
第一篇

学 科 志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

一、传入时期

“五四”运动前,四川出版的刊物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名字,并对社会主义作过简要解释的是《广益丛报》。1906年10月7日该报第118期发表同盟会员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前途》一文中,提到社会主义。

1917年5月,吴玉章在北京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一名词,早已通行于世界,而东亚人士尚有惴惴然惟恐其发生者,亦有援引而妄用者,殊不知今日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自德国之国家主义以至俄国之共产主义,派别虽多,大约可分为二:一急烈;二平和。急烈者,为改造的,即欲打破旧社会之组织而建设一新社会者也。平和者,为进化的,即欲就旧社会之组织而改良之者也。其手段虽有不同,其

认今日之社会为不良则一也;其欲使今日经济分配不平等之现象,使之趋于平等则一也。”他以甲午战后,爱国者留日学习革命学说相激励;“甚愿吾国青年目光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择一自信而力行之”。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五四”运动的爆发,带来了中国的思想大解放,激起了人们探求改造社会,追求真理,建立新的国家的愿望,在中国、在四川出现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潮流。1914年4月,四川出版的《国民公报》连续转载了《晨报》渊泉撰写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简要介绍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事迹。“五四”运动后,该报又先后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之解释》、《马克尔(即马克思)小传》、《劳农俄国的艺术》、《俄国过激派之研究》等

文章。

由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李劫人等人创办,1919年7月正式刊行的《星期日》周刊,先后发表了《俄国革命后的觉悟》、《波尔雪勿克党的教育计划》、《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和《随感录》等文章。这些文章反对剥削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主张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以共有财产制度为社会的基础”。该刊从第19号起,还连续转载了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大联合》。

二、传播与研究

20年代初,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王右木、萧楚女、恽代英、吴玉章、杨闇公、袁诗尧等人通过组织学术团体、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创办工人夜校、平民教育学校等多种形式,在成都、渝、川南、川北等地努力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学习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道路的思想,在四川迅速传播开来。

1920年冬,王右木等人以成都高师为基地,组建了四川最早的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参加的成员有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和少数工人。每星期天集会一次,采用自行阅读、分组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利用纪念日举行大型讲演会等形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王右木给读

书会讲过《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还指导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阶级斗争》(恽代英译)以及《新青年》等革命书刊。1922年2月,王右木、袁诗尧等创办了四川第一个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人声报》(周刊),该报第一期发表宣言:“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决社会上一切问题”;“讨论马克思主义之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为全人类谋幸福”。该报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揭露当时社会时弊,抨击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的罪行,激励青年学生、工农民众起来参加爱国运动。袁诗尧所写的《红色新年》一文,热情讴歌了“劳农主义的新俄国”,无情揭露了“白色化”(即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喊出了“打倒资本主义制度”、“打倒不劳而获的阶级”的革命口号,引起了封建军阀势力的注意,仅办了5个月就被迫停刊。它在四川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2年冬,王右木开办了成都第一所工人夜校,吸收各行帮工人和积极分子参加。他多次到夜校给工人讲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先后组建了长机帮、生绉帮、建筑帮、牛骨业等20余个工会组织,推

动了成都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2年9月,吴玉章来成都高师任校长。王右木和吴玉章在校内指导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筹组“平民教育社”,经常在校内举行报告会、讲演会,宣传革命道理,市内学生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他们积极组织和引导积极分子及读书会会员声援湖南第一纱厂罢工事件,支援开滦工人的罢工斗争等革命活动,使青年们受到了实际的教育和锻炼。

是年冬,吴玉章聘请恽代英来高师任教。恽代英和他的学生张济帆、余泽鸿于1923年3月到达成都。5月5日,王右木和恽代英共同在西南公学主持召开400余人参加的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的纪念大会。恽代英在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的学说和生平事迹的讲演,受到与会师生的热情欢迎。会后要求参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达50余人。

在此前后,恽代英又多次在高师演讲革命理论,赢得了进步师生的热情欢迎。吴玉章、恽代英、王右木3人所在的成都高师成了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他们组织进步学生深入到工厂、丝织作坊和教会学校工友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工会、发动工人罢工,还深入到近郊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

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秘密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中

国Y·C团”(中国青年共产团)并创办与发行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同年4月,他们又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在成立大会上吴主章以《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为题发表演说。这是中国早期马列主义文献之一。

1924年5月1日,吴玉章、杨闇公与王右木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合作,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了近万人参加的追悼列宁逝世的群众大会,杨闇公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资本对中国的侵略》的讲演。他呼吁青年“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进攻,为继承列宁未竟之志而奋斗”。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来川开展工作,为传播新思想,创办了《新蜀报》。应陈愚生的邀请,邓中夏、陈启修、张闻天等来渝讲学。他们通过讲学与师生接触的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1922年,萧楚女经恽代英介绍来泸县川南师范任教,因川南政局变化,改赴重庆联合中学任教。此时,学生择师运动蔓延全川,重庆、成都、泸县尤为激烈。萧楚女与熊禹治等人于1922年11月开办了“重庆公学”。学校除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社会,参加群众革命斗争。

1923年,萧楚女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任教期间,组织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进步刊物;发动学生抵制日货,并和国家主义派进行坚决斗争,还秘密

在万县师范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发展万县地区的革命活动播下了革命种子。1923年夏,萧楚女到重庆女二师任教时,被聘为《新蜀报》主笔。在他负责撰写的社论、时评和“社会黑幕专栏”中抨击时弊,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的文章中,还分析了产生这些罪恶的社会根源,使该报革命倾向日益强烈。

1924年秋,中共中央任命萧楚女为四川特派员,再次入川领导重庆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和四川的革命斗争。到渝后,他在《新蜀报》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任职。他和杨闇公、童庸生等组织“四川平民学社”。在重庆参加的成员多数是学生、青年工人和店员,共300余人。“学社”的任务是“研究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学和社会问题”;“参加一切改造社会的运动”,还创办了刊物《曙光》。萧楚女为该刊撰文,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针砭时弊。该刊仅出三期,即被查封。他还给青年们讲解马列主义基本原理。1925年元旦,学社在组织“新年聚乐会”时,在节目表演之前,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能救中国”“有无现实意义”的专题讨论。

1921年冬,恽代英到川南师范任教。每逢周末,都到白塔寺通俗讲演所去讲演,他结合近代国际国内斗争的史实,宣传新文化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平时在课堂教学中他向学生们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把自己翻

译的《阶级斗争》等马列著作,在进步师生中秘密传阅。他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组织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辛勤教育、帮助和影响下,许多师生接受了革命真理,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恽代英还利用寒暑假,团结和发动一些进步师生,组成了以“提高人民知识”;“多注重宣传社会主义”为宗旨的宣讲团。1922年寒假,他率领川南师范6名教师、24名学生组成的宣讲团,步行经内江、隆昌、富顺、自贡、宜宾、南溪、江安、合江等县,宣传反帝反封建及爱国主义的革命真理,传播新文化知识。

1921年,袁诗荃应聘到南充中学任教,同时兼端明女中、顺庆联中的课程。他积极参加吴玉章在南充中学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他和张秀熟一道给学生宣讲时事和革命道理,向学生推荐《响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宣传和扩大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师生中的影响。据当时在校的罗瑞卿回快说:“袁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新知识’,使我‘学习了一个新的主义’;那就是马克思主义”。

1923年,王维舟返乡后,在清溪镇创办了“宏文小学”和“新群女子小学”。他聘请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任教,并吸收他们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他把朝会上唱旧国歌改为唱《国际歌》。在图书室中陈列《响导》《中

国青年》《新青年》等刊物供学生阅读。他们还到农村开办工农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工农群众觉悟,使马克思主义在川东北地区传播开来。

王右木、恽代英、萧楚女、吴玉章、杨闇公、王维舟等在四川各地努力宣传马列主义,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和革命骨干,建立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7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开始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此期在省外川籍学者赵世炎、陈启修、郭沫若、漆树菜、傅于琛、杨伯恺、周辅成等人也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

1919年秋,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读书,主办《工读》半月刊。在该刊发刊词中,他公开主张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此后,他不断向国内刊物投稿,先后在《响导》周刊、《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苏俄与美国》《列宁及列宁主义》《列宁》《世界第一名帝国主义—英国》和“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等文章。他是较早在中国报刊上系统介绍列宁及列宁主义的人之一。他在题为《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的长篇报告中,强调加强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他说:“共产党是中国工人的政党,亦即领导中国工人阶级与贫农及一切

受压迫民众革命的最高参谋部”。1927年上海第二次起义遭到失败后,赵世炎在《上海的第二次起义》一文中愤怒地指出:“白色恐怖的屠杀,只有激起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恐怖答复恐怖,这便是革命的状态。”“枪杆子无论如何不能放下,这是我们用血肉换来的。而且我们手里没有武器,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没有保障。”他清楚地指出了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革命人民对反革命敌人应有的态度和枪杆子对建立和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性。

陈启修是我国最早系统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1919年他应聘到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这年5月,发表《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传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此后,他先后出版的著作有《新政治学》《新经济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他译有:马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他定名为《资本论》第一分册(1930),这是国内《资本论》最早的译本。他还译了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1929)。这些著作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四川的传播起到良好的作用。他还把讲授《资本论》的讲稿整理成册,题为《经济学讲话》,1934年出版发行。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郭沫若1924年在日本留学期间,

译出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后,他又译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漆树菜 1924 年在上海法政大学任教期间,写成《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书。马寅初觉得书名太刺眼,怕妨碍发行,因改题为《经济侵略下的中国》,1925 年由上海独立青年杂志社出版发行。这是国内学者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列强侵华罪行的专著之一。

杨伯恺 30 年代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他在《研究与批判》等杂志上先后发表:《数学的抽象性与实在性》(1935.9)、《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科学的哲学之需要》(1935.10)、《必然、偶然、自由诸范畴之检讨》(1935.12)、《质与量》(1936.3)、《连续性与不连续性》、《本质与现象》、《哲学是什么?有什么用处?》(1936.12)、《机械的物质论与辩证的物质论》等文章,传播辩证唯物主义。

此外,傅于琛译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山川均的《资本论大纲》(1930)。周辅成在《再生》杂志上发表有《未来的哲学——新唯物论》、《关于唯物辩证法论战》(1934)等文章。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与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 年 8 月,罗世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从延安返川。他担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后,经常出席川康特委的学委会议,给学委干部们讲马列主义理论,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他还指导四川大学等校的学生运动。他经常给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三位知名教授作工作,帮助他们积极投入抗日运动。这三位教授,后来在成渝两地的高校教学中,宣传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张曙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入川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用革命理论武装党和群众。还秘密组织印刷、发行列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进一步,退两步》、《怎么办?》等书。

1938 年武汉沦陷以后,八路军办事处迁来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刊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千方百计地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出版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有关的介绍文章。1939 年 2 月《新华日报》印刷厂在重庆出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刘云合译)。1940 年 12 月 5 日,《群众》周刊第五卷 13、

14期合刊,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特地在封面上印制恩格斯的木刻头像,并辟特辑专栏,发表《恩格斯生平、著作及其事业》(葆荃编译)、《近代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梓年写的专论)、《恩格斯论民族问题》(华西园)等文章和《恩格斯著译编目》。解放战争初期,《新华日报》社在重庆还出版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文献》等书,这些著作在四川省内广为流传。

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出版了《毁灭中的日本》、《日本在泥淖中》,同时发表译著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继续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第一手资料,北平沦陷后,陈启修回川继续在高等院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同时还发表了《经济恐慌下的日本》。彭迪先出版《战时日本经济》揭露日本侵略者在经济方面的虚弱本质。樊弘随中央大学迁川而回到重庆,发表《关于马克

思和凯恩斯的资本积累、利息率和货币理论的比较研究》。这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文章之一。同时还针对当时国统区的现实发表《现阶段中国经济病症症结》、《只有两条路》等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刘诗白译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

川籍在外学者雍文远发表《评美国克林(通译克莱因)凯恩斯革命》、《评英国罗宾逊论马克思的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展开了批判。沿海沿江地区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内迁四川后,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来四川,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与研究。1939年张仲实出版译著《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著)、沈志远出版译著《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著)、1940年,许涤新等出版了译著《怎样研究资本论》。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了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开始大量出版、发行,党政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等部门都相继建立了时事、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即干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制

度)。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干部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共

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克思主义教学正式进入学校课堂,作为各级学校的必修政治课,各高校设有马列主义教研室(最初称政治课教研室),负责讲授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全国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成为四川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学习运动

1950年,川北大学张静虚发表《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这是四川省50年代以来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材,被推荐为学习材料。同时,为配合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省内各高等院校纷纷建立起政治课教研室。

同年,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相继重新发表,省内组织了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1951年,在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全省组织展开了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群众运动。

1952年,11月,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在国内出版。不久,根据斯大林意见修改后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亦出版。这两本书在国内被指定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必读参考书,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的新热点。一个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潮流开始兴起。

1953年,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七中

级党校首先组建了哲学教研室,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1955年,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相继效法,开始形成全省普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局面。

1955年3月,四川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同时在成渝两地举办“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专题的讲座。为适应全省学习的需要,省委成立“哲学编写组”,成员有四川大学的戴伯行(组长)、倪受禧、蒲寄宵、卿希泰和四川医学院的萧篔父等5人,编成《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四川省最早集体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之一。与此同时,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也组织学者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供电台播送,同时在《四川日报》连载。

同年,彭迪先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布》和《货币信用论大纲》,宣传马克思货币理论,探讨不同社会条件下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四川财经学院吴忠观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川籍在沪学者漆琪生出版了《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问题》,重点讨论了我国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向、方法、步骤和形式等问题。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李哲愚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价值规律对于社会

主义生产,就全社会来说不起调节作用,但在局部范围内还起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的观点。

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省委于1958年组织了学习毛泽东三篇哲学著作,理论联系实际的群众性学习运动。在这次学习运动中发表了一批论著,主要有李善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四川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目前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赵苍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四川大学王树德、李毓荃、鄢文相和邓清和合写的《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

川籍(在外)学者漆琪生结合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先后发表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对正确处理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指导意义》《资产阶级中间派的特性和改造问题》等文章。北京大学罗志如发表了《资产阶级国民收入理论批判》。复旦大学宋承先发表《马尔萨斯经济理论批判》和《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批判》两部著作。樊弘发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说的终结》。

1959年,四川大学成立哲学系,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课,以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为主要教材。并结合毛泽东三篇哲学著作(后增为五篇)进行教学。1959~1966年,培养哲学专业学生289人、硕士1人。

1959年6月,四川大学经济系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围绕于瑞熹《略谈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若干问题》展开讨论。与会者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存在的原因和范围、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同年7月,四川财经学院召开学术会议,就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性质、国家与职工之间的交换关系、人民公社的商品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共产主义制度下有无商品生产等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陈启修的观点十分令人瞩目。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营企业生产出来并被调拨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同意“说这种生产资料只具备‘商品的外壳’”的观点;同时还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下仍然会有商品。他的这些观点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大相径庭,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陈启修“舌战群儒”,毫不退让,把讨论推向了高潮。会后,他撰成《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一文,发表在该院刊《财经科学》1959年第四期上。这是他解放后撰写的第一篇、同时

也是最后一篇论文。

当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在上海召开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学术讨论会。出席的四川学者有李道南、樊弘、漆琪生、雍文远、宋承先等5人。会后,他们的论文均收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一书。樊弘在这次会上提出被称为“摆渡论”的观点,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采取商品生产关系,可以更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力,能将我们带到共产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界曾名噪一时。从1960年起,省内学者开始编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该书196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与此同时,川籍在沪学者雍文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下,与人共同主编并参与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该书于196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四川又组织了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省委党校、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学术讨论,编撰论著。四川大学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思想辑刊》,先后出版了三辑。1963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45周年,四川全省再次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运动。这次运

动持续时间很长。

在历次学习运动中,陆续出现一些研究成果。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薛习实发表《实践论产生及其重大意义》,四川大学高兴华发表《矛盾论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锐利武器》。四川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编辑出版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论文集),主要阐述《实践论》《矛盾论》的内容和意义的文章。四川大学哲学系集体编写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主要阐述“三论”的思想。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发表的文章有崔大田、郑青《谈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辩证关系》,灌畦《谈可能性》,魏明经《论否定之否定》和杨超等《魏明经先生论否定之否定一文之严重错误》,两文的观点针锋相对。

川籍在外学者复旦大学李成蹊《我对哲学的根本看法》针对王红玫等人关于哲学根本问题应当是一个还是两个发表了自己看法,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只能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南开大学王兴华《谈谈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关系》则是较早专门讨论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专著。

此外,60年代在参加全国学术讨论中,川籍在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贺麟《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转化》一文,提出了当时

全国哲学界公认的“定调”观点,总结了“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转化问题”的那场激烈讨论。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时间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大搞“语录”“经”“鼓吹”“顶峰”论,设置种种禁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神学,使它僵硬化、偶像化,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假马克思主义的圈子里,造成了全国性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四川和全国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工作完全处于混乱之中,理论工作者只能在规定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范围内编写注释和简介一类的小册子。

二、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四川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进入了新时期。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给中共中央写信,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5月2日,他在同中央两同志谈话时说:“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对待这个问题”。同时

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这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体系”。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接着,一场反对思想僵化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展开。11月,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编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文集)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

同年,四川组成了一个以杨超为首的“《实践论》《矛盾论》学习小组”,成员有张伟民、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彭泽农、四川工业学院林圃、四川省社科院毕剑横、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卢志清、包叙定、四川省社科院刘茂才、查有梁、李学明、西南民族学院范咀华等10人。1979年7月杨超发表《过程论》。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实事求是与哲学的基本问题》、《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等文章,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等两部专著。“两论”学习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撰写文章,主要有:张伟民《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探索》、林圃《历史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优秀哲学传统关系的探索》、毕剑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路线是实事求是》、《谈谈实事求是和哲学基本问题》。林圃、彭泽农《新时期运用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波浪式发展规律同对立统一规律的关系》。

这一时期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发表的论著还有四川大学鲁生、冉昌光与人合作写成的《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齐平、四川省社科院周振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鲁生《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发展毛泽东思想》、冉昌光、张锋、卢志清《照辩证法办事的光辉篇章——学习邓小平文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学习论十大关系》、四川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研究》、四川省社科院刘平斋、陈德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论》、四川大学楼凡《试析实践的本质属性》、柳平《应当重视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研究》等。川籍（在外）学者李成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主体与客体的理论初探》和《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认识论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

这方面发表的论著有：彭泽农、林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林圃《列宁的“三者同一”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四川省委讲师团《辩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提要》、四川大学哲学课程小组、四川学习杂志社《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学辅导》、

西南民族学院孟铸群、四川大学魏积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四川师范学院等8院学校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王仲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张国祺、崔广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决策的理论基础》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侧面作科学考察的学者论著有：齐平《论专业实践的作用》、崔建峰《试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特点》、戴大禄《浅析实践的结果在实践诸因素中的重要性》、黎永泰《试论主观意识与客观意识的划分》、冉昌光《论联系》、《把握事物的最佳量》、陈仲诚《假象及其对认识的作用》、袁亚愚《谈谈因果律的绝对性》、龚贵先《偶然性是必然性规律的外在表现》、幸强国《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逻辑顺序》、唐远镜《社会基本矛盾只应当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1985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书，戴大禄参与编写第二、第三章，楼凡除参与编写第十五、第十六章外还参与了统稿。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专题研究上，主要有王典泽《从共产党宣的七篇序言看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用社会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王仲士《列宁一生对哲学的研究》、袁亚愚《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鲁家果等

《“异化”的若干理论问题——兼评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等。

川籍(在外)学者北京大学黄楠森先后出版了《哲学笔记 注释》和《哲学笔记 与辩证法》两书,受到国内学者重视,他同北京大学周辅成合编《马克思与人》(论文集),收入论文 12 篇,其中有周著《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谈“人”和“人的解放”》,都不同程度地批评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观点。

(四)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1978 年,高兴华等发表了《关于自然界的基本矛盾问题》,此后陆续发表的论著有张国琪《自然辩证法学科性质初探》,姜爵一等《试论自然辩证法在哲学教学中的地位 and 运用》。高兴华参与苏炜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中“和谐原理”一章的编写。谢泳新长期致力于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他在 1980 年 4 月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学报》上发表《中医学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后,又参加编写《中医学辩证法概论》一书,还主编专著《中医辩证法原理》。华西医科大学的周纯也对医学学科哲学问题的探索作出了成绩,他写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新进展》一文,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逐步深化。在自然辩证法史方面有张伟民、毕剑横《发掘中国古代医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加强自然辩证法史

的研究工作》,张国祺、戈欣《真理发展规律探析——自然科学史上成对学说演变的启示》。在运用自然辩证法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能达成《用自然辩证法研究八一年特大洪水》一文,阐述了水的社会功能、水与旱的相互关系、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相互统一的思想,并提出了关于成都平原防洪措施的建议。杜洪作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提出的有关以林为核心、处理好“七山一水两分田”的七条合理化建议。川籍(在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沈小峰《试论自然辩证法的三个规律》,缕述了系统层次律、转化守恒律、循环发展律等自然界三个规律。华东化工学院陈奎德《当代科学新思潮——耗散结构论的启迪》针对耗散结构理论中的哲学问题作了细致的探索。

之外,哲学界还针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其中各种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撰写出一批有分量的论著。如齐平、杨洛《经济体制改革的哲学思考》,包叙定《正确处理增强企业活动力中的若干辩证关系》等。

(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问题。1979 年以来,刘诗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贺弘毅、川籍(在外)学者雍文远等人,发表论著有:刘诗白《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贺弘毅《马克思公有制理论在中国的实践》,雍文远《从

所有制结构看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问题。姜凌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企业中实现的形式和特点》一文中概述了企业如何从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实现这一规律的途径。川籍(在沪)学者漆琪生《关于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对这一规律的详细表述。雍文远在《社会必要产品》中则认为,这一规律可以称为“社会必要产品规律”。

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问题。有袁平《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要求》、周春《谈计划经济调节与市场经济调节的有机结合》、周振华《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李少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刘诗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雷起荃《关于指导生计划的几个问题》、周春《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些专著和论文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存在的重要性和长期性。

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有西南农学院鲁济典《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吗?》、《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影响》、西南农学院刘之林《略论搞好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石柱成《社会主义固定资产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四川大学王兆亮《论社会主义总产品、纯

产品和剩余产品的性质、结构和效益》。川籍(在沪)学者宋承先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关于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三个公式》。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史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和政治经济学史的编写和探索。陆续出版了李善明、周成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四川师范学院吴世泰与人合作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史》。川籍(在沪)学者雍文远《试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和以该文提出的观点为根据,主编并参与编写的《社会必要产品论》。

关于《资本论》问题。先后发表了彭迪先《马克思论抽象劳动》、张赞洞、李善明《剩余价值理论概说》第一册、柴泳《试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的形成》、晏仁章《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规律》、刘诗白《资本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王永锡《资本论第三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意义》、李善明《马克思劳动力商品学说的创立》、《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等论著。川籍(在外)学者宋承先发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初探》,阐发了原著精神。他的《资本论提要》和漆琪生的《资本论大纲》都是辅导阅读《资本论》,流播全国的著作。

第三节 主要著作选介

一、专 著

《经济侵略下之中国》 漆南薰(树菜)著。上海独立青年杂志社 1925 年 10 月出版,约 20 万字。全书共两篇:第一篇总论,下分五章,论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等;第二篇各论,下分八章,论述商埠、交通和国际投资等。本书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提出中国受“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问题,分析列强蹂躏的根本症结;论述经济侵略旨在保护其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论述列强与军阀勾结,导致连年内战,使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弱国家,更以大半篇幅揭露列强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辟商埠和设置租界,对我国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迫害。本书是“五卅”运动时销售最多、影响很大,为中国共产党人肯定和称赞的重要著作。

《经济学讲话》 陈启修(豹隐)著,北京好望书店 1934 年出版,约 48 万字。本书系作者在北京大学讲授《资本论》的讲稿,经增删而成,是作者在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作。全书共六篇二十九章,讲述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立场、观点和方法;商品、价值和货币;剩余价值、资本和工资;平均利润、商业利润和银行利润;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危

机,资本经济的扬弃等一系列原理。大体与《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内容相当。密切联系实际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每篇篇末都专设揭露、剖析旧中国社会实际的章节。分析了洋奴、买办产生的必然性;分析了外国大资本家、中国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紧密勾结、结为中国人民三大敌人的经济背景,等等。本书还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相反的种种价值学说。最后,作者提出发展民族产业必须分三步走的见解:使中国“真正独立自主”;“使全国土地国有”;“一切产业上的重要生产手段,收归国有、国营”。认为这是“理论的必然归结”。

《实用经济学大纲》 彭迪先著,生活书店 1940 年 7 月出版。本书依次从商品、货币流通进行分析,引出资本这一范畴,进而阐明资本的周转和增殖,阐明平均利润和地租如何形成等。作者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得概括为“基本所得”和“派生所得”,对两者作了清楚解释,得出一切所得都流向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论断。通过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等的介绍,让读者大体了解资本对国内剥削、对国外掠夺的方式与手段。本书从 1945 年起的 3 年间,陆续出版发行了

2、3、4版,1948年又在香港发行第5版。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李哲愚著,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约6.8万字。作者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要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价值规律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就全社会来说,不起调节作用,但在局部范围内还起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这和苏联当时流行的观点是不相同的。强调国家要自觉地利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即自觉地利用计划与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李善明、周成启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约22.2万字,本书概述了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过程。突破了苏联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以著作为中心的传统体例,以劳动价值学说、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学说、资本理论、工资理论、资本积累学说、再生产学说和经济危机理论为线索,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剩余价值论为核心来安排其结构和体系。本书采用多层次的对比方法,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比,从而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就和局限,马克思恩格斯的新贡献,以及他们如何克服前人无法排除的矛盾而建立起彻底的科学

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杨超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约25.6万字。本书原型是作者在“文革”中被关押期间,为了反对林彪关于“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句句主义,驳斥江青诬指他是“右派黑格尔”,学习毛泽东思想时写的笔记。粉碎“四人帮”之后,由张伟民、彭泽农等人协助整理成的一部著作。本书是一部较早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专著。作者力图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全面地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哲学课题。作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唯物辩证法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以实践理论为基础,以矛盾学说为核心;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可以概括为一个体系(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三者同一)、两类范畴(认识论过程的范畴与实践过程的范畴)、三个论(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四条规律(对立统一是根本规律、平衡不平衡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彭泽农、林圃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27万字。本书针对流行的哲学教科书在体系上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联系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

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完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全书围绕体系改革这个中心,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指出,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其根本问题就是违背了列宁提出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围绕“三者同一”原则,阐述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内容、结构和功能等重大问题。中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建立完善哲学体系的思想内容发展线索,剖析了不合理的哲学教科书赖以形成和传播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下篇着重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哲学笔记 与辩证法》黄楠森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2月约版,20.8万字。本书对唯物辩证法思想既作了介绍和解释,还有一定程度的发挥。全书九章:第一章,作者把列宁在1914年至1915年间对辩证法的研究过程作了阐述。第二章,作者对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对象、内容和体系的重要思想作了详介,并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逐步深入考察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内容以及体系的设想。而且列出了具有三十六对范畴的辩证法体系的范畴表。第三~七章,作者对列宁关于辩证法范畴和范畴体系的思想作了介绍和发挥。不仅缕述了整体范畴、并存范畴、层次

范畴、过程范畴和认识范畴等五类体系问题。第八~九章,作者针对列宁论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辩证思想,从揭露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党性、黑格尔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种形式、关于对立统一规律以及关于感觉和概念等五个方面作了分析和研究以后,总结出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和改造问题上的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鲁生、冉昌光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约26万字。本书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完整准确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本书有四个特点:突破了按哲学原理的一般结构来编写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框框,实事求是地论述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设专节结合改革开放时期实际)来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广泛吸收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结合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体会来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齐平、周振声主编,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约20.9万字。本书采用史论相结合方法,对毛泽东哲

学思想作了全面的纵深的考察。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着笔,然后落墨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展开、运用与成熟;对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各个侧面进行阐述,其中尤着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三大法宝”中的哲学思想的阐述;就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突出功绩与长远影响作了逐步深入的解说。

《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刘诗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约15.5万字。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以后,研究所有制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在本书中,作者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内涵、结构和改革问题。关于内涵,作者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的关系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样性、多层次性以及不同经济管理形式的实质。关于结构,对比发达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特征,分析和概括了不发达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五大特征:即公有化的不完全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样性;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多样性与公有制内部的多层次性;局部占有性的存在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成熟;直接占有的不完全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成熟;商品经济关系

的存在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成熟;从这些特征引出多种经济形式和公有制形式内部的多层次结构。关于所有制的改革,作者认为,现阶段的公有制是一种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国家最高所有权与企业的部分支配权的差别和统一;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共占有与企业的局部占有的因素的差别与统一;集体所有制是以完整的集体所有、集体经济利益、直接的集体占有为主要内容,具有较为充分的独立性。并进而论证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拥有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和实行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形式。

二、论 文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吴玉章著,载《追悼列宁纪念号》,1924年5月1日社会主义研究会,成都出版,约0.76万字。本文是著者1924年4月13日在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文章预言:“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生命”;“最后的胜利终必归于劳动阶级”。

《“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赵世炎著,载1925年《“二七”二周年纪念册》,约0.21万字。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要得解放与自由,只有实行列宁主义,与继续“二七”的奋斗!。

《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光辉》卿希泰

等著,载《光明日报》1960年2月14日哲学第227期,约0.6万字。本文是当时国内发表的较早论述毛泽东“三论”的文章。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实践论》,第二部分论述《矛盾论》,第三部分论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转化》 贺麟著,载《哲学研究》1961年1期,约1.2万字。作者在本文中就他在1956年冬季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无同一性问题的讨论中所存在问题作了修正。承认那时只是在寻求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中的共同之点,在寻找抽象的、形式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而不是辩证的同一性。现在,他认为辩证的同一性,只能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要认真贯彻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必须承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其统一性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统一,不是统一于唯心主义,而应是统一于唯物主义。坚决反对黑格尔那一套把唯物主义统一于唯心主义,促使唯物主义转化为唯心主义的所谓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总是存在着的,我们的任务即在于依据事物本来的辩证和客观发展的规律,促成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化,使统一于唯物主义。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的终结》 樊弘著,载《新建设》1964年5~6期,约2.3万字。文章以马克思资本主义积累理论,批判凯恩斯学说的荒谬性。80年代以后,作者以本文为基础,编写成《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说批判》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袁文平著,载《四川日报》1979年3月13日,0.3万字。作者在肯定计划指导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成熟性,公有制存在两种形式,全民企业还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按劳动分配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等等,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存在和发展。作者在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的共同点后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劳动者需要为目的,以国家计划为指导,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意义在于:促使企业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自觉地讲求经济效益,提高生产率,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地位;同时注意处理好各方面的经济利益的关系。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者指出,计划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要受计划指导。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 漆琪生著,载《学术月刊》1980

年7期,约0.75万字。1979年《学术月刊》笔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栏内,作者曾发表文章,后来有人根据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论,对作者的观点提出质疑。作者乃作此文进行答辩。作者认为,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必须将实现现代化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为:“用在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基础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通过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促进社会生产多快好省地不断发展的办法,保证尽可能地充分满足国家、集体和个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进而完成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准备物质条件。”

《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影响》鲁济典著,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4期,约1万字。这是一篇答辩文章。文章根据翔实的史料指出:从手工工厂的变革中,纺织业的发展速度高出钢铁工业几倍。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广泛使用,出现了一系列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引起煤、铁、钢等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快于棉纺织业几倍甚至几十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进步由一个部门、一种工具的革新,变成一切科学领域、一切生产和非生产过程的根本变革,发达国家出现了两大部类平行发展,个别年

代甚至出现第一部类快于第二部类情况。据此,作者认为,那种不问经济条件,把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绝对化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作者的这一结论对我国当时顺利实现调整任务和以后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都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论抽象劳动》彭迪先著,载《经济研究》1980年9期,约0.9万字。作者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对有关抽象劳动的误解,进行了评说。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的各种经济范畴是一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是历史的范畴。不能把抽象劳动看作生理学意义上的永恒范畴。

《从所有制结构看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雍文远著,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2期,约1万字。本文最早提出我国多层次所有制结构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观点。文章认为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以后的20年间,急于求成,在思想上一再犯“左”的错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认识这一国情。

《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周振华著,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4期,约0.6万字。文章具体论述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的特征:有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但不发达;建立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多层次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国家统一计划的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初步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积极合理地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观点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略论搞好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刘之林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1期，约1.4万字。本文新提出有积累的内含扩大再生产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主张，并作了科学的分析。文章引证了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农业上推广籼型杂交水稻、河南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的技术等范例，说明这些办法对挖掘潜力，提高生产效益，搞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作用。

《试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形成》

柴泳著，载《经济研究》1983年1期，约1万字。作者把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形成，概括为三个小段：1842～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肯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鉴于私有制下价格不断波动，经常背离价值论，从而怀疑价值本身的存在；1844～1846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是受历史限制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把劳动看作是决定价值的本质因素，因而对劳动价值论转而加以肯定；1847～1849年，马克

思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两本著作中，已经完全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但是，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扬弃其缺点，继承其科学因素并加以革命变革。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价值规律是在价格的波动中实现的。这为以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社会主义固定资产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石柱成著，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2期，约1万字。作者从实物形式和价值形式上考察了社会再生产，为区别固定资产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理论前提。作者依据固定资产补偿和积累的原理，分析了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的区别和联系，从而首次提出了应当采用“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新概念，以代替“基本建设”这个旧概念，把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内容都包括在固定资产投资之内，对固定资产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实行统一计划，分别管理，以保证技术改造和控制建设规模，作者把固定资产投资分为新建扩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内涵扩大再生产），前者既有资金量的增加，又有技术水平的提高，后者不仅有生产要素效能的提高，而且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资本论》第三卷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意义》王永铎著，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2期，约1万字。文章

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在本原理,是可以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的。文章着重从我国的产业,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的调整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结构和模式,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这些原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运用问题。

《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产品价格的形成》周春著,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6辑,1983年3月,约1万字。本文对下列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过去理论界在讨论农产品的价格时,都是把级差地租作为一个既定的组成部分,据以决定农产品的价。本文明确指出,不是级差地

租决定农产品的价格,而是农产品的价格决定级差地租,从而在理论上把级差地租和农产品价格的关系论述清楚了。近几年来有人主张农产品应按中等土地的生产成本定价。本文指出,农产品不应按中等土地上的生产成本定价,而应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按劣等土地上的生产成本定价。多年来“剪刀差”的存在,证实了本文的观点符合实际情况。有人主张我国农产品不要统一定价,而实行分区定价。本文指出,分区定价使毗邻地区农产品价格不能衔接,助长投机贩运,因此,实行统一定价,并制定合理的地区差价。

第四节 主要学者选介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903年留学日本,1906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同年领导荣县“九·一五”的独立斗争,1912年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1913年反袁斗争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被迫流亡法国后开始研究欧洲各种社会思潮,探索救国道路。1920年提出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为总目标的政治主张,受到广泛欢迎。1922年任命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校长。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等职。1946年4月在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大学校长、全国教育工会主席、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1954年起,历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有《吴玉章文集》行世。

陈启修(1886~1960)后改名豹

隐,男,四川中江人,幼年读私塾。其父系清朝翰林,晚年任广西桂林书院山长。陈启修随父在桂林就读,1907年赴日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3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1916年在日本与王兆荣、周昌寿等发起组织由李大钊倡议的“丙辰学社”即“中华学艺社”。并任首届执行部理事,在《学艺》杂志上发表《国宪论衡》、《孔道与国宪》、《欧洲大联邦国论》、《对德外交之公正批判》等。流亡日本期间,出版译著百万字左右。1917年毕业回国。191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与李大钊在北大举办“现代政治讲座”。1923年12月由北大派遣赴欧、苏考察、讲学。1925年回国仍执教北大。1925~1926年,先后在中共北京区委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广东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大革命失败后被南京政府通缉。1927年12月至1929年流亡日本,从事著译。1930年再应蔡元培聘回国执教北大。1932年在泰山与李达为冯玉祥讲学。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济顾问和国民参政员。1946年与马哲民创办重庆西南学院,兼任川北大学商学院院长。1947年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1952年任四川财经学院筹委会委员兼教务组长。1956年定为一级教授。历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和四川政协常委。陈启修在学

术上的主要贡献是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代表作有《新政治学》和《现代国际政治讲话》等。

漆南薰(1892~1927) 名树葵,男,四川江津人。1924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回国后在上海法政大学执教。1926年回到重庆,在重庆中法大学任教,兼任《新蜀报》主笔,国民革命军20军第5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3月31日,在主持“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时,惨遭暴徒杀害。代表作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

杨伯恺(1894~1949) 原名杨洵,又名杨道融,男,四川营山人。20年代初赴法勤工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委员、中法大学教务长。1929年底应成都大学校长张澜聘请,来成都任教。1930年因参加中共领导的广汉起义失败,遭地方政府通缉,被迫离川去上海扩办辛垦书店,同时潜心著译。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四川从事上层统战工作。1938年任成都协进中学教务长,组织抗日进步团体,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常为《华西晚报》撰写评论文章,抨击时弊,宣传民主。1944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9年12月7日在成都青羊宫十二桥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著有《自然科学的发展及科学的哲学之需要》等。

第二章 中国哲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古代四川的中国哲学研究

四川古为巴蜀之地,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史记·天官书》记载:“昔之传天数者……周室史佚、苾弘”,蜀人苾弘是周代著名的天文历象家。《淮南子·汜论训》中载:“昔者长宏,周室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苾弘精于术数,对后来四川学术思想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汉代四川著名的思想家有严遵(字君平)和扬雄。严遵为扬雄的老师,著有《老子指归》和《庄子注》。他继承了老庄的哲学思想,强调“无者生有,虚者生实”的本体观和相反相成的辩证法,继承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强调“君者民之根”;“务在顺民”。扬雄继承苾弘重象数的传统,根据天文历法的新成就,模仿《周易》而作《太玄》,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他在人性

问题上,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圣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的新观点。

唐代四川学者中最著名的有:李鼎祚、赵蕤、李荣、王玄览、杜光庭、宗密、马祖等。李、王、杜是道教学者,宗、马是佛教学者。李鼎祚著《周易集解》,收集了汉代以来三十五家易注,保存了汉代早已亡佚的易象。赵蕤著《长短经》,强调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两宋时期的四川是人才辈出的时期,出现了陈抟、苏洵、苏轼、苏辙、张浚、张栻、张行成、魏了翁等知名学者。陈抟首创先天易学,开创易学图龙派;苏轼创立蜀学派,张栻创立了南轩学派,魏了翁创立鹤山学派。这些学派在宋代理学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宋代术数家张行成,著《周易通变》、《周易述衍》、《易元包总义》等书,故时有“易学在蜀”的说法。

从元初到清代中叶 理学式微 易学勃兴 交汇演变。在易学方面有赵采著《周易折中》,以程朱义理之学为主,兼采先儒象数、变互之学 将义理和象数折中起来。黄泽著《大易缉说》,其说主象数学,以河图配先天卦 以洛书配后天卦。王 申子著《易学滥觞》,认为王弼废象数而遁於玄虚,汉儒之象数失於琐碎,於是力主折中。熊良辅著《周易本主集成》,熊过著《周易象旨决录》,二熊之学亦主象数。来知德著《周易集解》,主象数学,以错综中爻解易,多有新见。在义理上 强调“太极”“阴阳”的实体性,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全都是阴阳二气及其变化而已。理学方面 虞集为吴澄弟子,主朱陆会合之学,认为朱陆之学大同而小异,吴澄、虞集等“朱陆会合”的思想,对王阳明心学的兴起起了重要的孕育作用。而杨慎则举起反对宋学的旗帜,他提倡实据、实证、实用之学,开清代朴学之先河。中经毛奇龄等人,到了乾嘉时代,蔚然成为盛学。唐甄著《潜书》,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专制制度,都进行了尖锐的深刻的批判,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主义意识的政治和经济的主张,特别强调国家要以富民为根本任务。费密著《弘道书》,他批判宋明理学,提倡汉唐古学,强调实以致用。刘沅之学以阐明孔孟之道为宗旨,在研究方法上站在客观分析的立场,摈除门户之见,其哲学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内容

十分丰富,在清代有很大的影响。

二、近代四川的中国哲学研究

产生了今文经学运动。首倡者如庄存与(1710~1788)、刘逢禄(1776~1829)是一般地探索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到了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6)时,开始强调今文经学的变易哲学。依据公羊三世说提出变法维新理论的是廖平和康有为。四川井研人廖平首先提出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孔子是主张更法改制的,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廖平以“经学六变”闻名于世。一变倡平分今古学;二变倡尊今文经学;三变倡小统大统学;四变倡人天学;五变倡人天小大学;六变倡五运六气学。廖平首创以“礼制”的不同来区分今古学。自谓毕生学说“专以尊孔尊经为主”,目的是为了改制救弊,保种爱国,廖平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同时吸收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形成自己的变易哲学和进化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文明后又不断有变革,故历代制度不同,不能拘泥株守,必须随地变通,因时改制。廖平著《辟刘篇》和《知圣篇》,认为古文经皆刘歆伪作,只有今文经才是孔子的真正之学,其主旨是托古改制。康有为全部继承其说,本《辟刘篇》作《新学伪经考》,本《知圣

篇》作《孔子改制考》,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由于廖平全盘否定古文经,康有为、崔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大张其说,实开近代疑古辨伪之风,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邹容 1903 年出版《革命军》,站在哲学高度,论证了革命是宇宙演进的普遍法则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环节,同时还认为革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舍此别无他途。

吴虞从 1917 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以及一系列批判封建礼教的文章,闻名全国,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吴虞运用资产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首先批判儒家的“孝”和“忠”,指出:儒家以“孝悌”来联结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干;“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其次他批判礼教是以等级为根本,造就顺民以利于其统治的,同时还指出礼教吃人的本质。第三,吴虞指出:“天下有两大患焉”;“君主之专制,铃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为使国家兴盛必须革儒教和专制政治之命,使“真理益明,知识益进”,创立新说;“鼓舞言论思想自由之风潮”。

1916 年 5 月,中华书局出版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起自上古,暨于近代,凡哲人巨子,树风声于当

时,标新义于后代者,皆掇其学说之要,用今世哲学分类之法述之。该书是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用新体裁所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谢无量对中国文学、经学以及中国哲学史均有较深的研究。他在《佛学大纲》中指出:“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哲学,道术、儒学、理学、佛教的义学均是哲学”。他还指出:“哲学必起于宇宙之观察”;“见其全者为哲学,哲学者全备之学”;“见其偏者为科学,科学者偏备之学”。他认为近世哲学大致分为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三类。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正是按照这样的分类,根据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论述各家各派哲学思想的源流,揭示各家各派哲学之义蕴、特点,论述简明扼要。

三、“五四”以后四川的中国哲学研究

“五四”以后,学术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的局面。一些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进行新的探索;从 20 年代开始,兴起现代儒学文化思潮,十分重视哲学问题的研究,四川的学者在以上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其中成就卓著者有郭沫若、蒙文通、贺麟、唐君毅等。

郭沫若在学术思想史方面有两部重要的著作:《青铜时代》和《十批判

书》这两部书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传统学术,认为:

(1)孔子与儒家是有区别的,孔子时代的儒家与秦汉之际的儒家更是不同。孔子的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是站在代表人民的利益方面的”。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爱人也包括爱奴隶的意思,因此,孔子的“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潮流的。”

(2)墨家作为孔子学说的反命题而出现,其基本立场是“完全相反的”。墨子是一位宗教家,神权起源论者;政治上是一位顽梗的守旧派,反抗时代精神的复辟派。

(3)前期法家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具有进步的思想政治倾向,而对后期法家持批判的态度。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来说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来说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来说是墨家”。秦始皇综合了先秦诸子的大部分思想。

(4)黄老道家是稷下学宫中重要的一派。他们共分为三派:一是宋钘、尹文派,他们是以调和儒墨的态度而出现的,一是慎到、田骈的一派,他们是把道家的理论向法理的一方面发展了的,还有一派是关尹《道德经》是关尹为发明老氏旨意而作的。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庄子》全部继承了黄老学派的宇宙观,并对庄子的消极思想进行了批判。

(5)名辩思潮的产生是因为“社会制度发生变革,各种事物起了质变,一发关系都动摇了起来,甚至天翻地覆了,这样就发生了名实矛盾,于是名辩思潮应运而生,它是原于儒家的“正名”。还对名辩思潮的学者一一进行了分析。

(6)对先秦天道的发展,指出:老子对于殷周的传统思想的确是起了天大的革命。继老子而起的智者是孔子,他对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持否定的态度,然而孔子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

蒙文通是历史学家,他博通经史,对先秦诸子、儒学、经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有很深的研究,因而他也是哲学史家。他认为:

(1)儒家之学源于鲁国文化。墨家之学源于代国文化,三墨者,即南方之墨,为谈辩一派;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秦之墨,为从事一派。阴阳家、名家属于墨家。道家之学出于楚国文化,道家分南北二派,黄老之学源于北方(齐)道家,杨朱学派亦属北方道家,庄周系南方道家。杂家属于道家。法家之学导源于秦文化,秦文化不同于中夏之文化。法家非徒务法而已,农以致富,兵以致强,纵横则为外交家,所以,农家、兵家、纵横家皆统属于法家。儒家主仁义,墨家主兼爱,法家以法为务,道家以虚无为本。儒墨、黄老、杨

朱、田慎之学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人与人相爱的思想。庄周一派以不屑之意待人,使人与人相轻;商韩一派以权术对人,使人与人相贼。儒家以人与人相亲爱立说,法家以人与人相贼害立说,由此产生出两家治术的不同。儒法之争为新时代思想之争。儒为旧文化之阐明,法为新政治之前驱。

蒙文通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合。申韩之学,本于黄老,取于形名,为其南面之术,荀子取于道法二家。《庄子》虽诋訾孔氏,但在《杂篇》中是有取于儒家的。《六艺》经传,汇各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并儒墨为一家最早的著作是《尸子》,《管子》一书是法与儒两家相调和的著作。儒法调和以后,学术渐流入统一。儒家兼采法墨之长,各家相争迹熄,而恢宏卓绝之新儒学得以形成,诸子汇合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其结果是形成儒学一尊的地位。

(2)对儒家的人性论,他指出:惟古之哲学,恒依于宗教而不可分离,哲学中心之命,与宗教中心思想之命,亦混而不可分。孟子以后,哲学与宗教分离,用性情之说代替原始的命性之说。哲命之说既邻于宗教,故儒者比纷纷然起而言性。

(3)蒙文通系廖平的弟子,因此,他批评古文经学,崇尚今文经学,并且还对其师之说加以发展。他指出:古文

经学兴起于王莽新室倾覆之后,其学不为宏言卓论,谨固之风足尚,而恢宏之论顿消。章句训诂,秕尘极目,而大义晦,微言绝。秦汉经师之传,由是扫地以尽。今文经学是继承先秦诸子的致用之学,舍经学不可以明子史,舍子史又何以明经学?三科九旨的核心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今文经学的理想是排除贫贱、富贵的悬殊,主张庶人议政和平等政治。儒家思想之政治,以明堂为最备,而理想之社会,以井田为尤精。

现代新儒学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家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是一种文化思潮。四川的贺麟和唐君毅是现代儒学中的两位突出代表人物。

贺麟在40年代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指出:中国哲学在近五十年是有进步的。有四点:陆王之学得到了盛大的发展;佛儒的对立得到了新的调解;理学中程朱与陆王的对立也有了新的调解;对于中国哲学史有了新的整理。产生这些进步的原因是由于西学的刺激,清末革新运动的勃兴,和从佛学的新研究里得到方法的训练和思想识度的提高和加深。最主要是,我们打开了文化的大

门,让西洋的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汹涌进来,逼使我们对自己的旧文化,如果不是根本加以怀疑破坏的话,至少也得用新方法新观点加以批评的反省和解释。

贺麟哲学思想走的是一条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他自觉地谋求使重视逻辑认知和理性思辩的西方哲学与重视道德评价和直觉体悟的中国哲学相结合。贺麟哲学有的关思想,鲜明地表现出新黑格尔主义的某些特征。他一方面融合黑格尔、康德和斯宾诺莎哲学;另一方面则又立足于调解朱程陆王,并以陆王“心即理”的原则统贯其全部哲学思想。

唐君毅 1958年初在香港《民主评论》9卷一期上,刊载了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4人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标题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全面阐述了中国文化的诠释方法、精神生命、伦理价值、心理意义、长存依据,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与民主政治、与东西文化的关系,世界文化的未来趋向等问题,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宣言》承认中国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在政治上能成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活动的主体。通

过这种主体的转化以实现对方文化的吸收,开出中国文明健康发展的道路。

唐君毅的哲学思想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对中西哲学的不同流派都力图客观加以评价,再找出它的圆融之处。唐君毅哲学思想的中心观念是“道德自我”,认为这个“道德自我”是超越自然环境、物质身体或生理欲望的东西。

此外,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有不少学者来川写了重要的论著。赵纪彬在三台东北大学任教时著《哲学要论》一书,在宇宙观上,系承接明清反理学一派而稍有修正,在认识论上,系依据孙中山知行学说而间有引伸;在方法论上,系采自黑格尔,对其余各家虽亦有称引,然于其持论相反之处,则取批评态度。高亨在乐山武汉大学执教时,写成《周易古经今注》一书,他说:“不守易传。历代学者注《易经》都是以传解经,我注《周易》则离传释经。”“不谈象数。《易经》本是卜筮之书,讲卜筮是离不开象数的,但是,讲《易经》的卦爻辞则可以不管象数”。金景芳先后在自贡东北中学、三台东北大学任教。在四川期间著有《易通》《春秋释要》《周易和老子》《研治经学之方法》,其中影响最大者是《易通》一书。

四、当代四川的中国哲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新时期,1959年四川大学哲学系建立了以邱坤为主任的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讲授中国哲学史,还开设了中国哲学原著选读课程,培养了一批从事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南充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学院、西南民族学院、成都中医学院以及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等陆续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课程,培养了大批人才。1980年3月,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1981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建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至此,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重点研究四川历代思想家、哲学家,先后研究了扬雄、严君平、越蕤、李荣、宗密、陈抟、张栻、苏轼、魏了翁、来知德、杨慎、唐甄、费密、廖平、吴虞等,并推出了一批成果。如李耀仙的《廖平的古学考和新学伪经考》,陈德述《试论杨慎的哲学思想》,贾顺先、蔡方鹿的《独具新风的思想家杨慎》,陈德述、蔡方鹿的《赵蕤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李远国的《试论陈抟的宇宙生成论》,于光贵的《费密的反理学思想和哲学思

想》等。

四川省学者对先秦的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发表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论文,对先秦哲学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如王德裕的《孟子思想的阶级实质》,李耀仙的《孔子的天命思想之我见》,罗世烈的《孔孟伦理思想初探》,阳正太《孔子道德观的抽象意义》,贾顺先《略论老子的道》,阳正太《墨子三表说初探》等。对汉代以后的成果有黄开国的《论汉代讖纬神学》,胡文和的《易经与华严宗学说的形成》,贾顺先、蔡方鹿的《宋明理学中的辩证法及其特点》等。四川部分学者还与全国一些高校的同行合编《中国哲学史》(1982年)、《中国哲学简史》(1982年)等教材。

在伦理学方面,周辅成是著名伦理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在50年代他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各界重视伦理学研究和道德教育,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并编译《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此外,贺麟还翻译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80年代初在国内学术思想界影响较大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其较早发表的学术性探讨文章中,有四川大学哲学系袁亚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和张儒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四川籍学者、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黄枏森发表了《试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作者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随即发表于《哲学研究》1983年第四期)。在当时的学术讨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政治系肖雪慧发表了《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1982年7月10日至14日,“四川省中国哲学史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四川思想家和宋明理学的有关问题。

1983年9月15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在新都主持召开了“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会议就杨升庵的哲

学思想的性质和历史地位进行讨论。

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潜书注》,该书对唐甄《潜书》的句义、词义进行注释,给读者阅读此书提供了方便。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虞集》。吴虞的著作曾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刊印过《吴虞文录》和由成都美信印书局1933年刊印过《吴虞文续别录》,木刻本的《吴虞文录》、《续录》、《别录》及诗集《秋水集》等。

在省外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川籍学者的研究亦有相当成就。如钟肇鹏对孔子的研究,萧篱父主编《中国哲学史》,杨宪邦主编《中国哲学通史》(第一卷)等。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 著

《今古学考》 廖平著,1886年成都刻印初版,收入著者自编的《四益馆经学丛书》。全书分上下2卷,上卷列有《汉艺文志 今古学经传师法表》、《今古学统宗表》、《今古学 宗旨不同表》、《郑君以后今古学废绝表》等20表,下卷载经话106则。此书是为他经学一变思想的代表著作。指出,汉代经学,今古文经并行,至郑玄混合今古,使后代经师不辩今古,今文经学几乎

废绝。廖平治经与郑玄相反,着意将混合之处分辨出来,力主“平分今古”之说。提出以礼记为标准来分辨今古文经。《礼记·王制》为今文大宗,《周礼》为古文大宗;古学从周,是旧制,今学改制,是理想,今古学礼制的不同,“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古学从周,是孔子少壮之学,今学主因革,为孔子晚年之言。廖平的这些见解,实为经学史上的创见。该书问世后,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曾面评为“不刊之书”。

《知圣篇》 廖平著,正篇 1 卷,续篇 1 卷。正篇成于 1888 年,1904 年与正篇合收入《四益馆丛书》和《新订六译馆丛书》,是廖平经学二变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廖平认为,古文经学是刘歆伪孱之学,惟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阐述其“微言大义”的真学,故主张“尊今抑古”以知圣人之真谛,使孔子之学重见于世。《知圣篇》的“尊今”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孔子是素王,受天之命,著之六艺,托之空言,以“微言”的方式改制立法。《王制》篇中所载的制度是孔子所创的新制,为一王之法,制度之统宗,而《六经》是经托古之帝王以寓新制之义,故与《王制》相合。孔子改制是根据前代制度因革损益而成。凡与周礼相合者是“因”,与周礼不合者,是“革”,参用四代,损益其间,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孔子改制的目的是为了振救周朝衰微之弊,故主张治经要从《王制》入手,反对空疏无用之学。另外《知圣篇》续篇论及廖平经学“二变”以后的“大小之学”和“天人之学”的内容。廖平写成此书之后,曾以稿本示康有为。康有为受其影响,依《知圣篇》尊今之义,于 1894 年写成《孔子改制考》,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学考》 廖平著,该书原名《辟刘篇》,撰于 1888 年,后据旧稿,几经修订,改名为《古学考》。1897 年,由成都尊经书局刻板印行。全书录有经学论说 73 则,其宗旨在于“明古学之

伪”,是廖平经学二变时期“尊今抑古”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认为古文经学是东汉时期刘歆伪纂群经而成。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而《周礼》非周公手订的西周礼制,是刘歆据《逸礼·官职篇》篡改而成,其弟子推其书以说《诗》、《书》、《孝经》、《论语》,马融以后,古乃成书,始与今学相敌,其用意在为王莽篡汉订立新制,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古文经学为伪,今文经学为真,主张尊今抑古。《古学考》在学术上“长于破坏”、“短于建设”。康有为受其影响,撰成《新学伪经考》,对维新变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革命军》 邹容著,上海大同书局 1903 年出版,约 2 万字。此书在国内外各地迅速翻印 20 余版,翻印本书名有《救世真言》、《图存篇》、《革命先锋》等,总印数在 100 万册以上,居辛亥革命时期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震撼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此书以犀利明快的语言,石破天惊的气势,为辛亥革命呼喊。“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吴玉章回忆说:“当我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中国古名家言》 伍非百著,1914 年至 1932 年之间撰成,约 50 万字。以后迭经修改,于 1949 年在四川南充石

印分送亲友及各大图书馆,1962年作了最后一次修订。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根据修改本排印出版。全书共分七个部分。书前有作者的《自序》与沈有鼎的《序》各一篇,后附有《邓析子辩伪》一篇。其中,第一部分《墨辩解故》,校释《墨子·经》上下与《经说》上下四篇,初名《墨子辩经解》,后改今名,1922年曾由北京大学晨光社单独出版。今本修改十之三、四,别附《墨辩校勘记》1卷。第二部分《大小取章句》,辨析《墨经》的《大取》《小取》二篇,附《大取篇校勘记》1卷。第三部分《尹文子略注》,诠释《尹文子》的形名法术之学。第四部分《公孙龙子发微》,手稿内容早被陈柱《公孙龙子集解》所采录,今本附有《公孙龙子考证》1卷。第五部分《齐物论新义》,从名学的角度探讨《庄子·齐物论》。第六部分《荀子正名解》,阐发《荀子·正名篇》为先秦名学集大成的见解。第七部分《形名杂篇》,考论散见于诸子书中若干短章、单句,综析为要略、法术、分守、名理、思辩等六篇。作者以逻辑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名家言,探本溯源,颇多新见。中国古代的逻辑学说和有关的逻辑学说,所有不同的家数和歧异方向,书中都一一阐明。

《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著,1916年中华书局初版,1980年台湾中华书局再版。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应用西方哲学的分类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发展

史的学术巨著。全书分上古、中古、近世三篇,论述自唐虞至清代的哲学史。作者认为,古之道术,即是今世所称的哲学,因此传统的儒、释、道三家之学即哲学。“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哲学史的任务是“述自来哲学变迁之大势,因其世以论其人,掇其说之要删,考思想之同异,以史传之体裁,兼流略之义旨”。作者认为,西方哲学的分类方法一般有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等,所以书中论述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大多采用这种分类的方法,他根据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内容,而冠以不同小标题,以显示其特点。如孔子,就有专章论述“六艺哲学”,道家的老庄,则专列章节介绍其“辩证法”,宋代的邵康节,则以专节介绍其“先天学”。该书虽然用较为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哲学史,但却以儒家为中国哲学的“正宗”,将儒家传说中的伏羲画卦以及尧舜治事作为中国哲学的“渊源”,视孔子的“六艺哲学”为“儒家之秘要,哲学之统宗”,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的观念。另外,全书的体裁仍有明清以来“学案”体例的痕迹,凡此,皆显示了该书有时代局限之处。

《吴虞文录》 吴虞著,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1938年成都美信印书局又出有《续录》和《别录》。1985年汇编入《吴虞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上、下卷,收有《说孝》、《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礼论》、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墨子的劳农主义》等论文,中心思想是非孝非礼,反孔批儒,应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中国古代道家、法家、墨家的反孔言论,来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和制度,认为“君主专制”和“教主专制”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两大祸患。他指出孔子儒家的核心是“孝”,忠、孝并用,使人任从封建家庭和封建君主的摆布;“以遂他们专制的私心”;“君王以此为教令,圣人以此为学说,家长以此为护符”,共同组成压制人民的“黑幕”,目的是要“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吃人与礼教》说:“我们中国人最妙的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讲礼教。”因此得出结论:儒家学说与礼教“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并说:“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就新国民”?另一方面,书中文指:“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把孔子本身与封建君主的利用适当区分开来。

《戴季陶先生文存》 戴季陶著,1959年台北出版。该书收集了戴季陶20~40年代的著作、论文、演讲等,其中主要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之

哲学基础》等文章。认为:“生存是人类原始的和终极的目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为着此目的而展开”,因此,人们“生存的欲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求生的历史。还认为“民生哲学”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建立一个以“仁爱”为中心内容的道统,以论证其“纯正的三民主义”乃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戴季陶否定阶级对立的存在,反对唯物史观,其思想实质是为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提供理论根据的。

《儒学五论》 蒙文通著,成都路明书店1944年出版。该书收有本论一篇:《儒学哲学思想之发展》《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漆雕之儒考》《浮丘伯传》《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附《儒学法夏法殷义》一篇,另收广论四篇:《周代之商业》《秦代之社会》《汉代之经济政策》《宋代之社会设计》。书首有作者的《题辞》一篇,书末附有《跋语》。据作者自言:“此区区十数篇者,既以先汉经说为子史之中心,亦即中国文化之中心,以此申先师(井研廖平)之义而广其说”。蒙文通曾师事近代经学大师廖平,膺服其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分之说,以其观点为立论之基础,对先秦至汉代儒家思想的发展予以深刻的论述,自成一家之言。

《十批判书》 郭沫若著,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年初版,1954年人民出

版社改排重印,1982年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首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该文概述了作者的古史研究观点,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经历了奴隶阶段,修改了作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否定井田制存在的有关论断。《孔墨的批判》认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变革潮流”;“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墨家是作为孔子学说的反命题而出现的,指出墨子肯定鬼神的存在,相信“天志”能赏善惩恶。既然承认鬼世界的神鬼的权威,当然就要承认人世间王公大人的权威,这是墨子思想的脊梁。《儒家八派的批判》探讨了孔子死后儒家思想的演变发展,分为子张氏之儒、子思氏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等八派,条分缕析,提要钩玄,对研究孔子后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指出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置,是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黄老道家是其中的重要学派,宋钘、尹文;田骈、慎到;环渊、老聘形成道家三派,专致于探讨宇宙本体的“道”;道家思想简直可以说垄断了两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庄子的批判》认为,庄子继承了黄老学派的宇宙观和本体论,将“道”作为超感觉、不为空间和时间所范围的本体,天地万物与一切理则都从道产生,庄子的“道”实是一个绝对

精神的主体。《荀子的批判》对荀子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其“制天命”的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颇能合拍。“性恶论”对于强调人性的改造具有有积极的意义。《名辩思潮的批判》正确指出,所谓“名辩”即是社会发生变革的形势下,要求所有事物及其关系的称谓应与其内容相适应,循名责实,文中逐一分析了告子、孟子、惠施、庄子、公孙龙、墨家辩者等思想中的名辩问题。《前期法家的批判》研究了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法家思想,认为他们都是“以学者的立场,以一定的法理为其立法的依据: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夏氏之儒,而慎到和申不害属于黄老学派。《韩非子的批判》剖析了韩非“道、术、法”的思想渊源和基本观点,如毁坏一切伦理价值,推行愚民政策,遇事不择手段,认为实行韩非的法家思想并推上极端,是导致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批判》针对有人“歌颂嬴政,有意阿世”,对秦始皇的“极权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贬斥。

《当代中国哲学》贺麟著,胜利出版社1947年初版,全书共4章。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阐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界“推翻传统权威和重新解释哲学思想之处”,介绍了自康有为、梁启超到冯友兰、汤用彤等

著名学者的主要哲学思想。第二章《西方哲学的综述与融会》,介绍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与融会。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评介“应用哲学思想以改造社会之处”。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作者认为,此章对于关系中国现代哲学思潮和时代思潮很大的知行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诸如“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的关系等,因此是“本书中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章”。作者在书中着重阐述了陆王心学在近代的发扬,有助于“反对权威,解脱束缚”,称孙中山“本陆王心学”;“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

《文化与人生》贺麟著,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台湾地平线出版社1973年再版,全书约20万字。该书系作者40年代的论文集,除序言外,分上、下两篇。上篇有《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宋儒新评价》等15篇论文,反映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儒家传统伦理如何融合于现代文明、并化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基本观点,是新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著作。下篇有《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经济与道德》、《论假私济公》等22篇论文,作者对人性之善恶、利己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权利与义务等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西方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和西方文明社会中的精神信仰、道德风气等作了

述评与分析。

《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著,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1985年台湾学生书局印行《唐君毅全集》列作《全集》卷1之2出版。全书由“道德之实践”、“世界之肯定”和“精神之表现”三部构成。在第一部“道德之实践”中,作者以“绝对的自律”界定道德生活的自豪、自觉;人生须响应“道德自我”的召引而超越“现实自我”的限制,才能步入上升境界体现道德价值。作者还肯定了道德生活的扩展、充实方面具有无限性,进而认为一切生活皆可道德化。在第二部“世界之肯定”中,作者着重阐述了道德心灵的“形而上性”,从哲学思辩的角度为“道德自我”寻求本体性根基。作者对人性本善持肯定态度。在第三部“精神之表现”中,作者认为人的生理存在或自然存在是受时空限制的外在方面,而作为人性内在的“精神的存在”却是超时空的,与上下四方和古往今来息息相通,进而作者相信内在的一致能克服外在的局限,人们能够建立起真、善、美的共同社会。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著,香港友谊出版社1958年出版,1975年台湾学生书局再版,约44万字。该书除导论外,共有10章,目次为:人类文化活动之涵义及其自觉性,家庭意识与道德理性,经济意识与道德理性,政治国家与道德理性,哲学科学意识

与道德理性,艺术文学意识与求真意识,人类宗教意识及其诸形态,道德意识通释,体育军事法律教育之文化意识,人类文化在宇宙之地位与命运。全书中心论题是道德与文化的基本关系,作者阐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估价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哲学原论》唐君毅著,分为《导论》、《原性》、《原道》、《原教》四篇,在台湾地区1966~1975年出版,全书共6卷,约200万字。全书的体例是:“即哲学史以言哲学,本哲学以言哲学史”。作者自谓:“其大体顺时代之序而论述,类哲学史,其重在辩析有关此诸道之义理异同及关联之际,则有近乎纯哲学之论述”,其性质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书中的《原性》、《原道》、《原教》与《中庸》所述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方谓教”的主旨相契合,将性、道、教三者合为一有机人整体,体现了一个现代新儒家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真切体认。

《中国思想发展史》(第一编)孙开泰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出版。本书对先秦时期的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着重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及百家争鸣。对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对前期墨家的杨朱学派许行,阴阳家邹衍,前期法家的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后期法家的韩非,道家的老子、庄子、稷下黄老之学

与宋钘、尹文,名家惠施、公孙龙,兵家孙武、吴起、孙臆,融合诸子百家的《吕氏春秋》等,都一一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不仅分析了诸子百家观点的差别、对立和相互驳难,而且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各家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该书还有专章分析研究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

《中国哲学史》萧蓬父主编,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出版上下卷。本书是教育部委托编纂的大学本科专业教材。全书共6编。上卷为奴隶制时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封建制形成时期哲学矛盾运动的展开,封建社会前期阶段哲学的发展3编。下卷包括封建社会后期阶段哲学的发展的新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哲学的发展3编。该书认为,哲学认识是人们以理性思维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认识,这种认识的发展充满矛盾,而最能表达这种认识矛盾的特殊性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引起的思想原则的分歧和对立。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就是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这部专著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净化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摆脱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对象不明,越俎代庖的现象,跳出了局限于对历史上某些学派分合、思潮起伏

进行现象形态描述的窠臼,着力探索中国哲学发展史的逻辑线索,注意发掘中国哲学遗产中的启蒙因素,揭示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本质矛盾和内在规律。

《孔子研究》 钟肇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此书收集了作者 60~80 年代初有关研究孔子的文章 12 篇,主要研究了孔子思想及其阶级性的问题。从政治、法律、哲学、伦理、教育、文艺、美学等方面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说明孔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不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着重论述了孔子讲的“礼”与“周礼”有原则区别。提出四条论据;周礼主“亲亲”,孔子讲“爱人”(仁民);周礼“举亲故”,孔子“举贤才”;周礼“礼不下庶人”,孔子“礼下庶人”;周礼以刑制民,孔子提倡德礼为治,又从周代法律的角度进行考察,论证了孔子是反对周代奴隶法的,并提出孔子反对“晋铸刑鼎”是对奴隶的批判这一与众不同的结论,为从周代礼制、法律上探讨孔子的思想开拓了新的领域。书中《论经和史》一文,利用大量的资料,历史地考察了经与史的关系,是一篇较系统地探讨经和经学源流变化的文章。

《孙中山哲学思想评传》 杨宪邦著,齐鲁书社 1984 年出版。该书认为,孙中山世界观虽有唯心主义的杂质,但基本上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和

特征的进化论,或进化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或二元论。也不是机械唯物论。孙中山的知行学说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因素,但基本上是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论,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了一崭新的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前知行学说的最高成就。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基本是历史唯心主义,但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合理的进步的内容,具有珍贵的唯物史观的因素。该书还论证了进化论的或进化的唯物主义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具有珍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是中国近代唯物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特殊形态,是由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必经环节和契机。

《中国哲学通史》(第一卷) 杨宪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本书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各个时期产生的哲学认识即人类智慧的矛盾发展史,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的发展史,它主要是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而开展的矛盾认识史,因而也就主要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在此基础上交织着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产生、成长、发展和在对立统一中斗争的历史是在斗争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而中国哲学又有其

他哲学不同的特色,这些特色形成多层次的综合的系统整体,主要是:中国哲学发展存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确立时期(先秦),封建社会时期(秦汉到鸦片战争),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样四个各具特色的主要时期;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治世”感、“济世”感;中国哲学思想与中国古代走在世界前列的自然科学技术密切联系,每个时代的进步哲学思想都凝结着当时科学的精粹成果,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中国古代哲学受到宗法伦理道德纲常的最首要的最大的直接影响,但不能归结为伦理哲学或以伦理为本位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战斗的无神论思想极为丰富;中国哲学具有强调变易发展、相反相成、日新过程等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优秀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形成主要是本体(实体)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哲学主要是进化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二、论 文

《儒家思想的新展开》 贺麟著,载《思想与时代》月刊 1941 年第一期。作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至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现代以及今后的新发

展而言,就其在变迁中、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因此,现代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应是最新与最旧的统一。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而民族的复兴本质上应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中主要潮流和根本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面对现代西方文化学术大规模的输入,中国人要能真正彻底了解并把握西方文化,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吸收、融合、转化西方文化以形成新儒家思想和新的民族文化,否则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儒家思想新发展所取得的途径有以下三条:用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的正宗哲学发挥中国孔孟、程朱、陆王的儒家理学,如此,可使儒家哲学的内容更为丰富,条理更为清楚,系统更为谨严,才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机;应吸收西方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领略西方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最终形成哲学、宗教、艺术的和谐体,而奠定新科学思想的精神基础。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活等众多问题解决,若都能契合儒家精神,代表典型的中国人的真正态度,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新展开”,也就是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机运。

《孟子思想的阶级实质》 王德裕著,

载《江海月刊》1962年第九期。文章不同意历代把孔孟并提之论,认为孔子是氏族奴隶主贵族改良派,孟子则代表由氏族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新兴地主阶级。其依据是孟子反对周礼,倾向法治;既讲亲亲,更主张尚贤;反对诸侯割据,主张天下定于一尊,说明孟子政治上并非商鞅的敌对派,而是各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两翼。孟子在哲学上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但有其自身的特点,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向外争取、向内追求,发挥人的主观作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愿望与要求。

《论墨翟》王德裕著,载《中国哲学史论文选》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该文认为,墨子是代表由庶民上升起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主张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权,主张尚贤和王位禅让制,主张尚同与固本抑末,都是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反映。墨子的世界观有“天志”与“非命”的矛盾,但主要倾向是讲“非命”。墨子的认识论基本上是朴素唯物主义,但具有经验论的特征。墨子是我国形式逻辑的开山祖,对形式逻辑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墨子的历史观也有一些朴素辩证法的因素,较之孔子的复古,墨子是托古改制,而且有些复古思想的萌芽。

《墨子“三表法”初探》阳正太著,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一期。该文将墨子的三表法概括为:第一,前人

的符合当时实际的经验;第二,群众直接的经验;第三,实际运用的效果。认为墨子的三表是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是以客观事实和客观效果为出发点的,它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以朴素唯物主义的直观方式接触了这个认识论的重大问题。

《早期启蒙思想唐甄的哲学思想》陈德述著,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三期。认为唐甄的哲学思想是崇实尚功的唯物主义,指出唐甄把天地万物及其成毁,社会的治乱兴衰看成是真实的,它们绝不是不存在的“泡影”或“吾心”。唐甄从实事出发,看到了封建社会民不聊生,四海困穷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反对徒以为文的形式主义,强调致其实,尽性与事功相统一的学说。在唐甄的哲学思想中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唐甄认为自然和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唐甄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心知未见,物受乃见”的原理。该文认为,唐甄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众为邦本”的思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众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唐甄的哲学思想是市民阶级利益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袁亚愚著,载《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一期。全文三部分:人的本质和人性。作者指出否认人性或一般人性是不正确的;必须正确把握人的自然属性(本

性)和社会属性(性质)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使二者统一起来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人的实践活动与历史。人是其自然本性与社会本质的统一物,但并不是自然和社会的消极的产物;作为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主体,人乃其自身实践的产物。实践把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产物的人统一起来。

人的异化及异化的克服。作为一定社会存在的状态,异化反映的主要是生产关系造成的一种客观现实;不能用主观状态去解释人的异化。人的异化只是从社会的一个方面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实际状况,所以关于它的理论和范畴,不能用之于对社会总体的认识。人的异化得以产生的两个原因:自然压迫与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异化也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克服异化的客观必然性植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社会主义虽不能完全达到消除产生一切异化的条件,但它却能为最终的共产主义消除它们奠定基础。异化的克服和人类的解放是社会客观规律决定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果,而决不能放弃历史发展的决定论,将共产主义视为追求人性自我‘复归’的结果。

《孔子的伦理教育思想》钟肇鹏著,载《东岳论丛》1981年第一期。作者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社会变革时期,凝聚着孔子伦理思想的‘仁’、‘仁道’代表着封建伦理

道德,并服务于封建政治,它固然有欺骗性,但历史地看仍具有进步意义。作者提出孔子伦理思想的历史价值主要有:他把伦理、教育、政治三者相结合,构成一贯的体系,揭示三省的内在联系是孔子总结历史经验的一大发现。孔子在伦理教育上强调言行一致和德行的修养,这在哲学、伦理学都具有普遍意义。孔子对道德起源和人性善恶,虽未明确阐述,但已把问题提了出来,对后世伦理学说的产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常”、“变”范围的历史演变》唐明邦著,载《中国哲学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该文认为,先秦时期,“常”、“变”观念早已产生,逐步确定为哲学概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常”与“变”为常用的哲学范畴,其内涵随政治斗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近代的社会大变革中,革命和改良的政治斗争,使“常”、“变”范畴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从而阐明了: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常”、“变”范畴同其它的哲学基本问题一样,必将合乎规律地产生,它的内涵,在哲学斗争中由朦胧到清晰,由贫乏到丰富,由抽象到具体,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并更将在新旧哲学体系的交替中,得到改造与发展。

《子思孟子五行说考辩》李耀仙著,载香港《抖擻》1981年第七期。该文认为,章太炎在《子思孟轲五行说》、郭沫

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侯外庐在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之中,关于思孟五行说就是五行家五行说的论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思孟的五行说,是指“仁”、“义”、“礼”、“智”、“信”,其五行是他们的伦理观、世界观,而根本不同于五行家的五行说。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张儒义著,载《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四期。作者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所独具特点;其一,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学说。其二,它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它洞察了人类社会非人道现象的真正根源,以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作为实现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其三,它是同人的本质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的人道主义;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本质的实践活动的需要;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至多只是在社会局部问题、表层问题方面表现出真理性倾向或善良意愿。

《孔孟伦理思想初探》罗世烈著,载《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四期。作者认为孔孟独具一格的伦理思想以古代村社成员间人际关系传统准则为基础;它们主要不是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新思想,而是村社民主体制传统影响下的旧意识。孔孟将现实社会的国家政治关系引入伦常领域,并以传统村社制的亲属关系准则去规定基本

的行为准则,其“五教”、“五伦”、“十义”之说,强调相对的权利义务,并不主张片面服从君长。在君臣关系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对等的,君主有权教育和挑选臣下,臣民也可以批评并选择君主;孔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主张伦理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亲亲”只能是有条件的。在政治态度和个人政治品行方面,孔孟是积极而严肃的,强调关心天下事、立志改造社会的政治热情,反对迎合时君世主去谋取权势富贵和患得患失的个计较。

《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萧箴父著,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一期。文章认为,中国的哲学启蒙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展开的自我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自我批判,在16世纪中叶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哲学动向已启其端,由17世纪掀起的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地表现出来。反思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我们应珍视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要看到近代哲学对现实的双重投影:一方面,资产阶级哲学虽然在古今中外思潮的汇流中匆促形成,毕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提供了某些条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哲学上远未完成其应完成的任务,又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带来了特定的局限和困难。我们只有继续完成历史留下应当完成而又尚未完成的课题,自觉地培养理论思维的土

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庄子·齐物论 哲学思想与名家学说的关系》李耀仙著,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期。该文认为《齐物论》的篇名不是“齐物”论,也不是齐“物论”,而应作齐“物”论”解。《庄子》的所谓“物”包括“生死”、“物我”、“万物”三义。“论”当“是非”讲。《庄子》的齐“物”论”,重点在齐是非,其批评对象主要是惠施、公孙龙的名辨思想。它认为慎到的“齐万物”说,不懂得“齐生死”是从“齐是非”到“齐万物”的重要环节,也批评了惠施、公孙龙等夸大“言”、“辩”、“知”的作用。只有达到“忘年忘义,振于无竟,而寓诸无境”的天倪,才算是精神上最高境界。该文指出,《齐物论》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交错在一起的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常把辩证法和诡辩法纠缠在一起。但它对“言”、“辩”、“知”的考察有精辟处;对名家的批评,亦有中肯处,其人生态度虽以避世思想为主,又有用世思想的一面。

《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萧箠父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是为纪念王夫之逝世290周年而编纂的论文集。萧箠父提供了数篇论文,约10万字。论文从总体上对王夫之的辩证思想进行了剖析,认为王夫之沿着“即物穷理”、“心理御心”、“入德以

凝道”、“要变以知常”的认识途径,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客观矛盾运动进行了“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的辩证考察,形成了“极物理人事之变”的辩证的自然史观和人类史观。同时,对这种辩证考察的认识运动本身,“事之来,心之往”怎样做到“始终周条,内外合德”,进行了辩证考察,形成了他的辩证认识论。

《费密的反理学思想初探》蔡方鹿著,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一期。该文对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想家费密的思想作了论述,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提倡实事,反对空言”。指出费密坚决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和崇尚虚无之说,以力行实事代替“空谈仁义”。第二,“发明古经圣道,反对程朱道统”。费密正本清源的工作,抽掉了宋明理学的根基。第三,“是汉唐,非宋儒,提倡训诂注疏”。第四,“肯定人欲,反对禁欲”。第五,“道在事中,心合万物”。指出费密的反理学思想是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反映了时代思潮。

《世界科技中心转移与社会发展诸中心转移的连锁效应》刘波著,载《科学、经济、社会》杂志1984年第一期。本文从社会系统观和科学社会观出发,从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汤浅现象”入手,提出世界科技中心同哲学、社会、经济、科技、教育的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哲学(思想)革命先行,社会(政

治)革命开路,教育革命播种,科技革命开花,经济革命结果。作者提出以下观点:哲学革命是指引科学革命的航标,社会革命是促进科学革命的动力,教育革命是实现科学革命的基础,技术产业革命是科学革命的继续,科学技术革命是促使经济飞跃的杠杆,哲学革命、社会革命、教育革命、科学革命、技术产业革命和经济繁荣会发生连锁效应。本文旨在通过回顾世界现代历史进程,提出连锁效应机制,引出可资我国现代化建设借鉴的历史经验。

《老子哲学思想方法论研究意见》张智彦著,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八期。该文较早地运用系统论的思想,提出对老子哲学思想应从多角度、多方面作动态的考察,从老子思想的整体联系中去把握老子哲学的面貌和特色。

《宋学新探》贾顺先著,载《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日本东洋书院1985年出版。这组文章由《儒释道的融合和宋明理学的产生》、《朱熹哲学的二重性》、《朱熹年谱的变迁》、《魏了翁与宋明理学》、《宋学的特点和内部斗争对李退溪的影响》五篇论文组成。这组论文从理论渊源、逻辑结构等方面研究了理学的产生、发展、内部矛盾的演变过程,以及朱熹、魏了翁等哲学的特点对朝鲜大朱子学家李退溪的影响,说明宋学在东方文

化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

《易纬》钟肇鹏著,载《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选》第三卷,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该文指出《易纬》是汉代讖纬神学中最富有哲学意义的部分,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提出了把《易经》同历法相附会,用作占验的卦气说,特别是其中的《乾凿度》,首尾完具,最富于哲学思想,其中提出了由“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浑沦,元气,一)一天、地—四象—八卦”的天地发展模式。但它所讲的“浑沦”包括“气、形、质”三个要素,事物的发展都包含有“始、壮、究”三个阶段,以及“河图洛书”的九宫算的数学规定,却包含着一些辩证法思想和科学内容,而《易纬》的思想目的,在于论证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合理性。此文最后介绍了历代研究《易纬》的情况,以及《易纬》的版本和研究著作参考目录。

《唐甄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苏显信著,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二期。该文指出,唐甄是批判唯心主义理学的启蒙思想家。他总结历史,研究现实,寻求治世之道。穷理尽性,治国富民是其哲学理论和政治主张。“理”、“性”、“行”、“实”是唐甄哲学思想的四个基本概念,穷理尽性与治国富民是统一的,二者统一在“行”上。修身治国便是统一的表现。在自然观上,唐甄以“气”为宇宙本体,主张“精气”

是生成万物的学说。认为事物变化的动力在事物的内部,根源在于自身的矛盾。他的历史观主张“随时制法,因情循礼”,反对因循守旧,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龚自珍历史哲学浅析》丁楨彦著,载《学术月刊》1985年第三期。该文分析了龚自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提“公羊三世”说,利用旧形式来探索历史演变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动因,为他更法改制提供理论武器,龚自珍的历史哲学使人们感到了时代的气息。

他提出的“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的观点,体现了他对历史发展主体承担者的见解。这一见解批评了传统的圣人观,强调“自我”在历史上的作用。这种说法虽然仍是唯心史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中国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人文主义思潮的表现,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该文还指出,龚自珍的“自我”有点像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他以此来反对传统的“三纲五常”对个性的束缚,要求个性解放。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刘沅(1768~1857) 双流县人,字止唐。刘沅之学以儒家为主,批判接受释道两家的思想,旨在阐明三教之精微。他认为孔孟思想的真谛在汉代以后已被弄得面目全非,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朱等人窜改或歪曲了孔孟思想的真义。他认为孔孟思想的精髓是《大学》中的“止至善”和《中庸》中的“致中和”。刘沅之学影响很大,时人称为“川西夫子。”刘沅著有《十三经恒解》、《孝经直解》等书,全部收入《槐轩全书》之中。

廖平(1852~1932) 井研县人,字季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号四益,继改四译,晚年更为六译。1879年乡试中举人。入尊经书院深造,并从王闿运治

今文经学,从此为之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其学从治《春秋》开始,经六变而闻名于世。以一二变最有价值,首创以“礼制”区分今古学的理论。二变时的代表著作是《知圣篇》和《辟刘篇》。康有为受其学的影响,本《知圣篇》作《孔子改制考》,本《辟刘篇》作《新学伪经考》。廖平著作宏富,大部分已收入《六译丛书》之中。

吴虞(1872~1949) 成都市人,原名姬传,字又陵。早年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1891年入尊经书院,从经学家吴之英学诗文。戊戌维新后,转而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1905年秋去日本留学,在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之后,思想大为进步,产生反孔非儒

的思想。辛亥革命后,吴虞对尊孔复古的逆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写了大量批判儒家的文章。有《吴虞集》行世。

谢无量(1884~1964) 乐至县人,字仲清,号希范。1893年,拜立宪派人物汤寿潜为师,入上海南洋公学,结识了李淑同、邵力子、黄炎培等人,以后又认识了革命派人物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906年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任《京报》主笔。1909年回成都任存古学堂监督兼教授。1926年任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1927年在中国公学讲授世界革命思潮等课。1938年赴澳港讲学,1946年在四川大学讲授汉朝以后的学术变迁史。解放后,历任四川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等职,1956年赴北京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60年任全国文史馆副馆长。谢无量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大文学史》、《诗经研究与注释》等书。

蒙文通(1894~1968) 盐亭县人,原名尔达。1911年入存古学堂学经学,1927年相继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大学教授。40年代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四

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50年代以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部委员。其治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有《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理学札记》、《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法家流变考》等,均收入《古学甄微》之中。

唐君毅(1909~1978) 宜宾市人。1926年入北京大学,后转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并任无锡新设的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3月去香港,与钱宾四、张介丕等创办新亚书院,并任教务长。从1950年开始,唐君毅倡导设立文化讲座。1963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1975年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是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的活动。1958年,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等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著作甚丰,其主要代表作有《人生之路》、《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

第三章 外国哲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传播时期

本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国立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等院校先后开设了“西洋哲学史”课程,多属于简单的介绍和对个别人物(如黑格尔)的专题宣讲。1936 年,张颐回川执教,先后在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西洋哲学史”等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的著名学者方东美、宗白华、陈康、牟宗三、何兆清、熊伟等教授都在川执教,分别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希腊哲学”、“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西洋近代哲学”、“黑格尔哲学”、“柏格森哲学”、“印度哲学”、“人生哲学”等必修课和选修课。外国哲学的研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川境内的外国哲学研究和教学又逐渐冷

落。

民国时期,一批川籍(在外)学者为中国的国外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张颐、贺麟、杨一之最为人所瞩目。

1924 年春,张颐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哲学系的工作并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以后,他又到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在研究方面,他主攻黑格尔哲学,是当时首届屈指的人物。他在国外用英文写成的《黑格尔伦理学说——其发展、意义与局限》一书,1925 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印,并于次年再版。他在 30 年代初还写了一些论文,与学术界磋商讨论。贺麟 1931 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兼课,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等课程,撰写了《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处国难之态度》《近代唯

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黑格尔理则学简述》等著作和《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对黑格尔哲学系统的看法》《费希特哲学简述》《谢林哲学简述》等文章,翻译出版了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开尔德的《黑格尔》、斯宾诺莎的《致知篇》等著作。特别是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于1941年成立,开始有了系统、有计划的译述外国哲学著作。杨一之1936年后执教于北平大学、中法大学、(重庆)复旦大学、东吴沪江大学、同济大学等校,讲授西方哲学等多门课程,翻译了《物理认识之途径》,并撰写过《西方之没落——评斯宾格勒》等文章。他们在我国传播外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改造重建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1952年全国性院系调整,华西协合大学的文科各系撤销,改建成四川医学院,至1959年,四川的外国哲学教学完全中断。1959年9月,建立四川大学哲学系,招收了第一届本科学生,开设外国哲学史、外国哲学专题选修课和原著选读课,并进行研究工作。还聘请北京大学黄心川等省外学者来校讲授“东方哲学史”等课程。

这一时期,张颐、贺麟、杨一之以及杨祖陶、李质明、吕大吉、尹大贻、李武林等人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院校执教,潜心研究,译著撰文。翻译了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黑格尔的《小逻辑》《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一批西方古典哲学名著,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为学术界所瞩目。

三、发展时期

1978年,四川的外国哲学研究进入了发展活跃时期。四川大学在继续开设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课的同时,还为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增设了日本哲学、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等系列的东方哲学史课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研究、希腊哲学专题、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专题、德国古典哲学专题、《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康德哲学研究、《小逻辑》研究、马恩列论西方哲学等课程,并为全校文、理科学生开出了西方哲学公共选修课。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南充师范学院、四川教育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委党校、成都市委党校等院校也先后设置了西方哲学课,讲授西方哲学史,现代

西方哲学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等课程。

1982年,四川大学外国哲学专业被国家教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开始了四川省外国哲学学科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1980年3月,四川省哲学学会外国哲学史分会和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分会在成都成立。四川大学还于1979年成立了“现代哲学”教研室,专门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1981年举办了康德、黑格尔哲学讲习班和学术讨论会,1984年、1985年纪念狄德罗逝世200周年和费尔巴哈诞辰180周年理论讨论会和专题讨论希腊哲学。四川大学哲学系还多次邀请国内知名学者来川讲学。1984年四川大学张遂五、任厚奎等人承担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印度阿拉伯哲学研究》。截至1985年底,省内学者参与撰写并已出版的外国哲学方面的著作2部,在省级以上的公开学术刊物和各种论文集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主要有《黑格尔否定的否定和质量互变的内容和特点》(张遂五)、《论萨特的“自由”哲学》(刘平斋、徐家杰)、《黑格尔的异化思想》(樊昌扬)、《亚里士多德“潜能”、“现实”思想述评》(张远宏)、《评黑格尔关于客观性的论述》(章自承)、《评逻辑经验主义对“归纳问题”的解决》(李晓蓉)、《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

与伊奥尼亚学派自然哲学的区别》(姚定一)、《苏格拉底思想初探》(柳文超)、《古希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路线的形成》(任厚奎)、《论康德的两类实践观》(陈德荣)、《简论狄德罗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李培湘)、《费尔巴哈》(蒋永福)、《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观浅析》(欧阳荣庆)、《方法论意义的上的先验逻辑》(罗中枢)等。

贺麟、杨一之、杨祖陶、李质明、吕大吉、尹大贻、李真、李武林等人相继成为博士或硕士导师,并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教材和学术论文。如《康德导论述评》(李质明)、《欧洲哲学范畴发展史》(李武林等主编)、《洛克物性理论研究》(吕大吉)、《简明欧洲哲学史》(朱德生、李真主编)、《欧洲哲学史稿》(陈修斋、杨祖陶)、《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有”与“无”》(杨一之)、《康德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伟大贡献》(李质明)、《康德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的批判及其理性宗教观点》(尹大贻)、《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杨祖陶)、《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陈世夫)、《论康德的先念对象》(李质明)、《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贺麟)等。此外,贺麟还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出国讲学,促进了中外学术的交流。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著或译著

《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其发展、意义与局限》张颐著,商务印书馆1925年英文版,约10万字。该书为中国第一部论述黑格尔伦理学说的专著,作者认为,尽管黑格尔未就任何重要著作使用过“伦理学”之名,但是黑格尔的确有伦理学说,而且其论述很“透彻和有独创性”。在一至五章中,作者用明白晓畅的语言简述了黑格尔在上述各种著作中阐述的伦理学说。概述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及伦理学在黑格尔整个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对其学说固有的困难和通常的误解作了详尽解释。在第六至第九章中,作者论述了黑格尔伦理学说的一般特征,即:合理的东西与实在的东西的统一,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的统一,关于意志和自由的唯理智论,自由意志自我实现的辩证发展观等,并从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他的形而上学立场、他的时代背景等方面考察了黑格尔伦理学说的形成原因,论述了黑格尔的哲学对其伦理观的影响。作者还对黑格尔伦理学说的意义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肯定了其基本原则及反对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伦理学的正当性,同时指出并评述了其局限性;有时过分强

调普遍而贬低个人,社会伦理观上的民族主义倾向,混淆了形而上学中的辩证法和与伦理学中的辩证法等等。该书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英国黑格尔专家J.A.斯密士教授曾为该书作序,对该书给予了较高评价。英国J.S.墨铿惹教授、德国E.习尔熙教授、德国著名黑格尔专家拉松博士也先后发表书评,对该书作了肯定的评价。

《小逻辑》(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0年10月版,约29.3万字,该书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一。1980年7月的中文新版以1929年出版的格罗克纳本和1919年再版校订的拉松本这两个德文版为依据,参考了1892年牛津大学出版的瓦拉士英译本的第二版和1970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主编的《黑格尔全集》(共20卷)中的第八卷——(小逻辑)。中文新版的《小逻辑》,除了德文原版中黑格尔的三版序言、柏林大学开讲辞、序言和正文内容外,还有中译者的译者引言、新版序言以及书后附录的术语索引和人名索引。特别是其中的“新版序言”,译者不仅介绍了译本所依版本,翻译过程,而且论及了一些术语的翻译问

题和译者的体会,有助于读者在学习原著时的正确理解。《小逻辑》是黑格尔《哲学全书》中的“逻辑学”部分,初版于1817年,1827年出第二版,1830年出第三版,是《逻辑学》的提要概括和补充发挥,代表黑格尔晚年成熟的逻辑系统的著作。《小逻辑》中文本出版几十年来,对于在中国开展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逻辑学》(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约67.9万字。该书也被通称为《大逻辑》,以别于《哲学全书》的第一部分,即通称的《小逻辑》。全书于1982年9月被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文译本以1922年莱比锡迈纳出版社出版的、由拉松主编的《黑格尔全集》第四、五卷为主要依据,并参考了1929年斯图亚特出版的格罗克纳本。为了帮助中国读者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译者就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所摘录的部分,将《列宁全集》第38卷的页码一一标出。为使读者查对列宁所依据的米希勒本德文原文的便利,译者还在中译本中逐页加注了这个德文版本的页码。此外,译者还另编了米希勒本和拉松本的页码对照表,分别附于上、下卷的编末。《逻辑学》是黑格尔的一部巨著,其思想深邃,系统谨严。为了忠实于这部闻名遐迩的艰深晦涩著作的原有风格,

准确传达出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实质和行文特点,中译者在翻译时订立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一名一译,保持一贯,不因行文方便而随意改动译名,以免读者误解。二是凡黑格尔所引证的他人的文句,除少数过时了的数学书无法找到外,都取原本勘对过,因而纠正了黑格尔引用康德的误文,三是不增损原文,纯采直译,但力求使读者可以读通。《逻辑学》的翻译出版,对于系统地深入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学习研究列宁的重要著作《哲学笔记》,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语言、逻辑与真理》(英)A. J. 艾耶尔著,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约12万字。该书是艾耶尔早年的一本重要著作,由于该书简明而比较系统地叙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因而在欧美哲学界流行较广,产生了一定影响。

《洛克物性理论研究》吕大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月版,约10.6万字。该书是一部论战性著作。洛克的物性理论,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作者认为,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学说的内容在理解上有错误,评价也不正确。通过哲学史的系统考察,作者在书中结合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纠正了传统的误解,做出了新的评价。作者认为,洛克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学说是古希腊原子唯物论和近代机械唯物论在自然观上

的集中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第一性质是物体固有的性质，第二性质依赖于第一性质；第一性质与它在人心中产生的观念相似，第二性质与它所产生的观念不相似。所谓洛克否认第二性质的客观存在的说法，是哲学史上的一大误解。作者从理论与事实上证明，洛克没有、也不可能否认第二性质的客观存在。洛克第二性质的真义，不是色、声、香、味的感觉，而是物体中引起这些感觉的能力。基于这种认识，作者驳斥了所谓洛克取消了第二性质独立性，认为“第二性质不是物体本身存在的东西”，第二性感觉与客观能力只是“因果关系”，没有“内容上的一致性”等说法。作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说明，近现代科学的结论，证明了洛克第二性质学说的正确性。该书的出版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后来对洛克物理性论的评价。

《欧洲哲学史稿》 陈修斋、杨祖陶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4 月版，约 52.8 万字。该书共分 6 章。杨祖陶撰写其中的三章，即第一章，古希腊罗马哲学，第二章，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和第六章，德国古典哲学。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史料为基础，系统论述了三个时期的哲学发展，特别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阐述，是当时国内同类著作中最为详尽、清楚的。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和广泛好评，率先被《人民日报》社采纳为内部学习用的教材。1984 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自学指导委员会指定该书为自学教材。1985 年，该书被国家教委列入七五规划中高等学校的文科类教材。自出版以来，全国许多综合大学的哲学系都先后把该书作为学生学习“西方哲学史”课程的指定教材。

《康德 导论 评述》 李质明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7 月版，约 29.8 万字，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评述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简称《导论》的专著。作者在书中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依据，采用绪论、开篇说明、篇章概述和小结等形式，对《导论》各篇的主要问题作了比较系统而又深入浅出的介绍，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许多新见解，所以，该书兼具原著解说和学术专著的特色。作者本着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原则，批判性地肯定了康德哲学的很多合理内容，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康德“哥白尼式革命”、不可知论、范畴学说等问题，作者都给予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好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1985 年 6 期的“图书评介”专栏曾以“一本剖析康德哲学体系的力作”为题对该书进行了评介。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 贺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版，约

31.1万字。该书是由作者几十年来讲演现代西方哲学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的。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上篇收入作者1947年上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讲课记录共14篇,以当时听课的学生萧辉楷的笔记为基础修订、补充而成。分别介绍了柏格森、爱默生、詹姆斯、杜威、柏雷、摩尔、罗素、亚历山大、怀特海、桑提耶纳、希尔、格林、鲁一士等人的生平、著述、流派及主要观点;下篇是作者从1955年起陆续写就的讲演稿和文章,共16篇,批判性地评介了叔本华、尼采、文德尔班、胡克、布拉德雷、克郎纳、布兰夏尔缪尔等人的思想,其中有的文章在此前发表过,重点是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该书是作者在两个时代,以两种不同的观点为指导进行两种探索的结果。由于作者随着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使得上、下两篇中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该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风格独特,形式活泼,既有著作分析、观点评述,也有生平介绍、轶事趣闻的点缀,还不时穿插有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作者在这些演讲中,力戒空谈,注意掌握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大胆褒贬,直言不讳,在陈述自己的见解时不落俗套。该书的出版,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使我们了解中国以往的研究情况

以及作者本人哲学观点,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欧洲哲学范畴简史》李武林等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约51.1万字。该书由概论和正文的二十一章组成。大体上按照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框架,主要从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几个方面列出了二十一对(个)范畴来阐述从古代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范畴发展的历史,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欧洲哲学的发展史,对一些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书是受国家教委委托而编写的一本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参考材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欧洲哲学范畴发展史的著作。

二、论 文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有”与“无”》杨一之著,载《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约0.8万字。该文从认识论入手,打破《逻辑学》的框架,理解逻辑内容自身的辩证运动。作者指出,黑格尔认为有与无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有与无都是无规定性的、空的。因而是同一的。有是认识的整个客体,无是人们达到客观思维后的认识活动。有与无同一,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实有开始,在实有的直接性中获得感性认识,而深入内部进行反思活动,获得本

质的认识,由于这是间接的有中介的,因而只能是反思,反映的内容不是实物,所以是“从无到无”。反思认识本质,以绝对否定性扬弃了有,本质就是绝对否定性和直接性的统一体,反思的否定在事物的直接性中熄灭了,本质进入存在。因此,本质的反思运动,就是从无到无而回到本身的辩证运动。作者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是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什么那样重视黑格尔,要致力于摘取其合理内核,也才能明白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如何客观的,为什么它竟成了走向唯物主义的前夜。

《黑格尔论否定的否定和质量互变的内容和特点》张遂五著,载《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一期,约0.9万字。该文分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了否定的否定和质量互变。文章指出,具体事物和概念的矛盾发展具有节奏性和阶段性,一个矛盾的进展一般要经历从正到反,从反到合三个阶段、两次否定才能完成。第一次否定是简单的否定,第二次否定是继往开来,是新的肯定或复归。概念的自我发展依照一定的方向和道路,总是从抽象到具体、从贫乏到丰富、从低级到高级曲折地向前发展,是从盲目或不自觉的过程。理念或认识的发展,就其与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其次,文章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呈现出质、量、度三个阶段,并以

量变和质变两种形态去实现。当量变到达度的交错点上,就产生渐进过程的中断和飞跃。黑格尔据此反驳了“自然不飞跃”的形而上学观点,肯定自然、社会普遍存在着飞跃。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化学的发展进一步证明质量互变的正确性。

《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奥尼亚学派自然哲学的区别》姚定一著,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三期,约1万字。该文从世界的统一性、世界的运动及运动的原因、思维方法等三个方面较为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与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差别。与许多欧洲哲学史教材中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和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混在一起或放在一起论述的作法不同,该文作者认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由于其辩证思维的全面展开,已经从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中分化出来,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古希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路线的形成》任厚奎著,载《外国哲学》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6月版,约1.1万字。文章分三部分。作者认为,从泰勒斯到赫拉克里特着重探索万物起源于什么,提出了水、气、无限、火与数为本原,同时又认为灵魂不死、灵魂是气。可见,他们还不能严格区分物质和精神。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不仅表现出较高抽象性,而且还揭示出了思

维和存在、现象和本质、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差异和对立,但仍受先辈的影响,抽象的存在里还残存着有形体的特征,仍不能严格区分精神和物质。在巴门尼德以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浑然一体,在他那里便已播下了分裂的

种子。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肯定了原子决定思想、认识,柏拉图的理念论则断言理念决定万物。原子论和理念论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路线。

第二节 主要学者选介

张颐(1887~1969) 字真如,又名唯识。叙永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投入四川保路爱国斗争,在蜀军政府及四川省民政公署任秘书。1913年考入美国密西根大学,1919年获哲学博士。同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1921年再获哲学博士学位。后转学德国和法国,1924年春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应陈嘉庚之聘任厦门大学副校长。1929年重返北京大学任哲学系主任。以后就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特聘教授。1936年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后代理校长。1939年改任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重返北京大学任教授。1969年病故于北京。张颐是最早研究黑格尔并把西方古典哲学引入中国学者《黑格尔的伦理学说》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论著和几十年的教学活动,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了解。

杨一之(1912~1971) 笔名杨先墉,潼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

究所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法国研究》特约撰稿人,同济大学联邦德国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中国民盟盟员。1927~1928年在上海震旦大学学哲学,1929~1936年先后在法国巴黎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学哲学。1936年4月曾被德国纳粹政府逮捕,因此提前回国,未及考取博士学位。1936年秋在北平大学及中法大学任讲师。抗战爆发后在重庆任复旦大学及东吴沪江联合大学教授。1946~1949年在上海任同济大学哲学教授。1950~1956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6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重点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译著有:卜兰克的《物理认识之途径》(笔名杨先墉,1935年商务印书馆版),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黑格尔的《逻辑学》

(商务印书馆,上卷 1966 年出版,下卷 1976 年出版)。主要论文有:《西方之没落—评斯宾格勒》(1937 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赫拉克利特之评论》

(1958 年)、《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有”与“无”》(1978 年)、《康德摧毁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1984 年)等。

第四章 逻辑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从公元前 4 世纪起,中国、印度和希腊都先后产生了各具特色的逻辑理论。这些理论分别称作名学、辩学、论理学、因明学、逻辑学。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名辩逻辑思想,是世界学术史上熠熠发光的瑰宝。两汉之后,各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挥。

公元 6 世纪以后,印度的因明学随佛教传入中国,一些因明学译著,其中特别是唐玄奘的译著,以及后来大量的藏文因明学译著,为佛教学者的逻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隋唐之交,玄奘及当时众多的著名佛教高僧曾聚居蜀地,推动了因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因明学与中国的名辩逻辑同为论辩逻辑理论,是佛教学者的主要研究科目之一。著名的川籍高僧、佛教学者马祖、宗密等在此领域内均有较深造诣。

本世纪初,四川学者开始了对逻辑学作系统、专门的研讨。当时,在四川大学前身的一些高等学校和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都开设有逻辑学课程。曾任两校教授的著名学者伍非百著有《墨辩解故》(1914 年)、《中国古名家言》(1949 年)。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高等学校内迁,著名逻辑学家齐聚西南。著名学者金岳霖和他的学生沈有鼎、王宪钧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述,系统研究、介绍了现代逻辑的基本理论与问题。王宪钧还在省内的一些高等学校讲授逻辑学。稍后在四川大学又有卢剑波、王燕生、张遂五等开设过逻辑学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省内的高等学校先后都建立了专门从事逻辑学研究的逻辑教研室,开设了形式逻辑课。1956~1963 年,全国主要报刊

上展开了逻辑问题大讨论,客居京、沪的川籍学者王方名、且大有、彭漪涟等得风气之先,相继撰文就若干逻辑学及有关逻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发表了有益的见解。

1978年,省内各高等院校普遍恢复或增设了逻辑学课程。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开始招收逻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招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以毛泽东逻辑思想为研究方向之一。学术研究也渐趋活跃,迄至1985年12月,我省学者发表的专著或论文,涉及到形式逻辑、形象思维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和逻辑学等,其中不少具有创造性的见解。王方名关于形象思维逻辑的论著,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

与此同时,四川学者还先后编写各类逻辑教材。主要有彭漪涟《形式逻辑》(修订本),邱觉心《形式逻辑纲要》,阳作洲《法律专业逻辑学》,苏天辅《普通逻辑》、《形式逻辑》,郑国玺《形式逻辑干部读本》,郑功伦《经济专业逻辑学》,何向东《逻辑学概论》等。

1979年11月,成立了四川省逻辑学会。1984年,成立了四川省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对于推动逻辑科学的发展与普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11月,成立了四川省逻辑学会。1984年,成立了四川省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对于推动逻辑科学的发展与普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 著

《中国古名家言》 伍非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约5.1万字。本书内容包含七部分,即《墨辨解故》、《大小取章句》、《尹文子略注》、《公孙龙子发微》、《齐物论新义》、《荀子正名解》和《形名杂篇》。《形名杂篇》录管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及韩非子论述中涉及形名者,共63条。另附《邓析子辩伪》一文。作者从1914年开始整理墨子经说,1932年全书暂时定稿,以后续有补正,至1962年最后校订,中间历时49年。本书以传世典籍为依据,整理校释,全面探讨了先

秦名家的逻辑学说和其它诸家有关逻辑的学说。作者校正古籍,首重章句次序,次及文字错讹。本书以逻辑学的观点说名家,而且说法家、墨家、道家、儒家。又不限于以法说法,以墨说墨,以道说庄,以儒说荀,而是纵横穿插,互为发明,要以阐述先秦逻辑思想为依归。沈有鼎的序文,对本书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论形式逻辑问题》 王方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约7万字。这本文集包含以下6篇论文《关于正确思维的初步规律和形式》,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问题提出质疑。《关

于“客观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本质的规定性”》,对形式逻辑客观基础问题提出质疑。《关于形式逻辑和哲学科学》,对形式逻辑科学性质问题提出质疑。《关于形式逻辑和逻辑》,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问题提出质疑。《关于“坚持形式逻辑理论问题的唯物主义路线”》,对形式逻辑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论古典形式逻辑和归纳逻辑(纲要)》,是作者对前述一至四篇文章所提质疑的总的回答。

《辩证逻辑参考资料》且大有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约92万字。本书分为两卷六篇,集中反映了1950年到1958年国内外学者探讨辩证逻辑问题的梗概。第一卷第一篇,选入了中国和苏联学者讨论辩证逻辑的对象、性质及其基本内容的论文或论文摘要。第二篇的资料,主要涉及辩证思维的规律,辩证逻辑关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理论,以及辩证逻辑的范畴及问题。第三篇的资料,涉及辩证逻辑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等方面的问题。第二卷第四篇的资料,主要涉及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特别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第五篇的资料,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辩证法、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六篇的资料,包括了外国学者评介国外学者关于逻辑(包括辩证逻辑)问

题讨论情况的文章,苏联学者对罗森塔尔所著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一书的评论,以及德国学者阿·克吕格对波兰学者阿·沙夫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几个问题》一书的评论文章。

《形式逻辑》(修订本) 彭漪涟、何应灿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约16万字。本书原系彭漪涟为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各系编写的内部教材。1980年重新修改后,作为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用教材正式出版。全书分为8章,系统地介绍了传统逻辑的基本内容。书中还介绍了真值表方法等数理逻辑的知识,并在国内形式逻辑教材中,最先把传统逻辑视为基本规律之一的充足理由律,仅作为逻辑证明的原则加以讲述。1983年本书修订本出版,由于分量适中,论述简明,被国内不少省市指定为高等学校自学考试教材,许多高等院校也将其采用为教材。

《形式逻辑纲要》 邱觉心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约17.8万字。本书分为14章。导论部分,简述了逻辑思想的形成和逻辑发展简史,本书于系统介绍传统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时,某些章节还引入了一些当时逻辑学界尚有争论的问题,并提出作者自己的主张。

《说话写文章的逻辑》 王方名、张兆梅、张帆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年版,约16万字,本书对创建一门新的逻辑学科——形象思维逻辑学,作了有益的探索。全书分为14节。第一节主要说明,人们的言辞是思维的载体,因而说话写文章的逻辑,实质上是言辞的逻辑,是通过言辞的组织结构而研究包含于其中的思维形式与思维结构的。第二节主要说明,说话写文章的思路条理,可分为记叙描写类和说理论证类。因此,两种思维形态都属理性认识的范畴。其本质区别在于反映客观事物的认识阶段有所不同。所有记叙描写言辞是以事实线索作为思想的路数,而说理论证言辞则以阐明道理作为思想的路数。第四节论述了记叙描写言辞的思维形式,作者新创了“形象观念”这个词,用以指称事物形象中思维中的反映,以与传统逻辑理论中的概念、判断、推理相区别。第五节论述了记叙描写言辞的思维结构。这种思维结构是以人物、景物或事件的描述为素材组织而成的。第六节提出了记叙描写言辞的思维规律,计有:形象观念的同一律、不矛盾律,形象观念的融合、汇合律,叙述事实的“六何”律(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必然律和可然律。作者认为,绘画、舞蹈、戏剧等部门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中,也存在大量形象思维,并各有其特点,但记叙描写言辞的逻辑仍可作为形象思维逻辑的代表。第七节至第十三节所陈述的说理论证的逻辑,则

以传统逻辑为内容,但作了一定的调整。第十四节还讨论了说话写文章的逻辑和思维能力的培养问题。

《法律专业逻辑学》石子坚、阳作洲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约26万字,本书是中国最早将传统的形式逻辑与法律科学、司法实践相结合的高等院校教科书。全书13章、共53节,川籍学者阳作洲、雍琦撰写了其中的六章又四节。本书在系统阐述传统逻辑理论时,所举实例,大多取材于法学术语、法律条文及真实的案例。对法律或司法实践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某些逻辑原则,则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作了专题的讨论。本书还从理论上初步探索了一些为司法实践所特有而普通的形式逻辑教科书未尽包容的逻辑问题,如审判三段论(包括定罪三段论、量刑三段论),类推适用,刑事侦查中的比对法,并案归纳法。恢复犯罪过程归纳法,侦查假设等。

《课堂教学的逻辑性》张静虚著,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约8.2万字。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从事逻辑、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经验,为创立一门新的应用逻辑——“教学逻辑学”而作的初步探索。全书以新颖的例证、通俗的笔调论述了如下问题:讲课与思维规律;讲课怎样使概念明确;讲课怎样使判断恰当;讲课怎样推理才合乎逻辑以及讲课怎样善于运用逻辑思维方法。作者明确指出,无论社会科学

或自然科学,都离不开逻辑。文科教师和理科教师,都要自觉运用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才能增强讲课的逻辑力量,以提高教学水平。本书还把《怎样增强哲学教学的逻辑力量》作为附录。

《逻辑学概论》何向东著,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约26万字。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逻辑的基本理论。书中对“概念的外延”、“判断的周延性”、“假说”等重要概念做出了新的定义。在推理的分类体系上,首先按照前提与结论之间无蕴涵关系,分为必然性推理与非必然性推理。在假言推理的分类上,假说的理论上,也有新的见解。还提出一种“探索性推理”,并对其定义、结构和作用,详细地加以论述,引进了数理逻辑的某些内容。

二、论 文

《论思维史研究》王方名著,《学术月刊》1961年第八期,约2.8万字。本文从人类思维史研究起步的必要性、可能性说起,系统论述了从事这一研究所必须进行的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对现代思维进行充分解剖,寻找解剖古代思维的钥匙。为此,作者着手解剖现代人类思维内容结构,先后得到20多组的思维分类。本文只介绍了其中的10组,并对形象思维的特征作了重点的论述。第二,探索人类思维的历史上和实际上的最初的、最简

单的、作为思维的细胞形态的思维事实。第三,从广泛的相互联系中,探索思维发生发展的线索。作者的初步工作,便已涉及有关“人类精神史前时代”的动物智力发展、有关人类思维发生的物质基础、有关思维发展的古人类体质、有关思维发生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以及有关现代儿童的智力发展等10个方面。

《关于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且大有著,《哲学研究》1979年第一期,约0.25万字。作者认为,辩证逻辑应是研究辩证思维的,应是一门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及其逻辑方法的科学。思维形式方面,文章指出,辩证逻辑对概念的研究着眼于概念的辩证法与辩证的概念;对判断的研究着眼于判断的辩证法与辩证的判断;对推理的研究,着眼于推理的辩证法与辩证的推理。思维规律方面,作者不同意把辩证法的三条规律作为辩证逻辑的规律,认为辩证逻辑的规律应是辩证法规律在思维领域中的具体化。思维方法方面,文章指出,辩证逻辑不是泛泛研究一切辩证思维方法,而应从逻辑的角度,即从与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和规律有关的方面来研究辩证思维方法,其内容如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方法。更不能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来取代对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的研究。

《刑事侦查中怎样运用假言推理》 阳作洲著《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约0.68万字。本文结合刑事侦查工作的特点,探讨了如何正确运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以提高办案效率的问题。文章讨论了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在刑侦工作中的三方面作用。其一,推论罪犯应用具备的条件。其二,推定罪犯。其三,否定关于案情的某个论断。文章最后论述了侦查工作中运用假言推理常见的逻辑错误。

《刑事侦查与逻辑思维》 陈康扬著,《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六期,约0.62万字。本文主要探讨刑事侦查与逻辑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提出应建立一门新的边缘科学——侦查逻辑。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主张从侦查工作的实际经验出发,在吸取有关逻辑知识、总结出一些新的逻辑思维方法的同时,还要注重运用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的某些原理,以创建一门适合于侦查工作的逻辑。

《比对推理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 雍琦著,载《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80年3期,约0.56万字。作者认为,刑事侦查中对考察对象通过“比对”方法进行同一认定的过程,是一种具有特殊推理形式的推理过程。为此,本文首次提出并论述了“比对推理”的理论。文章结合具体案例,提出了正确应用比对推理的若干逻辑要求。

《中学数学教学中的几个形式逻辑问

题》 喻绍迪著,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3期,约1.5万字。本文结合国内某些中学数学教材及数学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和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中学数学的逻辑专著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对中学数学教学中的推理、论证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论复合判断形式之间的对当关系》 周钺著,载《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一期,约1.7万字。本文借助数理逻辑命题演算的工具,阐述了各种复合判断形式的逻辑性质及其相互间的真假关系。

《谈谈逻辑思维方法》 张静虚著,载《形式逻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8月,约0.7万字。本文结合实例,对逻辑思维方法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全文包括三个部分。

“比较的方法”部分,阐明了正反的比较;同异的比较——形同实异的比较、大同小异的比较、大异小同的比较;共性中的个性的比较;有关划分的比较;模糊概念和明确概念的比较;前后变化的比较;比喻的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清一定界限的比较。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部分,阐明了分析与综合的辩证关系,并提出存优、浓缩、化合这三种综合的类型。在“抽象的方法”部分,阐明了抽象的方法在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构成事物的概念,发展科学概念,对立理想模型以及设计理想实验等思维活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伍非百(1890~1965) 原名伍程驥,蓬安县人。早年曾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在川军中参加过护国、护法斗争。其后专力治学,曾任成都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并在南充创办西山书院、川北文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川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图书馆长、省文史馆研究员等职。长于先秦诸子研究,对墨家学说独具卓见,所著关于先秦逻辑的系列著作辑入《中国古代名家言》,1949年曾自费石印500余部,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王方名(1916~1985) 渠县人。1938年3月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即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校从事干部培训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为地方和中央教育行政干部,1955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主任。1956~1957年,王方名在全国逻辑大讨论中,针对当时国内流行的关于逻辑学的根本性问题的一些观点,连续发表了几篇“质疑”文章,有较大影响。代表作有《论形式逻辑问题》、《说话写文章的逻辑》、《论思维史研究》等。

第五章 美 学

第一节 学术沿革

一、近代四川的美学思想

“五四”前后,由鲁迅、蔡元培、郭沫若等人提倡美育,介绍普列汉诺夫、克罗齐等人的美学思想,结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探讨美学问题。郭沫若20~40年代的论著中多次论及文艺的美学特征。30年代洪毅然、沈起予也发表了一些文章讨论美与生活的关系、美的起源等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内迁,蔡仪、朱光潜和宗白华等一批美学家,来到四川,在四川写作和出版了一些有全国影响的著述。蔡仪在重庆研究美学与艺术理论,写出《新艺术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论述艺术。《新美学》为中国第一部努力以唯物主义论述美学的系统著作。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从美学角度论述审美趣味味的培养,诗的“气势”与“神韵”,悲剧与人生的距

离,从美学上的“距离说”论述中国艺术,近代美学与文学批评等。

《诗论》论述诗的起源、诗与谐隐、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宗白华在四川时期发表的重要美学论文有《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等,后均收编入《美学散步》。

二、当代四川的美学研究

王朝闻1950~1963年一共出版了6本论文集,广泛地论述了文艺问题,其中包括很多阐明作者美学观点的成果。特别是阐发了文艺创作要给欣赏者以审美再创造的美学原理,有很多深入浅出、丰富多采的论述。洪毅然在50年代全国美学讨论中发表了

很多论文,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性质,成为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品有《艺术家修养论》《美学论辩》《新美学纲要》《大众美学》《美是什么和美在哪里》等。

1962年,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开始在高年级开设“美学”选修课。四川省文艺理论和哲学工作者也写出了一些美学研究论文,或从美学角度研究文艺问题。

80年代以后,四川省开始有了专门的美学组织,有组织地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1980年四川成

立了美学学会和四川高校美学学会。1982年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成立了美学研究室,1985年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成立了文艺美学研究室。

1982年11月,四川省美学学会编印了《大众美学》丛刊。

1982~1985年省内先后出版了《美的研究与欣赏》丛刊3辑、《美学文摘》4辑、《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3集、《艺术美学文摘》4辑、《美学新潮》1辑。四川大学中文系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美学辞典》。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 著

《美学论辩》 洪毅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一版,约15万字。本书涉及美学的研究对象、美是什么和美在哪里、美是不是意识形态、美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美感的实质及其心理过程、美与美感的分类、美与艺术的关系、美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基本分歧等8个问题。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不少重要意见。特别是对于美学研究的对象,作者主张不局限于艺术研究,被认为是这一派的代表。

《一以当十》 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59年9月第一版,约23万字。本

集成书于1959年,作者从“创作实际和欣赏实际”出发,集中提出阐明了“生活不就是艺术”、“最重要的是人”和“适应是为了征服”等美学观点,并生动而深刻地论述了“一以当十”、“不全之全”和“虚中见实”的艺术规律,从而表达了他的“美是关系说”、“多样统一观”和“表现对象——创作主体——服务对象”的理论观点,以及“创作式”的理论形态。尤其是本集中一再论述的“欣赏”、“再创作”、“适应为了征服”这一论点,都是重要美学观点。“创作是欣赏的对象,欣赏推动创作”,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适应,互相创造,这是王朝闻“美是关系说”的核

心,也是本文集中多次论述的一个美学命题。

《德国古典美学》 蒋孔阳著,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6 月第一版,约 29 万字。全书共 6 章,论述德国古典美学的产生和形成。

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和继承。康德与黑格尔的生平和著作,费希特与谢林的哲学观点,歌德与席勒在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等,并对德国古典美学进行了批判。

《美和美的创造》 蒋孔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5 月第一版,约 16 万字。本书收编论文 14 篇,论述了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 and 任务、美、美是一种社会现象、美和美的创造,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康德的美学思想——简评《判断力批判》,歌德论自然与艺术的关系,柏格森的《笑之研究》,评介《西方美学史》,评介《西方美学史论丛》,文艺批评中的艺术标准、灵感、剪裁、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等。

《新美学纲要》 洪毅然著,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第一版,约 8 万字。本书共 3 章,简略回顾美学历史,论述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从论美、论美感、论美育与德育的区的角度进行阐述。

《美学概论》 王朝闻主编,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第一版,约 23 万字。本书共 7 章,论述了美学研究的对象、

任务和方法,美的本质的历史探讨、真善美的联系与区别,美的各种形态,审美意识的历史起源、它与科学道德的联系和区别、它的客观标准与个性差异、审美的感觉、知觉、联想、想象、情感和思维等心理形式,艺术家与社会分工、艺术家的生活实践、世界观与艺术修养、创作个性的形成与发展,艺术创作的构思活动,传达活动,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艺术种类的划分,艺术风格与流派,艺术欣赏与批评的性质、标准和作用等问题,本书是全国高校文科教材。

《大众美学》 洪毅然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7 月第一版,约 10 万字。本书分 3 篇。上篇谈美感,共十三则;中篇谈美,共十二则;下篇谈美学在日常生活及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 苏鸿昌著,重庆出版社 1984 年第一版,约 15 万字。本书把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放在中国整个传统美学的发展史中加探讨,把美学与红学研究结合起来。

《审美谈》 王朝闻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第一版,约 36 万字。全书分 24 章,本书着重论证艺术这一作为审美意识的物质化和集中表现的审美对象,什么是人们的审美对象,怎样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的关系是依靠什么客观条件构成的,并对各种类型的艺术现象以及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审美性质、审美

价值作出细致的分析。本书采用一种“随感式的写法”，在论证方面不说尽道绝，而给读者留有余地。探讨的直接对象主要是人对艺术的审美活动，着重探讨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创作，又不局限于艺术，而同时涉及对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审美感受。同时，也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探讨艺术为什么会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本书区别了审美关系与伦理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特点。对于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关系，本书采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

《文艺美学论集》王世德著，重庆出版社1985年1月第一版，约32万字。全书共3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马克思、鲁迅、郭沫若、刘熙载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美学思想；第二部分论述了文艺的美学特征、形象思维、形象大于思想、“间色”等美学原理，进而分论了中国戏曲、悲剧、电影、摄影、舞蹈等艺术的美学特征；第三部分论述了当代审美心理中借鉴西方现代派文艺的问题，重点辨析了“意识流”。全书的“代序”《什么是文艺美学》对文艺美学作了界定。

《中国古典美学探索》皮朝纲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第二辑，1985年7月，约19万字。本书收入论文20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横向概括，着重探讨了几个基本的美学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层次关系，特别是论

述了“味”、“意象”、“悟”等范畴；第二部分是对先秦至近代的一些人物的美学思想的研究，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发展轮廓作了纵向勾勒，其中不仅有对庄周、刘勰、司空图、严羽著名理论家的评论，而且还探讨了桓谭、王弼、刘昼、方东树等的很少为人涉猎的重要美学理论。

二、论 文

《美是什么和美在哪里》洪毅然著，载《新建设》1957年5月号。本文认为蔡仪的美学观点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朱光潜也没有完全摆脱他原来的基本观点。认为“美即典型”根本不能成立，是不合乎实际的。本文也不同意王达仁说花本无色，美与色只是事物客观特性的“主观表现”。本文也不同意李泽厚所说：“美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物的社会属性”，认为应是物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相结合，物的社会性通过物的自然性表现出来，而后有美。使事物成为美的决定因素是它的社会性，但它的自然性却正是它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本文下的定义是：事物内在好品质之外部表征曰美。

《论美是一种社会现象》蒋孔阳著，载《学术月刊》1959年9期。本文认为，美不是自然现象，不是个人私有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才有的现象。其他生物的美感，是本能的、为了性选择而存的现象。人类还能创造美。自然现

象在人类以前就存在了,但对原始的人说是不美的,后来成了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才成为人类美感的对象,所以美是一种社会现象。

《庄子美学思想管窥》 皮朝纲著,载《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4期。本文整理了庄子的美学思想。本文认为,庄子以为雕饰是破坏自然朴素美的,这种思想太片面太绝对,不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庄子对美丑的观点,是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

《鲁迅美学思想探索》 王世德著,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本文对刘再复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六期上的《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提出商榷。本文认为,给人美感是文艺的本质的特征。文艺也有使人认识真实、前进的作用(这一点与其他意识形态相同),但这是不能离开美感作用,是必须通过美感作用的,因而真实、前进应融合于美,并不外在地与美并列。刘文认为美的形式即给人“审美享受”,也不对;给人审美享受的是美的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的形象,其中隐含人生真理,使读者“与人生即会”,兴感怡悦,神质悉移,更自力就于圆满,自觉勇猛,发扬精进,本文作者认为鲁迅的观点并没有片面性。

《论曹雪芹关于审美的观念》 苏鸿昌著,载《美的研究与欣赏》丛刊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2年7月。本文指

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审美思想有很形象生动的发挥。曹雪芹还论证和显示了审美意识和科学思想、道德观念有区别,有联系,还表现了审美感受的具体情状。

《生活美、艺术美及其他》 吴野著,载《美的研究与欣赏》丛刊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2年7月。本文认为毛泽东指出了生活是艺术美的源泉,艺术美又高于生活美,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提出“感受、体验”的概念,意味着对美的认识不能离开具体感性形象,不能以间接知识与逻辑概念去代替。文章还指出,必须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必须有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为群众欢迎的标新立异。

《论音乐形象的存在价值》 杨琦著,载《美的研究与欣赏》丛刊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2年7月,本文认为:“音乐形象”这个概念存在约有一个多世纪,1949年后引入中国。本文分析、探讨了“形象”的词义,再指出:音乐不象其他艺术反映现实的方式能真实具体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形象,根本不存在视觉形象,有些对音乐反映生活形象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因此,本文认为,音乐形象在音乐艺术中没有存在的价值,形象也不能作为评价音乐作品的尺度。

《从“不美”到美》 李敬敏著,载《美的研究与欣赏》丛刊第一辑,重庆出版

社,1982年7月。本文从审美感知到审美判断的全过程的角度,剖析了曾发生争议的散文《戴“麦克”镜的小伙子》,并旁及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说明处在运动发展中的审美对象,有复杂丰富、矛盾交错的情况,不能把审美局限在感性直观的范围内,认为审美只是非理性,无认识的直觉,只是审美感受与审美判断往往呈现一种胶着的、彼此渗透的状态,很难划出明显的阶段。审美表面上是不假思索的直觉,实际上其中渗透着长期积累的理性认识。

《菩萨美》王官乙著,载《美的研究与欣赏》丛刊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2年7月。本文重点谈大足石刻艺术欣赏,分析了石刻艺术有佛教哲理和审美功能。石刻有宗教色彩,但可以当作审美对象去研究。

《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曾永成著,载《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四期。本文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一个特殊的系统性领域,必须遵循系统原理所指示的方法加以全面的研究,以探索审美研究的新角度和新问题。作者主张:应在“自然的人生

成”的系统运动中考察美的本质。应在具体的关系系统中考察具体事物的审美性质,因为这种系统的系统质决定着该系统内各事物的审美性质。

应在审美的主体和对象所处的系统中考察审美感受,特别要注意由主客体双方所处的系统的作用而形成的审美认知和审美意象等中间环节。应在社会多系统的关系中考察审美关系的实现条件,这就应当看到审美情境在审美中的重要性。

《大足佛教石窟艺术审美片论》刘长久著,载《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4月。本文认为中国佛教石窟雕刻艺术,早期以云岗为主,受印度犍陀罗式和笈多式雕刻的影响;中期以龙门为主,渐离印度风气,形成中国民族化风格;晚期以大足为主,是中国式雕刻作用,优美、典雅、精致,与云岗、龙门的古朴、粗犷、敦厚、雄伟风格不同。大足石窟的佛教造象,体现了佛教的万物归空的思想,把现世的美认作丑,没有摆脱佛教束缚,但市民社会的生活气息,世俗的人性又表现在形象写实、生动精致的石刻中。

第六章 宗 教 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古代巴蜀宗教著述

东汉末年,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初创于四川鹤鸣山。《老子想尔注》是张陵(五斗米道创始人)或张鲁所著,是以宗教神学观点通俗解说《道德经》的布道传教读物,是以“太上老君”神化老子的最早文献记载。它对道教的传播与道学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唐宋时期道教兴盛,巴蜀地区出现了不少道教学者,如李荣,著有《老子注》《庄子注》《西升经注》等,皆佚,其《老子注》现有蒙文通辑校本、严灵峰辑本,是唐代思想界重玄派的重要代表。王玄览俗名王晖(绵竹人),是精通佛、道二教之学的著名道教学者。据其弟子私辑成的《玄珠录》,对唐宋以来儒、道、释在思想上互相融合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影响。《正统道藏》收入的《石药尔雅》是唐元和元年(806年)梅彪(江源人,今四川茂汶县人)

撰,在5000字左右的小册子中,搜集200多种物质和丹名,并书其隐名及异名。英人李约瑟称之为“矿物与药物同义语辞典”或“化学辞典手册”,并认为比马丁·鲁兰德的《炼金术词典》早了几乎1000年。唐末五代,杜光庭随唐僖宗入蜀后,留成都未返,其著作很多。最突出的是关于道教斋醮科仪的搜集、整理与编纂,至今许多道观还在流传使用。五代后蜀道士彭晓所著《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学术界认为是《参同契》的著名注释本。宋代川籍道教学者范应元的《道德经古本集注》,吕元素《道门定制》等,至今仍流传。四川佛教在隋末名僧荟萃、讲论之风盛行。唐初在蜀地流行的还有佛教三论宗,有安州慧实公等。初盛唐之际,安岳卧佛沟的石刻佛经20部,灌县灵岩山的石刻佛经等,都是珍贵的文物资料。

唐宋为四川佛教兴盛期,当时的佛教禅宗四川有马祖道一(汉州什邡人)后人辑有《马祖一禅师语录》,自禅宗六祖慧能之后,以道一门下最繁荣,当时称为洪州宗,禅宗至此而大盛,宗密(西充人)著作甚丰,其《原人论》为中哲史上名篇。唐代禅宗的八家中,四川占了五家,为当时全国禅宗力量最集中之地。宋代禅宗临济杨歧派的法演(今绵阳人),有《法演禅师语录》3卷行世,法嗣22人,其中圆悟克勤(今彭县人)著《碧岩录》,集禅宗杨歧派之大成,对禅宗发生很大影响。

二、近现代四川宗教学研究

近代以来,宗教研究已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其标志是宗教不仅在高僧、高道、居士中进行研究,著名学者、专家都竞相研究宗教,在大学讲堂上也开始讲授佛学等宗教课程。邹容(巴县人)的《革命军》,以西方的“天赋人权论”,来批判封建的神权论,鲜明地将批判天命与封建制度结合起来,因此他的无神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1920~1921年间,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进行了三次宗教问题讲演大会,并由《少年中国》杂志专辟“宗教问题号”刊载了会员撰写的一些论文。当时四川学者少年中国学会领导人周太玄远在法国巴黎,他非常关心宗教问题,撰《宗教与人类的将来》《宗教与中国的将来》

《宗教与进化原理》。川籍学者李思纯也撰写了《信仰与宗教》《宗教问题杂评》等。30年代还有唐君毅的《中国宗教思想之特质》等,这些研究宗教的论述,主要介绍与吸收西方宗教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并具有自己对宗教以至中国宗教的独特见解。他们的这些论著开创了四川研究宗教文化的先声。

道教研究在40年代有著名道士、道教学者易心莹。著有《老子通义》《道学系统表》《道教系统表》(即《老君应化图说》),又辑《道教女子丛书》,主持刊印《道教二字经》以及道教炼丹、养生等有关书籍,多在观中刊行。他与西南联大教授陈国符、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以及《扬善半月刊》《仙学月刊》主编陈樱宁等皆有书函来往,商榷学术,是当代著名的道教内学者。还有学者谢无量《阴符发秘》序,刘咸炘遗稿《道教征略》,蒙文通《黄老考》《道家三考》《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晚周仙道分三派考》《坐忘论考》,这些著述至今深得国内外学术界的称赞。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学者入川,佛学研究著名学者欧阳竟无(客居并圆寂四川)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当时迁入四川江津。著名佛教居士王恩洋早年曾师事欧阳竟无,后任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部主任,编写《佛学概论》,刊印后在当时佛学界有一定影响。又曾应成都佛学社邀请讲《瑜伽·真实品》,

《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等。1942年应邀赴内江主办东方佛学院(后改为东方文教研究院),1943年被推为支那内学院理事。他一生从事佛学研究,重要著述有《摄大成论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经释》《人生学》等。《人生学》融合儒佛,以佛法为体,以儒学为用,探究人生最后的归趣,为其代表作。30~40年代四川境内成立的佛教文化团体在百余以上,成渝两地特别盛行,有不少儒学社、佛学院,如成都佛学社、重庆佛学社、四川佛学院、川东佛学院等;也创办了一些杂志,如《佛学月刊》等。1932年在重庆创办世界佛学苑藏教理院,其宗旨是“为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陲边防,保全中国领土”。该院为中国藏传佛学培养了不少人才,使当时四川的藏传佛教研究在全国独占鳌头。

20~40年代,四川佛教著述较丰。主要有禅学、唯识学和藏传佛学的研究,除本学志第二部分“著作”中已介绍少量著述外,还有唐君毅的《佛学时代之来临》;王恩洋《佛法与中国之文学》;满智的《唯识学之理论和源流及其价值》《反宗教声中之佛教辩》;谢无量的《从批教研究谈天台宗在佛教中的地位》;刘洙源的《佛法要领》;蒙文通的《唯识新罗学》;贺昌群的《佛教文学史上一大问题》《敦煌佛教艺术系统》;以及广文的《二十年来之四

川佛教》等。学者李安宅、于式玉30年代末在甘肃拉卜楞寺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进行长达3年的实地调查,取得大量第一手材料。40年代末,李安宅发表《萨嘉派喇嘛教》《拉卜楞寺概况》《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拉卜楞寺公开大会》《宗教与边疆建设》等;于式玉当时也已发表《拉卜楞寺祈祷大会之布施》《拉卜楞寺红教喇嘛的现况、起源与各种象征》《普陀·五台·峨眉—蒙藏佛徒对三山的信仰》等;为国内最早对藏传佛教进行科学研究的著述。此外,刘立千于40年代末翻译《西藏宗教源流简史》,撰《西藏密宗漫谈——破瓦法》;任乃强的《喇嘛教之圣城——拉萨》《喇嘛教民之转经生活》;谭英华的《喇嘛教与元代政治》等。四川学者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成果,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30~40年代,在重庆出版了《回民言论半月刊》《月华》杂志,中国回教俱进会四川支部1927年主办《清真导报》,周子宾阿訇编《中阿字汇》;虎世文阿訇撰《成都回民现状》;四川隆昌籍回民、《突崛》杂志社记者苏德宣对四川回族与清真寺进行了考察,在《突崛》杂志发表有关四川回族及伊斯兰教的系列文章。

四川基督教界也出版了学术刊物、专著,成立了文化机构。较有影响的是1924年创办的《希望月刊》,1952

年并入《新希望月刊》；天主教会在1946年成立了中西文化研究所，1947年创办了《蜀铎月刊》，出版了《哲学与宗教》、《人生问题》、《宗教与科学》等书。

1942年，马长寿撰《钵教源流》，是研究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重要著述。四川大学教授胡鉴民赴羌族地区考察，撰写的《羌民的信仰与习为》、《羌民的经济活动型式》，是研究羌族原始宗教的重要著述。陈宗祥1948年撰《傩族的宗教》等。

50~70年代，四川宗教研究只是从政治学、哲学、史学、古化学、四川教案、农民起义、神话学、医药、音乐等方面做过一些零散的研究。1951年初，唐家弘发表《西藏的宗教》等多篇有关宗教的论述；后有冯汉骥的《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亚欣等搜集的《寺院音乐》等。易心莹编纂有《四川省道教史》。

海外川籍学者唐君毅1949年移居香港后，著有《生命存在与心灵世界》、《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文化精神之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等，讨论了宗教对现代人类之价值，建立未来理想的新宗教，中国近代的宗教以及儒教

高于佛教和基督教等诸多问题。

1980年，四川大学成立了宗教学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均设有相应机构与人员从事宗教研究。1982年四川大学创办《宗教学研究》杂志。

四川大学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二卷于1980年、1985年相继问世；卿希泰、龙晦、王家祐等参加了《宗教词典》道教条目的撰写；卿希泰主持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道教条目的编写。还有张觉人的《中国炼丹术与丹药》、王文才的《青城山志》、李远国的《四川道教史话》等，以及近年来四川学者发表的道教研究论文，使四川成为中国道教研究的基地之一。

四川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方面，钱安靖、李绍民、陈泛舟等的羌族原始宗教研究，陈宗祥的彝族原始宗教研究，都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成为四川宗教研究的一大特色。

翻译国外的宗教著作方面有宝文安译伊斯兰教经典《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以及不少宗教研究的译文。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著与译著

《圣教入川记》古洛东著,1918年由圣家书局出版,印行2000余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古洛东(Gourdon),法国人,1866年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派来中国,在重庆从事教会活动。传教期间,古洛东用中文撰写了《圣教入川记》一书。该书记叙天主教在四川的活动,其中包括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四川的最初情形,清初四川地区教徒的概况,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天主教同道教的矛盾,四川人民反洋教的斗争等。该书为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提供了较丰富的四川地区的资料。

《道学系统表》易心莹著,1934年秋书成于青城山古常道观。《道学系统表》是用“道”来描述宇宙万物的生成,以“道学”为中心,以“表”的形式展现的。作者“遵旧史成例,详校诸家”“寻其端绪系于一家,上自元始,下逮于今,其可考见者,盖二十有四家。”基本上属于道教神学系统,从黄帝起至清末,分24家。此《表》所列24家865人,不仅是道家 and 道教,它和南朝陶弘景的《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列有帝王将相、儒家名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属一家之见。

《道教征略》刘咸炘著,载《图书集刊》5、8两期,1946年10月,1948年6月。《道教征略》的问世,正如作者自序(甲子十月即1924年10月)所称:由于道教无史,传记虽多,但略于派别。书目则古目无存。今存明人目录,杂乱无理。加之儒者鄙弃道书,至于黄冠之流,亦无条别源流详允可据之书。为此作者以史传校讐之法整理,于20年代遂成此手稿。1945年因蒙文通先生之要求,作者的弟子数人悉心校讐后,才付印问世。本书为手稿,全篇虽有上中下之分,但未标章节与题目,内容包括:道教之远源,古之巫医阴阳道家也;关于道教各时期的派别;关于道教经书。

《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李安宅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安宅于1938年赴甘肃,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进行了长达3年的实地调查,取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拉卜楞寺宗教的研究报告。李安宅在1947~1949年赴美英教书、考察期间,撰写成此书。80年代初,李安宅将保存的英文稿副本译成汉文,1985年李安宅逝世后,由遗著编委会整理出版。全书共分四编,17万字。前三编8

章介绍藏传教的历史,作者在对藏区的文化背景、历史概况进行介绍后,对藏族原始宗教——本教(黑教)、早期藏族佛教宁玛派(红教)、半革新的佛教萨迦派(花教)和噶举派(白教)的历史和教派情况逐章进行介绍。第四编9至15章是全书的重点,详细研究、介绍了拉卜楞寺和它的施主、寺院组织、主要神佛、训练和课程、公开聚会等情况。1981年,日本东方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民族学家、藏学家中根千枝教授来四川访问,见到了这部著作的英文本,于次年8月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正式出版了《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中根千枝教授在《导言》中说:“虽然这方面以前也知道一些,但在此之前,还没有看到过这样详细而深入的调查报告。”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教授说此书“是国内外公认为通过实地考察和社会调研而撰写的有关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此书部分内容在日本翻译出版。

《寺院音乐》亚欣、刘世富、巫选文、王兵林、熊冀华、邱仲彭搜集整理,中国音乐家协会成都分会编,1955年出版。亚欣所写《前言》说:1954年3月,西南音协召开扩大会,提出了记录与整理民间宗教音乐的任务。同年8月,由上述6人组成采集寺院音乐的工作组,到峨眉山进行了记谱录音及有产关资料的搜集工作。全书分为“峨

眉山寺院音乐”和“五台山寺院音乐”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记录了“总谱”、“瑜伽焰口”、“释氏梵呗”、“禅门课诵”等属于青庙系统的几类佛曲,共74首。在第二部分中记录了“瑜伽焰口起止规范”、“瑜伽焰口吹腔一部”、“禅曲青庙之部”、“三昼夜本”、“青庙禅曲吹腔一部”、“黄庙喇嘛禅曲诵经吹腔之一部”、“禅曲西藏之部”、“五台鼓房音乐”等佛曲。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卿希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1985年出版。本书共分3卷,现已出版一、二卷,分7章。本书从汉魏两晋至北宋时期,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发展、兴盛以及它与封建政治的关系等,进行了提纲挈领的系统叙述。本书着重阐述了道教思想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不同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生平、主要思想、著作,指出了这些流派、道教学者对道教理论发展的贡献。本书还从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学术思想史角度探讨了道教与儒释的关系,认为道教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儒学和外来的各种宗教尤其是佛学既相互排斥,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然而“过去对于道教吸收儒、释的地方,尚有不少人指出,而对儒、释吸收道教的,特别是儒学吸收道教的思想,则揭示很少。”因此本书尤对儒释吸收道教思想方面着了不少笔墨,构成了一个重点研究探索道教思想的渊源流变,理清道教

思想发展脉络的道教思想发展体系,东京大学蜂屋邦夫教授所说:“道教史著作在国外已经有之,但是关于道教思想史的系统研究著作还是第一部。”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认为是一部“开拓性著作”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道教思想史发展的规律。”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宝文安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该书是根据伊斯兰教历1348年(公元1929年)开罗出版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坦斯坦勒拉尼注释》第三版翻译。由买买提·赛来从阿拉伯文译为维吾尔文,再由宝文安从维吾尔文译成汉文。“圣训”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言行和穆罕默德所认可的本门弟子言行的集录,它包括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主张和社会主张,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其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圣训”是《古兰经》的解释和补充,是伊斯兰教阐明教义,制定教律的重要根据。

《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土观宗派源流》1801年成书,是藏族学者的史学著作。该书叙述了藏传佛教各宗派的传承和教义,并比较系统的介绍了西藏原始宗教一本教的历史,对内地的儒、释、道三教也作了介绍。土观的著作近200年来一直受到藏族学者的推崇与重视。该书不仅对藏传佛教的法脉源流和教义学说,博取了

诸家之所长,而且对于藏族历史、文化、教派的记载,对西藏和内地、蒙古、新疆以及印度关系的叙述,亦较完备详尽。

二、论 文

《宗教与人类的将来》周太玄著,载《少年中国》3卷1期(1921年3月)。文章反对尔朗(Renan)一派的宗教本能说,该派曾有“人类对于宗教如鸟作巢一样,同样是出于本能”的论断。本文认定“人不是宗教的动物,人类的将来是无宗教”。在20世纪的20年代中国能提出这样的见解是比较少见的。文章将国外当时宗教学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介绍到中国。

《唯识学讲义》刘洙源著,载《海潮音》2卷5、10、12期,卷7期、4卷3期,(1921年5月、10月、12月;1922年7月;1923年3月)。讲义由唯识学之缘起。唯识学之渊源。唯识学之宗派。唯识学西土东方之后师师承。唯识学之显晦。唯识学之宗趣。唯识学之名义等构成。解释了三能变及能变二种;自相、果相、相果等三相;种子六义;熏习之义以及本有新熏、生熏之别;相分、见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等心分四义;四心分四师异说;现量、比量和非量等三量。

《中国禅学考》蒙文通著,载《内学年刊》第一辑,1924年12月南京出版。全书分两大问题考证,在禅学传承

考证中,作者指出:我国禅宗祖于达摩,说者谓是教外别传,自迦叶以来代有授受,至达摩得二十八世,及所谓二十八祖。在古今禅考证中,作者认为壁观为达摩之道是可信的,自达摩以至五祖皆在坐禅为道;六祖以下与达摩所传固未可强合,六祖禅得之金刚经,自昔无此,而达摩以至神秀皆传楞伽。今禅自六祖创之,其实无所从受。南宗诚东土独有之禅,自唐而始发,无待远古。

《略论即身成佛与立地成佛》 满智著,收入《海潮音文库》第二编、佛学本论3(1931年6月)。文章对密宗的即身成佛与禅宗的立地成佛之同异作了比较。

《三论宗与勃拉得来现象论之比较》 唐君毅著,载《哲学评论》1934年5月。以三论宗思想与西方现象学作比较,比较二者同异,作者指出,哲学上所谓现象不外是指时空,时空中表现的变动,变动中的因果关系,与主观之我,客观之物。文章从论时间、论动变、论因果、论物我四项,去比较二者的现象论。

《中国宗教思想之特质》 唐君毅著,载《中心评论》1936年33期。关于中国民族特殊的民族性的认识,作者认为最好从中国宗教思想上看,提出了八个方面。作者认为这八项都是从“天人不二,分全合一”的根本观念引来的。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人不二,分全合

一,所以没有超越的天观念;也就没有与人隔绝高高在上绝对权力神的观念;所以把神视作人一般;于是逐渐形成重人伦关系过于神人关系;因而产生祖先崇拜、圣贤崇拜之宗教;形成以人与人交往之态度对待神;因而产生现世主义的宗教观;培育了宗教上的宽容精神。

《二十唯识论疏》 王恩洋著,载《海潮音》19卷4~8期(1938年4~8月)。本文为疏解二十唯识论之作。疏中解释说:识谓认识,心之异名。心所识境,皆唯心变。非离心外别有境物,故言唯识。

《羌族的信仰与习为》 胡鉴民著,载《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是作者30年代赴岷江上游羌区实地考察,发表的关于羌族原始宗教的研究报告。作者指出:羌民是信鬼神的民族。作者详细考察了白石在羌人信仰中的意义,认为羌民所信仰的并非白石的本身,而是天神、地神、火神和树林神。作者还考察了羌民家中供奉的十二神,还具体记载了一些羌寨地方神起源的传说。作者对羌族原始宗教职业者——端公进行了研究,对端公的起源,端公的服装与法器及端公的神通与传播情形及各种原始宗教仪式、丧葬习俗、求雨仪式等都作了详细介绍。文章保留了后人不可得见的珍贵资料,是今人研究羌族原始宗教不可或缺的资料。

《以破极微与粗色之理成立唯识》 王延贵著,载《海潮音》23卷1、2期(1942年2月)。该文为研究唯识思想的作品。

《“拉娃”；西藏人的巫师》 于式玉著,载《风土杂志》1卷6期(1946年)。作者1939年与李安宅同赴甘肃拉卜楞寺考察藏族宗教,文章专门介绍了藏族原始宗教职业者“拉娃”情况。文章记载了“拉娃”做法事的具体细节,又系作者临现场的记录,为研究藏族原始宗教保存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台湾佛教史》 匡宇著,载《现代佛教文选》(1958年8月)(匡宇原名刘汉平,四川人)。全文分为:郑氏时代,清代时期。日据时代。光复以后等四部分。作者认为:佛教传入台湾,很可能自唐代。但有信史可证,则为郑成功渡台之后。

《佛教东来对中国文学之影响》 谢无量著,载《现代佛学》1958年9月。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指出,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佛经的翻译工作,佛经在翻译注疏方面,为中国文学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说,佛经故事大量注入民间,给合诗歌声韵同时成熟,于是创造大众娱乐崭新文体。

《道教史琐谈》 蒙文通著,载《中国哲学》第四辑(1980年10月),其重要

的、有特色的见解是:天师道原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汉末西南少数民族向北迁徙,赛人、氏人北入汉中及汉水上游,五斗米教亦于此时入汉中,可知米教原行于少数民族,符篆固非中国汉字。今日写道教史,似可于其哲学理论之外一切姑略置之,或略及之而不必详悉,一如近世作佛教史仅以思想学说为主而略其余。论道教思想当以有关老子的著作为主。《道德指归》非严君平作,《老子河上公章句》不是周、汉古籍,非深于学之所为,词意鄙浅,杂以炼养之术,老子之合于神仙,此书当为首,后世道流都宗之,所谓《老子想尔注》《老子内节解》之流都出于此(校其文字异同可知)。关于老学重玄宗、杜光庭以孙登为魏人。此为大谬,注《老》的孙登为东晋人,即孙盛之侄,重玄一宗始于他。唐代重玄宗的著名代表为成玄英、李荣,吸取了佛教中观学说解老,道教与佛教三论宗有合流之概。全真教。全真教初以《金刚》、《道德》、《孝经》为主,系三教合一,吸取了禅宗和理学。全真教于明永乐间传至武当,自张道贵、张守清后武当派行于荆湖、滇、蜀,又兼修清微、正一之法,南北二宗混为一。

《论中印佛教与中印文化》 巴宙著,载《海潮音》50卷3、4期(1969年4月)。全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佛教在印度”。从印度的出世及解脱思想、佛教与政治,佛教对印度的贡献

等三个分方面阐述印度佛教。第二部分“佛教在中国”分为：佛教与黄老方术。认为汉代佛教初来能获得一立足点，而未遭受华人歧视排挤，是人们以佛教为道的支派之一。佛教与政治及儒道两教。指出在佛教来华的二千年长时期中，从汉到唐宋时有排佛之举。因为中国民族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不能相容，凡是夷狄之法皆被攘斥，因此，佛教初来中国时所遭受的困难与阻力，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佛教对中国的贡献。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在给予中国人以有系统的宗教。佛教的中国化，因其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为中国文化增光不少。此外，汉译梵文经典，语言音韵、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并对儒教和道教给以新思想、新哲学及宗教组织等。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思想》杨宪邦著，载《中国无神论文集》，中国无神论学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南北朝时期道教思想的探讨，必然牵涉到这一时期道教的改革问题。文章认为当时门阀士族从几个方面改变了原始道教，使道教和封建礼教紧密结合，发展了它所固有的出世思想和神秘性，借用佛教的某些形式和内容，使道教完全成为适应他们统治的宗教体系。同时也指出了在神形问题、生死问题、修行炼养等方面，道教与佛教是有所不同的。文章重点探讨了葛洪的金丹道教，寇谦之的御用道教，指

出他们是使原始道教贵族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想尔注怎样解老子为宗教神学》谢祥云著，载《宗教学研究》1982年1期。作者在本文中对《想尔注》如何以宗教神学观点解释《老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想尔注》对《老子》一书的篡改，在方法是采取减字、增字、改字等，曲解《老子》原旨，附会道教。采用注解全书章句，使《老子》一书曲附宗教神学。

《张陵五斗米道与西南民族》王家祐著，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4期。本文运用大量的史料、传说、神话、考古、文物等资料来论证张陵五斗米道与西南民族的关系。分别论述了张陵创建天师道和张鲁政权，张角的太平道与张修的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与青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论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钱安靖著，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4期，文章根据历史文献和民族学资料。从四个方面论证了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道教经典中有少数民族入道受箓的明确记载。道教从初创到鼎盛时期皆有少数民族信徒。西南少数民族吸取道教为本民族宗教信仰。五斗米道创建于西蜀鹤鸣山与西南少数民族有一定历史渊源。作者另辟蹊径，发掘材料，提出了天师道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尤密之新说。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

尹大贻著,载《宗教问题探索》1984年文集(上海社科院宗教所、上海市宗教学会编)。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进行讨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是什么。该文认为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宗教与相适应的问题。任何一种宗教的历史就是它适应于社会发展的历史,从其产生发展到今天,就是它不断适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并认为宗教也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探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可以说宗教是麻痹人们的鸦片。认为在剥削阶级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和宗教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都不存在了。但认为宗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关于总结我国建国以来无神论宣传的经验。文章认为无神论与宗教的关系首要的是要合于宪法。无神论不是一种信仰。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个教派,因而无神论与宗教不是并列的。如何宣传无神论,在方法上应当注意,而宣传者要了解宗教,要客观地历史地去说明问题。

《试论成玄英的“重玄之道”》赵宗诚著,载《中国哲学》1984年11辑。文章从“重玄之道”的否定式的宇宙论和养生成仙说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佛教与气功》贾题韬著,载《中华气功》1984年3期。作者认为:佛教的

教义和戒律,几乎无不与气功有关。佛家所提倡的修持方法,基本上都是气功家所必由的途径。文章指出了宗教气功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浅析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辩结构》萧篔父著,载《江汉论坛》1984年11期。文章认为:佛教哲学之所以精巧迷人,重要的是由于它有一套思维模式和思辩方法。其实质可归结为以相对主义为特征的诡辩论。但其中确有又蕴涵着、酝酿着某些认识运动的辩证法。佛教哲学这一套思维模式和思辩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方面:缘起说,在佛教看来,任何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因缘所生,故任何事物与现象都不能自主,不能常住,没有质的规定性。中道观。从缘起说推出的中道观,是大乘佛学的又一理论基石。“离有无二边”即是“中道”。“中道”是破掉各种“边见”的认识,即佛教所谓真理的认识。二谛义,即俗谛和真谛。是佛教试图解决它所说的真理与常识间的矛盾。证悟论。证悟是成佛的关键,是宗教实践一种自我亲证的神秘体验:认为人类认识及其媒介手段都有局限,只有通过神秘的“转识成智”的证悟,才能认识佛教的最高真理。

《道藏目录新编刍议》钟肇鹏著,《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文章对历代道藏的结集和编目,从东晋葛洪《抱朴子》所列道经篇目起,至明代正续《道

藏》,以及30年代燕京大学翁独健先生编的《道藏子目引得》等,都作了较为系统的考查。认为《道藏》传统的三洞四辅七部分类法源于神学体系,这是造成道藏编目混乱不科学的根本原因。对七部分类法进行了评论和分析。因之指出整理《道藏》首应从目录着手。随即对《道藏》包罗万象、极其复杂的内容,略加分析列举了15条。最后提出了新的道藏分类法,分为总类、经论、史地、诸子、道术、杂著六类22目。正如作者所谈,真正做到科学分类是不容易的。本文对道藏新编目录的意见十分宝贵。

《简论南北朝时期的儒释道关系》曾召南著,《四川大学学报丛刊》25辑《宗教学研究论集》(1985年1月)。作者认为南北朝是儒释道关系史上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儒释道的尖锐斗争和佛道二教互相模仿并吸收儒学的情况,而在南北朝的表现各自不同,南朝主要表现为思想理论斗争,大体上出现了三次斗争高潮,即宋文帝时的因果报应之争,宋末齐初的《夷夏论》之争,齐、梁之际的《神灭论》之争。北朝的特点大多不诉诸说理,而以北魏和北周两次废佛事件为最突出,虽属释道之争,却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斗争促进融合,采用修改、调和、吸取等方式,缩小彼此差距,为唐宋以后,三教大融合创造了条件。

《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龙显昭

著,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1期。文章根据史料,在宗教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对曹魏及西晋时期的道教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略论周易“三才”思想对早期道教的影响》刘国梁著,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1期。文章从宇宙生成论和天人感应论两个方面论述了《周易》“三才”思想对早期道教的影响。

《宋徽宗与道教》羊华荣著,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3期。作者搜检史籍,分析和指陈了宋徽宗崇道的特点;认为一是徽宗集皇帝、天神、教主于一身,此为历代崇道皇帝所无。二是改变了北宋诸帝三教兼容,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作法,有意抬高道教的地位,逐渐形成以道为主,融合儒教贬低佛教的格局。最后提出,徽宗的崇道活动,影响深远,一方面加剧当时政治的腐化和社会的动乱,从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另一方面对旧道派的融合和北宋以后新道派产生都有一定影响。

《论敦煌道教文学》龙晦著,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3期。在敦煌文献中,道教文学作品为数稀少,前人也很少研究。本文提出了数种敦煌曲五首、《云谣集杂曲子》中的《内家娇》和《敦煌变文集》中的《叶净能诗》等,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敦煌曲五首的分析,有游仙诗为炼丹家所作。其中对《还京乐》三首考证,不但补上了道教

词曲的空白,并对唐以来《还京乐》一曲的流传与演变,提供了坚实的研究资料。通过对《云谣集杂曲子》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云谣”与道教的关系非常密切。作者推测很可能别有类似正编的道教《云谣曲》,不过早已亡佚,无从取证。文章着重研究了《敦煌变文集》中的《叶净能诗》。先对《叶净能诗》变文中逐个情节与唐代道士叶法善(即叶静能)的传记、传说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重大情节都可在这些文献中找到根据或影子。同时又列举14种敦煌卷子,探讨了隋大业到瓜沙沦陷期道教在敦煌的活动情况,并认为敦煌道教文学之所以流传甚少,瓜沙

沦陷时期佛教对道教文学作品的销毁和变相销毁,是其原因之一。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宗教》 陈宗祥著,载《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研究集刊》第一集,1985年出版。该文是作者在1948年发表的《傩族的宗教》基础上改编撰写的。该文分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毕摩与苏泉、祭祀与巫术三个问题,详细介绍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原始宗教信仰。作者认为:凉山彝族原始宗教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破坏和阻碍作用,但毕摩对保存彝族古史和一部分科学技术知识有一定作用。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唐君毅(1909~1978) 另见《中国哲学》 唐君毅在30年代就涉猎宗教研究,1949年移居香港后,对宗教问题特别重视,看成是自己学问知识进步的表现。探讨了许多宗教问题,如:宗教对现代人类的价值,建立未来理想的新宗教,儒教高于佛教和基督教等。对宗教问题的重视,也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特点。

李安宅(1900~1985) 另见《社会学》 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宗教研究方面亦有突出贡献,主要著作有《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的研究》、《巫术分析》、《关于祖尼部落的一些观察和探讨》等,译著有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两性社会学》等。

蒙文通(1894~1968) 另见《历史学》、《民族学》、《中国哲学》。在道教研究上也有开创性的业绩,搜集整理出版了道教老学重玄宗的两本重要著作成玄英与李荣的老子注;对道教史的研究提出了独到见解;对道教中的陈碧虚与陈抟学派作了开创性研究;这些都为今日四川道教研究在全国居领

先地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易心莹(1896~1976) 近代著名道教内学者,名良德,字宗乾,法名易理轮,四川遂宁人。17岁时于青城山天师洞出家,曾拜全真龙门派碧洞守道士魏至龄为师,又曾拜吴君可门下就学,与当时学者西南联大教授陈国符、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以及道教学者陈樱宁相交往,商榷道教学术。曾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道教协会会长。著《老子通义》、《道学系统表》、《道教系统表》(又名《老君应化图说》)。辑《道教女子丛书》,主持刊印《道教三字经》以及道教授丹、养生等有关书籍,多在道观中刊行。

王恩洋(1897~1964) 字化中,四

川南充县人,为现代佛教居士中有一定影响的人物。1919年游学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列席旁听。1921年经梁漱溟介绍,前往南京支那内学院谒见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他整理并续成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讲稿,撰《佛法真义》论文,校刊《唯识述记》、《唯识枢要》、《唯识学记》等要籍。后任内学院大学部主任,编写了《佛学概论》。1929年在家乡设“龟山书房”授徒讲学,直至1949年。讲学和著述为其主要活动。著有《二十唯识论疏》、《摄大成论疏》等,其中《人生学》为其代表作。1957~1960年,应北京中国佛学院邀请,讲授“佛学概论”。

第七章 汉语言文字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西汉末成都人扬雄(前53~18)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此前,蜀郡严君平(又名严遵、庄遵)和临邛林间翁孺在方言词汇的搜集上已作过一些工作,或者保存了部分资料,或者拟订了整理的提纲。扬雄在前人所作工作的基础上加以“注续。”他的方言调查是利用各方人士集中都市的机会,从知识分子和士兵中进行了解。

汉代学者也编撰了一些规范用字性质的字书。西汉成都人司马相如(前179~前118)编撰的《凡将》一篇,无复字。扬雄撰《训纂》一篇、《苍颉传》一篇、《苍颉训纂》一篇(另所列扬雄《别字》十三篇),清代学者钱大昕以为即《方言》,并把扬雄立为“小学”十家之

列。

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还有《尔雅》,键为文学注,是中国最早的词典,今乐山市乌尤山尚存“尔雅台”遗址,据传即键为文学注《尔雅》处。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人文荟萃,汉时兴起而又一度衰落的语文学又开始出现新的著述。这一时期的本籍和外籍在川学者,如李商隐、林罕、句中正、李焘、李从周等的语文学著作,或见于记载,或流传至今。唐宋以来,四川地区十分重视刻书,其中也印了多种“小学”著作。唐咸通年间(860~874),留学长安的日本僧人宗睿携带回国的书籍目录中,记有“川西印子”(即雕版印刷品)《唐韵》《玉篇》。唐开成四年(839)杨汉公摹刻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于蜀中,南宋初此书又刻于潼川(今三台)。据唐末柳玘《柳

氏家训序》记载,当时成都“小学”出版甚盛。有名的善本《尔雅》郭注南宋监本及南宋小字本皆从五代蜀李鹞本出。

外籍客川之唐人李商隐撰《蜀尔雅》三卷,此书宋后亡佚。顾名思义,是仿《尔雅》的分类解释蜀地方言的著作。这是现在见于记载的有关四川方言的第一部专门著作,外籍客川学者林罕曾仕后蜀,任温江主簿,所撰《林氏字原偏傍小说》三卷,据其自序篆文取自唐代李阳冰,隶书取开元文字,对《说文解字》的部首各随字训释,使学者简而易从。其说颇与《说文》不同而互有得失。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记载,当时曾有此书刻石立于成都。

此外,唐时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东)四川学者梅彪还有专门解释药名的语文学著作《石药尔雅》二卷。蒲江魏了翁(1178~1237)亦有音韵学方面的论文(如《唐韵后序》,见清谢启昆《小学考》卷二十九)。元代眉山陈元吉著有《韵海》(见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后蜀宰相龙门蒲津(今属山西)毋昭裔还撰有《尔雅音略》。

明代杨慎在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等领域都有贡献。明末李实的《蜀语》更是现在最早的蜀方言词典。清代李调元的著作则把语文学引入到多种领域。到了近代,张慎仪的语文学著作,特别是他关于蜀方言的考释,对四

川方言本字的探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成都张慎仪(1846~1921)有关于方言的3种著作,《续方言新校补》二卷,这是清人杭世骏《续方言》、程际盛《续方言补正》的订补本,内容是见于六朝以前古书的方言词语和方音资料的汇集,作者谓“是正杭、程书者十之七八、芟补者十之四五”,故远较二家原书详审。《方言别录》四卷实为前书的续编或补编,内容是唐代以来见于载籍的方言、方音资料的辑录,取材颇为广泛。《蜀方言》二卷主要收录见于记载而当代仍然行用的四川方言词语,考其本字,注其出处,征引广博。这3种著作对于研究方言和民族语言,对于研究四川方言的本源都具有参考价值。此外,遂宁唐枢、林皋集的四川方言熟语、谚语集《蜀籁》于1930年石印出版(1962年重新校订出版)。这部著作辑录了民国初年以来较多的四川民间语言的词语资料。

井研廖平有《文字源流考》和《六书旧义》。其《六书旧义》一卷认为造字始于形,次事、次意、次声。象形皆实字,象事在半虚半实间,象意则全为虚字,只有其意,形声字乃后来创造,以济形、事、意之穷,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一字之义以数字形容为转注,本无其字,以声定名为假借。“假借异实而同名,转注异名而同实”,并认为形声字导源于假借。

此外,这一时期在语文学方面的学者和主要著述还有 30 多种,比较重要的有:

明代新都杨贞一《诗韵辩略》,清代成都龙为霖《本韵一得》,吕吴调阳《六书十二传声》,南江岳森《六书次第说》,《说文举例》,西昌颜启芳《读说文》,蒲江徐际来《汇字审音书集》,华阳张孝楷《说文假借例说》,近代富顺宋育仁《说文解字部首笺证》,《尔雅今释》,合川张森楷《文字类要》,《叠韵无双谱》,《通俗正名杂字书》,《同声字谱》,《六书半解》,富顺宋维彝《字索》,富顺李翼《集字韵释》,射洪韩志晖《韵学字典》,绵竹杨大绅《方言考证》,名山吴之英《音韵爽固》,《雅名爽固》等。

这些论著,或见于著录,或有刻本或排印本流传,或有手抄本留世。从明代到近代,四川地区的学者在语文学方面成都较为突出的是关于方言词语的考释,古音的研究以及文字学(特别是六书和《说文》)的论述,而对方言词语、俗语词的训释突破了传统语文学偏重文献语言文字的局限,对现代语文学中方言及口语词语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清代外籍客川学者段玉裁清乾隆间宦留四川,在富顺完成了他的音韵学名著《六书音韵表》以及《诗经小学》等著作,并开始了他的巨著《说文解字注》的长编《说文解字读》的撰写。《六书音韵表》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首刊于富顺县。他利用谐声字考求上古音,提出了“古同声者必同部”的著名论断。他分古韵为 17 部,认为“之”、“脂”、“支”三部分分立,认为古音只有平、上、入而无去声。他的这些观点和论证,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系统利用谐声字研究上古音,更是开创了音韵学研究的新局面。

二、现代四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四川省的语文学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小学”的范围。20~30 年代,由龚道耕和向楚共同倡议,在成都由著名藏书家渭南严谷孙刊印了有名的《音韵学丛书》32 种,凡 123 卷,标志着这一传统学科在四川学术界的地位。30 年代后期,新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开始在四川语文学界传播和应用,逐步改变了过去以传统的“小学”为主的语文学的研究内容,突破了传统“小学”的局限;这一时期吴玉章对文字改革的倡导,郭沫若对古文字的研究对汉语言文字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1913 年,廖平参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参与了制订注音字母的讨论。广安蒲殿俊(1875~1934)在 20 年代主编北京《晨报》副刊期间,也发表过有关汉字改革的文章。在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是吴玉章。1927 年后,由吴玉章、瞿秋白、林伯渠、萧三等

人共同研究,草拟了《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1930年又发表《中国拉丁化字母》,吴玉章并且亲到远东海参崴、伯力等地华侨工人中进行宣传,又于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集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以后吴玉章回到国内后,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期间,积极倡导汉字改革,并在陕甘宁边区倡导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创办了《新文字报》。吴玉章始终把提倡汉字改革与普及大众文化和扫盲教育相结合,提高文字在劳动群众中的交际和表达作用,从1933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玉章为文字改革发表的文章和报告近10篇。他在汉字改革方面的思想、设计和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汉字改革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中国文字改革的历史上,吴玉章是有特殊的巨大贡献的。

1931~1939年,郭沫若先后撰写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金文馀释之余》、《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萃编》、《石鼓文研究》等11部著作(五十年代作者将11部旧作重行改编,有增补删并),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文字进行

辩证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不但研究硕果累累,而且许多见解都超越了前人,成为古文字学界的定论,他特别注意运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古代社会,并用以解释古文字中的许多问题;又运用古文字的考释去探索上古的历史和社会状况。

这一时期,四川籍学者在古文字研究上甚有贡献的还有江津李亚农1939年出版《铁云藏龟零拾》一书,1941年又出版了《殷契摭佚》(后来又有续编)。此外还有《金文研究》等论著。

四川籍学人在这一时期还发表过一些语文方面的论著。合江沈佛愚著有《六书浅说》(1931)。马边贺昌群发表了《流沙坠简校补》(1934)、《流沙坠简补正》(1935)、赵少咸发表了《斲段》(1939)、《跋十三经音略》(1942)、《史籀篇疏证辩》(1945)。赵熙主纂的《荣县志》也论及了方言的差异与源流。由巴县向楚重修并于1939年刊印的《巴县志》,在《礼俗篇》中特撰《方言》一章,推寻巴郡方言根源,辨析甚精,成为学术名篇。在《方言》章中他精辟地指出掌握方音应寻求对应规律。他的音韵学、文字学术名篇如《论鱼歌麻古音答邓永龄问》、《订转注》、《古四声通说》、《戴东原声类表释例》、《古音韵部分析》、《分类等韵歌》等,都是他多年研究音韵文字学的心得。蓬安张煦对《玉篇》有较深研究,于30年代

撰《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垫江李植所著《异平同入考》1卷,早年由华西协合大学印行,列为华大国学丛书之四。所著《声韵学》3卷,由四川大学于30年代印行。在这部著作中,他主张使用新注音工具。成都龚道耕著有《仓颉篇续补》、《字林重订补遗》。

抗日战争期间,一批北方和沿海的高等学校内迁,一大批语言学家相继入川,其中知名的如沈兼士、吕叔湘、董作宾、商承祚、高亨、丁山、李方桂、马叙伦、魏建功、董同龢、劳干、徐中舒、闻在宥、陈望道、张世禄、林尹、姜亮夫、杨潜斋等。这批在中国语言学界享有声誉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给四川地区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同时,他们又继承了并发扬了四川地区历史上重视方言俗语研究的优良传统。他们对语言分析所采用的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实地调查和整理归纳,给四川地区的语言研究带来了活力,注入了新的血液,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四川期间,于1941年10~11月组织力量调查了四川多数方言点的方言,并先后由董同龢撰写了《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和由杨时篷撰写了《李庄方言音系》。此外,1942年唐幼峰撰《重庆方言》一书在重庆旅行指南社出版,著名汉简研究者劳干于1943年在南溪刊布了《居延汉简考释》石印本,

首次把1931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发掘的竹简木牍公之于世。周祖谟有名的《广韵校本》也最早刊行于南溪。

此外,抗日战争期中入川以后一直留川执教的徐德庵,在40年代先后发表了方言研究的论文《方言丛考》、《李实蜀语订补》(1943)、《蜀语札记》(1947),对四川方言的本字和源流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考释。

三、当代四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在四川省语文学界到广泛的传播。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的论著,毛泽东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述,在语言学界得到普遍的学习和重视。从50年代起,各高等学校中文系除继续开出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外,在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院校还先后开设了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修辞学等新增语言学课程,并配合国家的语文方针政策,开设了文字改革、方言调查方面的课程。

从1965年起,按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的规划,四川省由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高校负责对四川各方言点的方言作了比较全面的语音调查,对省内四川话的语音状况作了初步的整理和描写。在几所高校调查的基础上,由四川大学甄尚灵、

郝锡炯、陈绍龄编撰成《四川方言音系》。此外,甄尚灵的《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郝锡炯、陈绍龄的《峨眉音系》(1959)都是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汉语方言调查工作后的成果。成都和四川方言音系调查报告的发表,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描写和揭示了四川方言语音的实际情况。刘又辛《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一文直接为宣传文字改革服务,提出了当前汉字改革的历史依据。三台萧璋《略谈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1956)是全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直接产物。杨欣安、李运益等编写的《现代汉语》在50年代的现代汉语教学中具有一定影响,曾为当时一些高等院校采用为教材。江油傅子东的《语法理论》一书是汉语语法理论方面的一部探索性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玉章担任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1955年4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报告,后又发表《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文章。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吴玉章又作了《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亲自向四川大学师生作了有关汉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报告。

50~60年代,四川省除在方言调

查、推广普通话以及语言学教材编写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外,张永言有关古汉语词义研究的论文,如《古典诗歌“语辞”研究的几个问题》《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赵振铎关于音韵学的论文,如《从切韵序论切韵》等。赵少咸对《广韵》的研究和他规模巨大的著作《广韵疏证》《经典释文集说附笺》(均未刊)以及《谈反切》等论文。徐德庵的论文《近代汉语中句末语气词“则个”、“者”、“著”、“咱”、“罢”、“波”》都引起语言文字界的重视。

70~80年代,四川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出版,以及四川大学张永言等6人编写的《简明古汉语字典》的出版。《汉语大字典》系1975年国务院规划出版的一批全国性重点字词典之一,由四川、湖北两省合编,以四川大学徐中舒为主编,副主编有赵振铎、冉友侨、李运益等。经四川、湖北两省语文工作者用十年时间编成。共收字5万6千多个。在形方面,它是对古今汉字的初步整理。在字音方面,除标注现代读音外,尽可能反映出上古和中古的字音状况。在释义上,义项比较齐备,释义比较准确,能反映字义的源流和发展,注意吸收新词新义和俗语词研究的成果。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 著

《金文丛考》 郭沫若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932年,作者将有关铜器铭文的零散著作集成《金文丛考》一书。1954年,又把原有的《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和《续编》中的金文部分汇集为一书,仍名为《金文丛考》。此书包括金文文辞和文字的考释和几篇金文有关的历史论文。其解字辨韵和铭辞释读,多为前人所不能道。其中考释文字的有《释鞍》、《释黄》、《释白》、《释圣》、《释干卤》、《释亡作》、《释孔》、《释共》、《释朱》、《释义》、《释叔》、《释毕氏》、《释亢黄》、《释非余》等38篇,或纠正前人之误释,或新识,或补充旧释之不足等。考释古籍古官制或古彝铭文章有《周官质疑》、《毛公鼎之年代》、《谥法之起源》等著名论文。

《四川方言音系》 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编写,载《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3期,约16万字。主要撰写人为甄尚灵、郝锡炯、陈绍龄。《四川方言音系》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四川方言的音类和音值。这一部分是按声母、韵母和声调分类记述,有声母、韵母和声类的总表,声母、韵母的音值描写和声调的调值描写。另外,还列有150个

调查点的声母表、韵母表和声调表。

四川方言的声韵结合。这部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四川方言声韵结合表,二是四川方言声韵结合规律。25个代表点方音字表。四川方言的分区,包括入声独立区、入声归阴平区、入声归阳平区、入声归去声区。文末附有方言地图18幅。

《汉语造词法》 任学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月版,约20.4万字。本书是一部论述汉语构词法体系的著作。内容分7章,除第一章绪论与第七章讲述造词法和文字改革的关系外,其余五章讲述词法学造词法(即运用语法中词法学的手段和变化形式创造新词)、句法学造词法(即运用语法学中造句法的结构形式创造新词)、语音造词法(即只取语音,不取意义创造新词)、综合造词法(即上述几种造词法的综合运用五大体系,各分细目,详加论述。书中提出的汉语造词法,不仅和汉语造句法完全一致而且还涉及修辞和语音。

《广释词》 徐仁甫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约40.4万字。这是一部研究古汉语虚词的专著。其写作目的是想增广义例,以弥补《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经传释词补》、《经

词衍释》《词诠》《古书虚字集释》《诗词曲语辞汇释》等七书之不足。增广义例有四：一曰广词，二曰广义，三曰广例，四曰广时。在上述七书基础上，新增虚词和旧词新义 1028 项，对于旧词解释又补充例证 492 项。举例上起商周，下迄唐宋元明清代亦间涉及。所求用的广义方法是：据互文以求同义；据对文以求反义；据异文以求近义；据同文以求异义。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8 月版。本书原是为《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在字形方面所作的准备工作，又是一部独立的汉字字形工具书。《汉语大字典》要求反映汉字形体的发展，凡有古文字的单字，在字头下选列能够反映字形源流的古文字形体。

此书参考《甲骨文编》《金文编》新出土铜器、周原甲骨以及战国简书、帛书、印玺文、货币文、陶文等。字头约 3000 个，包括商、周、秦、汉各种形体一万余个。字形中的绝大多数是从原拓本或原件照片中摹取的，少数采自影写可靠的摹本。《说文》中的古文籀文，魏三体石经中的古文，则尽量收录。全书按《说文》的次序，以小篆为字头；《说文》所无的字，则写成楷书，注明所见字书。按历史层次分三栏排列，依次为殷代西周、春秋战国。根据版面需要，有些字形按原件放大或缩小。每字均注出处。

《子云乡人类稿》殷孟伦著，齐鲁书社 1985 年 2 月版，约 34 万字。这是作者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论文集，收录了作者从 40 年代以来有关论文共 25 篇。其中，有解释评介前人语言文字学著作的，如《论治中国语言文字之要籍》《从尔雅看古汉语词汇研究》《尔雅郭氏纂疏举例》《方言与汉语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说文解字形声条例述补》《王念孙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等。在这些论文中，对《尔雅》的研究尤为深细。还有研究汉语词汇和词义演变历史的，如《谈谈汉语词汇研究的断代问题》《关于汉语复音词构词形式二三例试解》《“闻”的词义问题》等。这些论文提出了对汉语词汇史从断代入手的研究方法，并对 60 年代初语言学界进行的词义发展问题的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还有总结前人语文学研究或语文学史的，如《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黄侃先生在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等。这些论文为使训诂学成为一门现代的语言学科在舆论上作出了努力。还有探讨文学名著语言技巧的，如《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从魏其武安侯列传看司马迁史记的语言艺术》《略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语言艺术的认识》《略谈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等。

《训诂学简论》张永言著，华中工

学院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版,约 15 万字。全书分概说、历代训诂述略、训诂著作举要、训诂方式和训诂用语综述等四章。书后附录两篇。作者把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新观点、理论、方法和材料引进训诂学研究,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开拓,书中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训诂著作,提出了中肯的评价。如对《辞通》和《联绵字典》的优劣异同作了很好的比较,便于读者合理使用。书后附录的《论郝懿行 尔雅义疏》和《论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是 60 年代在语言学界有影响的论文。

《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本书是《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的续编。本书收列的篆隶字形,从秦代至西晋止,字头 5400 余个。字形资料采自己发表的帛书、竹木简和现存的碑刻,其他如铜器、印玺、砖瓦等器物上有助反映汉字历史演变的字形,也择要收列。所收字形,按照版面要求,适当缩小或放大,并注明出处。字条按《说文》的顺序排列,以小篆或《说文》中的古文籀文为字头,《说文》中所无而见于其他字书者,以楷书为字头,并注明所见字书,依《说文》的原则归部,排在部之后。每一字头之下,按文字发展的历史层次分为三栏排列,依次为秦、西汉、东汉魏晋。各字之间既要显示形体演变的对应关系,也要照顾时代的先后依次,不受简、

帛、金、石等器物种类的限制。

二、论 文

《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甄尚灵著,载《四川大学学报》1985 年 1 期。本文是以四川大学中文系两个成都籍学生为中心发言人并经过调查研究而写成。内容除前言外,分成都话的音韵系统、成都音与北京音类的对应关系以及成都话同音字表三部分。前言指出,成都语音属西南官话系统。市区之中,语音基本一致,郊外情况则较为复杂:有些地方入声自成一类,共有五个声调,与市区四个声调不同,但仍属西南官话系统;有些地方大部分居民说客家方言(俗称“广东话”),与官话系统不同。成都话的语音,从大处看一是致的,统一的,但从内部看也有一些分歧。究其原因,与人口来源复杂有密切关系。关于成都话的音韵系统,文中按声母、韵母、声调、声韵调的配合、口语中的异读、连续变调、儿化等方面分别加以记述。关于成都音与北京音类的对应,也是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来作比较,归纳其相同和相异的规律。

《近代汉语中句末语气词“则个”、“者”、“著”、“咱”、“罢”、“波”》徐德庵著,载《语法论集》第 3 集,商务印书馆 1959 年 12 月版。本文研究的是,从唐代以来一般口语中表“请求”、“命令”等语气的助词的演变发展情况。文

中对宋元明清时期的戏曲、话本、传奇、小说等多种体裁的几十部作品的句末语气词进行全面仔细的考察,以丰富的材料证明“则个”、“者”、“著”、“咱”是近代口语中属同一声系的语气词(文中称为“甲组词”)、在句末表示“请求”、“命令”、“商榷”、“邀请”、“道量”等语气;“罢”、“波”是在语音上属于另一系统的语气词(文中称为“乙组词”),所表示的语气与“甲组词”完全相同,只是“乙组词”在近代汉语中出现较晚,直到元代才广泛地使用开来。作者还用历史的比较方法,考察了甲乙两组词的消长情况,着重指出这两组功用全同的语气词形成对立之后,沿着一种语言中的同义词不能长期并存的规律,开始了它们之间的斗争。最后还将这两组语气词在近代14部小说和8部戏曲作品中出现的次数,依时代先后列为22张表加以比较对照,显示它们消长升沉的实况。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郭沫若著,载《考古》1972年3期。本文分四部分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划谈到秦始皇统一文字。作者认为,西安半坡彩陶上的那些刻划,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距今6000年左右。到甲骨文时代,无疑是经过了3000年的发展。甲骨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甲骨文已经具有严密系统的文字。后人所谓构成文字的“六书”,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出不少例证。中

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指事应发生于象形之前。六书在汉代有两种排列方式,以指事先于象形,许慎的看法是比较正确的。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从方法观点来说,也就是草书先于正书。规整的字体,无论是后来的篆书、隶书或楷书,都是文字为统治阶级所垄断以后所产生的。但规整的字体只能在郑重的场合使用,一般是草率急就的字体。故篆书时代有草篆。隶书时代有草隶,楷书时代有行草。隶书是由草篆变成的,楷书是由草隶变成的。草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中国文字的趋于统一,事实上并不始于秦始皇。秦始皇的“书同文字”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使文字更进一步整齐简化了,在文化史上是一大功绩。

《韵学集成与中原音韵》龙晦著,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三期。在语言学界,曾经有人否认《中原音韵》一书的存在,认为所谓“中原雅音”仅是指当时的普通官话,并非书名。本文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中原雅音》不仅是一部书,而且还是一部韵书,,它的体例大体上与《中原雅音》差不多。作者认定《中原雅音》为韵书的主要根据是章黼《韵学集成》的材料。《韵学集成》里有近百处称“《中原雅音》云”,引用了《中原雅音》的释义,《韵学集成》的引书方式,如“见《中原雅音》”、“《中原

雅音》作某’等都是证据。此外,作者还提出两条旁证:一是从《中原雅音》的大量注音材料看到它的声韵调及声韵省并情况;二是《洪武正韵·序》:“钦遵明昭,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为定”。可见明人撰《洪武正韵》是根据《中原雅音》审音。作者结论说:“《中原雅音》是一部韵书,而且是一部考察音韵发展上至少不亚于《中原雅音》的带有关键性的韵书”。

《读广雅疏证》赵振铎著,载《中国语文》1979年4期。文章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王念孙写作《广雅疏证》前后的情况及书成以后在学术界的影响。第二部分具体论述《广雅疏证》的学术成就。中文指出,《广雅疏证》除了引证丰富、举例精当、连类而及等优点外,还有许多突出的成就。一是发掘了一批语言史料。由于文献不足,疏证《广雅》保存的古义难度较大。二是纠正了前人一些旧说。如“黔首,民也”条下疏证,辨明此称并非始于秦始皇。三是对词的语源意义作了一些有趣的探索。第三部分分析《广雅疏证》取得成就的原因:一是充分占有资料;二是坚持学科的求实态度;三是采用以声音通训诂的方法。第四部分比较王氏《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指出《广雅疏证》以后的著作既体现《广雅疏证》的研究成果,又能补疏证之所未备。第五部分指出《广雅疏证》的不足之处:一是术语含混,

概念不明;二是缺乏用例,解说尚有不当之处;三是校勘补正,不尽中肯。

《毛传条例探原》萧璋著,载《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4月版。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现存典籍中说《诗》、《书》的材料和古书本身的训诂材料归纳整理古人诗传条例,也就是探讨《毛传》条例之源。第二、三、四部分,探求了《毛传》的具体条例,如在解释单字方面的条例有“叠字释单字”、“连文释单字”、“点明含意”、“义隔相训”四种;在解释句子方面的条例有“翻译”、“推因”、“点明含意”三种。其中“翻译”又分为“直译”和“意译”。此外,《毛传》解释字句还有“互文见义”、“递相为训”、“连类而及”三种重要条例。第五部分,探讨了《毛传》“言”和“犹”两个重要训诂术语的来源。

《“右文说”说》刘又辛著,载《语言研究》第一期,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对历史上“右文说”的形成、发展经过及其有关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和总结,从汉字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认识“右文说”的形成。对于研究汉字声符的表意作用,本文具有参考价值。文章共分四部分:

评介宋人“右文说”的得失,肯定宋人注意对形声字声符研究的开创之功,以及用同声符字类比、以某字原字义为纲解释同声符的形声字字义的研究方法。评述清代以来段玉裁、刘

师培、章太炎诸家对“右文说”的研究。

评介沈兼士在“右文说”研究上超越前人的成就。阐明汉字发展为形声字的经过及形声字声符的性质,从而认识“右文说”的形成。

《论“形训”》李运益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4期。形训是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本文对形训的性质、原则、条例等问题的研讨,有助于训诂工作中正确理解和应用这种方法。文章的主要内容有:形训的作用体现在推求字义、明辨本假、考证音读、审定异体、诠释典籍、校勘讹误、释

读古文、辅翼教育等方面。形训与音训、义训的关系。形训的性质等。

《四川方言语法初探》杨欣安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增刊。本文针对四川方言语法研究还比较薄弱的现状,归纳四川话中的一些语法现象,并将它们与普通话作初步比较,说明四川话与普通话在语法方面的差别,以供方言调查,四川人学习普通话和语文教学参考。文章从15个方面将四川话与普通话作比较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四川方言研究的不足。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向楚(1877~1961)字先桥,亦作仙樵,号触公,四川省巴县人。1927年至1931年任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学院院长,1931年任国立四川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41年任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1949年代理四川大学校长。向楚长期从事文学、声韵之学的教学与研究,所著古声韵论著有《古四声通说》、《戴东原声类表释例》、《古音韵部分析》、《订转注》、《分韵等位歌》、《音韵学丛书》之《音学辨微·序》和《释大·序》。总纂《巴县志》并于撰之《礼俗》篇中特撰《方言》一章,以推求巴郡方言之语根。

赵少咸(1884~1966)名世忠,四

川成都人,祖籍安徽省休宁县。幼年就学于成都名儒祝彦和,抗日战争前先后在石室中学、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任教。抗战期间应聘到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授。40年代初,他回到成都,受聘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1966年病故。其间担任过中文系系主任。赵少咸在学术思想上,师承清代乾嘉学派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和近代学者章炳麟、黄侃,在学术观点上亦较接近。他一生致力于汉音韵的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广韵疏证》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两部巨著以及《斲段》、《批判胡适的入声考》、

《论反切》等单篇论文中。

李植(1885~1975) 字培甫,四川省垫江县人。曾任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成华大学等校教授及四川大学和成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李植专于文字、声韵之学并从事其教学与研究,主要著述有:《异平同入考》1卷,《声韵学》3卷,《古今声类损益说》、《喻纽为古声说》、《双声释例》和《叠韵释例》等。

郭沫若(见本志《历史学》)

徐德庵(1902~1984) 山东省临朐

县人。1922~1926年就读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山东任第三师范国文教员,后任曲阜师范校长。抗战时入川,先后在成都担任中学教员,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夜校讲师、相辉学院文史系以及重庆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50年代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著有《庄子内篇连语音训》、《庄子外篇连语音训》、《庄子杂篇连语言训》,是用声韵学原理解释词语的著名论文。

第八章 文 艺 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古代巴蜀文学

汉代是四川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是四川文艺学研究辉煌的开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华阳国志·蜀志》)当时,蜀地文学创作居全国领先地位:“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书·地理志》下)。西汉巴蜀地区从事文章著述和教学的人颇多,知名度很高者有张宽、司马相如、王褒、林间公孺、严遵、李弘、扬宣、扬雄等。在中国文艺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国晋初,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两表——诸葛亮《出师表》和李密《陈情表》都产生于蜀地。汉末入蜀的文士

和本土名流中著作传世的不少,其时蜀地诵读研习诗文学之风颇盛。如蜀汉车骑将军刘琰家中“侍婢数十皆能为声诗,又悉诵读《鲁灵光殿赋》”。(《三国志·蜀志·刘琰传》)致力于《诗经》研究的就有文立、司马胜之等十余人。就总体成就看,则以秦宓、谯周、陈寿为最高,蜀汉建兴二年(224),吴使张温聘蜀,向秦宓提出“天有耳乎”、“天有足乎”等问题,秦宓全引《诗经》回答,反映蜀地研习《诗经》风气。在《与王商书》中关于“自然文采”的主张,启迪了《文心雕龙·原道》的论点。谯周师事秦宓,又为李密、陈寿之师,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等著作百余篇,是三国西晋时蜀中最有的影响文史学者。陈寿巴西郡安汉(今南充)人。所撰《益部耆旧传》,保存了地方文化史资料。其《三国志·魏志》卷

二十一,已带文苑传性质《王粲传》后附建安作者多人材料,是关于建安文学的最早的集中研究和评述。

唐宋两代是巴蜀历史上文化最发达时期。川籍人中出现了陈子昂、李白、三苏父子等一流文学家。从“四杰”到杜甫、陆游,外地著名作家纷纷来蜀。600多年中,文学创作属全国最繁荣地区之一。陈子昂、李白、杜甫、田锡、三苏、黄庭坚、陆游、魏了翁等人的创作理论,都具有推动一代文学潮流的影响力量。陈子昂倡导“兴寄说”和“风骨论”,《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唐诗革新的宣言书。李白倡导“建安风骨”、“清真”风格,其实践与理论相符,完成了唐诗革新伟业。杜甫居蜀地九年,论诗主张重视内容,追踪风雅,强调艺术美,创作倡别裁伪体、转益多师,集众家之长;主壮美诗风,以“有神”、“混茫”为论诗极则,对中国诗坛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符载、韦庄、牛希济、韦毅、欧阳炯等人,均有值得注意的文艺学理论文章传世。

本土人士长于创作、评论或二者结合有著述传世的不下数十人。田锡的《贻宋小著书》、《贻陈季和书》中重自然文采的主张,直接启迪了三苏文论。苏洵主张文为世用,重平素修养,自然而发。苏轼是代表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旷世奇才,文集中多处涉及文艺研究。当时及宋以后谈艺者莫不受其影响,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发展

了传统养气说,《诗病五事》影响张戒《岁寒堂诗话》。唐庚的《唐子西文录》,范温的《潜溪诗眼》,韩驹的《陵阳室中语》均为有影响的诗论著作。王灼的《碧鸡漫志》是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和理论价值的词学研究专著。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开拓研究体式,后世治唐诗莫不资取。魏了翁综合道学家文论、政治家文论、古文家文论而自成一说,为南宋后期文坛所崇。

元明时期,四川出现了虞集、杨升庵等影响全国的大家。虞集主张上承魏了翁以来大综合的文学观点,以文章为“义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诸其口者,无所择而不当”(《刘桂隐存稿序》),反映出元代大一统条件下文学兼容并包、综合各派文论比较通达的看法。杨慎创作造诣极高,研究更广远深厚,而贯穿讲求实学,反模拟,反理学精神。其研究首重探源,故编《风雅逸篇》、《五言律祖》诸书;次重视大家,故编李、杜诗选及《绝句辨体》诸书;三重考证疏释,故编著《丹铅录》、《艺林伐山》等数十种书;四成系统,故有《诗话》、《词品》、《书品》、《画品》之作。就文艺学研究看,广博精深,为明代一流学者。

清代四川有名气和影响的作者,有唐甄、三费(费密、费锡琮、费锡璜)、张鹏翮、岳钟琪、三彭(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三李(李调元、李鼎元、李骥元)、二王(王恕、王汝璧)、张问

陶、三张(张怀泗、张怀淮、张怀溥)、二刘(刘灏、刘沅)、二王(王怀曾、王怀孟)、二孙(孙澈、孙澎)、李惺、李崧霖、章宝箴、刘硕辅、孙桐生等。在文艺学研究上有较突出成就者则当推彭端淑、李调元、张问陶、孙桐生。

彭端淑倡导“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才，所以辅吾之学识以达于文”。(《文论》)所著《雪夜诗谈》，宣扬真实、自然、含蕴深远的诗歌创作论。李调元平生著述之多，为清代蜀人之冠。所编《函海》辑汉以来有关巴蜀著作百余种，为研究四川文化学术重要文献。此外他还有系统的文艺论著《雨村赋话》《雨村诗话》《雨村词话》《雨村曲话》《雨村剧话》。张问陶为蜀中名诗人，与袁枚、赵翼、洪亮吉等均有交往。评诗倡独抒怀抱，诗中有我，有《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反复阐明这一主张，与袁枚“性灵说”相呼应，影响及于全国。孙桐生曾批点《甲戌本石头记》并将《妙复轩评石头记》分疏整理，刻印传世，为早期红学家之一。所编刻之《国朝全蜀诗钞》，收作者362人，诗5900余首，是清代四川文艺史的重要文献。

清末民初，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前后达8年之久，其论诗文崇尚汉魏，曾编《八代文粹》《八代诗选》。所编《唐诗选》收诗2800多首，眼光独到，对此书的批点及其论诗专著，对四川治唐诗的学人广有影响。杨锐为戊戌

六君子之一。学问广博，擅长诗文，论诗主博采众长，自创道路。经学大家廖平在其玄奇沉远的议论中(如说《诗》《易》《乐》为“天学”)也包含着不同于传统的文艺学主张。最能代表王闿运学风的吴之英，著《寿栎庐丛书》，多涉论文之语，其论诗倡融合李杜之“清刚”与元白之“铺叙，兼二派之长而无二派之短”(《国学荟编·关山月》)。宋育仁主要从事改革政治经济变法图强活动，然其《问琴阁丛书》亦间论文学，又编《三唐诗品》三卷。所写《半篋秋词跋》倡词宜“疏密得当而“意深”“隽永”，立论稳妥。赵熙为有清三百年四川诗人之冠，平生于诗词理论钻研甚精，所著《香宋杂稿》为文论渊薮，手批《唐诗选》及杜甫、苏轼等数十家集，精鉴细解，蜀中学人传抄转录，受益至今。

二、现代四川的文艺学研究

20世纪初以来，四川的文学研究有了新的内容、新的对象、新的方法、新的队伍。吴虞、曾孝谷是四川新文学最早的倡导者和研究者。吴虞为刘长述的《松冈小史》作的序中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作用，并把小说第一个介绍给四川读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四川的文学运动和研究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一批报刊、杂志开始发行，发表文学作品，开展文艺研究。

在“五四”新文学的高潮中,郭沫若、李初梨、周太玄、李劫人、康白情、赵景深、陈毅、蒲殿俊、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全国著名作家,与四川文坛的研究者共同推动和发展了四川的新文学研究。

如郭沫若的《三叶集》、《文艺论集》;蒲伯英的《戏剧之近代意义》、《中国戏剧天然改革的趋势》、《戏剧要如何适应国情》;康白情的《新诗之我见》;周太玄的《法兰西近代文学趋势》、《诗的将来》;李思纯的《抒情诗的德性及其作用》、《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李璜的《法国文学史》;陈毅的《我们的生活》;李劫人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

30年代,四川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受到极大地阻碍和影响。不少川籍学者纷纷东下,到上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积极倡导革命文学。其代表人物是郭沫若、李初梨、阳翰笙、任白戈,青年学者有周文、何其芳、章泯、罗念生、曹葆华、赵铭彝等。赵景深发表了《现代文学杂论》;陈翔鹤有《关于沈钟社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曹葆华翻译有[英]利普兹的《科学与诗》;沈起予著有《欧洲文学发展史》,还发表了介绍文学文艺知识的小册子《怎样阅读文艺作品》;赵铭彝有《我与戏剧》、《苏联的戏剧》;在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研究方面,王光祈作有《中国音乐史》。

四川的文艺学发展是随抗战初期大批作家、艺术家、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内迁而出现的。此时在川的文艺家有覃子豪、陈铨、宗白华、黎锦明、郭沫若、李何林、冯乃超、阳翰笙、章泯、沈起予、戈宝权、田仲济、廖沫沙、胡风、李初梨、茅盾、田汉、何其芳、叶以群、陈子展、赵家璧、向林冰、葛一虹、王平陵、张道藩、熊佛西、陈翔鹤、陈炜谟、朱光潜、马宗融、周文、叶圣陶、曹葆华、谢文炳等,主要分布于重庆、成都,以及乐山、江安、三台等地。

抗战时期,四川的文艺活动空前活跃。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1938年10月迁往重庆,随之四川出现了一只空前的文学研究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939年1月,根据“文协”的建议,由李劫人、周文、朱光潜、罗念生、马宗融、沙汀、陈翔鹤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员有叶圣陶、周太玄、熊佛西、叶丁易、邓均吾、王余杞、刘盛亚、谢文炳、洪毅然、萧蔓若、毛一波等。1946年5月1日“文协”重庆分会成立,沈起予、金满成、艾芜、萧蔓若、沙汀、陈翔鹤等被选为理事。除成渝两地外,在三台、南溪、江安等地也都有分会组织和活动,广泛地开展了文艺活动。

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曾有若干次的重大的文学论争,它不仅对四川文

学,而对全国文学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很快就传入四川,叫《文艺问题》。四川文艺界在重庆、成都、三台、江安等地举行了学习讨论,郭沫若、何其芳都先后发表了评论文章。

这时期重要的理论著作和翻译著作有艾芜的《文学手册》,陈铨的《从叔本华到尼采》,何洛的《艺术规律论稿》,赵景深的《民族文学史》,郭沫若译的《艺术的真实》(马克思恩格斯著),曹葆华译的《民族文学史》,郭沫若译的《艺术的真实》(马克思恩格斯著),曹葆华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苏联的文学》,章泯的《导演与演员》。

20~40年代末,四川文艺学中古典文学研究逐渐开始朝着现代化方向转变,取得一些成就。在中国文学史的综合研究、专题研究方面,周癸叔、林山腴、谢无量、庞石帚等都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从文化史角度考察认识中国文学诸特点的则有龚向农、刘咸炘等的学说曾震动学术界,可谓是宏观研究的前驱。向楚、杨沧白其创作与评论为古典文学研究界瞩目。

周癸叔20~30年代在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任教,专心词曲研究,有《唐五代词讲稿》、《北宋慢词讲稿》、《曲学讲稿》,影响蜀中词学研究。林思进述学论文甚多,其《中国文学概要》,为多

年教学所编教材,手批《唐诗选》等集,至今影响很大,龚向农长期任教成都各高校,深于经史之学,论文不喜桐城义法,而主衔花佩实,眼光通达。平生著书近70种,其《中国文史学略论》,从文化的广角宏观审视因革变化。谢无量有《中国六大文豪》、《中国大文学史》问世,续有《中国妇女文学史》、《平民文学两大文豪》、《楚辞新论》、《诗经研究》等多种著作。其中《大文学史》在川中高校普遍用作教材,至1940年已发行到18版。该书构体严密,作品与评论并重,材料丰富而尤重视把握变化大势。刘咸炘20~30年代任教成都各高校。其人自学成才,而纵贯哲学、史学、语言、文学以立论,所著《推十书》有20余种涉论文艺,属典型的文化史研究。向宗鲁30年代起在重庆、成都高校任教,所著《校雠学》为实证性文学研究方法论名著。所校之书有《说苑校证》、《淮南子》、《文选》、《周易正义》、《史通》、《管子》、《春秋正义》等,治学方法影响一代学人。庞石帚20年代起任教成都各大学,长期教中国文学史,诗选、词选及《文心雕龙》。所著《国故论衡疏证》(中、下),对章太炎原著所涉,一一寻根究底,辨别是非,为传统文论中一部力作。

抗战期中一批外省籍学者入川,推动了四川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1935~1937年,刘大杰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应有现

代文学观念,应注意文学思潮变迁和中外横向交流。陈寅恪 1943~1945 年来成都,执教燕京大学,在成都文科院校讲授元白诗研究,完成《元白诗笺证稿》初稿。

三、当代四川的文艺学研究

(一) 曲折发展(1950~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文艺理论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西南文联、川西文联、四川文联等文学艺术单位的建立,《西南文艺》、《川西文艺》等相继创刊,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宣传马恩列斯论文学艺术、及毛泽东文艺思想。高等学校文科专业有计划地开设了《文学概论》、《马恩列斯论文学艺术》、《毛泽东文艺思想》、《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等课程。

在文艺理论方面,四川学者着重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

古典文学研究在指导思想、研究宗旨、人员组织、成果体现等方面,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总体是保持民族特色面向现代化、科学化前进。

实行院系调整后,各文科高校的中文系及其古典文学教研组成为当时川中古典文学教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就实绩言,首先是实证性研究成就极为突出。曾宇康的《春秋繁露译注》,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唐戏弄》、《教

坊记笺订》,庞石帚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校点,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张默生(山东临淄人,1941年起在川)的《先秦诸子文选》,缪钺的《杜牧诗选》,华忱之的《阮步兵咏怀诗注》,陈志宪的《西厢记笺证》,旅京川籍学者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盐铁论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旅沪川籍学者赵景深的《元明南戏考略》,旅京川籍学者赵齐平的论文《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一些问题》等著作,在当时国内相同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作家作品的解析性研究,则初步形成了以唐诗和小说戏曲为重点的格局。刘开扬的《唐诗论文集》及曾缄《论杜诗七言绝句散记》,及其他为数甚多的文章,体现了四川学者对唐代文学(以唐诗为主)研究的实力。张默生《谈谈水浒》、《谈西游记》,陈炜谟《关于红楼梦评价的几个问题》,以及徐永年关于《琵琶记》和变文的研究,均为 50 年代初颇有影响的文章。刘知渐的《罗贯中为什么反对曹操》、《关于汉宫秋的评价问题》二文,也在当时引起注意。尤为突出的是旅京川籍学者何其芳在全国《琵琶记》讨论和《红楼梦》讨论中发表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论红楼梦》,二文都是带总结性意见的名著,推动了研究的深化。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则集中力量于六朝和唐代文论。杨明照在 60 年代即写

了关于刘勰思想、刘勰论构思、论练意练辞的系列文章,及《葛洪的文学主张》。缪钺有《颜之推的文学批评与作品》。华忱之有《略论杜甫的诗歌主张》。

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先后有吴宓、饶孟侃、赵澧、谢文炳、颜实甫、石璞、李梦雄等教授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如石璞的《民主诗人惠特曼》、林如稷《勤奋成功的巴尔扎克》、卢剑波《希腊悲剧的起源》、赵澧的《试论莎士比亚精致戏剧中的人物和人物塑造》等。

一些有影响的川籍学者在全国有大量的、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发表和出版。文学理论方面,有郭沫若的《雄鸡集》、沙鸥(重庆人)的《谈诗》(共三集)、陈炜谟的《论文选集》、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毛星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引起多方面的争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曹葆华译有《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与周扬、戈宝权合译)、《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高尔基文学论文选》、《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艺术论》等。

在台湾的诗人兼评论家覃子豪 50~60 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诗论,如《诗的解剖》、《论现代诗》、《诗的表现方法》,成为此期海外诗歌评论家的代

表人物。

在压倒一切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和标准之下,除了与全国政治和学习运动配合,发表一些表态性的文章外,四川还有三次大的文艺思想论争。第一次是 1956 年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第二次是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围绕青年诗人流沙河《草木篇》的思想内容和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的“诗无达诂”论,展开了一场批判运动;第三次是 1961 年围绕依据高缨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改编电影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性论问题的讨论。直至“文革”十年的动乱时期,四川文学研究成为学术领域的重灾区,陷于停顿。

(二) 发展时期(1979~1985)

80 年代以后,四川的文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繁荣的景象。

随着对文学批评中“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简单化、概念化标准的否定,文学观念的变革,研究方法的更新,文学基础理论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文学原理的研究方面的成果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选》、《时代·文艺·生活》(论文集);程代熙《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唐正序《文艺学基础》。四川新诗研究不仅起步早,成果也很突出,如吕进《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尹在勤《新诗漫谈》、雁翼《诗的信

仰》、吴野《文学欣赏漫谈》、苏恒《文艺批评家也必须深入生活》、田原、冯宪光《从生活到艺术的道路》等论著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批省外川籍学者在此期亦有新的成果出现,如何洛除发表了《形象思维的客观基础与特征》等论文外,还主编《实践与美学》和《艺术规律论稿》,王燎荧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高校出现了一批写作教材,如李保均的《小说写作研究》、董味甘的《应用写作》等。

对于川籍知名现代作家(如郭沫若、巴金、李劫人、沙汀、艾芜、何其芳等)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郭沫若研究在川籍作家研究中又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成果最多影响最大。《四川大学学报》编辑出版了《郭沫若研究专刊》共5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郭沫若研究论集》两集,共发表论文39篇,集中反映了郭沫若逝世一周年和诞生90周年四川和全国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四川郭沫若研究的实绩,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论文集》。刘元树《屈原的艺术构思》首先面向全国。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著,如李保均《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谭洛非等人的《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唐明中、黄高彬等人编注的《樱花书简》、《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编注的《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以及《郭

沫若历史剧 屈原 诗话》、《郭沫若在重庆》等。

伍加伦、洪钟等《论李劫人和他的死水微澜》、《有关李劫人创作的二、三问题》率先提出对李劫人重新评价,呼吁重视李劫人研究,引起学术界反响。这方面的重要论著有伍加伦、王锦厚的《李劫人传略》,谭兴国的《巴金生平与创作》、《艾芜的生平与创作》,李庆信的《论沙汀三四十年代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尹在勤的《何其芳评传》,李存光的《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等。

抗战文学研究是四川文学研究具有特色的部分,在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文天行《周恩来与国统区文艺》,苏光文的《抗战文学概观》,以及“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周恩来同志在为国统区传播 讲话 所做的贡献》、《关于抗战文艺的分期问题》等。综合性的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四川大学学报》于1981年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论文集》,发表了任白戈《研究鲁迅 学习鲁迅》,石璞《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华忱之的《鲁迅后期杂文的思想深度》,李昌陟的《鲁迅小说的民族风格》。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有赁常彬《鲁迅治学浅探》,秦川《鲁迅出版系年》等,这是四川文学研究者首次大规模地开展对鲁迅的研究。这方面还有尹在勤、孙光萱《论贺敬之的诗歌创

作》,流沙河的《台湾诗人十二家》。李士文《关于 创业史 和极“左”思潮》,陈子谦《钱钟书文艺批评中的辩证法探要》。旅京川籍学者张大明的《踏青归来》,钱光培等《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胡德培《李自成 艺术谈》、《李自成 人物谈》又独具特色。仲呈祥《作品争鸣述评》,严昭柱《中国古代美学、文艺理论研究概述》,彭放《作家自我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

在整理现代文学研究资料方面有《曹禺研究专集》、《艾芜研究专集》、《何其芳研究专集》、《马识途研究专集》等。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实证性研究向来为“蜀学”强项,此期更有所发展。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唐前子书、唐宋文学、戏曲、小说方面,成果形成则多以校注、年谱、专辨文章三大类出现。校注类著作中数十年致力于“龙”学研究的杨明照,完成了《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被国内学者誉为研究《文心雕龙》的百科全书,1985年又完成了《抱朴子外篇校证》。王利器连续出版《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校证》、《风俗通义校注》、增订本《盐铁论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打下被国际上称为“千万富翁”(指著述超过一千万字)的基础。数十年研究神话的袁珂完成了《山海经校注》。引人注释类著作有:屈守元的《中国古文献学论著选注》,王仲镛的《绝句衍义笺注》,王文才的《杨慎

词曲集校注》、《白朴戏曲集校注》,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杨世明的《淮海词笺注》等。年谱类著作中,有白敦仁《陈与义年谱》,钱钟书评价云:“援据之博,考核之精,罗万卷书,断千载事,而今而后,简斋身世遂如按图指掌矣。”还有王利器的《郑康成年谱》、《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谱》,谭优学的《唐诗人行年考》,刘知渐的《建安文学编年史》,安旗的《李白年谱》等。学术考辨是四川省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实力很强的领域,著述较多。屈守元的《元刊本 韩诗外传 题记两首》发表后,张舜徽先生评为“精湛绝伦”之作。汤炳正的《屈赋新探》,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赵卫邦关于《红楼梦》的考证,熊宪光关于《战国策》文章的考订,谢桃坊关于宋词的考订,曾枣庄关于三苏诗文的考证,张志烈关于宋词的考订,吴明贤关于陈子昂生卒年的考辨,余正松关于高适生平的考证,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评析性研究,内容相对集中的在楚辞、唐代(以杜甫为中心)、宋代(以苏轼为中心)及小说戏曲方面。关于楚辞,除汤炳正《屈赋新探》外,郑文(任教兰州)有《楚辞浅论》,魏炯若有《离骚发微》,白敦仁有《论屈原赋的崇高美》。黄中模在1983~1985年中,写出十篇有关楚辞的论文(如《评三泽玲尔 屈原问题考辨》中涉及《史记·屈原传》中的一些问题》等)。

关于唐诗的研究,有曹慕樊的《杜诗杂说》,刘开扬的《唐诗通论》《柿叶楼存稿》,安旗的《李白纵横探》《李诗新笺》,李谊的《杜甫草堂诗注》等专著。旅京川籍学者廖仲安,长期研究唐诗,这时担任由北京、济南学者组成的《杜甫全集校注》编写组领导工作。旅京川籍学者裴斐的《李白十论》及其在《草堂》学刊上发表的关于杜甫的系列论文,钟树梁关于杜甫排律的研究,陶道恕关于杜甫诗与六朝关系的研究,徐永年关于杜甫书画诗的研究,均是此期发表的论文。宋代文学研究,自50年代庞石帚等开其端,至80年代初苏轼研究会成立,在四川形成重点。重要著述有:杨明照主编的《宋文选》,曾枣庄的《苏轼评传》《苏洵评传》,白敦仁的《周邦彦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赵齐平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小说戏曲方面研究专著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省社科院文学所编的《三国演义研究集》,段启明(辽宁铁岭人,1964年后在川任教)的《红楼梦艺术论》《西厢论稿》,王泽君、常思春的《古代短篇小说选注》。李景白(北京人,1946年后在川任教)的《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思想的面面观》,谢宇衡《论琵琶记的悲剧冲突》,徐洪火关于“临川四梦”的研究。旅京川籍学者熊白施(笔名劳洪,乐山人)、周先慎(崇庆人)有关于《聊斋》《儒林外史》《牡丹亭》的研究,熊文有《聊斋志异选

评》等,周文有《从范进中举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等。旅豫川籍学者李春祥有《包公戏选注》及关于元杂剧的多篇论文。综合性评析研究方面,有缪钺的《诗词散论》。屈守元的《中国文学简史》,由国家出版局推荐到美国翻译出版。屈守元主编的《中国历代文选》,为国内许多高校用作教材。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相对集中在传统诗论、《文心雕龙》和唐宋文论方面。其中诗论有,旅京川籍学者裴斐的《诗缘情辨》论点提要。还有陈思苓的论文《试论毛诗大序》《钟嵘诗品的诗歌评论》,都是对传统诗论作新的审视。旅鲁川籍学者牟世金50年代即全力投入《文心雕龙》研究,这时连续完成《文心雕龙译注》《文学艺术民族特色试探》《雕龙集》《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此外陈思苓关于《文心雕龙》论道、论神思、论文学语言的系列论文,曹顺庆的《文心雕龙的灵感论》均有自己的独特体会和见解。唐代文论研究,有谢宇衡的《别裁伪体亲风雅》,黄中模《评韩愈柳宗元的文道论》,张志烈《释混茫》,吴明贤《论陈子昂的文学思想》等论文。裴斐连续写了《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元稹简论》《元白雌黄》《再论关于元白评价问题》,引起长达两年的热烈讨论。宋代文论研究方面,有曾枣庄的《三苏文艺思想初探》,曹学伟《试论苏轼文学主张》,项楚《论庄

子对苏轼艺术思想的影响》等。曲论方面,赵景深的《曲论初探》,王世德《论刘熙载 艺概 中的辩证思想》,陈昌渠《王夫之兴观群怨说浅释》,马德富的《南社诗论初探》,陈长义的《李调元戏剧理论初探》,《论王骥德的 曲律 》,廖全京《论 桃花扇 传奇的结构艺术》等。

此期四川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有:石璞《欧美文学史》,林亚光主编的《简明外国文学史》,四川6所高校参加编写的《外国文学五十五讲》,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等。蓝仁哲所译《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赵澧所译(美国)劳克斯坦的《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苏联)沃里夫斯基的《论文学》等。一批中青年学者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开展了比较研究,如曹顺庆《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罗纲《东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几点比较研究》,王泉根《论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等。

此期电影、电视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地方戏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收获。有朱先贵(笔名朱玛)《电影艺术与电影文学基础》,《电影剧作基础》,朱小丰的《现代电影美学导论》,川籍学者羽山的《惊险电影初探》,王

光全的、《论电影剧作的艺术技巧》等。

1979年后,出版了学术性丛刊《民间文学论丛》,成立了《格萨尔王传》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四川民间文学丛书》等。萧崇素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尤其是彝族、藏族文学研究,成果显著,著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彝族文学篇》。王映川的《格萨尔史诗的神话传统与宗教关系》,吴蓉章的《浅论民间文学与道德》等论文各有特色。川籍学者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全面介绍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成果、文学经验及其发展的历史,填补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空白。此期最具特色的是地方戏研究。重要成果有席明真的《川剧浅谈》,陈国福的《天府之花》,胡度的《川剧艺诀释义》以及《川剧高腔乐府》,《川剧脸谱》,《川剧音乐概述》等对川剧的历史发展、川剧的基本特征、川剧的基本特征、川剧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理论的研究和美学的探讨。同时还有一些对川剧表演艺术的专门著述。如周慕莲《川剧 情探 的表演艺术》,阳友鹤《川剧 旦角表演艺术》,以及《周慕莲舞台艺术》,《刘成基舞台艺术》,《袁玉堃舞台艺术》,《金震雷舞台艺术》,《陈全波舞台艺术》等。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著与译著

《中国大文学史》 谢无量著,中华书局1918年初版,约30万字。谢氏此前曾有《中国六大文豪》一书,对中国文学之特质有深刻把握。此篇则扩而充之。全书分五篇,后四篇分别讲上古、中古(汉至六朝)近古(唐宋明)、近世(清)文学史,而第一编绪论则综谈文学研究之重要观念、原则,实为今所谓方法论。其中:一重视对“文学”概念的辨析。介绍中外定义之后,申报自己主张,认为文学道人之志,通人之情,用之兴观群怨;“虽天地万物礼乐刑政无不寓于其中,而终以属辞比事为体。声律,美之在外者也;道德,美之在内者也。会内外之美,斯其至乎。”二重视对文学变化大势的把握。尤其能抓住两大角度审视,把客观时势与主观精神相结合考察,颇为全面。三重视对编写体例的研讨。分析了历史上论流别、宗派、法律、纪事、杂评、叙传、总集等七类著述,认为自己编书“奄有以上诸体”。本书自民国7年初版,至民国29年(1940)已发行到18版。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各篇均列本书为参考书,并多次援引。

《法国文学史》 李璜编著,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出版,少年中国学会

丛书之一。该书系法国文学的一部断代史,时间自18世纪至19世纪20年代。全书分3卷35章,分别介绍了18世纪法国哲学文学的代表作家孟德斯鸠、福录特尔、毕风、狄德罗和卢梭等人;19世纪浪漫主义代表雨果,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斯汤达尔、小仲马、左拉、都德、莫泊桑等人;20世纪开场的文学创作和罗曼·罗兰等作家。对于法国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的兴起,现实主义的繁荣及其自然主义的出现都作了相当的概括和评价。该书为中国第一部法国文学史专著,对于全面、系统介绍法国文学,推动中国对法国文学的评介和研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现代文学杂论》 赵景深著,光明书局刊行,1930年初版。该书是作者出版的第九本文论集,内容分上、中、下三卷,共收学术论文23篇,其中有研究外国文学的,如《托马斯·曼》、《哈姆生七十周年纪念》、《捷克大诗人勃累什那逝世》、《格利薄哀杜夫百年纪念》、《浪漫主义与基督教》等;也有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如《鲁迅与柴霍甫》、《冯乃超与穆木天》、《两种曲——杨骚与王文川》,以及叶绍钧、黎锦明、叶鼎洛、孙席珍、徐霞村、徐蔚南、罗皑

岚、白米、钟敬文、钱君匋、程少怀等作家的创作,在相当广阔的角度上,论述了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我国现代文学中小说、诗歌创作和实绩。

《文艺论集》 郭沫若著,上海光华书店 1925 年 6 月初版,创造社丛书。本书至 1933 年共出 7 版,分上下两卷,收入《沫若文集》,篇目有变动,文字亦有改动,共收理论文章 30 篇,如《文学的本质》、《论节奏》、《论诗》、《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生活的艺术化》、《自然与艺术》、《文艺上的节产》、《未来派的诗韵及其批评》、《儿童文学之管见》、《神话世界》、《艺术的评价》、《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之态度》、《论文学之研究与介绍》、《艺术家与革命家》、《泰戈尔来华的我见》、《西厢 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少年维特之烦恼 序引》等,另有《论中德文化书》、《古书今译的问题》、《施惠的性格与思想》、《天才与教育》等篇。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早期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

《文艺论集续集》 郭沫若著,1931 年 9 月上海光华书局初版,《沫若文集》第十卷。本书收 1923~1930 年文学理论文章 11 篇。

《中国音乐史》(上、下册) 王光祈著,上海中华书局 1934 年初版。该书是他旅居德国时期的重要音乐专著之一,是在撰写《中国音乐短史》、《东西

乐制之研究》、《中国乐制发微》、《翻译琴谱之研究》、《西洋音乐史纲要》等论著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内容包括历史乐律、宫调、乐谱、乐器的产生与发展变化,旁及乐队、歌舞音乐、古典歌剧(戏曲)、器乐曲各个环节,其重点是阐述乐律和宫调两个部分。它对两千多年来音律科学发展的过程,作出了系统明晰的叙述,对古代音律科学家在旋宫传调的理论和实践,在分律上所作的探索作了系统的总结。书中较成功、扎实的部分是乐律、调、乐谱、和乐器等章,作者不仅对中国传统乐律理论等民族音乐文化的悠久和发达给予充分肯定,还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乐制源于希腊之说的论调。他认为中国的“‘国乐’ 侔于国际乐界而无愧”,在律学的研究方法上,提出了“‘实物’为重,‘典籍’次之,‘推类’又次之”的精辟见解,一再为中国近年来出土古代音乐文物所证实,虽晚于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上册)、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缪天瑞的《中国音乐史话》,但他比前人提供了不少新东西,有新的发现,新的开创,而更胜一筹,不愧为中国音乐史上学术领域里的一部拓荒之作。该书出版后广为流传,50 年代后又重印,为音乐界重视,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面,表现了多方面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王光祈倡导和重视的律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对后世的发

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悲剧论》、《喜剧论》 章泯著,《戏剧小丛书》,1935年出版。《悲剧论》和《喜剧论》是两本独立的戏剧理论著作。前者主要论悲剧的起源、悲剧的目的、悲剧的统一性、悲剧的题材主题方法、悲剧的布局、悲剧的人物、亚里斯多德的悲剧论、席勒的悲剧论等,后者主要论述希腊的喜剧、罗马的喜剧、中世纪的喜剧、伊里沙白时代的喜剧、莫里哀的悲剧、复辟时代的喜剧、18世纪的喜剧、近代的喜剧、喜剧的特性、喜剧与趣剧等。这两部著作对中国30~40年代的悲喜剧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且本人在创作和导演《放下你的鞭子》、《悭吝人》、《钦差大臣》、《大雷雨》等话剧的实践中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学手册》 艾芜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3月初版。该书后经修改增加三分之二的內容,1942年10月仍由桂林文化供应社重印增订本。1981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全书约12万字。这是一本关于文学写作入门的知识性读物,其中有作者对于文学的看法,创作的經驗、心得、体会,以及关于写作技巧问题的探讨。

《诗词散论》 缪钺著,1948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再版,约6.7万字。此书辑作者关于古典诗词的研究论文11篇,皆多年潜心探究成

果。文非一时,各自成篇,表面似无联系,然其中內容,从《诗经》到王国维诗论,从论诗词异同到中西诗学的比较,从作家作品分析到对各种诗体、形式、风格的考察,都贯穿着作者鲜明的文学主张与严密的逻辑思维,可以看作是中國诗歌艺术发展史的论要。

《谈诗》(一、二、三集) 沙鸥著,第一集,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收诗评17篇,主要是研究田间、邵燕祥、梁上泉、顾工及青年诗人创作问题的文章。《谈诗第二集》,1957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收诗评11篇,主要是研究田间诗集《汽笛》、《马头琴歌集》的思想艺术成就,以及研究诗歌创作有关情绪、感受、构思、取材、意境、结构、创作方法、表现技巧等方面的问题。《谈诗第三集》,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收诗评8篇,内容与一、二两集相同。沙鸥《谈诗》关于诗歌评论和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以下三方面:一是研究老诗人艾青、田间等的作品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二是研究当代涌现出来的新诗人的作品,共同研究生活与创作,鼓舞青年诗人走向成熟之路;三是研讨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技巧,以及诗歌的鉴赏等问题。《谈诗》主要是讨论初学写诗的人及喜欢读诗的人学习写作和欣赏的问题。属诗歌爱好者普及读物。

《唐戏弄》 任半塘(中敏)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出版,1984年再

版,约86万字。书前有1955年2月王悠然序。此书专门研究唐五代戏剧。称唐戏剧为“唐戏弄”,作者认为“弄”有七义,皆含于戏剧所有之伎艺——乐、歌、舞、演、白、弄之中,而弄之最高意义则是编演者以戏论讽匡正,福利人群。全书中心论题就是证明一点:唐戏是真戏剧。如婴儿虽小,然已是真人而非类人猿。作者为此书之动机可说全为针对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及其影响而发。王书研究宋元戏曲,16章中6章说宋戏,9章说元戏,只有一章概说上古至五代,而且王国维认为“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认为只有唱腔、曲辞、宾白三要素完备且剧本固定之,才算真戏剧。由此便认为中国上古至五代无戏剧可言。任中敏以为这种“金元戏剧突如其来”是对唐五代戏剧的极大误会,是对我国戏剧发展之主要状况、戏剧作用之理论依据乃至剧人为广大群众利益而牺牲之伟大精神等均疏略不考而造成的。故在本书中以丰富材料“把唐代的戏剧精神与诗艺说得如火如荼”(王悠然序)谓其形式已趣向完备,戏剧精神特别活跃,是宋元戏之必然的启承渊源。全书分8章以明此问题,书后附载唐五代优语等材料。1984年出的本子,加上“补说”13节。由此书挑起来的争论,至今未结束。但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已产生了很大影响。

《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

普列汉诺夫著,曹葆华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出版,约18万字。这是俄国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美学和文学批评的文学论著。本书包括《没有地址的信》和《艺术与社会生活》两部分。《没有地址的信》包括三封信的内容,即《第一封信:论艺术》、《第二封信:原始民族的艺术》、《第三封信: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艺术与社会生活》是一篇独立论著。

《仰止集》林如稷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出版。这是一本作者学习和研究鲁迅的论文集,收有论文12篇,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小说、杂文、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等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在省内的鲁迅研究中尚属首次。

《文学艺术的春天》何其芳著,作家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约30万字。这是一本论文集,除序外,收集了作者从1956~1962年6年间所发表的18篇论文《论阿Q》、《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关于写作的通信》、《文学艺术的春天》等,代表作者此期对文艺评论、文艺创作的观点和立场。

《新诗漫谈》尹在勤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约20万字。全书分为诗的思维,诗的立意,诗的构思,诗的形式,诗的品种,诗的风格,

诗的手法,诗的修改共八个专题,就什么是诗和如何写诗的问题进行探讨性的论述。作者运用诗歌创作的规律及毛泽东关于“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诗要用形象思维”,以及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有关论述,对新诗的艺术和艺术,特别是针对青年诗人创作中的一些带普通性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深入浅出。通过一些具体作品的比较、分析,给诗歌创作者介绍一些诗歌的基本知识。

《山海经校注》袁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约37万字。《山海经》为我国古代神话渊藪,近世研究颇多,然迄无人以现代神话学观点析释,以显其本旨,发其光辉。袁珂为弥补这一空白,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校勘文字,融通旧注而加以诠释,引类排比,创通其义,于1963年完成《海经新释》,又于1978年完成《山经柬释》。全书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以神话学观点为核心,融合多学科知识进行校释,排比丰富的材料,专力找出每一神话的演进过程,以广阔的比较神话学观点解决前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欧美文学史》(上、下册)石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约63万字。本书内容包括欧美从古希腊罗马到20世纪初欧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其中包括希腊罗马古代文学、中世纪西欧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

学、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18世纪启蒙运动文学、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前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后期的巴黎公社文学(不包括俄罗斯文学)。作者有分析、有批判地评述了西欧、北美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发展情况,各个时期文艺思想和流派的相互关系,重点地、比较详细地分析评述了主要作家与作品思想意义与艺术特色。出版后,国家教委列为1985~1990年高等学校中文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的修订教材。

《颜氏家训集解》王利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约50.7万字,《颜氏家训》中心意旨在“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勉学》),故在封建时代广为流传、影响很大。集解不止是正文字,冰释义理,而且发挥自己见解,阐明此书诸项价值,认为此书对研究南北朝诸正史,可供参考,如《文学》篇言“并州有一士族为可笑之诗赋”,《集解》指出其人是姜质。类此者皆能补正史之阙,指出此书对研究《汉书》及《经典释文》可供参考。

《中国文学简史》屈守元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约21.3万字。全书7篇14章,对于上古到近代的中国文学发展情况作全面而精扼的论述。此书有以下特点:概括全貌精审。如第六章二节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散文时,将建安散文、魏晋理论散文、史传地志、小说、骈体文和俳谐杂

文各自的发展过程、表现特点、代表作品均作论述。复引《国故论衡·论式》语“老庄刑名之学,建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总貌清晰,具体实在,突出重点极细致。如第十章一节讲戏曲起源,线索精细,而材料翔实。十二章二节讲《水浒》成书过程之三阶段,分析细致而多引资料,引证前人材料均一一探求根本,详注出处。其注文即为提示读者进一步钻研的门径。如说《吕氏春秋》,只有十行字,却提供了《史记·吕不韦传》的记载《汉书·艺文志》的品题。高诱《经吕氏春秋序》的评价和汪中《吕氏春秋序》的基本观点。在评述汪文的二十多行文字中,引证了翁方纲《书墨子》、阮元《述学序录》、王念孙《述学序》、杭世骏《袁盐船文序》、卢文弨《吊汪容甫文》、章炳麟《蓟汉微言》等诸家评论。这些精到的摘评,既使本书的论述浑成有序,坚实有据,又给读者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阶梯。

《李白十论》 裴斐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12万字。本书收论文十篇,论及各代对李白评价、李白经济生活、供奉翰林、隐逸、政治抒情诗、饮酒诗、山水诗、游仙诗、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主题等问题。此书为作者数十年研究心得的结果,突出特点有

二: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把所论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在对立统一中解释纷繁问题;如关于隐逸,全从与现实的关系着眼,而不从抽象的精神因素出发,特别对李白功成身退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进行分析,中心集中于对李白思想矛盾的认识上。作者认为李白的思想基础,是由他的社会地位、社会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观决定的。开元、天宝年间的社会繁荣、对李白早期性格、抱负的形成及文化修养产生良好影响。入长安出长安是一生重大转折。站在时代顶峰,看到危机四伏的表面繁荣、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囚鸾宠鸡的黑暗现状,促使他失望愤怒,然又并不因此放弃儒家思想中“济代”思想。他对社会看法是悲观的,但他的人生理想是积极的;他不愿同流合污,也不愿独善其身,对社会深感失望,却又不愿弃世,这种矛盾是李白一生不幸的原因,也是他成为大诗人的原因。

《踏青归来》 张大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该书系作者读现代文学创作的笔记,用读书笔记的形式,对叶圣陶、蒋光慈、李劫人、周文、阳翰笙、何其芳、沙汀、艾芜、聂绀弩等32位现代作家的小说、散文创作的成就和特色进行了分析、评价。书的特点是:用文学的笔法写文艺理论批评文章,读书使人既获得理性的知识,又能给人以艺术的享受。重点突出每一位

作家的业绩,指出其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而不勉强对一位作家作出全面的评价,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苏轼评传》 曾枣庄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9 月出版,约 23 万字。全书 9 章,1~6 章按时间顺序叙述生平、思想、政治活动、文学创作。第 7 章讲世界观,认为主流是儒家思想,深受佛老思想影响是在政治失意仕途不顺时对自己的一种麻痹解脱,且吸收也主要是他认为与儒家思想相通部分。第 8 章讲文学史上地位,突出在各领域的革新精神和创造成就,第 9 章讲评价。全书叙论并陈,眉目清楚,事实准确,自己见解表达得非常鲜明。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对苏轼一生的人品、政治立场、文学成就等作全面评价的著作。

《唐诗通论》 刘开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1 月出版,约 23 万字。全书分五章:总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卷头语说自己一生“寝馈唐诗”,体认到焦循《易余籥录》及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和鲁迅“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评论。因此,这书即参照焦循、王国维的说法与鲁迅有关论述以进行写作和阐发。本书总论讲四个问题:“唐诗一瞥”、“唐诗发达诸因素”、“唐诗的品录和分期”、“唐诗的体裁和声律”。作者引用原始材料,扼要论述,

分别讲了自己的见解。以上四章,开头都有简短的导论,然后评介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对唐人在艺术经验上如何借鉴前人影响后代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本书出版后,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和香港《大公报》曾加以评介。

《唐诗人行年考》 谭优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约 21.8 万字。本书是一本年谱式的丛稿。作者认为:“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要有历史的全面的了解,从那儿发出来的议论,才比较符合实际。但实际情况是除了少量大家外,许多有影响的名家“谈到生平,多模糊不清,甚至存在着错误”。所以着手这一工作。书中共包括王翰、孟浩然、李颀、崔颢、王昌龄、高适、储光羲、李益、张祜、赵嘏十个诗人的行年考。

《李白年谱》 安旗、薛天纬著,齐鲁书社 1982 年出版。本书吸取了旧谱的长处,又总结了 1976 年以后学术界对李白研究的新成果。最突出的是肯定了李白两入长安的事实,因而解决了诗歌编年中关键问题。如有名的《行路难》(大道如青天)“古风”(大车扬飞尘)、《长相思》等十多首诗批判现实以比兴手法慨叹仕进无门,将其系在初入长安时,不仅使原来抵牾处得到妥善解释,也清楚地反映了初入长安的行踪和思想情绪。在编写方法上,本书与旧谱最大的不同是不仅以考证的目光分析诗中的时间、地点、人事交往和

历史故实等内容,而且以评价的目光着力分析作品本身内含的诗人情绪和感情,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确定诗歌的写作年代,分析具体作品,体察关键字句,又以一组组相关作品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抽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掌握李白在某一时期创作的总特征和诗人基本情绪,由之大面积地解决李白作品的系年问题。

《西厢论稿》段启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约13万字。本书主要内容是对《西厢记》的具体问题的讨论。全书分7章;元稹的《莺莺传》。讲该文的题材和思想。诸宫调和董解元《弦索西厢记》。介绍诸宫调特点和董西厢对小说的改造。《西厢记》的面貌。主要讲版本和剧本形式特点。《西厢记》时代和思想。《西厢记》的戏剧冲突。《西厢记》的艺术手法。讲结构、高潮、悬念、语言特点等。

“三幻”的同名人物性格辨。讲剧中重要人物性格分析。书后附录了元明清人论《西厢记》的资料。作者在《后记》中讲了自己写作的想法:“应力求以具体分析为基础。这一方面是指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了解”。全书在具体论述中,以自己研究心得为主体,有选择地融汇前人研究成果,按问题叙述论列,以体现了自己的主张。

《现代诗人及流派锁谈》钱光培、向运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月

出版,约12.8万字。这是一本有关中国新诗历史的专著。从《新青年》到《晨报副刊·诗刊》,记载了“五四”前后大约十年间新诗创业期的风云。本书除序和前言、后语外,共分《新青年》之群、《新潮》之群、《少年中国》之群、《星期评论》之群、《文学研究会》之群、《创造社》之群、《湖畔诗社》之群、《晨报副刊·诗刊》之群等八个部分。

《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吕进著,重庆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约26万字。全书分三篇九章。《本质篇》论诗的本质、诗的内容、诗的形式及社会主义的新诗;《创作篇》论诗的灵感、诗的构思、诗的修辞和诗的分类;《鉴赏篇》论诗歌鉴赏的过程、鉴赏创造性及其鉴赏的共鸣现象。书末有一个附录《新诗话》,主要是作者论诗的文章中的一些言论的摘录。该书是四川新诗理论研究方面继《新诗漫谈》之后又一部新诗研究论著,着重于从新诗自身的规律方面去研究,认为中国新诗应向传统的格律诗借鉴,以“推陈出新”,并学习西方现代格律诗的某些特点,以便建立与自由诗并存的现代格律诗。并认为社会主义的新诗在内容上重在抒发人民之情,形式上注重民族化和大众化。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杨明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约59万字。本书是作者《文心雕龙校注》基础上长期不断订补而成的巨著。

《文心雕龙校注》原为作者在燕京研究院毕业时的硕士学位论文,1958年专书问世。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博览精搜,成此新作。全书由“校注”和“附录”两大部分组成。校注部分,纠正了不少前人疏失,解决了某些千古疑难。如《总术篇》;“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二句,何焯、郝懿行、范文澜等都说“未详”,其他许多名家也不置一字。作者据上下文,判定与鼓琴有关。据《说苑·善说》:“雍门子周以琴见孟尝君……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初终而成曲”。指出刘勰遣词即出于此。今本“动用挥扇”应为“动角挥羽”。历来因字写成讹而难解的句子,遂得冰释。纠正此类阙失处,本书中比比皆是。书中《前言》及《梁书刘勰传笺注》,对《文心雕龙》全貌及刘勰生平事迹作较详论述和考证。《附言》部分,收集了有关《文心雕龙》的大量材料,网罗广泛,内容充实,均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香港《大公报》专文介绍,评为“积四十年余功夫而成的硕果,解决了某些千古疑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台湾学者王更生认为:“是杨氏呕心沥血之作。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断代”。

《建安文学编年史》刘知渐著,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首次以编年史形式来写文学史,不同于综合性年谱和文学系年之类著作,而是从史料的选择排比中反映出文学发展的线

索和规律。通过编年叙述,考出了《三国志》裴松之注及《文选》李善注的某些错误。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证明建安文学的发展关键在遗产积累已达到一定的高度,社会环境需要现实主义文学,因而,一群作家自觉地反映现实。至于曹操个人,不过是建安作家之一,七子在依附曹操之前早已成名,曹操对于建安文学的发展没有多大功劳。书中对郭沫若把建安文学高峰的出现过多地归功于曹操个人的功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杜诗杂说》曹慕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24万字。据作者“自序”,初稿写于60年代。全书分四部分:杜甫的思想、生活。论杜甫的诗艺和诗作。杜注琐谈。附录。此书既不同一般传论,又不同于论文集,而是按问题分别叙说的,因而详略自由,发挥任意。如从杜甫与农民关系切入其世界观,谓杜甫世界观有正统和民主性两面;前者战胜后者的时候,就是一个庸人杜甫在说话;当后者战胜前者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又如讲杜甫思想,以详细材料论证他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继承。讲杜甫诗艺,重点分析《戏为六绝句》《偶题》之后,以“论诗摘句形式将杜甫谈及诗艺的诗句归纳为六类:自述类、兴会类、律法类、诗史类、风格类、题材类。又从而提出论诗有五点值得注意:作诗崇尚儒术。

知流变,对文学形式采取实事求是态度。贵创造,反墨守。重兴会。尚清新,即重立意,琐谈部分,或解篇章,或解词语,于理解杜诗,可供参考。

《陈与义年谱》白敦仁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约14万字。本书对陈简斋的家世、生平、交游及其文学上成就作全面考证,重点在时、地、人、事的证实,以翔实的资料纠正了旧谱及历代公私记载中的一些错误。在前言中,对陈与义的诗歌成就作了分析,中肯地指出:“应该说,在宋代学杜的诗人中,陈与义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因为他自能做到骨肉停匀。”故钱钟书先生评此书云:“援据之博,考核之精,罗万卷书,断千载事,而今而后,简斋身世遂如按图指掌矣”。

《简明外国文学史》林亚光主编,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约47万字。全书分5编、19章。“古代文学”编的一章着重介绍东西方文明古国文学;“中古文学”一章介绍欧洲、阿拉伯、日本和波斯文学;“近代文学”分上、中、下三编,依次评介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及其主要作家作品;“现代和当代文学”编,分别介绍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苏联和各国无产阶级文学、及西方现代派文学。

《巴金的生平和创作》谭兴国著,1983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1章,是国内较早出版的全面研

究巴金生平、思想和著作的专著。该书以巴金生活历程和思想发展为经,以作品为纬,联系特定的历史背景,勾勒出巴金思想和创作的发展轮廓,并对作品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和审美价值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李白和他的诗歌》胥树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本书接近评传,但以诗歌的艺术分析为主,其中着重谈到情感和世界观的关系以及它的生活基础,反对在作品中直接说教的倾向,同时也不同意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概括中国诗歌与文学史。对于李白作品进行多角度考释,如利用民俗方法考证《蜀道难》和《独漉篇》等诗的题材来源、体裁演变和李白在这些诗里的独创性。对于李白身世,则主“本家金陵”说,反对郭沫若李白生于碎叶说。考证李白“三入长安”,并以《玉真仙人馆苦雨》为第三次入长安时作。主张李白创作分期最后一期应自753年南下宣城始。本书着重分析李白受当时文风影响,考证时抓住了“内精神的探索”。

《养晴室笔记》庞石帚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约7.3万字。作者1963~1964年始写此书,完成3卷后,因病逝世。后经屈守元标点,正式出版。主要特点是:以平生治学的心得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提出这些极具启发性的问题,不同于一些朴学家烦琐考据。故虽是资料考订

之作,而笔端自有诉者感情的文学写作风格。为青年指出治学门径。全书语言简扼、精要,引而不发之处甚多。本书是四川学术界踏实功底与严谨治学态度结合的一个典型。

《淮海词笺注》 杨世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约 14 万字。本书为宋代有名婉约派词人秦观词作的笺注本。前言部分介绍了生平及思想、分析了秦词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注文部分解义较详,并对部分作品作了系年考证。书中附秦观词存疑词 90 首及历代重要评论资料。

《电影剧作基础》 朱玛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 3 月出版,约 25 万字,它的前身是 1979 年 6 月由《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的《电影艺术与电影文学基础》全书分 14 章,着重论述了电影艺术的特性与电影文学创作的规律、特点,电影剧作与小说、戏剧文学的异同,电影剧作题材和主题、情节和结构以及其它技巧问题。该书是省内最早的同类著作。

《论古希腊戏剧》 罗念生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5 年 4 月出版,约 15 万字。这是作者几十年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结晶。书中除对古希腊的悲剧、喜剧的发生、发展概况作了总的评述外,还对亚理斯多德的诗学、悲剧理论、“三一律”学说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元曲纪事》 王文才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 1985 年 1 月出版,约 23.5 万字。原稿成于 1963 年。作者自序谓:“曲话杂著,评文纪事,辨调审音之说,犹散见诸书,未经综理,不便稽考。读曲之余,窃仿诗词纪事之著,草创兹编,聊补其阙,庶几可省检索之烦”。本书以品文述事为主,以人系曲,以曲隶事,事存曲亡者不录。除“总评”之外,列元曲作家 85 人并无名氏作品 14 题。每一作品之下,纪有关该曲之事。引文只列始见之书,凡转引重见者,仅注篇卷。本书断代,起讫于元。作者不同意“元以后之北曲,不复可见;元时之南词俗曲,并已无存”的法,故于书后附录“古曲”、“南词旧曲”,目的在说明北曲、南词的渊源流变,并以证其“宋金俗曲,实元明北词所肇始”的观点和“传奇未兴之先有南曲”的观点。诗文词类纪事著作,自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创作,厉鹗《宋诗纪事》踵之以来,已有十多种。元曲为一代文章,而却无《元曲纪事》之作,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二、论 文

《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作品》 李劫人著,载《少年中国》第 3 卷第 10 期。文章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产生、发展和衰退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价,认为法国自然主义是以福楼拜为开山祖师的,其后发展为三大派:一是以左拉、莫泊桑为代表的写实派;

一是以舍尔比例、浮茫丹为代表的理想派；一是以都德、龚古尔兄弟为代表的印象派。并对各派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评价。对左拉“真实的观察”、“赤裸裸的描写”极表赞成，又不同意左拉把社会看成“善恶分明”、“无可救药”、“冷酷粗疏”的观点，不同意左拉片面地强调细节描写，要求作家在作品严守中立和客观，不对事件作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论。他指出左拉学派“只重视实质的经验，忽视心灵的力量。只管揭破黑暗，却不指出走向光明的道路；犹之医生诊病，所说的病象诚是，却不到方案”。另外，文章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在评价《妇人书简》等作品爱情生活的描写时，认为不要给读者以龌龊的刺激。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李初梨著，载《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全文分导言、什么是文学、文学革命底历史的追迹、革命文学底建设的展开等四个部分。首先文章批判了“趣味文学”的观点，认为“文学是生活意志的表现”，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其次论证了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最后文章着重论证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认为现阶段的革命文学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无

产阶级的文学首先要求作家有“无产阶级的意识”，他是“为革命而文学”，而不是“为文学而革命”，他的作品应当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上，他认为有讽刺的无产文学、暴露的无产文学、鼓励的无产文学和教导的无产文学。

《浪漫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马宗融撰，载《文学》第6卷第3号（1936年3月1日）。该文主要考察了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浪漫主义的发生、发展直至最后推翻古典主义而代其地位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兴起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学的诸原因。还介绍了法、英、德三个国家众多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追溯了这些文艺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文章认为浪漫主义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的和例外的现象”，而是时代的产物，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该文帮助当时中国文艺界对浪漫主义兴起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了解，对我国30年代文学理论建设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关于抗战小说》金满成著，载《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38年第2卷第2期，文章着重论述了小说与抗战的关系。认为小说要移入抗战意识，成为宣传抗战的强力工具；小说特别需要时代性和现实性。

《‘战国’派文艺的改装》洪钟著，载《群众》第9卷第23、24期（1944年12

月25日)。文章主要是针对陈铨《文学批评新动向》一书的观点提出的批评意见,认为陈铨力图建立的文艺批评主体系“是主观观念论的文学观,是心灵幻影的文学观,是反现实主义的文学观”。说陈铨旨在歌颂和“阐扬叔本华的主意论”,因此为陈铨的主张是“反理性,主直观,反理智,主感情”的,是在“攻击理智,抨击理性,鄙弃科学”这种观点来源于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因此认为陈铨想建立的文学理论,是立基在法西斯的哲学之上的,是陈铨“卖弄的新花样”,是“战国”派的“旧阴谋”。

《评 芳草天涯》何其芳著,《中原、希望、文哨联刊》第1期(1946年1月)。《芳草天涯》是夏衍写的一出描写知识分子恋爱纠纷的话剧。这个剧本引起重庆文艺界的争论。何其芳认为剧作家在选材上没有“与当前的政治斗争相结合”,而选择了一个“意义不大”的知识分子恋爱纠纷为主题,失去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恋爱问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劳苦大众等比较起来“究竟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问题”,而作家却“把一小问题夸张为很大的问题”,并作了不恰当“宣扬”、“歌颂”和“赞同”。认为“芳”剧比起作家其他作品,如《包身工》《上海屋檐下》《心防》等剧来是一个后退。

《电影的锣鼓》钟惦斐著 载《文艺

报》第23期,1956年12月15日,署名“本刊评论员”。文章是针对上海《文汇报》1956年10月24日发表关于电影问题讨论中认为“好的国产片少”,和中央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加强政治思想指导而发表的言论。文章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含义不准确,词义上不科学,有“弊病”,是“宗派主义”的。这种提法会造成文化生活的“单一化”,艺术上的“观念化”,会把题材限制在窄小的范围内。他提出看一部电影好不好,艺术高和低,要由观众来评判;“票房价格”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他还对电影管理工作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认为“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越大,……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片”。该文曾轰动一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多方面的争论。因此在1957年《中国电影》《文汇报》《文艺报》开展对《电影的锣鼓》的批判,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代表而受到多方面的批判和否定。1980年初重新肯定了它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李劫人传略》伍加伦、王锦厚著,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一期,约4万字。文章对李劫人的生平、创作活动、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作了全面概括的评述。肯定了1912~1919年间李劫人的小说创作是四川新文

学的开始；“五四”时期的李劫人和他主办的《星期日》在四川传播了新思潮，开展了新文学运动；李劫人的小说受到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李

劫人短篇小说集《好人家》集中批判了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李劫人的历史三部曲，填补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空白。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孙桐生(1824~1908) 字筱峰(一作小峰)，号饮真外史、痴道人、怀梦居士、卧云主人、蓉溪外史。四川绵州(今绵阳市涪城区)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后曾任湖南酃县、安福、桃源知县，永州知府、郴州知府，晚年主讲绵州治经书院。诗文创作有很高造诣，其文艺学研究成就则体现在小说戏曲研究上。他曾批点《甲戌本石头记》，从结构、章法、照应、情趣角度提出自己的赏解。又曾用十年时间，将太平闲人《妙复轩评石头记》据程甲本分疏，逐句排比，整理。1881年刻于湖南，即今传《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在叙中他提出：“描绘人情，雕刻物态，真能抉肺腑而肖化工，以为文章之奇莫奇于此矣。……文章者，性情之花也。性情不深者，文章必不能雄奇恣肆，犹根底不固者，枝叶必不畅茂条达也”。他是中国有影响的早期红学家之一。他又曾辑刻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并在序言中阐发“言情之功”胜过“高谈心性”的观点，表现了对小说戏曲的重视与突破传统观念的进步认

识。孙氏又注重对清代诗歌的研究，他编刻的《国朝全蜀诗钞》，费数十年时间勤搜精选，收作者362人，诗5900余首。为每一作者写一小传，评介其人其诗。该书是清代四川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杨锐(1857~1898) 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学于尊经书院，是张之洞最赏识的“尊经五少年”（余四人为井研廖平、广汉张祥龄、仁寿毛瀚丰、宜宾彭毓嵩）之首。学问广博，涉猎文学、史学、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尤长于经学、诗文、书法。曾为《晋书》作注。论诗主张博采众长，独辟蹊径。着眼现实而直抒胸臆，反对无病呻吟。在所著《诗赋》中，提出做诗要求：“纳百氏之涓涔，辟众家之门户”，而应做到“言情也必挚，体物也贵妍，吐音也尚婉，遣词也惟鲜。语不可以渣滓，词不可以冗钉牵”。是“诗界革命”的早期呼喊者。

赵熙(1867~1948) 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道光十八年(1892)进士。初为翰林院编修，后历官御史、

翰林院国史馆修纂江西道监察御史等。曾以弹劾盛宣怀、赵尔巽，正声远震。先后主讲荣县凤鸣书院、重庆东川书院、泸州川南经纬学堂。赵氏诗为有清三百年蜀中诗人之冠，亦清末民初全国有名的诗人、学者。时晚清名宿陈宝琛、陈衍、朱祖谋、陈三立、林琴南等，都与之有交游。梁启超、周孝怀、朱德都从之受学。其诗、文、词创作极负盛名，偶写之《情探》，亦为川剧经典性剧本。平生于诗词理论，钻研甚精。所著《香宋杂稿》为论文渊薮。其总论诗歌谓：“文章以器识为主，深情远韵岂能遂立一席。”“诗有何法？胸襟大一分，诗进一分耳。”“凡作诗须具幽秀之心，幽则深曲不浅，秀则无尘俗气。”凡此皆实践深考之言。又手批《唐诗选》及杜甫、苏东坡等数十大家集，精鉴细解，使评点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接受批评形式大放异彩，学人传抄转录，受益至今。其词作被谢无量评为：“独掩前传，以其似白石之隽朗而加整丽。有稼轩之豪纵而无其粗野。”（谢无量《题林氏旧藏稿》）。赵氏本人论词则谓宜“不莽不纤，语有内心”（《与林山腴书》）。其古文能融王临川、硬硬盘折，韩昌黎之博大雄奇。故其手批《古文辞类纂》议论精严，对散文研究启迪很多。其为一代书法名家，绘画造诣亦高，论艺常能贯通。民国时期四川高校古典文学教授林思进为其老友，向楚是其门下高足，庞石帚为其激赏之后辈。其

他直接或间接从学受教影响很大者甚众。

傅增湘（1871～1949）字沅叔，号双鉴楼主人、藏园老人，别署有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直隶提学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20年代退隐，潜心于目录、版本、校勘学的研究。家藏古书约20万卷，手自校勘者16300卷。所著《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题记》、《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都是古代文学实证研究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著作。后来全国知名的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赵万里、谢国桢等等，都曾得到他的帮助与提携。平生最关心巴蜀文献的整理研究，亲自花9年时间编辑《宋代蜀文辑要》100卷，于1944年出版。又编辑古代蜀人著作宋本《方言》、宋本《王荆文公诗注》等12种为《蜀贤遗书》，名工雕版。1957年由家属将全部书版捐献国家。

林思进（1873～1953）字山腴，晚年自号清寂翁。四川华阳（今属成都双流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乡试中举人。后赴日本考察。回国后考取内阁中书。辛亥后，孜孜注意于文化教育事业，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华阳中学校长；先后为四川国学院、四川高等师范学堂、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教授。早年旅京，与陈宝琛、赵尧生、陈衍、林琴南、冒鹤亭诸名

流交游唱和。晚岁与龚向农、向楚、李培甫、庞石帚共同任教于四川各高校。其诗文词创作均有很高造诣,而精力所萃尤在诗歌。论创作以修辞立诚为准则,以经世致用为鹄的,而取径宏通,不执门户之见,有论学诗谓:“自吾操觚来,雅不门户喜,是是与非非,丹素各有美”。(《长夏排闷,率尔言怀》)所著《清寂堂日记》50册,述学论文,颇多精到之语。其《中国文学概要》为在川大授课时所编教材,对蜀中古典文学研究影响巨大。所手批《唐诗选》等书,至今嘉惠学人。今人刘君惠、王文才等编其诗、文、词集为《清寂堂集》。

龚道耕(1876~1941)字向农,一字君迪,号蛛隐,又号辟翁。四川成都人。光绪二十八(1902)举人,授内阁中书。青年即不乐仕进,投身教育,潜心著述,年未三十,成书数十种。历任省立第一师范、眉山市中、成都县立中学校长及成都高师、成都师范大学代理校长。1928年以后,主要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特长于经学,曾著《尚书释文考证》《丧服经传五家注》《礼记旧疏考证》《三礼述要》《经学通论》等多种有关经义研究之作。为学不囿门户之见。尝以“破汉宋门户之见,合义理考据为一家”为治学宗旨(《礼记义疏》发凡)。故其论文不喜桐城义法,而主张衔花佩实,眼光至为通达。平生著书近

70种,其《中国文学史略论》,从文化史广角度论文,详其流变因革,实含今日宏观研究内容,在川中学术界颇有影响。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见《中国哲学》)。9岁读完五经并能诗文。后肄业南洋公学特班,与马一浮、邵力子、黄炎培同学。后与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结识,参加《苏报》《国民日报》编辑工作。清末回川,担任四川存古学堂监督兼教词章。民国建立,愤于袁世凯窃国,隐居上海,闭门著述。北伐时,曾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参议。40年代,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50年代后,曾任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是中国最早用“文学史”体例撰写古典文学研究论著的专家之一。所著《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大文学史》长期用作各高校教材,影响广泛。其《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马致远与罗贯中》)《楚辞新论》《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三书,深得孙中山先生赞赏。专题研究著作《诗经研究》《骈文指南》《实用文章方法》《中国六大文豪》及50年代后所写《佛教历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诗经研究与注释》等,对当代专题研究具有重要学术启迪价值。除了对文学的综合研究、专题研究外,谢氏继承中国古代文艺学重视哲学思想的特点,重视观点指导与方法论讲求,重视综合认识。

他写有《中国哲学史》《王充哲学》《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孔子》《韩非》《佛学大纲》诸书。30~40年代,即倾向唯物史观,其学术思想亦能跟随时代进步。

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生平见《历史学》)。原名郭开贞,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和文艺理论家。1921年以《女神》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时代,发起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三叶集》中的诗歌主张,构成了早期文艺思想的基础。《文艺论集》收集了1920~1925年间文艺论文,集中反映了其早期文艺思想和学术观点。1931年出版《文艺论集续集》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文艺的主张,表现了倡导无产阶级文艺的决心,标志着作者思想和创造社的转向。流亡日本时撰写了《创造十年》(1932年)和《创造十年续编》(上海北新书局,1938年)为中国现代文艺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时发表了《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蒐苗的检阅》等文章,(《收文艺论集·沫若文集》十一卷集外)和《屈原研究》(1935)。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发表了《“民族形式”商兑》(1940年)、《今天创作的道路》《关于“接受文学遗产”》(1942

年)、《献给视实的蟠桃》《历史·史剧·现实》(1942年)等重要论文。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和香港继续坚持了文艺和政治的批判,撰写的《浮士德简论》《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斥反动文艺》等(收《文艺论集·沫若文集》十三卷集外)。50年代后,历任中国文联主席,并撰写了大量的文艺论著,收集在《雄鸡集·沫若文集》17卷、《文史论集》(1961)、《奴隶制时代》(1952)等论文集中。这时期还撰写有《读随园诗话札记》1962,其中有不少惊人之论,丰富和发展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理论。1971年写了最后一部长篇文学评论《李白与杜甫》。郭沫若一生对中国文坛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评价等方面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刘咸炘(1896~1932) (另见《图书、情报学》)。

庞石帚(1895~1964) 名俊,四川成都人。由私塾、小学入商业学堂,17岁即辍学为塾师,此后坚毅力学,自奋成才。1919年以诗投赵尧生,大见推赏,并立即向林山腴、向楚介绍,遂聘教华阳中学。1920年任教成属联立中学(今石室中学),1924年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历任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华西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成华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其诗、词、文创作造诣很高,多年教授中国文学史、文选、

诗选、词选、中国文学批评史诸课程。写成《国故论衡疏证》(中、下),对章太炎原作涉及的经、子、史、集以及佛学、西欧之书,一一为之寻根究底,辨别是非,从理论到辞章,沿波讨源,理解冰释,为传统文论中最后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50年代后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所作《养晴室笔记》,涉及文学史问题至为广博而论考精严,解决了一些从来无人解决的问题。

林如稷(1902~1976) 别名林师海,笔名白星,右古江,四川资中人。1919年开始了文学创作。1922年同陈炜谟、陈翔鹤、邓均吾等人发起成立了“浅草社”。1923年留学法国,又与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发起成立了另一文学团体“沈钟社”,从事西方文学评介,与鲁迅联系密切。1930年回国后执教于中法大学。抗战爆发后,回川任四川大学教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积极支持抗战文艺活动,开设文艺讲座。50年代后,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授现代文学史、现代散文、现代文学名著选、鲁迅研究、世界文学史等课程,有专著《仰止集》,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小说、杂文、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论述。有《林如稷选集》留世。

赵景深(1902~1985) 四川宜宾人。1922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23

年秋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专事文学研究。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任中国文艺家协会秘书,并主编《现代文学》等刊物。50年代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和写作。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文学理论、新文学方面有:《作品与作家》(1929)、《现代文学杂论》、《现代世界文学》(1932)、《文学讲话》(1932)、《文学概论》(1932)、《文艺论集》(1933)、《文学常识》(1936);文学史研究方面有:《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中国文学史纲要》(1936)、《民族文学小史》(1940)等;小说研究方面有:《小说研究》(1932)、《小说闲语》(1937)、《中国小说论集》(1950)、《小说论丛》(1947)等;戏曲研究方面有:《元明南戏考略》(1958)、《曲论初探》(1980)等;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有:《民间故事研究》(1928)、《大鼓研究》(1937)、《民间文艺概论》(1950)等;童话研究方面有《童话概要》(1927)、《童话论集》(1927)等。

沈起予(1903~1970) 四川巴县人。青年时代赴日本留学,在京都帝国大学专攻文学。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创造社,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30年参加“左联”,曾主编《光明》半月刊。翻译有《欧洲文学发展史》。抗战爆发后到重庆,先后主编《新蜀报》、《新民晚报》副刊,并从事对日俘进行反战宣传,写了报告文学《人性的恢复》。抗战胜利后,曾在渝主持重庆文协日常工

作。50年代后加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总会。曾任上海群益出版社主任编辑。论著有《怎样阅读文艺作品》(1936),文艺译著还有[法]伊科微支的《艺术科学论》(1931)、[苏]高尔基的《给青年作家》(1937)、[苏]伊佐托夫的《文学修养的基础》(1937)、[法]泰勒的《艺术哲学》(1949)等。

章泯(1906~1975) 原名谢兴,谢韵心四川峨眉人,1929年参加上海“左翼”戏剧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回川,先后在成都、江安、重庆等地省立剧专、国立剧专等校任教,编辑《新演剧》等杂志,并从事导演和研究工作。50年代后,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创作有《醉生梦死》等25个话剧和电影剧本,导演过《放下你的鞭子》、《钦差大臣》、《北京人》等28部中外名剧,还进行了大量的戏剧、电影、导演等理论研究工作。有《表演的基本技术》、《戏剧艺术的现在与将来》、《论演员》、《导演人的职责》、《论战时工农演剧》、《新悲剧论》、《论战时演剧宣传》、《演员,创造的艺术家》等数十种论著。同时还大量翻译了近代西方和苏联的戏剧理论,如《希勒论悲剧》、《苏联电影的实验》、《戏剧导演的基本知识》等,还翻译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责任》、《演员的创作基础》,对中国戏剧

理论和导演体系产生过重要影响。

曹葆华(1906~1978) 四川乐山人。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9年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翻译的文艺论著有《马恩列论艺术》、《马恩列斯论文艺》、《苏联文学艺术问题》、高尔基的《苏联的文学》(1950)。50年代后翻译的文艺论著有《列宁与文艺问题》(195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人合译,1953)、《苏联文学艺术问题》(1953)、《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54)、伊凡诺夫的《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与人合译,1957)、高尔基的《文学论文选》(与孟昌合译,1958)、《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1959)。1962年到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作研究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1964)《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1962)、高尔基的《文学书简》(1962)、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集《哲学选集第五卷》。

何其芳(1921~1978) 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50年代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方面撰写了不少的学术论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积

极从事文学理论建设对中国文学理论和研究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建树。先后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评 芳草天涯 》《论民歌》《关于现代格律诗》《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论 红楼梦 》《论阿 Q》《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正确对待遗产 ,创

造新时代的文学》等重要著作和文章 , 论文主要收集在《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与读诗》《论 红楼梦 》《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等论文集中。

第九章 历史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古代巴蜀史学

巴蜀地区自原始社会(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以来,人们就在这里生活和劳动着,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近年来考古出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与成都十二桥遗址等,可知与中原商代社会的中后期,为同一时期。已出土的巴蜀铜器上的图语和印章,多是些象形文字,和殷墟甲骨文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因此,巴蜀文字多是早期甲骨文分化发展的结果。甲骨文中累见蜀和巴的记载,乃其国名、族名和地名。商人有典有册,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巴蜀,也应该是有自己的典册存在。比较集中反映巴蜀历史文化的《山海经》中虽有可怪之论,正反映了早期的巴蜀历史和传说的真实与史影。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其中华阳黑水惟梁洲,以及巴蜀水道,应是巴蜀历史的片段存留。公元前315年,秦

灭巴蜀以前,巴蜀与秦楚等已有交往。商鞅之师尸子逃于蜀并著书立说,蜀人传其书,正说明秦蜀文化是亲属文化,因而受到蜀人什袭重珍,并传其书。公元前315年后,巴蜀与中原秦楚等文化普遍交融接轍,渐趋一轨。为开发巴蜀,秦人迁富豪和谪发罪人实川,带来外面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巴蜀文化与海岱、河洛文化相接,更有力促进巴蜀开发和文化发展。西汉初,四川有司马相如这样的奇才杰士,在文翁化蜀之前已名扬中原,应是巴蜀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而产生的俊异。

巴蜀历代皆有杰士,西汉后期有扬雄,东汉有杜抚等经学大家,严君平这样的《易》学家,更有精通《史记》的杨终,他与当世著名学者班固、贾逵等合作,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多字的《史记》,删剩十余万言,假使没有对《史记》和汉以前的历史文献的充分理

解,是不可撷其精华而删繁取要的。然司马相如有《蜀本纪》,严君平有《蜀本纪》,扬雄有《蜀王本纪》,阳成子玄有《蜀本纪》,李尤有《蜀纪》,足见蜀中纪事修史蔚成风气。古人治史在于鉴兴亡得失或讽谕,因而史论不少,无论司马相如、扬雄等,这方面文章传世,如杨雄的《蜀都赋》、《百官箴》,实际是文学形式而史学内容。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和时代的原因,普遍重视国史和地方史志的编纂,至今尚存有影响的著作传世。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陈寿曾任蜀汉黄门侍郎,265年后,历任晋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晋灭吴后,历时十年,撰《三国志》65卷。其中《蜀书》记载季汉史事甚详核。《三国志》今为“二十四”史之一。另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失传。

常璩,东晋蜀郡江原(今成都市崇州市南)人,字道将(锵)。十六国成汉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温伐蜀,他劝李势投降,并随之到建康,撰《华阳国志》12卷,记述晋代梁、益、宁三州地区(今四川及陕西汉中、云南部分地区)的历史。上起远古,下止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其《序志》一篇,说明其述作之旨云:“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接着说明每篇著录之由,这种体式,一直影响到古近现代之方志。

两宋是四川史学的发展时期,而今传世的宋代四川史著,有十几种,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史书有华阳范祖禹的《唐鉴》12卷。1070年司马光奏调范祖禹参修《资治通鉴》,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祖禹明于治乱,取事可法戒者,系以论断,自唐高祖至昭宣帝为论凡306篇,书成于元祐元年(1086)。该书后有吕祖谦注,析为24卷。《资治通鉴》成书后,眉州眉山史炤撰《资治通鉴释文》30卷。采摭既广,10年始成,书为首创。宋元之际胡三省依之作《资治通鉴音注》294卷。虽有后出转精之誉,但权舆则是史炤。

宋眉州丹棱李焘究心历史掌故,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例,采北宋几朝事迹,以40年的时间,成《续资治通鉴长编》,上起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钦宗靖康二年(1127),凡168年的历史,编定980卷。另《举要》68卷,《修换事目》10卷,《目录》5卷,共计1063卷。今存《永乐大典》本520卷。

李心传,南宋隆州井研人,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以编年纪宋高宗一朝32年的事迹。与李焘《续资治通鉴》相续。此书,元代已少流传,今本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心传又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甲集、乙集各20卷,记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之事迹。此书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为表里,是研究南宋历史的必备资料。

叙述北宋历史的有宋眉州眉山王偁的《东都事略》130卷,上起太祖,下迄钦宗,凡12本纪、5世家、105卷列传、8卷附录,载辽、金、西夏等国,取材于国史、实录,旁及野史杂记,是研究北宋史的参考资料。

宋末元初,四川遭受战乱之苦,文献荡然。若以元人而论,有费著的《岁华纪丽谱》《笺线谱》和《蜀锦谱》等,亦可考见川中的某些史实。

明四川按察使曹学佺著《蜀中广记》108卷,其中名胜一目今题《蜀中名胜记》30卷,有单刻本《四库提要》称其“蒐采宏富,不愧广记之名”,是一本关蜀中历史、方志和掌故之书。另外成都新都人杨慎编辑之《全蜀艺文志》64卷,收集远古至明代蜀中历代之诗、赋、书、序、表、碑、谱、牋、行记等近千种,对于研究四川历史文化,有极大参考价值。

清朝前期,承明之制,士子习于制艺,求之史学方面,四川很难找出一二俊士。

二、近代四川的史学

清同治十三年(1874),兴文县在籍侍郎薛焕等倡议,以通经学古课蜀士。经四川学政张之洞商请总督吴棠,奏准设尊经书院于省城。光绪元年(1875)建成,开始招生,学风为之一变。为课蜀士,张之洞特地写了《书目答问》和《语学》,在《语学》第二中,

《读经》之后之《读史》中,提出:宜读正史(即二十四史);“凡引据古人事实,先以正史为凭,再及列史、杂史。仅看坊本,削肖《纲鉴》,不得言史学”。其次,指出“正史中宜先读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第三言:“宜读《通鉴》”。第四:宜读《通考》。第五:史学亦宜专精一种。第六:读史宜读表志。第七:“读史忌妄议论古人贤否,古事得失”。第八:“读史忌批评文章”。一共讲了八个关于读史方面的问题。每一项下,各有解释,并间附小注。在张之洞的提倡影响下,四川文教之风大盛,随着尊经书院建立。学子文士云集成都,由此而出现了一些史家,出现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学家,如吴玉章、郭沫若、张森楷等就是杰出代表人物。尊经书院于1902年结束后,改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1910年又开设存古学堂,后来改为国学专门学校,培养了一些史学人才。

尊经出身的吴之英写有《中国通史》,50年代初期散佚。张森楷长于史学,并从事修志,著有《史记新校注》130卷,《通史人表》290卷,《廿四史校勘记》337卷。杨锐也有关于《隋书》的注释等。

三、现代四川史学

“五四”以后,在中国史学史上,出现了新、旧史学的对立。

四川的史家如叶秉诚、祝杞怀等，在成都高师、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历史，张森楷、宋育仁等或著书，或编史修志，大多还是循旧史学的路径方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避居日本，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研究中国历史，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中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郭沫若还在研究殷墟甲骨文的同时，研究了殷周青铜器铭文。这些研究先后结集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影响下，李亚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邓初民等，都在从事于中国古代或中国近代历史及其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从而使传统的史学、史料学、史考、史辑、史辨等黯然失色。

抗战时期，一大批学校内迁四川，一些史学工作者，在恶劣而艰难的战时环境中从事历史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丁山的《新殷本纪》，徐中舒的《井田制度探原》，顾颉刚的《巴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二、三集），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古地甄微》、《儒学五论》、《天问本事》，李源澄的《秦汉史》、《李源澄学术论文集》，刘咸炘的一些

论著等，都是在学术上有贡献的。

四、当代四川史学

1950～1985年四川历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个历史时期。

（一）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转变的过渡时期（1950～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四川史学工作者，逐步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教学科研上，取得初步成果。四川史学工作者，积极参加了全国性的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如徐中舒发表了《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1957年在《历史研究》第5期上，重申前论，发表了《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的性质》一文。成为西周封建论这一派的主要支柱，受到全国史学界的广泛注意。胡鉴民发表《西周社会性质问题》一文，主要认为西周是奴隶制社会初期，而成为另一派观点。

配合全国关于土地制度问题的讨论，蒙文通于1957年发表了《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

在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全国大讨论中，四川史学工作者也参加了讨论。如徐中舒于1951年在成都《工商导报》副刊发表《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缪钺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0卷上，发表《北朝之鲜卑语》（1950年）、

唐嘉弘在《成都工商导报》副刊《西南边疆》(1950年12月6日)发表《西藏社会的分析》、《凉山彝人的家庭制度》(1951)。

在全国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中,唐嘉弘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四川的义和团》(1956年),这是论述四川义和团发生发展和斗争的文章。吴天墀在《历史教学》上发表《北宋中期的王则起义》(1957),王介平、王庭科、隗瀛涛、童恩正、赵宗诚、李润苍等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同时发表了《义和团运动6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义和团运动在四川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的矛盾与合作》、《义和团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律》、《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和污蔑》(1960)。从上列选题,可以看出四川史学的两个显著特点:即第一是对中国古代史,尤其先秦史有较大的优势,第二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四川研究上,同样具有雄厚的基础。

在史学的教材建设上,有缪钺《三国志选》(1962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选录19篇,大多是全篇,偶有节录,选录侧重当时政治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贡献者,也照顾到记载少数民族事迹者。凡是重要的学者、字义、人名、地名、书史、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词语,

加以注释,便于初学。还有徐中舒《左传选》一书,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约20万字。内分56个题目,在有的题目下,再据历史事件的发展,分立若干子目,藉以说明主题,有的讲个别事件和人物言论,则不立子目。《左传》全书讲霸业兴衰,因此,对霸业的起始、衰微,录选的多。个别政治家,如叔向、子产、晏婴、孔子的言行,择要入录。其他盟会、载书、誓、盟告等有关典章制度,也予入选,并予注释。

省外川籍学者吴玉章在1961年9月,出版《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回忆》一书,论述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以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

1958年,中央委托郭沫若编一部中级干部阅读的《中国通史》,是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小组,编写该书,订名《中国史稿》,是一部以郭沫若观点为主的中国通史。

川籍学者李亚农,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出版了《殷代社会生活》和其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论著,后结集为《欣然斋史论集》一书行世。

川籍学者贺昌群,长期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1964年,出版了《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认为在宋代之前,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二)四川史学研究的停滞时期(1966~1976年)

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老一辈史学家，受到残酷迫害和摧残，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也无法从事正常的学术活动，四川史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三)四川史学的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1985年)

80年代以后，史学的教学和研究，摆脱了“左”影响，四川史学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往日的某些禁区和空白，得到开放和填补，无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史和四川地方史等各个方面，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在这段时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论著。

中国古代史方面，影响较大的专著有蒙文通遗稿《越史丛政》(1983)、缪文远《战国策政辩》(1984)；论文有徐中舒《殷周史的几个问题》、《西周史论述》(1979)、罗世烈《孔子与春秋》(1980)、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1983)等。

巴蜀古史研究专著有童恩正《古代巴蜀》(1979)、徐中舒《论巴蜀文化》(1982)、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1983)、董其祥《巴史新政》(1983)等。

三国史研究论文有刘琳《东晋南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1981)、龙显昭《论魏晋道教与西晋政局》(1985)等。

宋元史研究专著有蒙思明《元代

社会阶级制度》(1980)、吴天墀《西夏史稿》(1980)、重庆市博物馆《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1982)；论文有张邦炜《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1985)等。

明清史研究专著有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984)；论文有柯建中《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1981)等。

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重要专著有徐克烈《邹容传》(1978)、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1981)、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注释》(1984)、李润苍《论章太炎》(1985)、王庭科《红军长征研究》(1985)、《四川近代史》(隗瀛涛主编，1985)、省地方志编委会《四川近现代人物传》(任一民主编，1985)等。

整理出版的大型古籍有清嘉庆《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4年)、《蜀中名胜志》(重庆出版社，1984年)等；古籍校注成果有赵吕甫《云南志校释》(1985年)等。

世界史研究的重要论文有卢剑波《亚狄加(希腊)悲剧的起源》(1979)、赵卫邦《印度的村社制度》(1980)、顾学稼《论19世纪末美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与衰落》(1980)、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1983)等，孙培良《中国画法的西渐与伊朗细画》等。

省外川籍学者王思治的《承德避暑山庄》(1980)、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1981)、方诗铭等的《古本竹

书纪年辑证》(1981),牟安世的《鸦片战争》(1982),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1984),谢本书等的《护国运

动史》(1984)等研究成果在国内史学界有重要影响。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 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著,上海联合书局 1930 年出版。郭沫若的《自序》中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现在却是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批判那些反对中共和马克思主义以及侈谈中国国情不同的托派等说:“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当然,郭沫若此书有一些欠正确的论点存在。在每次印刷或改版时,加了一些修正性的注解,他说:“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

《十批判书》 郭沫若著,重庆群益出版社 1945 年 9 月出版。本书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

《儒家八派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等十篇批判文章结集而成。有《后记》一篇,题目是《我怎样写 青铜时代 和 十批判书》。另外,1945 年本有《后记之后》,1950 年本有《改版书后》等。1944 年 7 月写成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 1930 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最适当的,也是颇合时宜的”。关于奴隶制的下限,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开始,一直“到秦始皇并吞六国,乃至陈吴刘项的奴隶大暴动的成功为止,才达到它的最后的终结。所以,郭沫若“曾经认为秦始皇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真正的开山。”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肯定吕不韦是中国古代

有数的政治家,并认为古代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某些传说是不可信的。吕不韦和秦始皇在政治有许多对立。并指出秦始皇时“天下是一面大刑狱的网,所谓政事,除游观、建筑、南北伐,东漕西转之外似乎也只是断狱了”。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文章还对秦始皇的种种设施、文治与武功,进行了分析,列举出九项大事。认为秦始皇统治时,内部有猛烈的冲击;果然,等秦始皇一死,不及一年天下鼎沸了”。

《中国历史教程》 吴玉章著,1930年至1935年在苏联所著,1962年整理出13章,收入《历史文集》。本书内含《夏禹传子是中国由母系氏族社会到男系氏族社会的一大转变》《宗法家族制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元末和明末的农民战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关键》等13章。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的著作。最后作者指出:“猛兽般的帝国主义实行束缚中国的政策时,总是说中国不能自己发展自己的经济。它们力图证明中国不能自己复兴。据它们的意见,中国应该分给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然而完全瓜分中国,它们还没有办到,因为中国人民的斗争以及它们自己相互间的仇恨妨碍了这件事情。”“同时,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是通过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来实现的,因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

民族民主革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关键”。

《古史甄微》 蒙文通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3月出版。本书撰于1927年,《自序》外,有《三皇五帝》《历年世系》《上古开化》《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上古文化》《虞夏禅让》《夏之兴替》《殷之兴替》《周之兴替》《三代文化》等12目次。主要认为上古民族、文化三系之说,即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为三系,而其部落、姓氏、居住地域各异,经济、文化商业部各互异。书中又以五岳说之演变及九州疆域之扩展,谓上古开化应以东方为最早而逐步西渐。

《李源澄学术论著初编》 李源澄著,成都路明书店1944年2月出版。作者在《自序》中说:“斯编皆集旧作而成。言其内容,则经、史、子皆有,以时而论,则以近年所作为多。念战前所作收集之难,故及早合为一编,以免将来之散失,藉以就正于有道”。本书收集《先秦诸子是非之准则及对历史文献之态度》等26篇文章。上起先秦,至两汉魏晋南朝唐宋为止。这些论文,也如《秦汉史》一样,以抒发自己心得为主,人所言所知者,则略而不谈。

《战国史异辞》 黄少荃著,载前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2卷2期。作者认为,战国史异辞甚多,不少篇章

是说客辩士之设辞，率借物寓义，虚实杂陈，本非历史事实，研究战国历史，必须予以具体分析。本文分《寓言类》、《传说类》、《伪告类》、《似仿造寓言类》等四目，各项之下，再列细目，举39条以隅及，然后综贯众说，申以按语。如《战国策·中山策》之《中山君飧都士大夫章》（文长不录），征引全文之后，按语云：“按此显系钞袭华元、羊斟、赵盾、灵辄事而合成者（《左传》宣公二年《吕氏春秋察微·报更》）《（战）国策》之不可信者多类此。”作者将这列在《伪造类》。本文所列举之条目，均广征博引，抒以己见。

《秦汉史》李源澄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4月出版。本书自秦至东汉（包括西汉霍光在内）分立15个子目。从第16至第23，分别叙述《政治思想》、《法吏与法律》、《选举与学校》、《社会经济与国用》、《地方政治》、《社会风尚》、《官制》、《学术思想》等。其于汉人学术之成就云：“汉儒于经学诸子而外，在学术上承前启后之功极大。六艺虽为古史，然不相联属。司马迁采六艺、经传、《世本》、《战国策》著成通史，为后人言古史者所依。其于书籍，开校讎之学。文字之学，则有《尔雅》、《说文》。前人所以传后，后人所以识古，皆赖于此三者。汉代在学术上承先启后之功，为各代所不及，亦时会然也。汉代文学，不独辞赋为列朝之冠，开发著述文体，皆为后人所取法，史学著述尤

多。《史记》为通史之祖，《汉书》为断代之祖，《汉纪》为编年之祖，其余记制度、典礼、法律、历法、天象、地志、《水经》、古史、杂史、记注，靡不有之。清人所谓汉学，特其中这一部耳”。这真要言不繁，以少少许，胜人之多多许。本书《自序》有言：“故人人所知者则不复言，即其关系甚大不能不言者，言之亦从简略。若所关甚大而为人所忽者，则言之从详。其中引用原书之处，多是前人所忽略处，乃以为征信也。若人无异义，则直言之，不费多辞”。此深谙著书详略得当之旨。钱穆在《序》中称“其书（指《秦汉史》）则亦章氏（学诚）之所谓圆而神之类也”。此书当得此称。

《奴隶制时代》郭沫若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约12.4万字。本书是作为1945年所出的《十批判书》的补充。共收16题目的文章。本书主要论文《奴隶制时代》，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理论，作者认为我国“夏、商、周三代的产生方式只能是奴隶制度。”但“关于夏代的情形，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多说，且等待日后从地底下能有丰富的资料出现”。作者认为“殷代是奴隶制”，作者认为商代“主要的生产是农业，而从事农耕的众人是‘畜民’中的最下等，故殷代是奴隶社会是不成问题的”。作者认为“西周也是奴隶社会，据今天所有的资料来看，我认为是不成问题的。只是

奴隶制在西周三百四十年中在逐渐变化,逐渐走向崩溃,也是毫无问题的事”。作者认为“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依据《史记》,把绝对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在这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在这之后的战国作封建制的初期”。本书另有《蜥蜴的残梦》、《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墨家节葬不非殉》、《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等,都是补充论证殷周是奴隶社会的文字。除几篇讨论铜器、《诗经》屈原和《楚辞》(主要是《离骚》)的文章外,有《几封讨论古代研究的信》(实为五封),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时代划分,充满自信,他一再说明“必须精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治好历史”。“研究历史必须从本质上,从发展上,从全面上来看问题”。本书在《改版后记》中,还引用凉山解放前彝族社会里“黑彝(奴隶主)对白彝的统治情况来研究古代历史,至少可以获得一些感性上的认识,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戴执礼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约46万字。本书编录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史料475件。其中珍贵稀有资料为布告、奏稿、传单、日记、宣传书报等180余件。绝大部分未经发表,而为目

前不易觅得的文件。本书所有录入文件,均详细甄定,于必要地方略加校注。每件并注明原件标题,引用书刊、资料来源、考证等,既按时间先后排列,又略依运动发展阶段分为5卷:即运动发生前史料为第一卷;自清政府出卖铁路与四川立宪派为争夺路款发生分化为第二卷;自保路同志会成立到人民正式要求独立为第三卷;四川人民武装起义到清在四川统治的瓦解为第四卷;自重庆独立至立宪派夺取胜利果实,革命归于失败为第五卷。每卷之首均有各阶段内容的说明,以清眉目。具体时间跨度为1903年7月11日至1912年5月8日。为四川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必须而必备的参考资料。

《读史存稿》缪钺著,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3月出版,约17.3万字。本书是一本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选集。全书由《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陈寿与三国志》、《南朝汉人逃往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北朝之鲜卑语》、《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人之冲突》、《王粲行年考》等14篇文章构成。在《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中,认为曹操镇压黄巾“罪过是大的”。在“曹操施行屯田的问题”中,认为“曹操为屯田制还是肯定的”。在“曹操裁抑豪强的问题”中认为“曹操的裁抑豪强是起了进步作用的,我们只要把曹操政权下的情况与

同时的孙吴及后来的两晋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总之,作者认为曹操生平活动的主要方面,“都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有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诸葛亮比一比,在人民利益与经济文化发展上,诸葛亮不及曹操,私人品质的某些方面,则曹操不及诸葛亮。其他的一些论文,立论平实,行文流畅,可读性强。

《顾炎武的抗清活动》 黄少荃著,收1964年5月《四川大学第五次科学讨论会论文》。作者认为:顾炎武是我国明末清初坚持抗清斗争的战士,是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的思想家。他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在顾氏诞生350周年之际,许多谈他学术思想和成就的文章,对顾氏的抗清活动,很少涉及。本文钩沉索引,从《精卫填海的抗清精神》等九个方面论述了顾炎武的抗清事迹。作者说:“顾炎武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激励着后代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由于阶级局限,他敌视农民起义。他的抗清末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终然一事无成。因为顾炎武的全人是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经世致用是其宗旨,所以纪念顾炎武应作全面考察。

《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 贺昌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出版,约28.4万字。本书是关于秦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的论文集。本书由《秦汉间封建土地所有制

形式与秦末农民起义的关系》《秦汉间个体小农的形成和发展》《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以及《汉唐间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均田制》等7篇文章构成,书前的自《序》概括了本书所收各篇的主要论点。而各篇文章均在探讨各历史时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希望从中引出有助于认识这段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形式的推移、生产关系的发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问题的结论,为通史研究服务”。封建地租形态的变化,反映着封建生产发展情况。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又同农奴制的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即农民对封建主的人格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阶级斗争的方式和内容,都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和发展息息相关”。作者指出:“均田、府兵制和租庸调法崩坏以后,封建国家在社会财产占有关系的比重上大大缩小了,中古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态亦大有转变。”“从两税法实行以后到明中叶改行一条鞭法,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社会财产占有关系的比重上,逐渐居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作者指出“私人占有土地,转化为货币地租”,农民一般地用货币来缴纳地租,逐渐摆脱了对地主的人格的存在关系,而转为近世的经济的依存关系”。所以,本书研究汉唐间土地制度和占有关系,在《序》中指出两税法、一条鞭法是一大转变。私人占有土地后,

货币地租的实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引起上层建筑等的变化,一切从土地所有制得到说明。

《四川古代科技人物》刘德仁、沈庆生、王家楼编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约9万字。本书是介绍四川古代科学家的小型传记,对李冰、落下闳等34位著名科学家的主要科学成就和影响均有介绍。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蒙思明著,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约17.9万字。本著作曾发表于1938年4月《燕京大学学报》第16期上。全书共分5章:即元前社会原有之阶级;元代社会阶级之实况;两种阶级系统之冲突及混合;日趋混合而后元代社会阶级之实况;元代阶级制度之崩溃。限于时代之限制,这里的阶级是指元代法定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划分,不是指生产资料占有的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作者在《自序》中指出:元代广大的劳动人民,基本上只分为两类,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或农奴,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官局工匠或工奴,民户是人口多数,是劳动者,而军户、站户,基本是农业劳动者,但又不同于一般农民,他们力役固定而且世袭。这些认识,是对原书的某些提法和认识不当的修正和补充。作者指出,蒙古的统一中国,本来汉蒙早有经济文化联系,不能与一般外族入侵混为一谈。统一中国过程中

虽然有残酷和暴行,是统一必然付出的代价,不是深责。作者又指出:元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因为元代的统治政权,是代表各族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关于元末红巾军与白莲教,只是一种组织手段,而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宗教只是一种表象,任何宗教都是叫人不反抗而顺从统治的。形式和内容,有时是不尽一致的。书后附有《引用参考书目》近220种。

《辛亥革命史》(中册) 隗瀛涛、吴雁南为本册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约36.4万字。《辛亥革命史》全书三册,全书主编为章开沅、林增平。参加中册执笔的有李润苍和钱安靖。本册共分《同盟会的建立》《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起义和群众自发斗争》《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保路风潮》等五章。时间上,记述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1911年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史》全书,立足于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又注意写出四川“引起中华革命先”的保路运动,点与面,局部与全局叙述适度,立论严谨,赢得史学界好评。

《左传疏证》徐仁甫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约35万字。清代以来,经今文学家认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乃刘歆窜乱古书而作,托于左丘明者。赞成这一说法的人很多,而系统论述证明人却没有过。本书作者

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将《左传》与有关古籍剖析之后,认为《左传》并非成于先秦解经之作,而是西汉末年刘歆博采群书之后,精心加工而作,因能集众家之长,故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本书作者以 10 卷之篇幅,将《左传》采《国语》、《公羊》、《谷梁》、《礼记》、《孝经》、诸子、《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的,逐一对比,疏正,从文体、风格、思想等方面,证成其说,如《左传》正确,而《史记》有误,显系刘歆根据有关古籍而有意纠《史记》之误,司马迁不见《左传》,因而不得谓《左传》采《史记》了。最后,作者认为“刘歆为文与《左传》相同,可证《左传》出于歆手”。附录一,“论《左传》思想内容具有西汉时代之特征”;附录二,“刘歆伪作《左传》证成莽篡汉辨诬”。关于《左传》之来源和作者,当世郭沫若、顾颉刚等人,均有与徐氏相同之观点,惟只在著作中道及一二,徐氏遂一一加以疏通证明,可谓集《左传》出于西汉末年刘歆所作论之大成。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方诗铭、王修龄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约 20.3 万字。竹书纪年,是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一座古墓中发现为写在竹简上的一部编年史书,称为《竹书》,或称《纪年》。原书 13 篇,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 299)止。与传统记载多异,与甲骨文和

铜器铭文多合。惜原简散佚,时人荀勖等之释文也失传。然经宋以前之古书,多所引用。清朱右曾始为辑佚,成《汲冢纪年存真》,继之王国维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现存的《竹书纪年》称为今本。今本可能成于南宋时期,虽不甚可靠,但可参考,王国维曾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于朱、王、范三成之书,又予辑佚补充其疏漏,复又取甲骨文、金文及其他出土文物为之疏证。因此,本书是当前带有总结《古本竹书纪年》的性质。另加附录三项。又录入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因而,一编在手,诸书咸在目前,是一本极有价值的纪年工具书。

《巴蜀古史论述》蒙文通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版,约 12.3 万字。本书是一本关于巴蜀史的论文集。全书由《巴蜀史的问题》、《庄蹻王滇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成都二江考》等 4 篇文章构成。其中《巴蜀史的问题》一文,共分 10 个小题,对于巴蜀的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疆域不等,巴黔中、巴蜀分界,巴蜀境内的小诸侯,蜀的古代、史迹、经济、巴蜀的文化和特征等,作了详细论述。作者认为巴蜀各有长远的历史,所谓蜀王、黄帝后世、蚕丛、鱼凫等皆蜀人传说的历史,非凭空造出。巴蜀与中原各国有所交往有自己的文

化,而且指出:“晚周文化应该早在巴蜀有些传播”。本书在引用材料上,多所考证,使纷繁的巴蜀古史,有一清楚脉络。

《四川保路运动史》 隗瀛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9 月版,约 27.2 万字。全书分为 5 章《前言》,是全书点睛之作,作者认为:“四川保路运动是四川社会基本矛盾的总爆发,是四川各种爱国力量和革命力量的大汇合”;“这次运动的基本动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资产阶级作为这一时代的‘主要动力充当了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保路同志军起义,不同于旧式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而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立宪派士绅,不同于封建士大夫,而是具有发展资本倾向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因而其时之官权和绅权的斗争,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关于同盟会的作用,首先是群众自发斗争与民主革命合流,又有效的准备了武装斗争,并领导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朝在四川的统治。保路运动,既显示了民族民主运动特征,又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弱点,说明资产阶级不能将革命引向胜利。

《论巴蜀文化》 徐中舒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4 月版,约 13.3 万字。本书是一本关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论文集。由《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

化续论》《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试论岷山庄王和滇王庄蹻的关系》《夜郎史迹初探》等 6 篇文章构成。作者认为四川古代是与外界有联系的经济文化区,从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区域。秦灭蜀前,蜀地农业已有良好基础,并影响巴国农业的发展。李冰治水,是在开明治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巴蜀有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至于铜器上的巴文,当前虽然不识,但巴文与么些文有一定亲属关系。么些文可能是在巴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巴文,么些文和汉字。在文字构成的条例上,它们也是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最初还有可能是同出一源的”。其他几篇,对巴蜀及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巴、氏、夜郎等的史实,进行了探索,并校订了一些古籍上的错误。本书充分使用了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纠正一些古籍误说,如“汉嘉之嘉乃古代嘉戎自称之词,酈道元解为‘嘉此良臣’,望文生训,显然是错误的等等。有一定带规律的总结:如‘《蛮书》谷谓之浪,古代西南地区凡以良、郎、浪、果为名者,皆因其居于溪谷之中而得名’等等,就是一个例子。

《越史丛考》 蒙文通著。见本志《民族学》。

《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 吕子方遗著,整理研究组整理,四川人民出版

社 1983 年 3 月出版。全书分上、下册共 50 万字,选编四川大学物理系已故教授吕子方论文 20 篇。上册 10 篇,主要是中国古代历法史、天文史、天文思想史、天文历算家传记以及天文学文献考证方面的论文。下册 10 篇,包括《山海经》、古代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地学史、气象史方面的论文。本书资料丰富,方法科学,富有创见。

《巴史新考》董其祥著,重庆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版,约 11.5 万字。本书由《甲骨文中巴与蜀》、《古代的巴与越》、《五丁新诠》、《涂山新考》等 9 篇论文结集而成。作者认为商代武丁时期,命其妇好代巴方,其时巴人活动中心在江汉之间,春秋时期,巴人仍活动在汉水流域。至于“巴子入川,建都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当在春秋末年,即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在《五丁新诠》中认为“五丁”是巴人的“巴子五姓”,即由五个氏族组成的一个部落的缘故。巴人五姓(巴氏、樊氏、瞿氏、相氏、郑氏),应理解为五个氏族。在氏族组织未解体前,依靠集体力量,创造大石文化遗存,战时则举族参加战斗,先歌后舞,战胜敌人。

《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史式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约 45.9 万字。本书是一部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专业词典。既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参考书、工具书,又是关于客家方言、粤方言的工具书。作者经过多年研

究和积累,收词于太平天国文书中之宗教用词、方言词语、口头俗语、会党隐语、新造专名、新义旧词、造字、改字及一些不易解释的词语,共计 1664 条。每一词语的解释,包括名称、注音、释文、引文、按语。罗尔纲称此书为“洋洋大观”和“功德无量。”

《论章太炎》李润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约 26.3 万字。全书由《章太炎是什么派》、《章太炎的史学观点和方法》、《章太炎的国粹主义》、《章太炎的民族主义》等 13 篇论文结集而成。作者指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他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而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起义前后到“五四”前后退而为民族资产阶级中派;最后退为民族资产阶级右派;在史学观点方面,作者指出:章太炎是由传统的封建旧史学转变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接受古文经学和古典文学的传统极深,形式和方法显得保守落后,但贯穿着爱国精神。

《中国科学技术史概述》毕剑横著,四川省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 5 月出版。本书共 5 章:第一章我国科学技术的萌芽和经验科学的产生,第二章我国铁器时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第三章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心及古希腊的科学技术,第四章近代科学史上两种相反的转化,第五章十六世纪我国明清以来科学技术落后原因之探索。

《红军长征研究》王庭科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版,约18万字。全书由《红军长征历史概述》《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四渡赤水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红军长征过彝区》《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一九三五年参谋团入川剖析》《红军长征大事记》等8篇文章构成。在《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中指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经过了8次演变,到第8次才决定建立陕甘宁根据地,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对这8次演变,作者给予了具体的分析说明。”

《云南志校释》赵吕甫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约37.5万字。唐代樊绰的《云南志》10卷,是关于南诏的一部史志。作者前后稿经三易,断续历时30余年,对每条条目予以编号,既加以校,又申以释,集当代关于此书之研究成果而于一书,方便广大读者研究使用,颇受学界欢迎。

二、论 文

《二千年来成都大城史的衍变》李劫人著,1949年5~8月完成,发表于1949年《风土什志》第三卷第二期。全文约44000字。作者从8个方面,论述了成都城市的历史发展和衍变,其文详尽深入,据有关历史资料和传说,予

以考证,是研究成都地方史、政治史、城市史与地方志的首要参考材料。

《前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及成立经过》黄稚荃著《杜邻存稿》,1980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文约8000字。同书另有《张溥泉先生言行小记》一文,可与此文共读。此文是50年代以来国内第一篇有关前国史馆的文章,也是当年参加该馆人员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并批判胡适井田辨观点和方法的错误》徐中舒著,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二期。作者指出西周是存在井田制的。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作者说:“当西周统治的开始,它是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阶段了”。

《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蒙文通著,载《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2期,约1.3万字。文凡11:我国两汉的农产量;两晋六朝的农产量;唐宋金元的农产量;明清的农产量;两汉的赋税、(附录);魏晋六朝的租调和唐的租庸调;两税法 and 工税法;一条鞭和地丁合一;正始学术;大历学术;嘉靖学术。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农业制度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战国、两汉;第二是魏晋六朝;第三是唐宋;第四是明清。秦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巨大变化来看,可以唐前唐后分为两大段,就其显著来看,可以魏晋、中唐、晚明分为四

段若从其再细一些变动来看,则又可分为若干段。这是一个总旨,11个问题都是围绕这个纲而深入展开论述的。

《西周社会性质问题》胡鉴民著,《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约3.5万字。作者指出:“西周上承殷商更低级的奴隶制,下续春秋战国最高发展的奴隶制,全部构成一个奴隶发展步骤的历史过程”。接着分析“西周的物质生产状况和生产关系性质”。认为春秋战国才是我国奴隶制的最高发展时代,同时也孕育了奴隶制的崩溃”。并认为西周只能是低级奴隶制”。接着分析“西周国家的性质”;“西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几个主要表现”。最后是“结论”。文章的写作特点是充分运用民族志和一些外国资料,予以马列主义的分析。谈到《周礼》一书的真伪,结论是《周礼》成书虽较晚,但其内容确是西周实际法制,《周礼》并非刘歆伪造等等。

《欧阳修史学初探》赵吕甫著《历史教学》1963年第一期。约18000字。作者认为欧阳修是我国中世纪史上一位出类拔萃的史学家。他对我国史学的发展是有卓越贡献的,其史学著述也极丰富,除散见于文集里的传状研志外,最为后世珍重的当数《新唐书》的纪、志、表20卷,《五代史记》75卷和《集古录拔尾》10卷。这些博综故闻,兼擅文采的著述,既表现了欧阳修

独特的治史才华,决定了他在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同时也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丰盛珍贵的遗产”。本文叙述了《欧阳修的重要史学著述》,在《新唐书》成书宋祁与欧阳修等完成,例得由欧阳修署名,但欧以宋祁为前辈,谢绝改点宋文,且书中分别署名,这是史学家的求实精神。其次讲了欧阳修对历史编纂的贡献。在正史体例上创本纪义例,恢复表谱,改进史志,创立了《兵制》和《选举志》。在史学思想方面,正文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讖纬迷信,提倡属辞简要。第三个问题是讲《欧阳修的金石考据学和古籍辞辨伪》,欧阳修善于用金石以证史,纠正了历史记载的某些错讹。同时,《易》之《十翼》被历来学者主认为孔子所作,欧氏提出:“《方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皆非圣人之作”。《系辞》(上,下)亦非圣人之作。在《诗经》方面认为毛、郑之失在于“疏略”和“谬妄”。认为辨伪端在弄明撰著之时代背景,进而探求思想渊源,流别等,提供足资参证的具体依据。

《论论博克尔的史学》谭英华著,《历史研究》1980年第六期。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英国人。著有《英国文明史》,第一卷出版于1857年,第二卷出版于1861年。以后各种版本改为3卷本。劳伯逊校注本改名为《英国文明史导论》。

作者对博克尔的史学观点和方法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论。

《略论新唐书·食货志的编纂方法和史料价值》谭英华著,《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约15000字。旧日史学界认为《新唐书·食货志》的价值远低于《旧唐书·食货志》,因此,对《新唐书·食货志》研究的不多。作者认为《新唐书·食货志》资料详于《旧唐书·食货志》,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加详,所谓“事增文省”,是《新唐书》的编纂原则,但又造成缺失。其次,文章论及《新唐书·食货志》在编纂上的成就及史料价值。近年考古资料的发现,许多方面《新唐书·食货志》的记载是

正确的。

《中国画法的西渐与伊朗细画》孙培良著,《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三期,约15000字。作者提出:早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前,我国业已经由中亚和欧亚草原各部族同西方有了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自汉魏至隋唐,伊朗的金属细工和雕刻、装饰纹样,对中国有广泛的影响。然而中国的织造和造成乃至绘画艺术则是逐步西渐。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中国画法更以新的审美观念和技巧使伊朗画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1894年以参赞名义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将其考察国外政治风俗所得,成《采风记》4卷。曾为强学会都讲,后成立蜀学会,创办《渝报》。1897年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辛亥后任国史馆修纂。反袁世凯复辟,被押回籍编管。1916年任国学学校校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制定《四川通志凡例》,并写有《论史学方志》等论文。

张森楷(1858~1928)字元翰,号式卿,四川合川人。初入成都尊经书院,后入成都锦江书院。长于史学,

1914年成《史记新校注》13卷。1925年任成都大学国史教授。1927年去北京校订《史记新校注》,劳累致疾,病逝。曾主纂民国《合川县志》。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生年见本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历史学方面,著有《中国历史教程绪论》、《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历史文集》等,是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1928~1937年避居日本。在日本期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

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石鼓文研究》等书。在抗战时写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史学著作。50年代著有《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等学术名著。其史学著作被辑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7册、《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0册。

蒙文通(1894~1968) 四川盐亭人。1927年撰成《古史甄微》。曾教授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等。1923年从欧阳竟无问唯识法相之学。1933年教授于北京大学。1933年因日本侵华,归教于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1940年出任四川省图书馆长。50年代后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成都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学识渊博,掩有众长,先后有《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古史甄微》、《古地甄微》、《儒学五论》等。1984年出版之《越史丛考》一书,受到广泛赞誉。

胡鉴民(1897~1966) 江苏宜兴人。1936年到四川大学任教。1937年作民族调查,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50年代后任四川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历史系主任、教授,1957年发表《西周社会性质问题》的著名论文。

贺昌群(1903~1973) 四川马边县人。1921年毕业于成都联中,1922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1930年4月,曾请假赴日访书,收获颇丰。

1931年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1937年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9年任东山复性书院教务长。1940年回马边县,创马边中学,1940年一度在三台东北大学任教,不久赴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大学迁南京后,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50年代后任南京市图书馆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等。

李亚农(1906~1962) 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日留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回国,去北平中法大学、北平大学任教,1937年在上海孔德图书馆工作,出有《金文研究》一书。1941年参加新四军,50年代后曾任上海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其史学著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等,后合编为《欣然斋史论集》行世。

李源澄(1907~1958) 字浚清,四川犍为县人。早年就读于成都四川国学专门学校,1933年学、教于南京国学院和章氏国学讲习会。后回川任四川大学教授。1945年在灌县创办灵岩书院。后在云南大学、五华书院、勉仁文学院、四川教育学院任教授、史地系主任等职。50年代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兼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秦汉史》、《李源澄学术论著初编》等。

蒙思明(1908~1974) 四川盐亭人。1929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发表《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等著名论文。1944年去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深造。获哲学博士,1950年9月回国。1951年至1952年任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代主任。华大文科并入四川大学后,任教务长。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有一定成就,尤长元史和蒙古学。主要著作有《曹魏的阶级制度》、《总理衙门的组织与功能》、《六朝世族形成的经过》等。

黄少荃(1918~1971) 四川江安人。

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后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50年代后在南充师范学院任副教授,1954年9月起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授。著有《战国史异辞》、《秦灭巴蜀考》、《五国伐秦考》、《顾炎武的抗清活动》等论文及专著《战国史丛考》、《战国史记事本末》等。袁庭栋辑有《黄少荃史论辑存》一书。

李润苍(1930~1985) 四川资阳人。1951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副教授。其关于章太炎的学术论文,结集成《论章太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十章 考古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以传世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四川的金石学著录以石刻为多。现代田野古学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四川境内的现代考古工作亦在20世纪初开始。

一、古代四川的金石学

四川古代金石出土的记载不多,但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著作如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陈思《宝刻丛编》等均著录有四川境内的石刻目录及跋尾。洪适《隶释》、《隶续》则录全文。成书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的吕大临《考古图》的内府本卷末有邛州(今邛崃)天宁寺僧捧敕佩图。宋代专记四川石刻的有刘泾《成都石刻总目》1卷,凡368则。

元费著撰有《器物谱》、《钱币谱》、

《蜀锦谱》等。明曹学佺《蜀中广记》著录秦汉以降的碑刻310多处。陶家信《石刻丛钞》也录有四川石刻。新都杨慎撰《水经注碑目》,精密不及《隶释》。

清代四川著录仍以碑刻为多。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宝金石补正》、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等均存大量四川碑刻。其专录四川者有李调元《蜀碑记补》、刘喜海《三巴金石苑》。巴蜀自东汉至两宋均盛行铁钱,刘燕庭收集400余种,收入李佐贤《古泉汇》中。

二、近代四川的田野考古与研究

四川地区的田野考古调查始于1877年。

1913年,外籍传教士J.H.叶长青、D.S.戴谦开始四川史前遗迹的调查。

1931年,广汉西10公里真武宫的燕家院子,乡民燕道诚因掏水沟发

现玉石器坑,有璋、圭、琮、璧、斧、钺等三四百件,引起各界注意,1934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和中国学者林名均前往发掘。按探坑法,分地层操作,记录遗物出土位置。在未经扰乱的地位中获得大量陶片、石器和玉器。此事引起避居日本的郭沫若的注意。郭在同年7月复信中称他们“是华西科学考古工作的开拓者”,认为广汉发现的玉石器与中原地区出土物极相似,殷代甲骨文记载有“蜀”,周武王伐殷有蜀参战,陶器断为周代早期是可靠的。并指出:“有朝一日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并且肯定会出现更可靠的证据。”(嗣后数十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他是有远见的)。此次发掘的记载有葛维汉的《汉州发掘的最初报告》(1936年,英文)和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1942年)。此次发掘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此期间,郭沫若还出版《甲骨文研究》(1931年),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甲骨文的新途径。同时将《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本,扩充为《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图录》(1932年),创立了标准器断代法,使传世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形成科学的体系,成为古代实物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内外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三、现代四川的田野考古调查与研究

1942~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四川博物馆(筹)合作发掘五代前蜀王建墓,由吴金鼎主持,冯汉骥、王振铎等参加,这是国内首次用科学方法发掘的帝王陵墓。后经冯汉骥多年研究,发表系列文章,并发表《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年)。

1945年由杨家骆、陈有刚发起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马衡、顾颉刚、傅振伦、朱锦等参加了对大足石刻的实察,对各区石刻进行测量、著录、编号、断代、搜拓碑刻,并对其历史、艺术作出评价,纂集成《大足石刻图征初编》(1946年),认为大足石刻“可继云岗、龙门,鼎足为三”。大足石刻由此闻名于世。

1946年,史语所芮逸夫、石钟健在川南兴文、珙县调查悬棺葬,并清理了三具悬棺,芮逸夫为此撰《僚为仡佬试证》(1948年)。嗣后,凌纯声经多角度综合研究,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1950年),由四川的发现展开讨论,认为崖葬(悬棺葬乃其一种),是中国东南古代濮越文化之特质,向外传播至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成为民族考古的里程碑式著作。此期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研究。1938年成都南门发现蜀石经残石数十方,内容有

《尚书》、《毛诗》、《仪礼》等(蜀石经是唯一刻有注文的石经,始刻于后蜀广政元年(938年),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止,历时232年,久已佚失)。1941年成都南门城垣发现元至正二年(1342年)八思巴蒙文圣旨碑,背面为汉文,由韩儒林、冯汉骥著文考释。1942年芦山发现有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的王晖画像石棺,由任乃强著文报告。1944年冯汉骥、杨有润在四川大学校园内清理小型唐墓一座,由于细心清理,在银镯内发现唐代茧纸《陀罗尼经咒》印本,是国内仅存的一件时代最早的四川雕版印本。1947年邛崃龙兴寺遗址发现石刻佛像、经幢、刻经、铜佛像、建筑构件等278件,后曾出书《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1958年)。另一批重要的南北朝至唐代的佛教石刻是在成都市西城外万佛寺遗址发现的。该地自光绪八年(1882)出土南朝“元嘉”,隋“开皇”年号佛像百余;1937年出土佛像30多件,内有“大通元年”(529年)造像,此后至1954年陆续出土石刻200余件,最晚有唐大中元年(847年)经幢,补齐了四川南朝至唐400余年的佛教造像序列。

四川考古研究的热点以巴蜀文化最为引人注目。抗战中,成都市面上有一大批传出于成都西北白马寺坛君庙的青铜器,为卫聚贤收得,卫为此著《巴蜀文化》(1941、1942年),认为巴

蜀在秦灭前已有文字。“巴蜀文化”作为考古学文化名辞之一,卒为学术界所承认采用。

四、当代四川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四川的考古学有很大的发展,有些重要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开辟了考古学科新的研究领域。

(一)考古队伍的建设

1951年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下设历史考古部。配合成渝、宝成铁路等各项大型基本建设开展考古工作。1952年,川西博物馆改为四川省博物馆。1954年西南博物院撤销,考古队伍转入四川省博物馆与重庆博物馆。1955年西康省撤销,西康省博物馆(筹)的考古队伍和藏品并入四川省博物馆。至此,四川省内有省博物馆和重庆市博物馆两支考古队伍。1962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成立,成为重要的考古力量,并在1964、1965年培养两届考古专业毕业生30人。197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设置考古专业,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截止1985年共毕业考古专业本科生85人,硕士3人。

(二)重要考古调查

1950年,川西博物馆在新都发现明代软尸墓葬,当时在国内尚属罕见。

在成都开元寺发现陶瓷窖藏,获大量唐宋印窑制品。

1953~1955年,四川省文管会在全省开展首次文物普查,初步掌握省内古遗址、古墓葬及地方文物的基本情况。此间在宝成铁路建设沿线即获得考古标本700余件,研究资料200余种,其中以冬笋坝、宝轮院的船棺葬与羊子山的土台建筑为国内首见。

1981年,四川省史学会等联合在琪县召开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百余名学者对中国南方的“悬棺葬”的名称、起源、时代、传播、族属、文化内涵展开讨论,这是国内第一次有关此课题的大型学术讨论。

198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大足县文保所合作,对大足、安岳等地的石刻造像进行调查与课题研究,编纂有《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等文献资料。

1985年,四川省史学会等团体联合在攀枝花市召开中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17个省市区百余名学者,就1938年以来发现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及1974年以来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大石墓以及东北地区的石棚、石棺葬等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三) 考古研究

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 四川已发现的古人类遗存5处:1951年资阳黄鳊溪发现晚期智人头骨化石,命名

为“资阳人”;1979年射洪马鞍山发现“射洪人”,为晚期智人顶骨化石;1980年筠连镇州发现“筠连人”,为晚期智人在上第一臼齿化石;1983年炉霍卡娘发现人牙化石;1985年底发现巫山猿人。

1951年成渝铁路建设中,在资阳黄鳊溪铁路大桥基址的南岸地下7米多深处采集到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经鉴定为一50岁以上的女性,是中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智人化石,命名为“资阳人”。裴文中据地层及动物化石分析认为属于更新世晚期。后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们主张“资阳人”是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化石。

1985年重庆自然博物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地县文保部门合作在巫山龙骨坡发掘出一段直立人左侧下颌骨化石和具有人工痕迹的骨片。次年又在此发掘出一枚上门齿化石和石制品,人类化石的特征明显。经王万波、方其仁等研究命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简称为“巫山猿人”。巫山猿人是中国迄今发现距今200万年前左右最早的人类化石。贾兰坡认为“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说提供了新的依据。”

四川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9个地点:巫山龙骨坡、资阳黄鳊溪、炉霍卡娘、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鲤鱼桥、成都羊子山底部、重庆马王

场、攀枝花回龙洞。其中除巫山龙骨坡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外,均属于晚期遗存,而回龙洞的打制砾石器与细石器共存,可能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新石器与原始文化考古 50年代以来发现四川约有230处以上的原始文化遗存,有些可以肯定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文化内涵比较清楚的有4个地区类型。

大溪文化 巫山大溪遗址1958年发现,其年代约距今6000年左右,以渔猎为主。大溪文化的某些因素为屈家岭文化所继承。

三星堆一期文化 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及其附近。以1980~1986年发掘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下层为代表, C_{14} 测定年代在距今4500~4700年间,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有些文化因素为后来古蜀文明所继承。

建山寨类型 在岷江上游发现80余处原始文化遗存,以理县建山寨遗址为代表。年代约距今4000年左右。

礼州类型 川西南的安宁河与云南龙川江流域分布着大墩子——礼州文化类型。测定年代约距今3200年左右。

古巴蜀考古

船棺葬 1954年在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发掘出土一批巴蜀铜器与陶、漆、银、玉等器,从地下证明了1940年以来争论怀疑的巴蜀文化青

铜器的真实性。墓葬形制分为船棺墓(战国晚)、狭长土坑墓(秦汉间)、长方土坑墓(西汉)等,而以船棺墓为特色,据冯汉骥等研究命名为“船棺葬文化”,并认为与巴人有关。

水观音遗址与墓葬 1957~1958年在新繁发掘水观音遗址,据研究可分为三期:商代、商末周初与西周,于是把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序列从地层分期上推前到商代。

三星堆遗址群 1980~1986年在三星堆、西泉坝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清理出房屋基址27座,老坑100多个、墓葬4座、陶窑一座、祭礼坑2个,城墙数千米,出土金、铜、像、骨、玉、石、漆、陶标本数千件。文化层堆积最厚在2.5米以上,可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之际、殷商、商末周初、西周、春秋等连续发展的6个层位,前4个文化层 C_{14} 测定年代在距今4700年至8875年间,应属于古蜀文明,为蜀文化的分期提供了标尺。

十二桥木结构建筑 从1985年开始在成都十二桥发掘发现商代、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建筑基础,尤以奇迹般保存下来的商代竹木结构干栏式建筑为国内首见,测定年代距今3600年左右。

秦汉以后的考古

都江堰李冰石像 1974年在都江堰金刚堤西,外江河床下4.5米的砾石层中发现,高2.9米,直立全身大

型圆雕,冠带袍履,交手拱交,衣襟正中题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两袖分刻“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1975年又在附近河床中出土持锤圆雕石像,头缺残,高1.85米。当为东汉时纪念修筑都江堰者李冰祠中的神像。此为都江堰乃秦蜀守李冰所修筑之地下确证。

青川秦墓 1979~1980年,三次在青川郝家坪发掘土坑墓72座,分两期:早期(战国中期)的陶器组成合为鼎豆壶,晚期(战国晚期)则为鼎盒壶,与关中秦墓同。所出漆木器上多处有“成亭”烙印,当为秦时成都所造。出土的秦半两钱可能为巴蜀私铸。宋治民认为可能是受巴蜀文化薰陶的秦移民墓葬。

西汉土坑墓 全省已清理200余座,基本上承袭先秦土坑墓。

东汉砖、石室墓及画像砖、石墓,四川的砖石墓出现较晚,约在新莽时期,东汉大盛,而极富特点,有的砖石墓室壁嵌有画像砖,故称为画像砖墓。成都平原为中国东汉画像砖墓的集中地。

崖墓 四川崖墓分布广、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初步统计有崖墓群约2500多处,东起巫山五溪,西至汶川、荣经,北抵广元,南达昭觉至宜宾一带,尤以岷江中下游最为集中,其次为嘉陵江流域,仅涪江中游三谷附近有

数千座。已知纪年墓近40座,最早为新都马家山M5,为东汉永平八年(65年),最晚的是昭化宝轮院,为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乐山麻浩崖墓1984年成立乐山市崖墓博物馆,为中国唯一崖墓专业博物馆。

历代瓷窑 四川东汉墓中青瓷器出土不少,重要的有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学术界倾向于把四川南北朝至唐宋的民窑青瓷简称为“邛窑系”。

摩崖造像 全省龛窟在10个以上的分布点超过124处。广元千佛崖、皇泽寺有南北朝时期的“塔林窟”与“佛殿窟”。世界上最大的弥勒坐像即在乐山,高71米。全川自唐至明代凿有大像16处之多。四川还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道教造像,如绵阳西山观、安岳玄妙观、剑阁鹤鸣山等。大足、安岳为中国宋代摩崖造像的“宝库”,宝顶大佛湾造像反映有禅宗、三阶教、净土宗等门派的内容,大足的妙高山、石门山、玉滩、佛安桥等处还有释道合龛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造像。

唐宋元明的墓葬 四川唐墓能肯定者甚少,宋墓最多,已清理者超过400余座。宋墓中往往有墓地买地券、敕告文、华盖文、镇墓“真文”等,可见宋代四川道教之盛。1982年重庆江北发掘元末明玉珍墓,出土铭旌画幡、龙袍锦被、金杯银锭等,石碑“玄宫之碑”记载这位元末农民起义红巾军领袖之

一的明玉珍的生平事迹 1004 字,对补旧史文献之缺讹有价值。四川的明墓甚多,1970 年成都凤凰山发掘的明代朱悦燎墓是目前所知明侯王墓中最大者。出土的釉陶俑 500 多件,文侍武俑、全

副仪仗,乘马象辂一应俱全,规模宏传。

民族考古 岷江上游、川西山地的石棺葬发掘总数超过 500 座,与周秦氏族有关,或与蜀蚕丛部落有关。雅砻江上游以卡莎湖的石棺葬为代表,乃是秦代草原民族的文化遗存。金沙江上游以巴塘扎金顶墓地为代表,可能与秦汉的白狼夷有关。青衣江上游以宝兴陇东墓地为代表,可能与汉代的青衣夷有关。大石墓是 1974 年首先在川西南安宁河流域发现发掘的,为土岳状大冢,以巨石构筑墓室,实行多次丛葬,时代约东周至西汉,是邛都夷的遗存。崖葬为中国古代濮越系统民族的习俗无疑。铜鼓是中国南方民族的神器,省内 23 个县市与铜鼓遗迹有关,会理出土的铜鼓最早、川南最为集中,指示出铜鼓传自云南的可能。

水文与地震考古 考古界对长江上

游干支流沿岸作过 7 次洪水考古调查,共获历史洪水题刻与遗迹 200 余处,历史枯水题刻 362 段,据此可统计出自 1153 年以来 800 年间,长江曾有 17 个洪水年份,其中 1870 年为长江大洪水,推算三峡葛洲坝附近洪峰流量可达 11 万秒立米,是现代记录 1954 年大洪水的两倍。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有自 764 年至近代的枯水记载 163 条,可推川江每三五年一枯,十余年一最枯,六百年一极枯水,为三峡水利工程提供可靠的设计数据。地震考古对地震多发地西昌及其附近的研究表明,安宁河两岸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不均衡性,推算出安宁河谷断裂带东西两盘年平均升降差在 0.017 ~ 0.02 米之间,这与近期的精密测量相吻合,可解释西昌地区每 140 年发生一次强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调查收集近 100 通碑石、族谱等,考订了 1536、1732、1850 年三次西昌特大地震的发震时间及序列、震中及破坏范围,并在西昌泸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地震碑林。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 著

《卜辞通纂》 郭沫若编著,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 1933 年版。该书 1958

年作为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稿,由作者加了一些校语和注释。为整理、研究甲骨文卜辞建立了新体系,是作

者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书中选录的甲骨精萃 800 片,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八个部分排列,逐步加以考释,并在每项之后作有小结。考释中作者注意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史。入选的甲骨碎片经作者缀合者“亦在三十事以上”;均为本书所独有。使破碎之片原分属数卷或分藏海外者复原为“整简”,有利于阅读和研究。

《四川汉画像选集》 闻宥编著,群联出版社 1954 年出版。本书共收集画像石拓片 70 幅,画像砖拓片 30 幅。内容包括建筑、神话传说、珍禽异兽、四神、历史故事、生产、娱乐、市场、车骑出行、宴饮等,基本上包括了汉代画像的全部内容,这些画像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社会生活。批驳了认为四川画像渊源于印度的说法。

《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 刘志远、刘延壁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5 年版。为 1953 年成都西门外基本建设工程出土石刻造像研究专著,认为万佛寺造像早期(宋梁)作品面型方而潇洒秀丽,晚期(隋唐)作品面型圆润而称秀静。

《巴蜀史迹探索》 邓少琴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由《巴史新探》《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论》四篇论文组成,以文献材料为主,结合考古材料,对巴族的族源、巴

族生活的区域、巴和华夏的融合、蜀之蚕丛、杜宇、开明各代蜀王,以及巴蜀的生产、生活诸方面有关巴蜀史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郭沫若编著,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作者于 1957 年将《大系》《图录》和《考释》合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书中将传世的重要金文辞依时代与国别加以区分。以铜器的形制、花纹、文字风格、文辞体裁、铭文中的人名事迹等方面加以考证作为断定时代的标准器。然后以标准器作为依据,对其它未知年代的铜器进行断代。这种方法在对传世品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是科学的,是把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用于铜器研究,使青铜器的研究突破了金石学的范畴,走上了考古学的轨道。作者将商周青铜器分为四期,其滥觞期,也就是第一期,根据殷末青铜器之铸造技术,断定必在远古。其余三期相当于商代后期至战国末年。其滥觞期当时尚无实物出土,系一个假设阶段,其余三期虽有过不同的名称,但为研究中国青铜器分期者所普遍采用。

《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 冯国定、周乐钦、胡伯祥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8 年版。本书为一本图录,收集 1947 年出土于邛崃县城西大佛寺遗址附近的石刻 73 件,包括造像、经幢及残碑。龙兴寺在《四川通志》《邛州志》和《邛崃县志》中都不见记

载,本书有补缺之意义。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报告》介绍了船棺制作和使用方法以及这种葬具的演变。出土器物中,有代表性的是铜器和陶器。铜器中的扁茎无格剑、折腰圆刃钺、短骨双弓形耳矛是主要兵器,甗、釜、釜、盘是主要日常生活用器。陶器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器,夹砂赭红色和夹砂青灰色陶是主要的陶系,最常见的器形是小口圆底绳纹罐、无把圈足豆和大口圆底釜。《报告》考订这两批墓葬的时代为上限起于战国,下限可延至西汉,并将这两批墓葬定为古代巴人的墓葬。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编著,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报告》分为12个问题,详细介绍了墓葬的发现经过,墓葬构筑和形制,墓中的雕刻、十二神、使乐及出土文物。墓室分为前、中、后三重墓室,券顶。中室置须弥座式棺床,棺床的东、西、南三面浮雕伎乐24人,其舞者2人,演奏者22人,为一完整的音声部伎。棺床两旁列有托棺床的十二神半身像,均顶盔、戴冠、贯甲,神情威武肃穆。后室有石床,床上置王建之圆雕坐像,像前置谥室、哀册、谥册等。王建墓早年被盗,残存随葬器物不多,但出土的谥宝、哀册、谥册等法物,对研究唐、五代的制度却是较为重要的材料,漆器为研究当时手工工业的宝贵材料。四川唐墓发掘很

少,王建称帝仿唐制,王建葬于公元918年,在墓葬建筑、随葬器物诸方面是唐墓的延续。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刘志远、余德章、刘文杰著,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本书6章,分别对汉代的政治生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城市、商业和交通,统治阶级的豪化生活、汉代的舞乐百戏及神话传说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昌都卡若》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为1978、1979年两次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的卡若村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全部资料。全书共分5章,分别介绍了卡若遗址的初步研究,并有附录二篇。根据文化层的堆积,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根据 C_{14} 测定数据,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遗址为氏族公社的集居地。认为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氏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并和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冯汉骥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文集》共收学术论文22篇。可分为五组:第一,关于巴蜀文化;第二,关于汉代研究考古研究;第三,关于石棺葬,认为石棺葬为川西高原秦汉时期少数民族的墓葬;第四,关于王建墓的研究,尤其是《伎乐考》一篇,详尽考证了唐、五代的音乐,为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著作;第五,

关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研究。

《于豪亮学术文存》于豪亮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书共收学术论文27篇,可分为四组:第一组,为研究周代金文的文章共6篇。对近年陕西、河北、湖北等省出土的两周部分铜器铭进行了考释和研究。对这些铜器铭文的难字难句,通假字从多方面加以论证;第二组为研究秦简的文章7篇,围绕湖北云梦出土秦简,对秦的历史进行了研究;第三组为研究居延汉简的文章8篇,对居延汉简中的一些文字和字句重新作了考释和考证;第四组6篇,考证了甲骨文、金文的某些字,对汉代的考古也进行了研究。

二、论文(报告)

《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管会编著,载《考古学报》1956年4期。此墓为成都地区较大的战国墓葬之一。认为出土铜器、漆器有楚器风格,陶器、兵器为巴蜀文化器物,172号墓为巴蜀文化墓葬,时代为战国晚期。

《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四川省文管会编著,载《考古学报》1957年4期。土台为人工建筑,平面为正方形,分三级,每级外墙皆为土砖砌筑,墙为用土整平,土台现存高度约10米。第三级即台顶面积31.6米见方,第一级即台底部约103.6米见方。有三级阶梯上下。土传砌墙采用缝垒砌,

用白色细泥勾缝。土砖系泥土与草盘制成。土台顶有古墓,土台基址上层有石凿、石斧、石璧和陶片。陶片以黑灰色夹大砂陶为多,轮制,纹饰有绳纹、圆圈纹及鸟纹等,能看出器形的有圈足豆、灯柱、折唇浅腹盘、小底大口罐等。基址下层有五件打制石器。认为土台时代为春秋时期,可能为盟会之用。

《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刘志远编著,载《考古学报》1958年1期。天回山在成都北门外,1957年四川省博物馆在这里清理了3座崖墓,编为1、2、3号。1号墓有墓道、过道,在过道的北侧并列开凿3个墓室,这种布局称为单翼式。2号墓有墓道和一个长方形单室,称为单室墓。3号墓有墓道、过道,在过道的两侧开凿墓室,这种墓称为双翼式。墓内均有排水设施。随葬器物主要有陶器、铁器、铜器。陶器有各种日用器和模型器及俑类,铁器主要为农具和工具,有1件铁书刀错金铭文“光和七年广汉工官……”,铜器有釜、镜和货币,时代为东汉晚期。

《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崖墓》沈仲常编著,载《考古学报》1959年2期。总共发掘34座崖墓,东汉墓2座、南北朝墓32座,报告介绍了南北朝的崖墓。墓葬均为单室,形制可分两种,一种平面长方形,前窄后宽,墓顶拱形。一种略近圆筒形前宽后窄。有些为两墓并列而共用一条排水沟。墓内

有的设砖筑棺台,有的就崖石凿成棺台,葬具用木棺。随葬器物有陶、铜、铁、瓷、银器。这批崖墓的结构与附近“元嘉十九年”题记的崖墓极为近似,瓷器为青瓷,为瓷器研究提供了断代标准。

《资阳人化石地层时代问题的商榷》成都地质学院第四纪科研组著,载《考古学报》1974年2期。认为可以基本肯定资阳人化石地层距今绝对年代为(7500±130)年,应属全新世早期,而非过去所认为的更新世中期至晚期。

《西周墙盘铭文笺释》徐中舒著,载《考古学报》1978年2期。墙盘出于扶风之周原,凡284字,前一部分历叙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世重要史迹,后一部分是作器者自叙其家世五代之事。全文分12节:叙文王初年政治;叙武王征伐四夷;叙公布宪令的成王;叙制定田赋制度的康王;叙昭王广施仁德于荆楚;叙穆王董正天子的错误;墙自叙其高祖烈祖两代之事;叙墙乙祖出仕于周为周心腹之臣;叙亚祖辛教育子孙;墙叙其父乙公之事;墙自铭作器之故;(12)以父祖祝福语作为铭之总结。认为此铭对西周前期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新史料,并知墙出自殷王世的后裔。

《万县唐墓发掘报告》四川省博物馆编著,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墓葬位于万县市东6.5公里,现存封土堆高出地面6.5米,封土底直径约

30米,夯土筑成,砖筑墓室在封土正中,单室券顶,平面呈长方形,后壁砌有象征性的棂窗。墓室前有甬道和墓道,墓室和甬道两侧有耳室,墓壁抹有白灰及彩绘。随葬器物大多被盗,出有瓷器、铜器和墓志。瓷器中的俑制作精美,从墓志知道墓主人为贞观六年任澧州刺史的冉仁才及其妻子的合葬墓。

《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四川省博物馆编著,载《考古学报》1981年4期。大溪遗址位于长江南岸三级台地上,1975~1976年进行第三次发掘。遗址地层可分3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上文化层,第三层为下文化层。第二层为晚期,第三层为早期。墓葬也分为早、晚两期,上下重叠,排列整齐,为竖穴土坑,早期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晚期以屈肢葬为主,早期墓出土主要为石器,晚期墓除石器外,多出陶器。从性别看,女性随葬器物多于男性,同时也出现随葬物多寡悬殊的现象。

《四川资阳鲤鱼桥旧石器地点发掘报告》四川省博物馆等编著,载《考古学报》1983年2、3期。发掘地点地层共分五层(最下为第一层,最上为第五层),第2层上部有一侵蚀面,代表一个沉积间断时期,其上下之堆积有大的时代差异。石制器、动物化石、乌木及植物标本出于第一层,石器有砍伐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植物标本中水青桐占大多数,动物化石有竹鹿、犀

牛、牛、东方剑齿象。乌木经 C_{14} 测定为距今 (25100 ± 400) 年,数据和动物化石的年代一致。认为应为更新世晚期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试论早期铜鼓》 童恩正著,载《考古学报》1983年3期。本文论证了早期铜鼓的分布、族属、功能诸问题。根据铜鼓的分布地区结合铜鼓形制的演变,早期铜鼓的发源地,可能就在云南

的楚雄至洱海一带,可分为 型 a 式和 b 式,前者早于后者。越南北部东山文化出土的铜鼓均为 型 b 式,晚于中国云南省的 型 a 式铜鼓。认为铜鼓为滇东高原西部的濮僚系统的民族创造,然后为其邻近同一族系的部落的采用。文中引用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意见,从而提出越南东山文化的铜鼓是由中国滇东高原西部传入的。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郭沫若(1892~1978) 见本志《历史学》。

冯汉骥(1899~1977) 字伯良,湖北省宜昌县人。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文科。1931年赴美深造,1936年获人类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任四川大学历史教授,1941年兼四川省博物馆筹备主任。50年代后任西南博物院副院长、四川省博物馆馆长。1952~1954年主持宝成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发掘工作。重点从事西南巴蜀文化、云南晋宁石寨山滇人墓、石棺葬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

于豪亮(1927~1982) 江苏省淮安人。1927年生于四川省成都。194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51年在西南博物院从事考古工作。后任职于四川省文

管会、四川省博物馆,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重点研究战国秦汉考古、古文字学。曾参加宝成铁路沿线的考古工作,参加编写《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著有《于豪亮学术文存》。1975年调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从事出土汉代帛书和秦汉简牍的研究。

刘志远(1933~1976) 四川省成都市人。1951年到四川省博物馆。此后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曾参加成都天回山汉代崖墓、成都及附近宋代墓葬考古发掘,对汉代画像砖颇有研究。著述有《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川西的小型宋墓》、《汉代市井——说东汉市井画像砖》、《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等。

第十一章 经 济 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传统经济思想

战国时期蜀郡守李冰、西汉蜀郡守文翁,在利义关系上,都信奉“农本思想”,先后主持成都平原上的水利建设。西汉杨雄提出“民为邦本”、“民富则国富”的功利思想。三国时期诸葛亮提出农本主义,重视理财。宋代苏洵指出,“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重视义利结合,利在义先。他还主张限田,认为发展生产必须重视增加劳动人口的数量,而不是全部人口的数量,在经济管理中应该充分发挥国家现有机构的作用。这些思想在当时均有独到之处,可从苏洵《田制》、苏辙《国学秋试策问二》和苏轼《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集中反映出来。明代唐甄提出,应该允许人们通过饲养、纺织、缫丝等非传统农业的途径致富,应该发展工场手工业,建立颇具规模的作坊,这代表了封建社会晚期萌发的自由资本主义

经济思想。

五代时期后蜀马鉴著《续事始》记载我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宋代王灼著《糖霜谱》记载遂宁糖业生产情况,清代张宝法著《三农记》记载各种实际生产经验。

二、近现代四川经济学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及学说逐渐引进中国,经济思想主流逐渐汇聚到寻找富国强民御侮的焦点上。在维新变法期间,宋育仁在《乘风记》中全面介绍西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并创办《渝报》、《蜀学报》,倡导变法,他主张发展民族资本,开发矿产,铸造货币,设立银行,发行期票,抵制外资经济侵略和合理使用资源,他在《呈请理财摺》、《债式议》等奏摺和文章中提出了各种富国理财的建议。刘光第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在其

《论校分庐抗议》一文中,力主去除弊政,发展生产,充实国力,抵御外敌。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许多经济学者先后在《广益丛报》、《重庆日报》、《民报》、《鹃声》、《四川》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斥责清政府出卖中国经济权益,号召人们奋起抗争,捍卫经济主权。1907年到1908年间《四川》杂志连续发表川省留学生的《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雷铁崖的《警告全蜀》、南冥子的《中国与世界经济问题》、思群的《列强协约与中国之危机》等。

维新变法时期,宋育仁、廖平等人就在四川翻译出版了《原富》等西方经济名著。辛亥革命之前,《鹃声》、《广益丛报》、《国民公报》发表了用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分析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形势的文章。

20世纪初大批川省留日学者回川,对四川经济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1905年四川大学设立了经济学正科,到1918年,经济学专业已扩展为19个,除普通经济学外,还有财政、银行、货币、簿记、统计、商法、保险、工业政策、农业政策、商业政策、殖民政策、交易市场理论、仓库税关论以及经济史等专业。专业教材内容兼取中外学说,经济思想既有国家主义、洋务思想、民族主义经济思想,同时也有西方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及空想社会

主义。

1919~1936年,经济学的发展沿着两个主导方面向进行。一方面由以往注重外国经济理论的一般引入转向对中国现实的、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在应用经济学方面加强了经济资源的调查研究、产业经济的调查研究以及中国经济形态的研究等。在此期间出现了林振翰写的《川盐纪要》(1919)、贾士毅的《川路直接间接用款》(1924),以及其他作者撰写的《内江糖业衰败的原因及其发展的希望》(1928)、《四川盐政史》(1932)、《川西北丝业衰落的原因》(1932)、《四川茶叶概况》(1933)、《畜产与四川经济及其发展途径》(1934)、《现阶段之四川农村与粮食》等分析四川产业现状、问题和趋势的著作及系列文章;杨西孟著的《中国合会之研究》(1934)、吕平登著的《四川农村经济》(1936)等分析四川经济的综合性著作及文章。另一方面,大批经济学者日益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考察分析中国的经济生活和世界的经济问题。在此期间,陈豹隐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经济现象的体系》(1929)、《经济学原理十讲》(1931)、《经济恐慌下的日本》(1937)等著作及文章;钟复光与施夏亮合译出版了《新经济学讲话》(1930)、《苏联的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1930)、《工会运动理论与实际》(1931);魏崇阳发表了《日

本侵略东北的经过及现势》(1930)等论文。

1937~1945年,沦陷区大批学校和政治文化机构西移,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孙冶方、黄松龄、陶大镛、王惟中、褚葆一、施复亮、沈志远、钱俊瑞、许涤新、王寅生、狄超白、章乃器、关梦觉、潘序伦、傅筑夫等先后客居四川。围绕战时经济,经济学家出版了各种研究成果。代表性书籍有:陈豹隐《经济恐慌下的日本》(1937),彭迪先《战时的日本经济》(1938),尹文敬《非常时期财政论》(1939~1940),狄超白《论游资》(1941),胡寄窗《战时物价管理政策》(1943),施复亮《四川征购粮食概论》(1941)、《经济漫谈》(1944)。重要文章有:钱俊瑞《论民生主义的实质》(1940)、杨西孟《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2)、《我们对物价管理的再度呼吁》(1944)、《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1944)、《战时物价动态》(1941),关梦觉翻译了《日趋严重的日本财政危机》、《当前德国经济危机》等。此外,马寅初还先后发表了关于战时财政、战时金融等文章,并把它们收入《战时经济论文集》,于1945年出版。

在战时经济学研究成果中,许多经济学家和有关学者撰写发表的战时经济论文和作品也相当丰富。例如在后方经济方面,出版的代表性书籍有:《战时四川之农业》(1938)、《中国战

时资源问题》(1939)、《中国战时经济论》(1939)、《战时后方之工业建设》(1941)、《战时西南经济问题》(1943)等。代表性论文有:《今日后方经济》(1940)、《战时四川之农业》(1941)、《战时四川工业概况》(1944)、《康藏经济》(1942)、《由地理观点论西南西北之经济关系》(1943)、《川西北区经济建设》(1944)、《北碚一带米谷生产调查》等。研究的范围遍及西南、四川及乡镇。研究的产业和资源遍及工业、农业、矿业、森林、水利、畜牧、盐、丝、茶、棉、桐油、药材、煤炭、石油等。在经济制度以及经济管理方面,出版的代表性书籍有:《中国农佃问题》(1943)、《四川租佃问题》(1944)、《农村禄田》(1943)、《中国战时财政》(1938)、《战时贸易政策》、《四川农业金融》(1941)、《中国战时公债》(1943)、《战时物价管制》(1944)等。代表性论文有《四川省契税概述》(1937)、《抗战中的法币》(1938)、《民族主义与保护关税》(1939)、《经济制度上的四个主义——合作主义评价》(1939)、《转换期中大后方经济建设》(1940)、《四川农业现状其改进》(1945)等。这些著述广泛涉及战时财政、金融、税收、地租、外贸、工农商业管理等,是四川战时经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川籍经济学者在战时经济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很丰富。代表性书籍有:陈豹隐《经济恐慌下的日本》(1937),彭

迪先《战时的日本经济》(1938),尹文敬《非常时期财政论》(1937~1940);重要文章有:杨西孟《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2年5月《大公报》,与伍启元等9人联名)、《我们对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1944年5月《大公报》,与伍启元等5人联名)、《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同上)、《战时物价动态》(1941)等。胡寄窗也于1943年在西安出版了《战时物价管理政策》一书。

一般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也获得新的进展。出版了大量论著。其中理论经济学代表性的论著有:马寅初《经济学概论》(1943)、《通货膨胀新论》(1944);1944年沈志远在重庆修订出版了《近代经济学说史》,修改再版了《新经济学大纲》(1940),翻译出版了列昂节夫的《资本主义》,褚葆一出版了《货币价值论》(1945)、《工业化与中国贸易》(1945)、《马先(歇)尔之经济学说》;彭迪先出版了《实用经济学大纲》(1940)等。这些著作,有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分析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问题,有的直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因此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得到发展。

在应用经济学领域出版的重要书籍有:潘序伦《所得税原理及实务》(1941),马大英《县财政建设》(1939)、《中国财政收支系统论》(1944)、《中国

财务行政论》(1946),石毓符《普通会计学》(1945);杨佑之《会计学》(1939初版,1942再版)、《高级统计学》(1943)、《审计学》(1943);归润章《会计学》(上下册,1943)、《成本会计学大纲》(1944)、《审计学》(1945)等。

此外,在经济史、经济方法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陶大镛发表了《中国石器时代的生产技术》(1940)、《中国金石并用时代的生产技术》(1941)、《中国青铜器时代生产技术研究发凡》等系列论文;傅筑夫着手中国古代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为他以后出版这方面的著作奠定基础;马非百1944年重庆出版了《管子轻重篇新注》、《桑弘羊传》、《桑弘羊及其战时经济政策》;刘絜敖于1937年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等。

1946~1949年,许涤新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道路》(1946)和《现代中国经济教程》;马寅初发表了《论官僚资本》等演说和文章;彭迪先写了《地方流通券最好缓发》、《从战后美国经济看“冷战”与“热战”》等文章。刘秋篁、许廷星、黄宪章、洪骏声、杨泽、李紫翔、刘敏、刘丙吉、姜庆湘、杨荫溥、刘光华等人在《四川经济季刊》、《四川经济汇报》、《工商日报》上连续撰写文章,揭露经济时弊,抨击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主要有:刘敏《抗战结束之四川工业》(1945)、许廷星《经济建设与财政建设》(1946)、李紫翔《论国

营事业政策的前途》(1947)、洪骏声《谈利率与物价》(1949)等。

这一时期理论经济学和实用经济学的研究相对较少,出版的经济论著主要有:彭迪先《新货币学讲话》(1947)、《世界经济史纲》(1948),黄宪章《货币学总论》(1947)。

三、当代四川经济学

(一) 转型和曲折发展时期

50年代初,经过调整合并,建立了西南地区最集中的经济院校——四川财经学院;与此同时,综合性大学开设了经济学系科;在省党政经济管理部门设立了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从而为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省经济学者开展了学习马列经济学著作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运动,同时针对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先后集中讨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等问题。此外,还广泛研究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部门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等问题。

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及著作有:梅远谋《国家统销政策与国家银行现金工作》(1953)、漆琪生《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问题》(1955)、程明鉴《四十年来苏联工业管理组织形式及

领导方法的产生及发展》(1957)、陈豹隐《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看法》(1959)、中共四川省委理论小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60)、王永锡、袁文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实质》(1962)、刘诗白《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体私有制经济残余》(1964)等;刘心铨《贸易网统计中关于销售额变动因素问题的商榷》(1954),张学远《农村家计调查》(1955),彭迪先与何高著《货币信用论大纲》(1955),许廷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1957),吴岐山《社会主义工业固定资产的磨损和折旧》(1958),杨佑之《加强会计核算,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1959),王叔云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60),李永禄《试论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1961),刘诗白《农业为基础的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1963)等。

这一期间,四川省学者对外国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主要有:1949年彭迪先出版了《世界经济史纲》,1957年罗志如出版了《资产阶级国民收入理论批判》,1957年樊弘出版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原理的批判》,1957年和1962年宋承先先后出版了《论重农主义》和《资产阶级危机理论批判》,1958年刘絜敖翻译了[奥]卡尔·门格斯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等。

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方面

主要有：胡寄窗于1962和1963年连续出版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两册，胡庆钧连续发表了《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1956)和《再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1957)，杨晓航发表了《对云南怒江区傜族社会性质的探讨》(1957)，此外，周开庆在台湾出版了《四川经济志》等。

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寻找对策方面，各部门及地区经济工作者的贡献甚多。在大量成果中有一些已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内容。四川省中苏友好协会《苏联集体农庄的生产和分配》(1954)，四川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经济管理经验》(1955)，西南农科所农业经济研究室《关于农业社制定工作额和报酬标准的几个问题》(1957)，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论人民公社的积累和分配》(1959)，四川省委办公厅《人民公社调查》(1960)，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把工业生产组成一个整体》(1959)等，均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这一时期内，1954～1957年是四川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比较活跃的阶段，成果涉及面宽、数量多。1960～1964年则是又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探讨比较深入，有些已接触到社会主义经济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1957～1962年，因“反右”及政治运动的影响，经济学研究进入曲折时

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省经济学的研究和探索进入停滞时期。由于学术性的刊物几乎全部停刊，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很少。

(二)恢复与繁荣时期

随着“解放思想”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四川先于全国开展经济改革的试点，四川省经济学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胆探索，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的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是前所未有的。

经济学的科研教学机构发展迅速，各类经济学术团体陆续成立，学术活动非常活跃。1979年，由省社科院、省计委、省物委联合举办了“四川省首次价值规律讨论会”；1980年召开了“全国企业财务体制改革讨论会”；1981年召开了“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讨论会”；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四川省第二次价值规律学术讨论会”，1982年举行了“全国经济效益讨论会”，1983年举行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全国城市工业管理学术讨论会”，1984年举行了“四川省第二次‘除本分成制’理论讨论会”；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学术讨论会”；1985年举行了“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搞活企业理论讨论会”；川、陕、豫三省经济法

理论讨论会”等,经济学界成果累累,其中具有广泛影响和重大贡献的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四川省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起步很早,首先是针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又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作了集中探索。许多研究成果构成了全省以及全国理论与改革政策的重要内容。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李云松《谈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达凤全《论社员家庭副业的客观基础》、唐洪潜《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价格基础》、鲁家果《论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基础》、邹绪昌《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刘政、陈武元《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改革“政社合一”体制的调查》、叶谦吉《试论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宋桂植、章玉钧、虞玉海《四川省广汉、邛崃、新都三县农村经济改革试点调查》、梁与延、刘政《县级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郑景骥《试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客观必然性》、林凌《努力开创社队企业的新局面》、唐洪潜、郭正模《剩余劳动力和非耕地相结合是发展四川农村商品生产的战略重点》、黄荣武《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杜受祐《农村集镇建设的问题与研究》、《多学科交叉小城镇发展规律》等。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国有制企业的改革是四川省经济学界在全国率先探讨的问题。针对1978年就已开始的企业扩权试点经验及问题,一大批富有创建性的作品出现在全国各类有影响的报刊上。林凌、顾宗柁主编《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顾宗柁、何克《自负盈亏是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发展趋势》,冯举、周振华《四川省五个国营工业企业自负盈亏试点的调查》,王德中《企业管理改革》,赵国良、郭元晞《论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关系的二重性》等大量论著,分别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扩权的内容、方向、办法和国有制企业改革的趋势,受到国内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

城镇集体经济政策问题成了经济学界调查研究的重点,其中不少研究成果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采纳。代表性的成果有:郑青、王世雄的《巩固和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调查》,郭建哲的《联系二轻工业实际,对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几点看法》等。

在城市流通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四川省经济学界一开始就注意到流通改革与企业改革的相互促进,主张“搞活流通”、“扩大商品内涵”、“开放经营”、“从建立贸易中心着手,促进流通体制改革”等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政策性意见。姜泽亭、黎雪、汪涤世的《四川商业体制改革的回顾

和展望》,吴园宏、周殿昆等的《试论以城市为中心组织和管理商品流通》,省商品经济学会、省社科院财贸物资所合编的《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论文集》,韩世隆的《关于建立出口商品生产体系的几个问题》等论著。

四川省经济学界较早提出了“企业独立核算、各级分享税收”的分税制设想,提出了“提高银行地位,使银行成为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的主张。反映这些主张的成果有许廷星《我国税制发展方向》,段秉仁、赵志尤《企业以税代利,各级分享税收,是完善分级财政体制的方向》,省人民银行《四川省银行体制改革的实践与认识》,曾康霖《银行体制改革理论》等。

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上,四川省经济学界不仅就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出许多独立的见解,而且在县级计划体制改革上进行了试点和总结。在这方面的众多成果中,顾宗柅《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周春《谈谈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张泽荣《把计划管理的重点由产品管理转为生产能力管理》,四川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理论方法室《邛崃县计划体制改革情况的调查》等具有典型意义。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其它方面,如关于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关于劳动制度改革,关于分配制度改革,关于价格管理制度的改革等,四川省经济学界也颇多建树。其中如林凌《论城市改

革》的系列文章,四川省价格学会编的《我国经济战略转变时期价格问题探索》一书,均受到国内有关方面的重视。

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重要研究成果有:四川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和省计经委合编的《新天府建设方略》,刘清泉、高宇天主编的《四川省经济地理》,顾宗柅主编的《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战略》,赵文欣、王能典、杨忠好撰写的《四川省盆周山区建设的调查》,辛文撰写的《对三线建设的一些认识》,张方笠撰写的《怎样发挥四川经济优势》,《关于四川国土开发战略的几个设想》

除上述成果外,四川经济学界在这几年内还对部门与行业的经济发展,对地、市、县级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做出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例如,在部门及行业经济发展方面,有黄培根、柴敬宗《四川省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问题探讨》,甘书龙、缪元龙《合理利用山地资源,开创农业新局面》,王力行《商业储运发展战略探讨》等。在地、市、县级经济发展方面,有《重庆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提纲》(重庆市发展战略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论成都的经济地位及其发展战略》(成都市社科所经济研究室),《攀西地区近期规划方案》(攀西国土规划课题组)《四川小城镇建设初探》(虞玉海、荀成华、吴翔燕)等。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四川省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和探索有了新进展。韩世隆《八十年代亚太地区的兴起与西欧经济趋势》林大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进程的同期规律在战后的曲折和复归》,四川大学南亚经济研究所《印度经济》,杜肯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经济制度》,王世浚《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浪潮》,罗志如《二十世纪英国经济——

英国病研究》等,分别对欧美、南亚地区经济作了综合的或系统的研究。

同时,四川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很大发展。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专著、译著和工具书。

此期在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有熊甫、裴侗、凌耀伦合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胡寄窗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下),隗瀛涛等著的《重庆开埠史》等。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 著

《川盐纪要》 林振翰著,商务印书馆 1915 年出版,约 40 万字。体例简明,内容详尽,有正文 4 篇,附录 4 编。正文第一篇为四川省“盐务沿革”,主要叙述前清至民国 4 年四川之盐法盐务的体制变化;第二篇为“生产”,主要叙述四川各盐场的分布、器具、物质、生产过程、产品、产量、质量、成本;第三篇为“运输”,主要叙述各种运输办法、运输途径和运输费用;第四篇是“销售”,侧重记述川盐销地、盐价、货币、税收、缉私等内容。附录第一编辑录中外盐政人员的若干呈奏、建议以及上级的批文。第二编辑录民国建立以来有关产运销的各类法规章程。第三编为丛录,着重记述盐务名词、琐闻以及民国二至六年川盐与全国产量、

收支、交税情况比较。第四编为补遗,主要记录盐务管理部门对内实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薪金、请假、以及税率、津贴等。图表部分除正文附录插用的大量表格外,尚有川盐盐场分布、销区分布地理图、盐场照片、生产器具图等近百幅。

《关税与国权》 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 1929 年出版,约 33 万字。细述了中国关税权如何失而复得,论述了关税的特质、海关组织、关税制度等。在补遗部分,又增加了最惠国条款、互惠协定、内地税及附加税、进口税则、关税支付债务、关税收入及国际贸易,以及民国政府与外国所签有关条约文件。该书以制度为经,历史沿革为纬,以档案文件为依据,资料翔实。

《经济学原论》 张与九著,商务印

书馆 1943 年出版 约 35 万字。此书共有 6 篇 35 章。其主要内容为：总论编，概述经济及经济学、财、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的动力、现代经济社会等。价值及价格论为第二编，论述各种价值论、价格形成及变动。第三编为通货论，包括通货的产生、职能、制度、通货价值及信用等内容。生产论为第四编，分述生产、劳动、资本、企业、再生产等。分配论为第五编，主要论述分配的概念、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保险。最后为第六编消费论，内容是消费的概念及类型、经济周期、支出、储蓄、人口论。本书以产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为论述基础，以货财转移与劳力之支配为核心，进而分别探讨经济中最一般的事物及原理，揉合多家诸派学说，是一本基础性的经济学著作。

《货币信用论大纲》 彭迪先著，三联书店 1955 年出版，约 28 万字。主要内容有三大部分：阐明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原理，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本书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信用的本质与职能设有专篇论述，并从理论和实际上探讨了当时苏联和新中国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在当时同类出版物中是没有的。剖析现代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体系及其危机。设专章批判资产阶级货币学说。50 年代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武藤守一博士曾将它译为日文出版。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 王叔云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0 年出版，约 30 万字。该书由 15 章构成，以“研究社会主义农业的经济规律和党依规律制订关于农业经济方针及其实现途径”为对象，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服务”为目的，概述了中国农业经济组织体制的变革与发展；之后，又对农业的投入要素，生产配置及农牧经济分类作了考察，最后两章则是从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再生产环节进行研究的。

《中国经济思想史》 胡寄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1963 和 1981 年分 3 卷出版。全书 3 卷共约 120 万字。该书分为 3 编，上编是先秦的经济思想，又分为三个部分，即春秋以前、春秋、战国的经济思想。作者把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放在封建领主经济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归类和分析。中编包括秦至唐这一时期，又分为秦汉帝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帝国时期三个阶段。作者认为这一阶段经济思想的主流是围绕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兴起和转向下坡路而产生和发展的。下编包括两宋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一大阶段。这里又分为宋元和明清两个时期。清代部分断至鸦片战争前夕。以各种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为中介，分别各人的不同思想和理论观点，表现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由

古及今,由简及繁,反映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此外,同国外经济思想作系统比较,考察中国经济思想的卓越和辉煌之处,也是该书的重要特色。该书80年代出齐后,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高教部已将它作为大学经济系的一门课程。前苏联、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学者也极为重视,分别予以翻译介绍或作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蓝本。

《四川经济志》周开庆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约30万字。全书共3编,分别为总志、地方志、物产志。总志就民国时期四川之面积、人口、农业、工业、贸易、交通等各方面分别概述,共12篇;地方志就各县的自然环境,农业和工业生产等项分别析述,共53篇。反映53个县市,约占当时全川县市的三分之一多。物产志记载较为重要和特殊的产品。主要涉及稻、麦、玉米、麻、棉、丝、茶、酒、烟草、榨菜、花椒、木耳、竹笋、桐油、白蜡、生漆、棕、竹、皮革、纸张、药材、食盐、矿物等,共53篇。该书资料充实、体例简明,对了解1949年以前四川经济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经济史》凌耀伦等著,重庆出版社1982年出版,约42万字。该书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截止于1949年。在体系结构、史料分析、观点概括上均有特色。

《国外货币金融学说》刘絜敖著,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出版,约36万字。为作者对西方古今重要经济学家有关著作研究的一本专著。扼要地介绍了西方各家各派的主要货币金融学说,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给以简要评论。

《四川经济体制改革》林凌主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约19万字。本书共包括15篇文章,其中有两篇为全面回顾四川经济体制改革试验过程的文章,有13篇属各方面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共涉及8个方面的改革,其中有5篇考察工业体制改革,有两篇考察商业体制改革,此外,分别对物资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价格、银行管理体制、建筑管理体制、县级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进行考察的各一篇。调查报告从记载和研究四川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这一历史事实为出发点,系统地介绍了1978~1981年四川经济改革试点的起始和发展、改革试点的内容和作法,真实地反映了试点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同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未来改革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全民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研究》顾宗柞著,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约6万字。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的性质和特点、企业内外的经济关系的改革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工业企业全面经济核算》王德中

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出版,约14万字。该书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宗旨,以如何进行全面经济核算为主线,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企业经济核算的基本理论和作法。为便于借鉴和运用,书中总结介绍了四川某些企业经济核算的先进经验,同时还附上必要的计算公式、应用的记录和表格等。

《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唐洪潜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出版,约11万字,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农业内部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向林、牧、渔业以及向其它非农产业转移。这种转移,对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探讨》蒋一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约29万字。文集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以企业为本位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实行两级分配、改革分配制度,建立与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改革企业领导制度,全面整顿企业、提高企业素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体系。如作者所说,31篇文章中,几乎有一半都形成争论,其中“企业本位论”、“两级按劳分配”问题,企业管理的中国道路问题和企业领导制度问题争论最大,集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此期的重点论题,是一部有代表性的论著。

《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刘诗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简介详见本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

《金融理论问题探索》曾康霖著,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1985年出版,约32万字。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决定货币存在和发展的是否限于物质产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人民币是不是真正的原有意义上的货币,其本质是否是一般等价物;流通中的货币怎样划分层次,怎样考察货币流通是否正常;什么是社会主义资金,银行能否创造资金;怎样看待存贷款关系,银行的信贷能力取决于什么;储蓄与积累和消费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是信贷资金运动规律;如何认识我国银行的地位;银行的业务应该如何发展,经济效益如何考察等问题分别予以研究。

《世界经济与中国》罗元铮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约30万字。该书把中国放在世界经济环境中,考察其联系与变化,探求其趋势和应采取的对策。

二、论 文

《呈请理财折》宋育仁著。这是作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向清廷提交的策论。请准民间开矿、铸币、开办银行。发行钞票。在这四者中,文章认为应先开矿,然后铸币和设行并举,最后发行钞票。

《论 校邠庐抗议 》 刘光第著。文章约 7 千余字,写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该文除有简短的弁言外,其余均是对《抗议》的简要看法,共 47 项。涉及经济性政策的 20 多项,主要有折南漕议、利淮盐议、改土贡议、罢征关议、节经费议、筹国用议、杜亏空议、兴水利议、均赋税议、重酒酤议、一权量议、稽户口议、崇节俭议、寓兵于工议、通道大江运米运盐议、垦荒议、稽旱潦议、改河道议、劝树桑义、用钱不废银议等。作者的经济主导思想是去除明显的损民经济制度恶习,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充实国力,以对抗侵夺中国权益的帝国主义。此文载于宜宾俚峰书屋所刻《衷圣斋文集》。

《自流井记》 李榕著,载《十三峰书屋文稿》第一卷。该文写于清光绪年间。以记叙自贡井盐的开凿、生产为中心,而对技术经济问题记载颇详,具有极高的经济史料价值。该文仅 2600 余字,提供的经济实况有:盐井的一般管理组织形式、盐井的单个规模和矿区规模,盐井的日产量,盐井的经济寿命,盐井的投资费用,井盐的市场范围,井盐与军费、税收的关系,围绕井盐生产的相关产业,井盐生产单位内部的分配关系等。

《为川汉铁路当先修成渝段谨告全蜀父老》 思群著,载《四川》杂志 1908 年第二期,约 6 千字。该文认为应先修成渝段。理由是:从发展经济考虑,先

修成渝线能见显效;从工程难易考虑,先修成渝线能获成功;从工程耗费看,先修成渝线耗资较小;从营业效果看,先修成渝线可以以路养路;从抵御外国侵略看,先修成渝线可以保有路权;从发展交通看,先修成渝线可以积累资金,兼营航运。后实施方案与该文所论相同。

《综论战后中国的土地问题》 刘光华著,载《四川经济季刊》1944 年第一卷第四期。约 1.8 万字。文章认为,无论就当代世界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论而言,还是就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实行土地国有是必要的。实行土地国有,应分后方或收复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实行土地国有将有利于粮食生产、财政增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复员人员的安置。文章明确反对私有和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但主张和缓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抗战结束期之四川工业》 刘敏著,载《四川经济季刊》1945 年第二卷第四期。约 1.2 万字。该文有四个部分,文章认为,战后由于国民政府另有政治军事目的,四川工业在资金、原料、运输、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将在临严峻形势;为此,除政府应在政治上采取和平民主措施和继续扶持四川工业外,工业界也应积极促使政府实行和平政策,并努力克服眼前困难,以使四川工业不致随抗战结束而衰落崩溃。

《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与国家银行现金工作》梅远谋著,载《教学改革》1954年16期,约6千字。该文认为。统购统销是由国家“包做买卖”,它消除了资本家的中介,计划代替了盲目的价值规律,有利于稳定和鼓励生产,国家领导了市场,因此价格政策要为统购统销服务。统购统销必然使现金投放集中,而回收缓慢,影响银行收支平衡。为加速货币回笼,第一应积极组织商品供应农村销售;第二应在收购时及时组织储蓄;第三应积极回收到期农贷。此外,在统购时要改变银行给收购部门透支、垫付;统销时,应加强对代销商的现金结算。统购统销需要提高现金管理的计划水平。国家银行应通过信贷计划编制现金计划,掌握货币发行及流通,为稳定市场和发展经济服务。

《对材料核算中计划价格与实际价格运用的一点体会》夏轻舫著,载《教学改革》1954年第18期,约3千字。文章认为,在成本核算中,材料的日常核算采用计划价格,是苏联的先进经验,标志着核算水平的进步。但是,在对低值易耗品的核算上,我国采用实际价格,而有别于苏联,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我国工业企业所需低值易耗品相对较少,运用实际价格进行计算,不会增加明细分类核算的困难,易于对计划价格与实际价格进行调整。在分期摊销的情况下,反而更方便真

实。

《四十年来苏联工业管理组织形式及领导方法的产生及发展》(1917 - 1957)程明鉴著,载《财经科学》1957年第三期,约6.4万字。为学习苏联经验而作。文章包括三大部分。第三部分结论,集中论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业管理组织的基础作用、技术与干部、节约制度及物资利益原则、民主集中制、矛盾的性质及解决矛盾的方法、党的领导等问题。

《四川地方工业的发展情况及其今后发展方向的意见》吴岐山著,载《财经科学》1957年第2期,全文约5.7万字。文章共三个部分。用统计报表的形式对四川地方工业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对四川工业基础差、技术低、产量低、分布不平衡的特点进行了描述,但也指出四川资源丰富、销售市场大的发展潜力及优势。第三部分对四川地方工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

《对云南怒江工区傣族社会性质的初步探讨》杨晓航著,载《财经科学》1957年第三期,全文约5.4万字。对傣族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除总结论之外,尚有许多中间研究成果,如傣族为什么在历史上不断迁徙;它的生产力水平受什么原因影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怒江区傣族社会土地占有形态有哪些具体形式。以及为什么说小农经济在傣族社会经济中已占主导地

位等。由于文章占有大量翔实的资料,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方面说明问题,因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本建设投资包干的形式问题》张国干著,载《财经科学》1959年第二期,约1.4万字。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投资包干制度是表现社会主义财务关系的适当形式。实行“三包”、“四责”、“六权”为主要内容的投资包干有利于改变以往集权较多、一事多主、手续繁琐的状况,有利于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二部分就四川省当时所采取的三种主要包干形式为对象,详细分析了其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权责关系、建设过程的管理组织以及包干基数确定上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改进工程投资外包形式的建议,主张甲乙既要统一建立工程领导机构;又要明确权责,以工程预算双方建立包干基数的依据,取消甲方包干乙方上缴任务的作法,让乙方包干完成,自理盈亏;双方内部则要层层包干、面面包干,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地完成任务。

《加强会计核算,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杨佑之著,载《财经科学》1959年第四期,约4000字。该文是四川财经学院第二次科学讨论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中推荐的优秀论文之一。文章的中心论题是论述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

规律的存在及会计核算的作用。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了会计核算不能缺少的。会计核算有两项主要作用。第一是加强成本核算改进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的重要手段;第二是反映生产中各种劳动消耗和补偿,确定企业盈亏的依据。会计核算作为一种经济管理工具,不论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阶段二者密切相关,会计核算必须利用价值及其表现形式。

《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邹绪昌著,载《财经论丛》1979年第一期,全文约6000字。文章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实现现代化必须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然而由于资金、物资、器材缺乏,所以通过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袁文平著,载《财经论丛》1979年第二期,约9000字。文章由三节内容组成。第一节论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客观必要性,认为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决定了计划经济客观存在,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成熟性、各不同经济单位与个人利益的差别,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存在,故二者必须结合。第二

节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及作用,特点有五:公有制为基础,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交换对象只涉及产品,竞争目的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结合的意义在于:能使供求见面,双方满意,促进经济核算,调动各方积极性等。第三节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是,两者应服从统一计划的指导,都按社会主义规律体系办事,在完善法制、合同等条件下结合运转。

《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李道南著,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5期,全文约9000字。文章集中论述以下3个观点: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商品生产的经济,由于要独立核算,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单元等原因,竞争必然存在。竞争是商品经济运动的规律,应该认识它、运用它。竞争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它有助于加强经济核算,有助于企业改变经营思想,搞好技术革新,有助于改善企业同消费者的关系。社会主义竞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并受计划指导的竞争,不应把它与资本主义竞争混为一谈。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企业中实现的形式和特点》姜凌著,载《光明日报》1980年7月26日4版,约4000字。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经常出现一些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现象,原因在于企业既有反映全民利益

的一面,也有反映地区及企业利益后面,它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也只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此,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企业中的实现,必须既为社会提供使用价值——实物,也为社会提供价值和利税;既要满足国家计划要求,也要满足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在企业内部则要体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的正确结合。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若干特点》周振华著,载《经济研究》1980年第八期,约9000字。文章认为:实现现代化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变国家经济技术落后状态,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由生产技术基础、制度、人口、地理环境及人们对规律运用程度所决定;中国有优势有弱点,我们应发挥优势、取长补短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应把人口多,耕地少作为规划现代化蓝图的出发点;要分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农业要走集约化、机械化半机械化和手工劳动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并举、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工业要走大中小企业并举、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并举、各层技术并举的道路,实现我国现代化既应发挥资源优势又应讲求经济效果;要按农、轻、重次序调整结构,安排生产;要利用当前时机积极利用外资和技术。尤其要深入认识现代化规律,充分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人民才智。

《对三线建设的一些认识》 辛文著,载《计划经济研究》,1982年第八期。文章认为,三线建设不能否定。因为历史地分析,建设三线是根据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决策的;是改善国民经济布局的重大步骤;在效果上也达到原定设想,对四川省及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对三线建设的正确态度应是认真总结经验。就教训看,三线建设决策过于匆忙,规模过大,内容过多,搞得太全,要求过急,缺乏综合平衡、全面安排,以致挤了农业、轻工业、能源和人民生活,这些教训应该吸取。为此,应调低重轻比例、调整好产品结构、搞好企业整顿、改善工业组织结构、搞好管理体制改革和充实、弥补、完善三线企业的缺陷,充分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

《国营企业财务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许廷星著,载《四川财经学院学报》1981年第一期,12万字。文章回顾了30年来国营企业财务体制的演变,指出多年来国营企业实行集中核算、统负盈亏体制。财权过于集中,企业缺乏积极主动性,行政办法管理效率低下,不利于经济发展。文章认为,财务体制改革既不能走高度集中的路,也不能高度分散,而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给企业以相对独立的自主权。”企业应有一定权力参与利润分配,要使职代会真正具有管理和监督生产经营的权力。最后文章认为,随着改革深化,企

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体制必然到来,那时初次分配及再分配关系将发生根本变化。若企业资金来源实行全额信贷,企业创造的净收入应有个合理分配比例。为此应抛弃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国家集中积累过多和过少的问题,大体参照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积累消费比例,按行业、部类加以调整,确定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比例,一定几年不变,以促使生产发展。

《商业企业的经济效果》 程荣国著,载《财贸经济》1981年第六期,约6000字。该文有三层内容。第一层讲提高商业企业经济效果对于增加国家积累、促进生产发展、满足社会需要、改善企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层讲评价商业企业经济效果具有五项主要指标,包括商品销售额、劳动效率、资金使用效率、流通费用额和费用率、利润和利润率;分别介绍了它们的计算方法。第三层讲提高效果的四项主要措施,包括组织好货源,扩大销路;改进劳动组织及管理;加速资金周转;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使物质利益与经济效果好挂钩等。

《科学社会主义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吴敬琏著,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四期,约12000字。文章认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较之资本主义有巨大的优越性,但行政集权模式并不

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唯一的和最好的模式,在计划经济中包含市场机制的体制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比走资本主义具有优势性,但它们往往因强制“实施”社会主义,给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这种强制实施思想来源于农业社会主义,它不仅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甚至比不上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农业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有密切联系,封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没落的地主贵族的权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对发展生产力、主张用专政办法发展经济、反对商品交换、按劳分配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主义主张。因此,清除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是促进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的任务之一。

《线性规划在财会管理上的应用》 黄浔著,载《四川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五期,全文8500字。文章认为,提高企业财会管理水平,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以往的财会管理大多谋求资金利用效果的逐步改善,而在方法上多限于资金费用的平衡和控制,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被动性。为此有必要引入运筹学中的线性规划法,谋求效果最优化。文章的中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层次:介绍线性规划的原理和基本运算步骤;举例说明线性规划在财会管理中的一般运用及三种不同的求解方法;提出在财会管理中应用线性规划时需要注意的三

个问题:关于目标函数极大值和极小值的转换问题;关于建立条件方程时松弛变量的引入问题;关于变量确定及基本可行解替换演算以求最优解问题。

《正确认识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实质》

赵国良著,载《经济问题探索》1982年第三期,约5600千字。文章对“落实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和“进一步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落实经济责任制的关键在于把各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加以具体化和制度化。把工业经济责任制仅仅理解为“利润包干”是不完全的,也是背离推行这项制度的本来目的的。不论任何企业,首要责任是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在分配制度上要使报酬与责任挂钩。如果内部责任不清,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工业经济责任制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权责利相结合的一种生产经营制度。“责”是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实质和核心;“权”与“责”相适合,是完成责任的保证;“利”与“责”挂钩,是企业完成其责任的经济动力。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

《对利改税的几点认识》 杨希闵著,载《财经科学》1983年第二期,约10000字。认为“利”和“税”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但在公有制条件下有其共性。推行“以税代利”对于搞活企业、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均有极大帮助。

实行“以税代利”宜分两步走,即先由税利并存,再过渡到全面以税代利,其条件是要使价格体系基本合理;在课税时,宜尽快完善税法及细则;要准确划分所得额、合理确定税率,在保证财政收入和有利调动企业积极性前提下,要分部门、地区、产品具体确定,并逐步一户一率走向统一税率。最后,文章指出“以税代利”这一改革不会改变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

《四川省经济预测实例集》1984年集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经济信息预测中心编,1985年1月。本书共选入40项预测实例,大都是某种产品的需求或销售预测,此外还有省工农业总产值预测,社会商品购买力投向预测等。选入的经济预测实例都是我省一些部门、地区、企业已预测的课题,有的已得到实践验证,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农业科技工作的经济评价方法》林世铮编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本书是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处主持下完成的“农业科技经济效益计算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编写的。本书提出一种简明适用、适合国情的农业科研经济评价方法,明确了有效使用面积、有效使用年限、单项成果的单位面积效益值、科研费、推广费及新增生产费等基础数据的概念,以及新增总产量、新增纯收益、科技投资收益率、科研投资收益率等主要经济评价指标,提出了进行经

济评价计算的五个步骤。

《当前税收制度与税收理论建设》左治生著,载《四川财政研究》,1985年第九期,约4000字。所得税的多税种、多次征、多环节的复税制体系。由于税种增多,税收调节经济范围增大,带来新的矛盾,为此必须考察确定中国应取的税制模式。世界上税收制度有三种模式,即所得税为主模式、流转税为主模式及“避税港”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兼有其它税种的体制是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但应注意各税种的协调配合。关于税收理论建设,认为应着重加强税收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研究税收经济杠杆作用。这样才能使理论和实践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实现经营现代化应注意的几项工作》

吴世经著,载《经营管理者》1985年创刊号,约4000字。文章指出,重视信息管理是经营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因为决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关键,好的决策必然来源于高质量的信息,为此必须设立得力的信息渠道,加强信息的搜集、筛选、处理和分析工作。加强市场经营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了市场研究与预测、选择目标市场、产品开发、产品项目的综合平衡、包装、商标、食宿、运输、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因此是联系企业和市场的生命线,必须改变以前那种重产不重销的观点与作法。实现经营现代化

还必须加强产品开发。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产品及技术更新速度空前加快,为此必须抛弃死守老产品、老技术的观念与习惯,组织企业内外科技力量,不断开发新产品与新技术。只有立足于上述三者的加强或“转轨变型”,四川企业才能有光辉的未来。

《关于指导性计划的几个问题》雷起荃著,载于《财经科学》1985年第四期,约8000字。文章认为,指导性计划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观念,突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是独占地位的观念,强调增强企业活力,按价值规律

管理,这使它具有特殊重要性。指导性计划的实质是国家运用经济杠杆、法规和政策,通过分配财力、物力,尊重经济单位的权益,对国民经济方向、目标、速度等进行精线条协调的计划形式。既不同于指令计划,也不同于市场机制。实行指导性计划的环境和条件除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外,还应有市场、货币投放回笼,财政补贴、外汇、投资等配合。编制指导性计划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应充分重视信息、预测和综合平衡。在程序上大体也要经过上下、下上等反复平衡和批准下达。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陈豹隐(1886~1960) 生平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他在经济学方面著述甚多,早期出版的著作有《财政学总论》、《地方财政学》、《统计学》等;能集中体现其经济思想的著作则有《经济现象的体系》、《新政治学》、《科学的社会观》以及论文《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

杨佑之(1893~1971) 原名杨宽德,生于江苏南京市,祖籍湖南长沙。1919年北京大学商科毕业,先后在北京尚志商业专科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28~1935年先后任教于北京中国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北京朝阳学

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商学院。1936年应邀到四川大学讲学,先后任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华西协合大学经济系和成华大学会计系主任。

撰写了《会计学》、《会计学纲要》等著作,并于1945年自办杨佑之会计事务所,受理民间会计事务。1952~1971年在四川财经学院任教。撰写了《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会计报告分析》、《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等10余部重要著作和教材。

李孝同(1893~1969) 曾用名李光忠、李会忠,贵州省贵阳市人。1919年

毕业于北大,1920年赴美,在加州伊里诺伊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先后在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北京政法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四川三台东北大学、贵州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四川财经学院任教授。译有《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

梅远谋(1897~1980) 原名梅一略,曾用名梅楚翘,湖北省黄梅县人。早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32年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经济学硕士,南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7年归国后历任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云南大学、重庆相辉学院、西南革大、四川财经学院教授、系主任及云大文法学院院长等职。对货币理论有较深的研究,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在法留学期间发表了《中国的白银外流与货币危机——驳国际经济关系均衡论》。50年代后,发表了《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与银行现金工作》、《农村金融工作与农业合作化》、《从自贡市商业信贷试验田看商业信贷工作的方向》等论文。

刘心铨(1903~1983) 四川省富顺县人。1924~1929年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当研究生,同时兼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大学等大学的讲师。1941~1949年除在湖南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任

教授外,还搞实业。1951~1953年在西南财委统计处任职,1953年初到四川财经学院任统计系教授,写有《统计系目前情况及今后努力方向》、《贸易网统计中关于销售额变动因素问题商榷》、《典型调查在统计工作中的作用》、《社会经济统计学与其它科学的关系》等论文。

程英琦(1908~1985) 原名程德泰,四川省涪陵县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1933~1934年任北京中国大学商学院讲师兼任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教授,1934~1938年到英国留学,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同年回国。1939~1949年,先后在光华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川康农工学院等校任教授,1950年到1952年分别在上海光复商专、杭州之江大学任教授。1952~1954年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4年调任四川财经学院教授。参加编写《中国金融辞典》。

高成庄(1917~1984) 四川华阳人,1938~1939年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大化学系读书,1939~1943年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1949年在川大经济系任助教。1952年调入四川财经学院任副教授。著有《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一书,写有《试论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对象》等十多篇文章,对工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工业生产指数和工业产品价格指数等问题有系统研究。

第十二章 政治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近现代四川政治学研究与发展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伯吉斯(John William Burgess, 1844~1931)创立第一所政治学研究院和《政治科学》季刊。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

(一) 传入时期

1897年10月宋育仁在重庆创办《渝报》,1898年5月在成都创办《蜀学报》,编印《蜀学丛书》、《法意钞案》,介绍英国议会章程、法律制度,并主持翻印《法意》等书,政治学理论首次传入四川。

1903年4月,邹容发表《革命军》,提出了较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为“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诞生而大声呐喊,为辛亥革命前重要的政治学论著。同月《广益丛报》在重庆创刊。该刊第34号(1904年4月25

日)刊登了署名“中国之新民”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按:此文即1903年10月《新民丛报》38~39期载梁启超的同一文章。伯伦知理,即德国海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Johana K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这是在四川最先介绍西方政治学的文章。1921年5月,重庆“20世纪社”出版《渝社丛书第一种》,即徐苏中译、俄国P.克鲁泡特金著《国家论》。这是目前发现的在四川出版的第一部政治学译著。书末有译者评语。

1912年在李宗吾在成都《公论日报》连载《厚黑学》名噪一时。文笔犀利,讽刺辛辣,被誉为“不可多得的奇书”,海内外流传颇广。

1922年12月,吴虞著《荀子之政治论》,译为日文,载于日本《支那学》3卷4号。同年,宋育仁著《政治学讲义》。

1923年6月,谢无量为《国学小丛书》撰写的《古代政治思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概括汉以下古代政治思想,言简意赅,自成一家之言。

北伐战争前后,各种政治学说竞相涌现。孙倬章发表《中国的难题怎样解决》(1923)、《地方自治救国论》(1926)、《中国改造论》(1927)、《非国家主义》(1928),阐述他的政治主张。潘大道于1926年4月发表《新国家观之一》和《国家社会主义释名》。李正谊著《新中国缩图》(1926),戴季陶著《三民主义的国家观》和《国民主义的一般意义与时代背景》(1927),李璜发表《国家主义正名》(1924)、《释国家主义》(1924)和《国家主义浅说》(1927),曾琦《国家主义者之四大论据》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1928)。同时,重庆《新蜀报》翻印发行恽代英的《政治学概论》;陈豹隐著《新政治学》,1929年8月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这是四川省学者发表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他的《现代国际政治讲话》,1929年由北平好望书店出版。由成都艺权书社石印并署名周择编述的《政治学》上卷,也可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1905年,由川督锡良倡办的“四川法政学堂”成立,设有政治科。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于1908年开设政法专业。1925年6月创立的国立成都大

学,设有政治学系。1927年8月,由五所专门学校合并成的公立四川大学,设有政法学院和政治学系。这是四川最先以政治学为专业的一批公立院校。在此期间还有一些私立学校先后建立法政专业。

(二)发展时期

本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反动,以及苏维埃制度的巩固和苏联建设的成就,国内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较量和斗争,全民抗战的兴起,在政治学研究上形成若干特点。各种政治学说趋于定型,争论十分激烈;政治学各分支学科基本形成,研究成果累累,真知谬说同在;众多大学内迁,政法院系增多,客籍川籍学者济济一堂,精芜并存。

1932年9月在南京成立了民国时期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国政治学会”。1945年8月,在成都成立了“四川政法学会”。

1. 政治学说的论著 孙倬章1932年3月自费在上海出版《怎样干》,书末附录《致中共中央执委的两封信》。作者总结一生的经验教训,“认定中国革命,只有布尔什维克一条路可走”。傅于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1932)、《国民救亡政治知识》(1937)、《汉奸的产生和扑灭》(1938)也相继问世。特别是他的《民主政治与救亡运动》(1938)。阐释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论及其与抗日救亡的关系,同中国共

产党当时的政治主张相一致。梅养天译著、宋式一编校的《民主与独裁》(1938),马哲民的《大学月刊社论集》和《论民主问题》(1944)以及署名一鸥的《我们为何要实现民主政治》(1944),邓初民的《民主的理论和实践》(1945)和《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趋势》(1946)等,译述论著是倾向民主主义、接近或赞同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

与上述政治倾向的著作相对立的,是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众多小册子。如:四川大学教授张云伏的论文集《惊涛骇浪中的中国》(1938),张铁君的《民生主义论战的总清算》(1938),朱木铎的《民主共和国与宪政前途》(1940),陈振的《马列主义与中国》(1941),吴曼君的《一个政府一个党》(1941),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1943),叶青的《中国只需要三民主义不需要别的主义》(1943),崔书琴的《全民政治与议会政治》(1944),孔庚等合著的《统一与民主》(1945)。此类著述其政治宣传色彩重于学术研究成分。陈之迈的《政治学》(1941),杨幼炯的《政治建设论》(1942),罗梦册的《中国论》(1943),陈伯骥的《中国民主政治原理》(1946),以及黄忼华的《政治学荟要》(1946),属同一政治倾向,但有较高学术水平。

此期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出版了一批政治学的小册子,主要有:邓燮薰的

《政治常识》(1936),岑大龄的《政治学教程》(1937),陈颐庆的《政治学概论》(1944)和黎盛东的《政治学教程》(1947),体系上皆因袭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内容上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寥无新意。但陈著在论及“苏维埃制政府”时认为“是帝俄革命后产生的一种新国家体制,其最终目的在实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想”。

介于上述两大营垒之间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有:张克林的《中国生存论》(1936),该书副标题“中国策应远东钜变之经济、政治、军事的战略战术”,客籍学者梁漱溟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1937)(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黄炎培的《中华复兴十讲》(1944),张申府、刘清扬等人合著《民主与宪政》(1944),张雪岩的《论两党对骂》和曹伯韩的《民主讲话》(1947)均属民盟一派主张。吴恩裕的《民主政治的基础》(1944),尤亚贤译[捷克贝恩斯(Edruard benes)]著《民主政治之现在与将来》(1944),则属于学术性较强的理论著作。

2. 政治思潮及其历史的著述 张克林的《法西斯主义论》(1932),潘大逵的《近代政治思潮》(1934),王嗣鸿的《独裁政治的理论与实践》(1936),张克林的《现代政治思潮》(1936)。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32),成涤轩的《尚书与古代政治》(1943)。詹文浒的《现代政治思潮》(1943),浦薛凤

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上册(1944),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戴克光译〔美吉达尔(Raymond G. Gettell)]著《政治思想史》(1944),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45),孟云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杨幼炯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潮论》(1945)和陈觉玄的《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1945)等。

3.政治史的专著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1940),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42),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3),均属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

4.政治制度的专著 钱端升主编的《民国政制史》(1939),罗志渊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1943),曾资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4册(1943~1944),沈乘龙的《中国现行政治制度》(1944),杨熙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史》(1946),施养成的《中国省行政制度》(1946),程辛超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1948)等。这些都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进行研究的专著。

研究外国政治制度研究的译著有:姜季辛的《日本地方行政概观》(1942),俞宝书译、〔布累提(Robert A. Brady)]《德国法西斯制度之研究》(1942),刘乃诚主编的《各国地方政治制度——英吉利编》(1943),刘乃诚著的《比较政治制度——英国政治制度》(1946)和张国安的《美国政府和政

治》(1945)等。

5.国别政治研究的专著与译著 国别政治研究的重点在原苏联和日本两大邻国。主要有:

沈天泽著《苏联的现势》(1936),邹韬奋译、〔英国斯隆(Pat Sloan)]著《苏联的民主》(1939),王守伟的《苏联的认识》(1941),魏敬译、〔美籍俄裔辛都(Maurice Hindus)]《苏联的新面目》(原名《Mother Russia》)(1945),以及端木琦译、〔英国杜勃(Maurice Dobb)]《苏联概况》(1945)等。

由《大公报》等报刊的社评和胡秋原、张国安等的署名文章及译文汇集而成的《中日战争中的日本政治》(1938),杨玉清的《日本国情讲话》(1939),李执中著《二十年来的日本》(1942)张友渔著《东京的统治者——日本现政权研究》(1944),韩幽桐译、〔日本平野义太郎]《日本民权运动史》(1944)等。

还有颠公译、〔英国 H. Sellon] 1934年著《德意民治失败与独裁成功之原因》(系原书《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之第二章,1938),金奎光著《朝鲜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40),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政治组研究员黄觉民编辑的《印度和缅甸》(1942),上官清编译的《战时美国的民主》(1944)等。

6.行政和人事管理的著述 其中学术性较高的有:李桐冈的《行政效率学

概论》(1942),富伯平译、〔美国普菲诺〕1935年著的《行政学》(1942),张金鉴的《行政管理概论》(1943)和《各国人事行政制度概要》(1943),王世宪译、〔英国戴乐(H.E.Dale)〕《英国高级文官》(《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of Great Britain》)(1944),张金鉴的《人事行政原理与技术》(1945),富伯平的《行政管理》(1945)等。

抗战爆发后,大批高等院校纷纷内迁,政治学专业的大批教师学者云集成渝等地。他们政治倾向不同,理论体系各异,政治学研究空前活跃。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正阳、辅成等法学院校都设有政治学系,重庆大学1947年增设法学院。当时政治学系一般必修和选修课程约20多门,除政治学概论外,大体分四类:制度类:中外政治制度、选举制度、政党等。史类:中外政治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宪法、法制及外交史等。行政管理类:行政学、文官制度、市政学等。国际关系与外交类: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与条约等。

二、当代四川的政治学

(一)停滞时期(1950~1978)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政治学专业被撤销,停开政治学课,从事政治学的教师学者几乎都改行。

此期政治学研究主要是在注释革命导师著作。傅于琛的《大众政治学》

1949年9月由上海书报杂志社联合发行所出版,1950年5月和1951年3月连续再版,成为这一时期仅有的成果。

(二)恢复和重建时期(1979~1985)

1979年3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政治学研究走上重建之路。

1980年12月,邓初民任名誉会长,张友渔任会长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四川省潘大逵、岳晓、杨永敬、刘真嘉等与会并被选为理事。1982年,西南政法学院建立政治学教研室,各系把政治学概论列为必修的基础理论课。同年,西南师范学院政教系改为政治系并设政治学教研室。1983年省社科院成立政治学研究所。1983年11月,四川省政治学会成立,有会员200余人。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开始招收政治学研究生。同年,四川大学法律系恢复政治学课程,并负责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目《国际政治》的教材编写和辅导。1985年,四川省财贸行政管理干部学院成立。四川省政治学研究机构和政治学课程逐步恢复,专业队伍开始重建。

1983年省政治学会成立大会后,辑成出版了《政治学文集》。客籍学者丘晓主编的《政治学原理》1984年12

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万余册。李世平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

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

第二节 主要著作选介

《古代政治思想》谢无量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6月初版,约23.4万字。全书含4章和结论。第一章把古代政治思想“分为南北两派”和“非南非北的折衷派”。“北派以孔子为宗”“人为主义”“政见多依据德性上的感情”,强调执政者“人格教令”的“感化”作用;以儒家为正宗,“孟轲荀况”虽小有出入,无碍大体。“南派以老子为宗”“自然主义”强调“为政者祇在因势利导”“以道家为宗”纵横、申韩、许行都“出于老子”。墨家和名家属折衷派。墨家“见识”“学问卑之无甚高论”。名家“诡辩小巧”“美而无用”。第二、三、四章分别阐释了这三派的政治思想。结论概述了汉以后古代政治思想,认为“汉兴,独尊孔子,南派渐衰”,但从淮南子直至六朝“嵇阮、何、王尚是南学余绪”。“唐宋以来,儒教益盛”“程朱发挥北派政治思想”“明清学者都讲究北学。”作者把“北派”比附为“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表面较为美观”,南派则是“较为切实”的“唯物史观派”;儒家“近于社会主义”,道家“近于无政府主义”。

《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著,

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练部1927年4月再版,约1.04万字。作者认为“造成国家力量的基础是建筑于武力上面”,“用武力、霸道的便是国家”。而“民族是以文化为基础,是在同一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构成的”。现在中国对于救国运动,有二个不同的主张与观念,一个是三民主义,一是个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只有一半的道理,“即只‘要自己独立得到平等’;不要人家独立,不许人家平等”。作者自诩“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它的“国家基础,第一不是以一民族压迫统治他民族的,第二不是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的,第三不是为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负担增进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责任,即是要替人民谋生产之增加,谋分配之适宜的。这三点是我们救国的本义”。

《新政治学》陈豹隐著,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8月版,约10.9万字。全书分上下两篇,用98个问题,以问答式展开论述。上篇题为“政治现象的体系”,共6章。作者认为政治是人类“关于强制权力”的生活。“具有强制权力的团体”,“最主要的就是国家”。强制

权力目的就在“经济利益的有秩序的取得”，不是在“谋自由幸福或一般利益”、“增加人类文化价值”、“处理共同事务”和“维持法律”。政治现象就是没有权力的“被治阶级”和保有权力的“治者阶级”之间的“冲突”；“武力暴动和革命战争”。作者反对国家三要素的传统学说，而只把土地、人口和财富视为“政治现象的基础”。该书指出，“政治学是研究人类在政治生活上的相互关系的学问”，它包括政治科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营学。并指出现代政治学分为资本主义政治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学。陈豹隐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现象是“人类的进化历史的特定阶段”，伴随着阶级和国家才发生的，是“最有历史的根据，最近科学真理的学说”。并批判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和“君权神授”等观点。作者指出现实的民治政治包括资产阶级的民治政治，无产阶级的（渐进和急进的）民治政治；“渐进的无产阶级民治政治”即“国家资本主义”，而“急进的无产阶级民治政治”即“国家社会主义”，而两者“原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的桥梁”而“现今俄国所实行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该书用“统治主体”和“统治样式”的概念，指出当时流行的把君主国与民主国的区别看作即“国体”和“政体”的区别是“表面的”，“并不足以说明统治

主体的实际的真相”。作者把“斗争和互助的原则”称作“人类生活的原则”，并批判“主张单一原则的人们都未免偏执一方，未能理解人类生活原则上的辩证关系”。该书下篇题为“政治现象的解剖”，共四章。作者认为政治权力从“发生”到“固定化”、“神圣化”和“人格化”，直到最终“社会化”，即“全社会变成没有权力没有政治的更高级的社会”。“一切社会现象都有发生、发展和消灭”；“变动都是有特定的原因，并不是偶然的”；“原因……含在现象的本身当中”；“现象中所含的矛盾，……互相冲突……使矛盾变成……统一”；“社会现象的统一都包含着新的矛盾……构成川流不息，时时变动的社会现象的洪流”。这是作者据以解剖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则。

《怎样干》孙悼章著，社会科学出版社1932年6月上海版，约25万字。本书有序言、十五章和两篇附录。作者自称“积十余年的研究和经验”；“认定中国的革命，只有布尔什维克一条路可走。”本书全面系统阐明了作者对中国革命的政治主张。关于中国现阶段革命，作者认为“只能提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现在所有农民的一切问题，均在于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废除土地的私有制”。解决办法是“将地主的土地

无偿地没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农民，由农民的小耕作为过渡，以教育的方法，引导农民进行社会化的生产。”作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政党分析后指出，统治阶级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大批无耻吃党饭的党官”，他们“不断的混战”；“加紧剥削和压迫全体民众”，“拱手出卖东三省”罪恶“罄竹难书”。“国民党已成为纳垢藏污之所”，将来民众的革命胜利后……“应受到民众的裁判和处罚”，“资产阶级在统治权上只占附庸地位”，“社会民主党”、“国民党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属小资产阶级并予以批判。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抱定一定的主义，自己牺牲一切，在那里拼命的奋斗，……完全在谋全体工农群众的解放，确能受工农群众的拥护”，但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本的理论上和策略上……，且或有违背布尔塞维克精神的地方”；“现在的行动，略有近于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的行动”，并说，“它必须反对过去那种偏重农村的策略，集中于中心城市的工作，然后才算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附录的《致中共中央执委诸先生》的两封信中，作者主张在“九·一八”事变后，“应暂时放轻国内阶级斗争……竭尽全力于反日帝国主义”。

《近代政治思潮》 潘大逵著，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 10 月再版，约 11

万字。全书 9 章。在第一章中，作者把政治思潮界定为“政治学者根据历史与经验或个人理想而对于国家及国家的重要问题，有一种根本的主张或哲理的解释”，它的“对象或中心目的物就是在国家”。第二章回顾了从古希腊罗马、经中古至十五六世纪的政治思潮。以后各章依次介绍了“契约学说”、“理想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塞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诸种政治思潮。在社会主义一章，作者肯定“马克思同恩格斯是大家公认为科学的与革命的社会主义领袖，而现在世界各国可以说无处没有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列宁是马克思的忠实信徒”；“现在苏联……教育进步，生产发达，人民多乐于工作，”“不像从前……都是为资本家谋利益，”但又认为“俄国现在的制度还是一个过渡的制度”；“或者这个过渡竟成了不是过渡，而成为一个止境”；“只好让真正的马克思信徒再起来革命”。作者认为，法西斯主义“拥护独裁，反对民主”；“维持资本制度”；“反对社会主义。”而在“习于专制”、“教育程度幼稚、民主政治思潮薄弱”的诸如意大利和德国；“比较容易成功”，而在“民权发达”的英、法、美等国则“必不易于成功，恐反有失败的危险”。

《现代政治思潮》 张克林著，成都新新印刷社 1936 年 9 月初版，约 3 7 万字。全书有 6 章和结论。第一章中，

作者划分了思想与思潮的区别,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资本主义、布尔塞维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特克诺克拉西(Technocracy)等四种政治思潮。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以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为目的的社会制度。”政治思潮便是民治主义或议会主义的。布尔塞维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民主制”,是“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者肯定布尔塞维克革命成果,并预言“苏俄在未来的大战中,一定会大显身手,使资本主义国家震恐的”。作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国家至上主义和政治万能主义”,绝对排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行动”,否认“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它产生的“客观条件”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社会基础是“介于劳资两阶级间的一些社会层”,使命是“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希特勒上台,“全世界人都看作是未来大战的导火线现象”。“特克诺克拉西政治的思潮”“主张生产统制,并将生产组织操纵在科学者手里”种种方案“理想成分太重,实行颇感困难”。作者在“结论”中认为“环境产生主义,不是主义产生环境”,而“特定的环境产生的某种主义,不能完全适合于其它的环境”,因此上述四种主义“统统不可以像商品一般地舶来中国”;中国本身应有特殊地

适合于自我需要的主义。中国需要的是三民主义。”

《印度与缅甸》黄觉民编,延安新华书店1942年6月版,约21.5万字。该书分上下两篇,各9章。编者自称系根据“九分材料,一分分析”的要求,分别收集了当时两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诸方面的材料编辑而成。“例言”指出:“材料来源全系采自国内外各种报纸、定期刊物及书籍,故文字之立场与主张颇不一致,文章体例,亦不统一。亦因战时交通梗塞、书报寄递不易,所收集的材料不齐全”。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曾访问过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巴素华大夫。书成之后,作者应邀在《解放日报》座谈会上和延安大学就印度问题作过讲演。

《美国政府与政治》张国安著,成都天群出版社1945年7月版,约16.1万字。全书正文11章,分别就美国的“建国经过”、“联邦宪法”、“邦国关系”、“人民权利”、“总统制度”、“行政部署”、“文官制度”、“国会制度”、“司法制度”、“政党”以及属地与特别区域”作了叙述。本书系作者“专就苏、德、意三大独裁国家和“英、美、法三大民主国家”之“政治组织及设施探讨之一部”。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程辛超著,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初版。该书追溯从秦汉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地方行

政制度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归纳阐释了地方行政制度变化的脉络和原因,同时阐述了台湾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历史变化。在台湾地区至今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目录中。

《大众政治学》 傅于琛著,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 1949 年 9 月初版,约 29 4 万字。全书由正文 11 章及导言、结论和附录等组成。前 4 章为政治学概论,后 7 章专论政治生活萌芽,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世界政治和中国人民民主政治。该书指出,孙中山关于政治的界说“在反封建专制政府和争取资产阶级民权运动中是有革命性的”,但又“掩饰了政治的本质和国家政治的阶级性”。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政治生活的实质及其所依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分析“主要政治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指导群众把握历史法则”;“创造新的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目前所需的人民民主或新民主主义政治问题”,等等,并提出“政治科学是实践的科学”。作者主张政治学研究应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关于奴隶政治,作者特别指出,至今“在非、澳、亚、美各洲可以发现奴隶制度的残迹”;在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中,“养奴蓄婢的制度”,“在许多军阀、地主、富豪家庭中流行着”。关于封建政治,无论中外“其共通形式,都是金字塔似的层层垒垒的统治体制”,分权或集权

“只是封建政治形态的外表”。“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权组织”。“资本主义民主在封建制度意义上”是进步的,但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不但工农穷人没有民主权利,而且小资产阶级也不能获得真正民主权利的保障”。“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生,就是反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胜利结果”,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政权形式”。本书还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中的四种矛盾关系以及中国人民争取人民民主政治等实际问题。

《政治学原理》 丘晓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约 36 7 万字。全书由导论和正文 15 章组成。作者认为政治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各阶级间的斗争,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属上层建筑的范畴,应当从它的“实体——国家机器、观念——政治思想、活动——政治实践”这三方面来把握。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政治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社会政治生活所展现的各方面、侧面和层次,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组织结构的形式、特性和机能及其关系的总和”;“中轴线是国家政权”。全书除就政治和政治斗争、阶级和国家、国家政治制度、国家机构、国际政治关系分章列论外,还就政治和民族、政治和宗教,以及政治

党派、政治领袖、政治战略策略、政治道德、政治心理、政治信息、政治思想工作、政治目的等展开论述,并致力于揭示“政治心理因素同制定政策的关系”,“政治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及其与政治决策的关系”。该书获四川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李世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约24万字。全书含5章和结束语,论述了从1915~1949年中国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第一章介绍了“五四”前后新思潮的各种流派及其著名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第二章叙述了“新民主主义思潮的产生,改良主义思潮和反共思潮的发展”,包括戴季陶主义和国家

主义。第三章论述了1927~1934年间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中国法西斯主义,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第四章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同妥协、反共理论的对立和斗争”,其中包括日本侵华和汉奸卖国的谬论。第五章论述“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胜利”,包括“中间党派的建国主张和中间路线的破产”,以及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批判。在“结束语”中,概括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以及其余各种性质不同的政治主张失败、破产的原因。该书填补了四川省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孙悼章(1885~1932) 又名贻谋,四川云阳人。1918年底赴法勤工俭学。留法期间,组织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办《巴黎丛刊》和《奋斗》杂志。1923年秋回国。1925年出席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教育联合会。1926年,任《新蜀报》副刊主笔。1927年春,与向育仁等创办《民力日报》和民立大学,任社长和校长。同年6月,任成都市政讲习所所长。在成都组织中国改造社、青年自觉社,开办社会主义研究会,领导社

会民主党活动,著文、演说、授课的基本内容是鼓吹地方自治,抨击军阀,反对蒋介石,批判国家主义,同时又诋毁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4日,《民力日报》被禁。1930年6月22日,民立大学遭查封。孙被通缉,逃往上海法租界,撰写《怎样干》一书。主要著作有:《中国改造论》(成都民力日报1927年版)、《社会主义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三版)和《怎样干》等。

陈启修(1886~1960) (生平详见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他的政治学代表作有《新政治学》和《现代国际政治讲话》等。

吴永权(1886~1961) 字君毅,四川新繁(今新都)人。1904年中秀才。1905年赴日留学,1917年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士学位。1916年与王兆荣、陈豹隐等筹组“丙辰学社”,筹办《学艺》杂志。1916年9月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北大特约讲师。1921年由教育部派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柏林大学进修。1926年应张澜聘任任成都大学教授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及政治学系主任。1935年任交通部法规委员会委员、芜湖航政处长、北平法商学院教授。1937年7月后,任川大法学院、朝阳学院、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兼政治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职。1950年任川大政治学系教授。1956年退休后,聘为四川文史馆研究员。毕生从事于政法教育。

朱驭欧(1903~1982) 字沛西,号启龄。湖南零陵人。1922~1929年在清华大学学习。1929年赴美留学,获威斯康辛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36年回国受聘于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行政效

率委员会委员。1937年起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政治学系主任,1946年加入民盟,积极支持并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50年代后,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政治学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代理法学院院长。1952年调西南革大、西南政法学院任政治学系主任兼国家与法教研室主任、院图书室主任。

傅于琛(1909~1983) 笔名傅烈、傅宇芳,双流人。1932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1932~1935年在北京、山东、上海、四川等地任教。1935年至1947年在上海、汉口、重庆、成都等地从事文化、新闻工作,曾任成都《新新新闻》特约记者、《建国日报》总编、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编辑、《生存线》周刊编辑等职。1949年在上海联络局领导下从事策反、统战工作。50年代后任上海工商联调研室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学术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上海长城书店1932年出版)、《民权与革命》(汉口天马书店1938年出版)、《阶级与国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出版)和《大众政治学》等。

第十三章 法 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近代四川法学

1898年,宋育仁在成都翻印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和《法意》等书;维新派人士在重庆创办《渝报》,曾连续刊载宋育仁所著的《时务论》,明确提出“君民共治”的法治思想。1902年,四川开办新式学堂,讲授西方法政课程。

1903年四川开办“课吏馆”,由各地选派现职的司法官员入馆学习内政、司法之课程。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在原“课吏馆”(仕学馆)的基础上创办四川法政学堂。第一任监督是四川青神进士邵从恩,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开设的主要法学课程有《大清律例》《大清会典》《法学通论》《民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商法》《刑法》《行政法》《宪法泛论》《城乡地方自治章程》《法院编制法》等,除中国古典法律文献外,大多采用日本教材,仿照日本模式,聘用日本留

学回国人员执教,传授大陆法系的法学观点。

二、现代四川法学研究

20年代末,四川的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相继成立,到1931年3所大学合并,组建为国立四川大学,在法学院设法律系。法律系拥有一批留学日本和欧美的教授。在原有法律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亲属法》《继承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和《土地法》等新课程。法学研究有较大的进展。潘大逵著有《欧美各国宪法史》《中国宪法史纲要》;谢盛堂有《刑法总论》《刑法各论》;朱显桢著有《亲属法论》《继承法论》;裘千昌著有《民法总论》《公司法讲义》;赵念非著有《刑法总论》《监狱学》;胡恭先著有《行政法论》等。

朱显桢介绍苏联的继承法,是可取的立法先例。赵念非在讲授刑法总论时,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地区的许多大学相继迁入四川,法学界不少知名学者也随之来到成、渝各地,形成了四川法学的繁荣兴盛时期。

主要成果有:中央大学陈顾远的《立法要旨》、《中国法学与中国文化》;北平大学韩幽桐的《平时国际法》、《宪法论》、《欧美宪政运动的发展阶段》;四川大学朱显桢的《法学通论》;国立商学院姚梅镇的《欧陆法律发达史》(译著);张友渔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民大会——评国民大会组织法和代表大会选举法》、《世界宪政运动的几个类型》、《论选举权》、《论人民的自由权》、《论地方自治》;重庆《新华日报》社出版了《苏联宪法》;1946年在重庆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吴玉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作的《关于宪法原则》等。另外,梅仲协的《民法总论》、《民法债篇》;胡长清的《法律评论》、《中国民法继承论》、《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民法债篇总论》;裘千昌的《中国民法债篇总论》、《公司法论》、《票据法论》;胡元义的《物权法论》;余群宗的《土地法论》;杨兰荪的《法院组织法》;龙维光的《民事诉讼法》;龙显铭的《民法物权论》、《现行法上租赁研究》;伍

柳村的《法院组织法》等,亦属此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三、当代四川法学研究

50年代以后,四川的法学教育与研究进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与法律观为指导,依照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法律思想和法制体系的新时期。

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被分别派往司法部门参加司法改革的和司法工作,参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提高了师生们的政治、法律专业素质。

1950~1952年,四川省的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同时,成、渝两地区还选派了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北京进修学习。

1952年下半年,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和文教部的决定,将四川大学法律系、政治系,重庆大学法律系、政治系,贵州大学政治系、法律系,云南大学政治系、法律系以及重庆的正阳学院和财经学院的法律系,集中到西南革命大学总校,合并成立革大一部政法系。1953年成立西南政法学院,招收四年制本科法律专业学生和轮训司法干部。

学生的法学教材,多直接采用原苏联的高等法律院校统编的教材,即《苏维埃国家与法权理论》、《苏维埃刑法总则与分则》、《苏维埃民法总则与

分则》《苏维埃刑事诉讼法》《苏维埃民事诉讼法》等。

1955年在重庆北碚建立了四川省政法干部学校,成立了人民公安学院重庆分院。1959年省政法干部学校和公安分院与西南政法学院合并。直至80年代为四川省仅有的专门培养法律人才的高等学府。

50年代,在学校及司法部门中普遍开展对原苏联法学理论观点的学习和研究,推广原苏联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经验,对四川法学的发展,特别是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律观,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四川编写、翻印、出版发行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西南政法学院编写的《人民代表制度讲话》、《遵守国家法纪》,罗世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选举制度的特点》,李化南的《为肃清教学中的旧法观点而斗争》,李实育的《人民检察院对起诉材料的审查工作》、《积极整顿和发展人民调解组织》,马衡聪、董鑫的《我国在当前实行特赦的重大意义》;国务院委托裘千昌注释《唐律疏义》(计30卷60余万字,十年动乱中被烧毁)。

1957年后一段时间内,四川法学的研究与发展受到极大阻滞,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抬头,“要人治,不要法治”,重政治,轻法律;“政策可以代替法律”;“不能用法律来束缚无产阶级专政的手足”等错误观点,被奉为真

理,公开歪曲的和否定法学研究的科学性,否定法的继承性,错误地批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学原则,及律师制度、辩护制度,人为地给法学研究设置了许多禁区,对西方法律制度予以全盘否定,60年代以后,对原苏联法学理论和教育经验,也斥之为修正主义东西,在法学教育计划中,政治理论课的比例,超过60%,大量削减和合并法律课程,取消民法课,法学研究完全停滞。特别是“文革”动乱期间,法学教育遭到史无前例的严重破坏,造成严重损失。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恢复重建,面向全国招生。80年代初,四川大学、四川财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相继建立或恢复法学系、科。1985年四川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恢复重建,达县、涪陵、南充、自贡、宜宾、内江等地市,也先后设立政法管理干部学校,培训在职司法干部。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南充师范学校、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省公安干部学院、成、渝、泸警察学校、省检察学校、其他大学及中专等学校,均先后成立了法学教研室,开设多种法学课程。1985年,成渝两地的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建立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分校。推动和促进了四川法学的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合格法律人才。

四川法学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先后成立。1983年成立四川省法学会,1985年成立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四川经济法研究分会。1983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设立了法学研究室。

1978~1985年,四川省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工作者,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努力探索,出版、发表了许多成果。

(一)关于民主与法制问题的研究

杨景凡的《关于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林向荣的《法制一词含义的初步探讨》,孙孝实的《发扬延安传统,加强革命法制》,王嘉惠的《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几点认识》,罗世英的《批判法律虚无主义,加强法学研究》,张警的《谈人治与法治》,高绍先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实行法治》,高克明的《正确认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胡光的《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黎国智的《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原则》等。

(二)关于法的本质、作用的研究

1979年全国开展此问题的讨论后,四川省法学界发表的主要论著有卢云、黎国智、程燎源的《改革与法学理论》等。

(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律思想的研究

陈学明的《马克思早期哲学观及法律思想初探》,罗新民的《学习恩格

斯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的光辉思想》等。

(四)关于中外法制史、法律思想史的研究

张警的《七国考、法经引文真伪析疑》,俞荣根的《孔子法律思想探微》,杨景凡、俞荣根的《孔子的法律思想》,杨联华的《对建立外国法制史学科体系的设想》,王威的《庞德法律思想简评》等。

(五)关于宪法学理论的研究

薛国安的《我国宪法应当恢复国家主席制度》,卢云的《我国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的刍议》,孙孝实、李昌麒的《冤案赔偿应当写入宪法》,王连昌、高克明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应当扩充》,傅昭中、杨泉明的《论宪法的最高权威》,都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王连昌的《建议重建国家监察机关》,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的《认真实行任免权的一个好办法——关于重庆市南岸区人大常委会考察自己任命的干部的情况调查》等。

(六)关于行政法及行政诉讼的研究

西南政法学院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编印的《行政法概论》(1982年),王连昌的《加强我国行政立法的几点建议》,贺善征的《加强行政法制,克服官僚主义》等。

(七)关于刑法理论的研究

邓又天、邓定一、赵长青的《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知识》,邓又天的《论反革命罪的特征》,李黎、凌楚瑞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犯罪与剥夺政治权利》,黄泽林的《谈谈区别杀人罪和伤害罪的标准》,王者香的《论防卫过当的从属性》,黄泽林、李少平的《破坏专业生产户的刑事责任初探》,罗书平的《打击制作、传播淫秽录像犯罪补充立法》等。

伍柳村、董鑫的《划清罪与非罪的几个界限》,伍柳村的《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刘家琛、凌楚瑞、李黎的《形势需要与罪量刑》等。

(八) 关于民法、经济法理论的研究

杨志淮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一些问题》,邓大榜的《试论我国民法调整的经济关系》,金平、聂天祝、吴卫国、赵万一的《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李开国的《国营企业财产权性质探讨》,杨志淮的《绝对所有权与相对所有权——试论国营企业的所有关系》,金平、赵勇山的《国家财产与委托经营权》,金平的《充分发挥经济合同制度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初思、大榜的《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张序九的《论无效经济合同》,刘晓星的《论建立我国企业破产制度》,赵勇山的《专业户法律地位探讨》,王卫国的《试论民事责任的过错推定》,覃天云的

《经济开放与经济法》,罗世烈的《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几个法律问题》,周友苏的《农村个体工商户法律地位的探讨》等。

(九) 关于婚姻法、继承法理论的研究

叶清勋的《四川凉山彝族婚姻家庭问题调查》,杨怀英、胡平的《我国婚姻法的新发展》,柯瑞清的《浅析配偶继承权》等。

(十) 关于诉讼法理论的研究

廖俊常的《独立审判与书记批案》,廖俊常、徐静村的《略论我国的辩护制度》,徐静村的《吕刑初探》,王洪俊的《谈谈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常怡的《论撤诉》,柯瑞清的《建立健全民事代理制度的必要性》,常怡、周麟惠、孙洁水、谭兵合著的《民事诉讼法教程》,常怡、廖俊常、徐静村、李实育、田有丰、周麟惠合著的《刑事诉讼法教程》,王洪俊的《论证据的确实充分》,陈康扬的《刑事侦察与逻辑思维》,常怡、谭兵的《怎样调解民间纠纷》,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积极开展经济司法工作》,寇孟良、李昌麟的《对开展经济审判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探讨建立检察监督制度,建立检察学学科的问题,王洪俊撰写了十多篇文章,详尽地论述了检察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问题,全面地论述了检察制度的历史沿革、检察机关的性质、职

权、活动原则等问题;另外,王连昌的《我国法纪检察的任务》对检察监督制度进行了研究。

关于对律师制度的研究,王泽南的《“从重从快”与律师辩护》,聂天祝的《企业常年法律顾问的作用》,文立人《浅谈辩护制度和律师制度》等。

关于劳动改造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夏宗素的《谈谈对罪犯的革命人道主义》,杨显光的《劳改工作应该搞承包责任制》等。

对犯罪理论的研究有郭裕的《干部子弟犯罪是当前不容忽视的问题》,鲁正新的《青少年的模仿与犯罪》,叶清勋的《浅析我省凉山地区彝族青少年犯罪问题》,邓又天的《改造青少年必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辛明的《集团犯罪问题探讨》、《全面落实综合治理,必须加强犯罪预测》等。

公安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成果有:

谭宗志的《试论我国公安学的性质》、《公安法律规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阎培、吴中林的《试论预审学的研究对象》,谢仁福的《流体静压引起的死后伤软组织出血》,邹明理的《刑事照相曝光表的制作及运用》,黎镇中的《论刑事犯罪现场的特点》,周应德的《刑事侦查同一认定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徐功川的《侦查心理学》,杨作洲的《法律逻辑学》等等。

(十一)关于国际法和国际私法理论的研究

80年代以后,四川的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研究有较多的成果,主要有:李金荣的《加强国际法研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刘鸿惠的《对制定我国冲突法规的管见》,杨树明的《试谈海商法的概念任务》,寇孟良的《关于国际贸易洽谈中的一些常识性法律问题》等。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 著

《欧美各国宪法史》 潘大逵著,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全书约12万字。本书以介绍欧美七大先进国家宪法的发展史,拟期为中国日后制定宪法的参考,并借以补充国内各大学缺乏宪法史教材之不足。本书共七编,分别介绍了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

瑞士、德国和苏俄等国家的宪法史。

《破产法论》 宁柏青著,1935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约17.3万字。

该书在论述上采取比较法,介绍外国法制,以日本破产法为主,兼及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立法例的作法;对前北京司法部所拟《破产法草案》之失当

处；尤多加指出，据理批评”。在评介外国法制以及有关的各家学说时，作者均发表了不少个人见解，在论述概念时，十分注意准确性，例如在讲述别除权时，就很注意与取回权、财团债权等概念的区别；对破产者实行惩戒主义持否定态度。

《亲属法》朱显祯著，该书为作者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的讲义，在1940年前后出版，全书约76万字，分为绪言、亲属、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抚养、家、亲属含义之性质等部分。作者认为亲属法是民法系统的组成部分。作者在就自然的亲属与法律上的亲属做了简要区别后，批评了过去历次亲属法草案都以旧律的丧服图为依据划分亲属的作法是封建宗法思想，重男轻女的反映，称赞以婚姻及血缘为基础，分亲属为配偶、血亲和姻亲的作法是立法上的一大革命。从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沿革、婚约、结婚条件、夫妻财产制、离婚等方面对婚姻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以亲子关系实为血亲关系的基础，因而确定父母子女的身份及其间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便是亲属法的重要事项。监护制度是作为亲权制的延伸而列入亲属法的。最后，分别讨论了抚养关系、家制等问题。

《孔子的法律思想》杨景凡与余荣根合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出版，全书约18万字。认为孔子的法律思想熔法律和伦理于一炉，是一种伦

理的法律思想，也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其次，孔子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仁学”，由仁而派生出孔子法律思想的四大原则，即民本思想、宗法思想、君权思想、大同思想，这四者都是对仁不同角度的展规，是孔子法律学说在立法、司法、守法等问题上的指导原则。

《唐代司法制度——唐六典选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汪潜编注。1985年8月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全书约18万字。本书选注了《唐六典》中有关司法制度的四卷，每卷正文都详述了司法机关的编制、官员的级别、待遇、职权，注文又详述其自周秦以来至隋唐的历史沿革，而刑部这一卷还详述了唐代的法律形式、刑法制度、诉讼程序、刑罚的执行制度等。

二、论 文

《法律解释论》朱显祯著，原载《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论丛》（法律专号）第二卷第八、九号合刊，1935年5月，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由吴经熊、华懋生编辑的《法学文选》全文收录。该文约2.1万字，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法律解释。第二部分指出：“法律解释之物体，为既存之法律，而所谓法律，又系指法之表现”，“法律解释”从来一般皆系只是关于成文法者”。第三部分论述法律解释之目的在于“研究国民以法条为法律规范之表现，而合

理的判断所得之规范的思想”。第四、第五部分着重分析了理论解释常见的七种方法的意义与价值。然后指出应将文字与理论这两种解释方法结合,并提出如果这两种解释出现矛盾之后的三点解决办法。

《四川高等法院二十四年三月至二十五年四月工作概况》工作总结报告,谢盛堂撰写。全文约17万字,作者长期既作法学教育工作,又作司法实际工作。本文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司法工作存在的问题,着重论述五个方面的问题:一 强调司法工作要执行便民的诉讼原则。二 重视司法官吏的纯洁性。三 重视办案质量。四 重视整顿监所。五 重视保存卷宗,以备稽考。

《对当前农村犯罪问题的管见》王怀安著,载《人民司法》1957年第6期。作者分析了当时农村几种主要犯罪现象以及有关部门对其处理的情况,提出了处理劳动人民犯罪需要采取的四点方针和办法。

《人民检察院要独立行使检察权》陈逸云著,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20日第3版。该文针对“文革”前和“文革”中,一些人反对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几种错误论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作者认为,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执法有据,然而竟有人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指责为“以法抗党”,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就是具体保证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把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说成是“以监督者自居”,是特权思想的表现等错误观点予以批判、澄清。最后作者提出,要坚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必须正确解决党委对检察机关如何实行领导的问题,作者认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监督其是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该文作者的观点对我国的检察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颇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联邦德国法学家明策尔,曾将此文译为德文,选载于《法学论文集》中。

《批判法律虚无主义 加强法学研究》罗世英著,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二期。作者认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保障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马克思主义法学同法律虚无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法律虚无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法制问题上的反映”,健全法制建设,加强法学研究,建立完整的法学体系,“关键是人才问题”。

《对修改婚姻法的几点意见》杨怀英著,载《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79年第二期。作者对婚姻法中的婚龄、离婚、买卖、强迫婚姻条文的修订提出意见。

《论反革命罪的特征》邓又天著,载《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79年第二期。该文首先论述我国在实现“四化”

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反革命罪必然具备一定的条件,特别指出构成反革命罪必须有反革命行为。单纯的思想活动,不能改变外界事物,谈不上犯罪,不应当把认识问题、思想问题也当作犯罪来处理。

《青少年犯罪初探》 罗耀培著,载《青年研究》1979年第五期。作者就分析当前产生青少年犯罪的几点主客观原因,对减少青少年犯罪现象提出了建议。

《刑事侦查同一认定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周应德著。载《西南政法学院学术报告论文集》(1980)。该文从理论上阐述同一认定与种属认定的根本区别。

《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 王叔文著,载《法学研究》1981年第一期。作者指出,新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序言”中明确规定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该文对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形式特征等作了深入的论述。

《冤案赔偿应当写入宪法》 孙孝实等人合著,载《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81年第三期。认为在新宪法中应当赋予公民以请求冤案赔偿的权利并提出建议。

《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 伍柳村著,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一期。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就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性,教唆行为都应该认为是犯

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又处于相对的独立地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唆犯在实施了教唆行为以后,被教唆的人没有去犯被教唆的罪,对教唆犯应该怎样定罪?作者认为:不能说他是犯罪的预备、未遂、或者既遂,只能说是犯罪成立或者构成犯罪。

《略论贪污罪》 董鑫等著,载《法学研究》1983年第三期,论述了贪污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作者依据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的规定,以及对四川省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的调查,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处理本罪一般应掌握的数额界限,提出区别本罪不同情节的三个量刑幅度数额标准的建议。

《七国考 法经 引文真伪析疑》 张警著,载《法学研究》1983年第六期,全文约7000字。该文共分四段;第一段谈《法经》及其存在的问题,《桓子新论》明季尚有完书,不能排除有秘本流传的可能;第三段论述董说的为人和关于他的《七国考》。第四段是作者对《法经》条引文的内容析疑。

《略论我国刑法中罪过内容与形式》 朱华荣著,载《法律建设》1984年第一期。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罪过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论述罪过的内容。第三部分论述怎样确定故意与过失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即认定其是否属于刑法上的罪过。第四部分

论述罪过概念的体系。

《论无效经济合同》 张序九著,载《法学季刊》1984年第一期。该文结合《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着重阐述了认定无效经济合同的条件及其处理的原则等问题。

《试论 检察学 在诉讼法教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洪俊著,载《人民检察》1985年第三期。这是倡议建立《检察学》的首篇论文。指出建立《检察学》必须突破原有的诉讼法学体系,新的体系应包括:诉讼法学原理、检察学等八个分支学科;而《检察学》的研究对象

则是中国的检察制度的理论和检察工作的实践。

《经济体制改革与法人制度》 赵炳霖著,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二期。该文分为四个部分:论述当前我国应当建立法人制度的必要性。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专业户权益不受侵犯》 金平著,载《法学季刊》1985年第二期。作者针对侵犯专业户合法权益的现象,提出切实维护专业户的合法权益,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吴永权(1886~1961) 字君毅。(生平详见《政治学》)。

杨兰荪(1887~1971) 四川遂宁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广东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

朱显楨(1889~1943) 四川璧山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主要代表作:《亲属法论》、《继承法论》。

裘千昌(1896~1969) 号禹言。浙江奉化人。1929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文法学部法科。曾先后在安徽大学、成都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

朝阳学院任教授。50年代以后,历任四川大学法律系教授兼川西行署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学院教授、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著有《中国民法债编总论》、《民法债编总论》、《公司法》,并编写《民法总论》、《债编各论》、《保险法论》和《票据法论》等讲义。主要学术观点有:认为债权法是财产法的一部分,属于财产法中的交易法,是规定动态财产关系的法律,它以任意性规范为主。认为处理侵权行为,一般应采用过失责任主义。公司制度的固有目的,在于共同经营工商业,多数人集合而为团体,

各自出资作为共同资本,用以经营工商业,而分享其利益,此种团体或组织,如具备一定条件,即称之为公司。并认为,公司作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不仅限于财产权,关于名誉的人格权,法人亦得享有,但关于生命权、人身权利及亲属法上的权利,属于自然人固有的权利,公司不得享有。

赵念生(1898~1985) 字卿康,号颜徽。四川大足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政协委员,其代表作有《债权总论》《刑法总论》《刑法各论》等。主要学术观点有:认为适用刑罚之目的在于扑灭犯罪而保全社会共同生活,预防犯罪,并非报复犯罪;刑事责任之基础是犯人的行为,其轻重则由犯罪行为所生之灾害和危险之大小,以及主观方面的故意或过失等而定;刑之理念在教育,刑法及行刑之改正应以此理念为指针;犯罪之本质在于行为的反社会性;不作为犯罪中无论为纯正不作为犯罪或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得成立未遂;被害人之承诺可以阻却犯罪之成立,但承诺不得“违反公秩良俗”。

朱驭欧(1903~1982) 字沛西,号启龄。生平详见《政治学》。

赵崇汉(1908~1982) 河南淮阳人,早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53年入川。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院校教授、系主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其代表作有《关于法国行政法中公务员的概念和法律地位的研究》、《越权之诉》等专著和论文。

余群宗(1894~1983) 四川广安县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东亚预备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法律系任教授,1952年到西南政法学院任教。主要代表有《中国土地法论》(上、下卷)。

罗石均(1904~1982) 湖南攸县人。1934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回国后先后在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任副教授,1946年到贵州大学任教授,1952年调西南政法学院任教授。

彭望雍(1911~1972) 江苏吴县人。193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1933年去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云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任教授,主要代表作有《英美法导论》(译著)。

第十四章 社会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近现代四川的社会学研究

(一)传播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提出过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思想,里面包含着某些社会学性质的内容。古代关于人口统计、户口制度、民风民仪民俗的记载,也带有某些社会学性质。但从学科意义上讲,社会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的。

1918年,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四川大学法学院前身)在政治本科开设社会学课。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后改为成都师范大学)1923年在文史部公共课开设了社会学课程,理化部选修课也有社会学。教师有陈希虞等。成都大学在政治系中开设社会学,由著名学者、共产党人杨伯恺讲授。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不少院系都开设有社会学或与之

有密切联系的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在30年代,曾在四川大学讲授过社会学的比较著名的教授有龙邦泽、沈嗣庄、胡鉴民等人。四川开设社会学课程比较早的另一所学校是华西协合大学。

此期还没有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但与社会相近或有关的研究机构已有建立。如1935年四川大学成立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专门研究四川及西南边疆的经济及民俗等问题。1942年华西协合大学设有华西边疆研究所和社会人口研究室,专门对中国内地、西南边疆及少数民族进行研究。

社会调查也逐步开展起来。1936年四川大学农学院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团联合对四川152个县及单位进行调查,并写成《四川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川大社会学教授沈嗣庄带领学生在成都石羊场进行农村经济调查;法

学院经济系学生在成都青羊场也作了农村经济调查。四川大学还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四川经济考察团,用8个月的时间对四川经济作了系统调查。随着社会调查的开展,报纸杂志也不时有各种调查报告刊出。如1931年5月23日《国民公报》刊载《成都工人生活调查》,1932年1月刊登《成都市人口职业类别表》等。

(二)发展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成渝两地集中了一批设有社会学系的学校:在重庆有中央大学社会系、复旦大学社会系、乡村建设学院社会学系、社会教育学院社会事业行政系;在成都有金陵大学社会学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大批教学和研究机构的迁入,使社会学界学者一时云集四川,人才荟萃,不少国内知名学者如许德珩、孙本文、吴景超、言心哲、卫惠林、瞿菊农、朱亦松、柯象峰、马长寿、乔启民、龙冠海、吴榆珍、林耀华、李安宅、蒋旨昂、张少微、晏阳初、张世文、胡鉴民、冯汉骥、姜蕴刚等都在川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有华西协合大学边疆研究所(该所是燕京大学迁成都后,1942年与华西协合大学合办的),由李安宅和林耀华负责,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和边疆社会。

在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学的重要

研究成果有:

1.普通社会学研究 出版了中央大学孙本文教授的《社会学原理》。他曾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社(后改建为中国社会学社),创办并主编《社会学刊》。他的《社会学原理》在全国影响较大,1944年在重庆修订后再版。

2.社会问题研究 出版了孙本文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全书共有四册。从1942年7月至1943年11月出齐,主要讨论家族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和劳资问题,其中,又按内容分别论述,涉及的社会问题达40种以上。本书在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注重以事实为基础,以社会学原理为根据,明确指出其意义和范围,详细介绍其历史背景和现状,深入分析其内容和特点,具体提出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书中还注重对中外社会问题加以比较,使读者了解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特殊性。

3.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研究 言心哲主编的《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收有毛起骏、郭任远、谢徵孚等的论文11篇。重要著作还有言心哲著《现代社会事业》,吴瑜珍著《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蒋旨昂著《社会工作导论》、《成都社会事业》,孙本文等的《社会行政概论》等。言心哲在重庆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长期讲授社会事业课程,并一度担任重庆实验救济院院长,他的《现代社会事业》一

书是当时论述社会事业的代表性著作。

4. 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研究 此期,一些社会学家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如林耀华带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深入大小凉山考察,写出专著《凉山夷家》。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在甘南拉卜楞寺对藏族宗教制度进行研究,写了一系列有关藏族生活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如《拉卜楞寺的护法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喇嘛教育制度》、《藏族宗教实地考察》、《萨迦派喇嘛教》、《藏民妇女》等。李安宅还对川甘青交界的安多地区进行考察,写出调查报告《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后又到西康德格地区考察,写出研究报告《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于式玉则到黑水进行调查,写出《黑水民风》、《西道堂的商族——黑水西北的回商》、《麻窝衙门》等文章。胡鉴民主要从事羌族考察,写有《羌族之信仰与习为》、《羌民的经济活动型式》、《苗人的家庭与婚姻习俗琐记》等论文,柯象峰出版了《西康社会之鸟瞰》,徐益棠出版了《雷波小凉山之僜民》。在对边疆社会的研究方面,李安宅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一位社会学家,他对边疆社会工作提出许多新见解,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边疆社会工作》一书是他研究边疆社会工作的代表作。

5. 社会调查方法研究 主要著作有

张世文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另外还有《社会调查统计》、《统计与行政》等书。

6. 社会思想和社会学史研究 在社会史方面有姜蕴刚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在社会思想史方面有孙本文的《社会思想》,在社会学史方面有陈定阔的《世界著名社会学家之生平及其学说》。

7. 乡村建设研究 最早在四川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卢作孚。于1926年在重庆北碚办了四川第一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1936年团务局改建为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包括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的一部分乡村。1936年晏阳初来川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推行卫生保健制度,在新都办实验县,同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合作开办以县卫生院为中心的乡村卫生医疗网点,同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开办示范农场,引入适合川西生长的稻谷、烟叶、家畜等优良品种,向农民推广,并推行初小免费教育,分期举办成年农民夜间讲习班、识字班,授以选种、治虫、防病、施肥等科技知识。抗日战争期间,晏阳初还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担任院长职务,培养乡建人才。除乡村建设学院外,还有其他大学协助建立协合乡村建设实验区,同时也有不少乡村建设论著出版,如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刘振东的《乡村建设》,

瞿菊农的《乡村建设与教育》等。

8. 社会实地调查 在家计调查方面,1938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成都选择工、商、教育界各类职工213户,调查1937年全年的人口、收入、购买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其他各项费用支出情况。这次调查所得资料,除用以确定编制成都市生活费指数的权数外,还写成《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一书,于1940年6月出版。1941年,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等调查了重庆市190户工人家庭自1940年5月至1941年4月的收支情况,写成《重庆工人所得及生活费》一文发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在1942~1943年调查成都皇城坝劳工家庭556户,并写成《成都皇城坝劳工家庭调查结果之分析》一文。在社会事业调查方面,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蒋旨昂组织一些大学的学生调查成都社会福利机构情况,写出《成都社会事业》一书。其他方面的调查主要有:北碚社会概况调查,成都社会概况调查等,均载《社会调查与统计》年刊。此外还有卫惠林的《丰都宗教习俗调查》,叶懋的《华阳县农村概况》,刘灿若的《重庆沙坪坝中渡口平民家庭生活程度调查》等。

9. 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学校建立社会研习站和服务处,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新繁崇义乡建立农村服务处,开办农民补习学校,宣传抗日救

亡,普及科学知识,举办小农借贷,调查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情况。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受中国盲民幸福促进会委托,培养残废救济和盲民福利人才,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合作,在成都石羊场建立社会工作研习站,使社会学系师生容易接近群众,了解群众情况,以便找出问题的症结、解决的措施,供有关当局参考。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在成都小天竺开办了儿童福利实验所,1946年该校迁回南京后由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接办。该所的主要工作是接收小天竺一带的贫苦儿童,开设幼儿班和初小班,并通过家访进行社会调查。成都五所教会学校,即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共同为宋庆龄主办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举办儿童福利人才训练班,开设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营养学、卫生学等课程,训练班的负责人是吴贻芳。

10. 社会研究 蒋旨昂认为社会学应采取综合的功能观点,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有生理的、心理学的、社区的(包括环境和文化),其中社区的因素最重要。他认为乡村是一种社区,并以社区的概念加以研究,分析乡村的社会与政治,写成《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和《黑水社会政治》。张少徽在这段时间也出版了《乡村社区实地研究》一书。

11. 知识社会学 李安宅于 1944 年翻译出版了德国社会学家孟汉 (Karl Mannheim) 的《知识社会学》一书。

在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活动活跃。中国社会学社于 1930 年成立。1943 年在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同时举行中国社会学社第七届年会,中心议题是“战后社会建设”。而第八届年会则是 1947 年在成都、北平、南京、广州四地同时举行的,中心议题是“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应取之途径”。

中国社会学社刊物《社会学刊》,抗日战争开始后停刊。1944 年在重庆另行出版《社会建设》月刊,由孙本文任主编,内容以讨论社会建设和社会行政为主。此外,在重庆出版的社会学刊物还有《西南边疆》、《边政公论》、《社会工作通讯月刊》、《合作事业》等。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大学社会学系还成立了一些学术组织,如 1946 年成立华西社会工学会,出版《华西社工》。一些学校组织了研究会,如青年问题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等。一些学者如郭沫若、马寅初、吴文藻、晏阳初、吴泽霖、潘光旦等也应邀到一些大学作学术报告。印度学者艾伯兰也应邀举办了“印度问题讲座”。

抗日战争结束后,四川在社会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力量仍然相当雄

厚,继续留在四川任教的学者有李安宅、冯汉骥、蒋旨昂、胡鉴民、姜蕴刚、任宝祥、张世文、梁桢、陈定阔等。

二、当代社会学研究

(一) 恢复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学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由于受到原苏联取消社会学极端做法的影响,1952 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也在大学中取消,原来的社会学者改行转入其他学科。因此在四川省社会学发展史上就形成了多年的空白。在这段时间,四川作过两次人口普查,作过多次城市职工和农村居民的家计调查,作过家史、村史、厂史调查,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社会学研究的性质。但社会学未能作为一门学科存在,这些调查和研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指导和依托,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局限。

1978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80 年代以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又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1980 年和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二期暑期社会讲习班,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方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两次派人参加学习。1982 年春,在武汉举办社会学讲习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

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四川外国语学院等都派人参加了学习。加上出国留学回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社会学归队的老学者,以及从哲学等学科转而搞社会学的研究人员,逐渐形成了一支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队伍,为四川省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随着社会学人才的培养和会聚,研究和教学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81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建立社会学研究室,1983年成立社会学研究所。1983年建立青少年研究所。成都市社科所也于1981年设立社会学研究室、重庆市社科所于1983年建立社会研究室。1984年四川大学哲学系设立社会学研究。在四川医学院则建立了社会医学研究室。

在社会学教学方面,四川大学社会学研究室除承担社会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外,从1985年起招收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重庆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交通大学、省委党校等也建立了社会学教研组,开设社会学课程。

社会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学会也陆续建立,以加强社会学学术上的联系和交流。1982年春四川省青年研究会成立,1983年4月四川省社会学学会在成都成立,1983年5月重庆市社会学学会成立,1985年9月四川省婚姻家庭研究会在新都成立。

1982年春,四川省青年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在会上作了《青年研究的方向和方法》的专题报告。

1982年5月5~6日,四川省社会学学会筹备组举行会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会并作了题为《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1983年4月7~13日,四川省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成都举行,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到会作了题为《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新建系统的中国社会学》的讲话。

1983年9月23~29日,四川省青少年研究所在灌县召开农村青年现状调查学术讨论会。会议总结了1983年暑期组织省内五所高等院校近500名师生对6个县的15个公社40个大队农村青年的调查工作,对80年代农村青年的现状、特点及对策进行了讨论,对如何发挥农村青年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议。

1984年3月26~28日,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举行理论讨论会,会议就理论研究与经济研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社会学的中国化等问题作了讨论。

1984年12月18~21日,四川省社会学学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乐山市举行。讨论农村家庭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家庭的功能和结构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实行责任制后农村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学如何为农村改革服务,如何开展农村社会学研究。

1985年9月10~13日,四川省婚姻家庭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在新都举行,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对婚姻家庭的影响、婚姻家庭价值观念的变化、恋爱择偶方式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生活方式和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以及第三者插足与离婚问题等。

1985年10月底至11月初,四川省生活方式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生活方式的定义、生活方式的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的历史演变、生活方式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特征、社会改革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等理论问题。

1985年11月5~9日,四川省有关部门还就青少年犯罪原因及青少年犯罪的综合治理问题作了讨论。

社会学重建以来,四川省社会学界与国内和国外的学术交流不断得到加强。国内学术活动方面,参加的主要有:全国历次青年劳动就业学术讨论会、全国婚姻家庭学术讨论会、全国青少年犯罪学术讨论会、京津沪宁蓉五城市家庭调查研讨会、小城镇问题学术讨论会、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

学术讨论会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方面主要有: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夫妇来川访问考察,在大邑县安仁镇研究老年妇女问题;1983年瑞典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协会副主席希梅斯特兰德来川作学术访问;1984年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庭问题研究所教授特马拉·哈丽雯来川进行学术访问;1984年匈牙利科学院代表团来川进行学术交流;四川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合作进行中美城市家庭对比研究;此外,还接待了一些青年和青少年犯罪研究方面的国外学者,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二)主要研究领域

1.社会学基本理论 社会学不能是旧中国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不能是西方社会学的机械照搬,而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学,就要研究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如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传统,正确对待西方社会学理论,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协调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济研究的关系等等。几年来,四川省社会学工作者围绕这些问题,在学术讨论会上,在论文和专著中,作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集体编写出理论著作《社会学——历史、理论、方法》。

2.社会学研究方法 四川省社会学

工作者一方面注意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调查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注意吸收和引进现代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既运用开调查会,进行典型调查等传统方法,又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处理资料技术等现代方法。

3 应用社会学研究 结合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应用社会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婚姻家庭问题研究 1982年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室对简阳县南河村农民家庭进行调查。主要是围绕改革与婚姻家庭的变迁展开的,涉及的方面主要有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择偶观念与择偶方式的变化等,同时对离婚问题、第三者插足问题、现阶段婚姻基础问题、婚姻家庭道德问题等也作了探讨。

青年问题研究 1981年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室就青年待业问题曾在成都市解放南路作过调查。几年来,青年问题研究还涉及到青少年教育问题研究、青少年犯罪及治理研究、青年问题研究的方法论等。

小城镇研究 1982年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室曾对德阳县进行调查,后来又对乐山市五通桥区以及达县地区小城镇进行调查,并就城镇管理体制提出一些建议。几年来四川省小城

镇研究主要围绕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乡镇企业与城乡发展、城镇管理等问题进行。

老年问题研究 1982年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学研究室对成都市部分老年人作了调查。同年,四川医学院社会医学研究室对成都市和什邡县部分老年人作了调查,并对城乡老年人状况进行比较研究。1985年成都市社科所社会学室对成都市部分老年人作了调查,这些调查为老年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社会保障研究方面,四川省民政工作者和社会学工作者对此作了一些研究。重庆市成立了民政学会,并举办了多次理论讨论会。

4 重要调查

四川农村家庭调查 1984年2~10月由省社科院社会学所主持,对广汉、什邡、富顺、乐山、万源、南川、蓬溪、简阳九县市进行调查,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共调查农家2237户,调查资料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根据这次大型调查写出的研究报告《四川农村家庭预测》受到中共四川省委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主要依据这次调查写出的论文《论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变迁》被选定参加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

城市家庭调查 1982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组织京、津、沪、宁、蓉五

城市协作进行城市家庭调查。这次调查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成都调查部分由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和成都市社科所的社会学室主持,采用立意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成都市梓潼辖区如是庵街居民段作为调查点,对该段401名已婚妇女进行调查。根据这次调查写出的研究报告《成都市东城区如是庵街居民段婚姻家庭调查》获得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被收入《中国城市家庭》一书。

80年代农村青年现状调查 该课题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课题,由中国社科院青少年所牵头,九省市协作进行。四川部分由省社科院青少年所主持,于1984年8月在五市县抽样调查了5500名农村青年。后以这次调查的资料为基础,写出了《献给你,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一书。

青少年犯罪调查 该调查是中国社科院青少年所、国家司法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主持,五省市参加的大型调查,调查于1984年冬进行。四川调查部分由省社科院青少年所、省公安厅、省劳改局和省统计局联合主持,共调查了25例个案、850份问卷,查阅了30000份历史资料。以这次调查为基础而写出的一批调查报告和论文,编入《四川省青少年犯罪个案研究文集》(内部资料)。

成都市部分老年人调查 1982

年5~8月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研究室选取成都市东城区天涯石北街和西城区黄瓦街辖区为调查点,共调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5713人。该调查结合健康检查和病史询问,对老年人的年龄及性别构成、职业状况、文化程度、生活来源、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家庭关系以及精神状况作了调查。

城市青年文化生活与思想状况调查 该调查系成都市和广州市进行青年比较研究的一个调查课题。成都调查部分由成都市社科所社会学研究室主持,于1984年在全市范围内抽取800多个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据此写出的调查报告和论文有《城市青年文化生活与思想状况调查》等。

攀枝花市攀钢及城区职工社会心理调查 这次调查是由攀枝花钢铁公司劳动卫生防护研究所和华西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研究室联合主持,抽取攀钢职工2493人,城区职工1040人进行调查,对攀枝花市职工队伍稳定性心理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作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写成《渡口市攀钢及城区职工社会心理调查研究报告集》。

农村家庭与农民生活方式调查 该调查是辽宁等省联合发起的跨省农村调查协作项目。四川调查部分由四川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和省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合主持进行,选择邛崃和古蔺

两县为调查点,抽取 418 户进行调查, 调查资料用计算机作了处理。

第二节 主要著作选介

一、专 著

《社会学史纲》 李剑华著,世界书局 1930 年版。该书是中国较早的一部有关社会学史的著作,共有 5 章。该书把孔德以后的社会学分为两大思潮来论述:一是综合的社会学;二是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作者认为,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是由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到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由综合社会学到纯正社会学。根据对两大思潮的划分,作者在书中还分别介绍两派在社会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此书还概述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俄国、英国、美国、日本及中国社会学的状况,由于此书是比较早且比较系统地介绍社会学发展史的一部著作,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有一定影响。

《乡村建设》 卢作孚著,载《嘉陵江报》1930 年 1 月 7 日至 2 月 8 日,1935 年出单行本,全书共分 8 章。论述解决乡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要解决乡村问题就必须开展乡村建设。开展乡村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解减轻人民的痛苦,增进人民的幸福。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准备人,准备钱,准备地方,准备东西,尤其是准备办法。该书用主要的篇幅论述如何进行这些准

备。

《定县农村工业调查》 张世文著,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调查部 1936 年 2 月版。该书是作者在参加平民教育会河北省定县实验区工作期间,用 4 年时间对定县全县 453 个村庄手工业的状况进行调查后写成的调查报告。该书分三卷,第一卷为定县家庭工业概况调查,先讲述定县 453 个村庄工业的概况,然后分别讲纺织工业、编织工业、食品工业、木工业、化学工业、铁工业和杂工业的状况;第二卷为定县作坊工业调查,也是先进作坊工业的总状况,然后分别介绍化学工业、食品工业、木工业、五金工业、杂业的状况;第三卷是定县家庭工业详细调查,分别介绍几个村庄的典型情况。

《社会学论集——一种人生观》 李安宅著,燕京大学出版部 1938 年版。该书收集了作者 1931~1937 年在《社会思想》、《社会研究》、《现代思潮》等刊物上发表的社会学文章。书前有张东荪作序。全书共分 3 编:上编专讲人生态度,即人生观问题;中编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两性生活、婚姻制度、家庭制度以及道德的自律、环境的改造;下编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研究状况,

主要关心的问题,主要的研究方法,论述知识与产生知识的途径,并着重介绍实地研究方法,指出实地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成都社会事业》 蒋旨昂编著。该书是关于成都市社会福利机构团体的调查报告。1942年蒋旨昂主持并组织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参加这次调查。调查报告共分14章,包括社会行政机构、院外救济、院内救济、残废救济、精神病治疗、医药服务、法律扶助、职业指导、社会保险、体育娱乐、非专业之社会服务,以及训练机关等。

《生命统计方法》 张世文著,正中书局1943年2月版,约50万字。作者于1936年翻译出版美国辉伯尔著《生命统计学概论》,后依据中国的事实和自己研究所得,编成《生命统计方法》。全书分为12章,首先讲述生命统计学的重要意义和简史;其次讲述生命统计资料的搜集,如人口调查与人事登记等;再次述及资料的分析与整理,尤其注重各种算法,如人口的估计法,各种出生率、死亡率、婚姻率、疾病率等的算法,以及生命表的编制法,均举例说明其计算步骤,俾初学者根据此书,可无需教师的传授讲解,即可运用各种计算方法。

《边疆社会工作》 李安宅著。中华书局1944年版。该书是作者多年从事边疆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是中国社会

学校系统地论述边疆社会工作的专著。全书共分7章:第一章探讨边疆这一概念;第二章论述社会工作的性质、类别和趋势;第三章论述边疆社会工作;第四章论述边疆社会工作存在的困难和具有的引力;第五章讲边疆社会工作所需的条件,包括对于工作人员和工作机构的要求;第六章从行政和实施两个方面谈如何做边疆工作;第七章是边疆工作展望。

《农村社会调查方法》 张世文著,商务印书馆1944年7月版。该书是作者多年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经验和体会,全书共15章,要目如下:绪论、社会调查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调查的方法、农村社会调查的准备、农村实地调查进行步骤、社会调查的一般困难及其应付方法、农村人口调查、农村田场经营调查、农家生活费调查、农村工业调查、农村商业金融调查、农村宗教调查、农村教育调查、农村调查与农村社会学。

《社会学原理》 姜蕴刚著,华西协合大学1944年10月版。该书是姜蕴刚讲述、燕京大学毕业生王维明记录整理而成的。作者在序中说,此书是他想完成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是社会哲学,第三部是艺术社会学。他说,虽然是三部曲,实际上乃是一部书的三部分。他认为《社会学原理》只是社会哲学之初步阶梯,而社会哲学又是艺术社会准备的过程,只有艺术社

会学才是所要衷心建筑的全部思想的殿堂。全书共7章:总纲、社会的发生、社会的形成、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完成、社会学之理论与应用、社会学的历史。

《社会工作导论》蒋旨昂著,商务印书馆1946年10月版。该书对社会工作作了系统的论述。全书共12章,要目如下:社会工作之地位、社会研习、社工与个人、社会与团体、社区组织、社区行政、社工干部教育、社工所需的社会学概念。作者长期从事社会工作研究,在书中对社会工作的论述有独到之处。

《世界著名社会学家之生平及其学说》陈定闳著,商务印书馆1946年3月版。该书分别介绍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15位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对每一位社会家的生平、著述和学说作了简单扼要的叙述。

《社会调查概要》张世文、张文贤著,重庆出版社1984年7月版。全书共12章,分别论述社会调查的意义和作用、社会调查的起源和发展、社会调查的主要方法、社会调查的准备、社会调查的实施、调查图表的制作、调查报告的写作,此外还介绍如何进行人口调查、农村调查、城市调查、市场调查和民族调查。

二、论 文

《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著,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4年英文单行本。

全文共6部分:导言、乡村生活的研究、平民教育的三大方式,四个方面的建设计划、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作者认为,建立实验区是了解和研究乡村生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采取以县为单位的实验方式,既便于进行研究,又对全国农村具有一定代表性,有利于整个中国乡村生活的认识,而定县实验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建立的。作者以主要篇幅介绍定县在文化、经济、卫生、政治等方面进行实验的情况。

《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晏阳初著,载《八十年来的中国》一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该文回顾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十年的情况,共分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的渊源;乡村建设运动在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中的重要地位和着手解决的方法;十年来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阶段——由学术的研究实验阶段发展为实际化推广化的政学合一阶段;学术与实际工作结合的重要性;乡村建设工作的各个方面;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乡村建设运动所应抓的几个要点。

《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冯汉骥著,载《齐鲁学报》,1941年第一期。该文原为作者在美国读书时所写的博士论文,经删节翻译,在《齐鲁学报》发表。作者认为亲属名

词是一种语言现象,是对事实的一种表征,而语言的演变,往往要比它所表现的事实演变来得迟缓。从这一理论出发,作者通过对古籍中所载的中国古代亲属称谓及其在“交表婚姻”、“姊妹同婚”以及“收继婚”中的表现的研究,科学地解释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

《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 李安宅著,载《边政公论》1946年第五卷第二期。该文是作者深入西康省德格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写出的调查报告。作者运用收集的大量资料,对德格地区的土司与寺院、地方经济、政府机关、邮政交通、学校教育等作了历史考察,并对德格地区的人口分布、人口比例、人口类型和家庭结构作了详细分析,是一篇研究德格地区社会及历史的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社会现象的研究》 胡鉴民著,载《社会学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作者认为,社会现象具有“人为性”。“是经过人为(主观)而后再客观化的东西”。“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意识的,因为社会现象的产生不能不经过人类的意识”。根据这一认识,他把社会现象分为四类:共同的感觉态度——音乐、诗歌、图画以及其他一切艺术品,共同的思想态度——语言、风俗、宗教、哲学等,共同的行为态度——表情、礼貌、言行等,社会态度的表现——物件、制度、机关事件等。从这一分类可

以看出作者对心理因素的重视程度。

《试论社会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赵喜顺著,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一期。该文论述统计分析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由于社会现象也存在着量的规定性,因此用来研究量的规定性的统计分析方法在社会研究中就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统计分析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运用程度,与统计理论和方法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原来认为不能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的社会现象,也可以用统计分析方法加以研究。作者还论述统计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关系,认为应该把研究者、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三者加以区分,研究者有阶级性,研究对象有阶级性,并不等于研究方法也都有阶级性。统计分析是一种数学方法,其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青年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张黎群著,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四期。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青年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开展青少年研究是时代的需要,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青年研究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中心,运用多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第二部分论述青年研究的重要任务,指出青年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索在青少年中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律,培养青少年的革命精神,教育

他们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第三部分介绍我国青年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第四部分讨论青年研究的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与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袁亚愚著,载《社会学文选》(1983年9月)。作者认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学是追求科学的社会学为目标的社会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研究方法、手段的现代化。

《教育社会学探索的几个问题》任宝祥著,载《社会学文选》(1938年9月)。该文是从“人和社会组织相互影响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一论点出发,评述弗洛伊德的个性发展三层论和心理分析法、内尔的自由学校和皮亚杰的儿童认识发展阶段论。文章还论述遗传、环境和教育对于个性发展的影响,论述韦德海的民主社会下全面教育的课程的改革,教育机会均等学说下的补偿教育、早起步教学程序和教育重点地区等理论。文章还批判伊利奇的非正式课程论对于非学校运动的影响,阐述了马克思哲学政治观点对于教育的影响,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对于个性发展的危害。

《新中国社会学应当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定闾著,载《社会学文选》(1983年9月)。作者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中国的社会学应以中国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会

现象的历史渊源,其变迁的迹象及其产生的社会作用。中国社会学必须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结论,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它不但要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也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因此,中国社会学既是理论的社会学,又是应用的社会学。作者认为,对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现象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人口、民族与文化;二是社会行为及其控制;三是社会结构;四是团体与社区;五是社会制度;六是主要的社会问题。

《外国社会心理学发展趋向、理论和方法的评述》黄希庭著,载《社会学文选》(1983年9月)。该文介绍国外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趋向、理论和方法。作者指出,最近几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两种类型社会心理学——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相互接近和渗透。这无论在原苏联还是在西方都是如此。作者接着介绍国外社会心理学的两种模式——西方模式和原苏联模式,并扼要介绍两种模式中的主要理论观点。作者最后介绍国外社会心理学的几种主要研究方法:相关法、实验法、实地调查和人种学方法。

《孙本文社会学理论体系简论》陈定闾著,载《江海学刊》1984年6期。孙本文是我国著名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曾有过重要的

影响。该文从社会学方法论、文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体系、人口社会学等方面介绍孙本文的理论观点和著述,并对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贡献作了评价。

《青年社会心理学问题初探》王曙光著,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四期。该文从个体与群体心理、青年社会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潜的和外观的心理活动、青年的社会化和内化、青年的社会动机和社会态度、青年的社会人格等方面,论述青年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和领域。作者认为,青年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保证青年

在社会化过程中生理、心理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提供适合青年人格健全发展的客观条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有利青年人格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帮助青年健康成长。

《计算机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应用例解》沈崇麟、李东山著,载《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4~5期。本文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五城市婚姻家庭调查资料的计算机处理为实例,从操作定义与指标、问卷设计、输入资料、统计分析等方面介绍计算机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应用过程和基本知识。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晏阳初(1890~1990) 初名兴复,又名遇春、云霖,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1916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学士和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在上海青年协会主持平民教育科的工作。1923年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从1924年起,先后在北平郊区、河北宛平、定县、山东烟台、浙江嘉兴、福建龙岩、四川新都、璧山等地举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其中河北定县实验区最为著名。特别邀请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担任定县实验区社会调

查部主任,组织学者对定县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广泛的调查,做出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其中,李景汉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县为单位进行社会调查的范例,被国内高等学校长期选作社会学教材。晏阳初本人写的《定县实验报告》至今仍是国际乡村建设学院选定的学生必读书籍。1940年平教会迁到重庆,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北碚歇马场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67年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董事长,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他曾任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顾问、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由于他一生致力平民教育事业并有突出贡献,1943年国际学术界评选他为“全球十位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1987年美国总统一里根颁赠他“扫除饥饿终身成就奖”。晏阳初的著作,讲演甚多,主要收录在《晏阳初全集》中。

卢作孚(1893~1952) 四川合川人。1926年举办乡村建设实验区,早年曾办通俗教育会,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他在进行实业建设和推动平民教育的过程中,对四川社会学的发展也做了重要贡献。论著有《乡村建设》、《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社会生活与集团生活》、《社会的动力》等。

李安宅(1900~1985) 河北省迁西县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学家。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班,1926~1934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助教、讲师。1934~1936年接受罗氏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进修,其间曾到美国中部印第安部落进行实地调查。1935年曾到墨西哥考察少数民族社会及乡村教育。1936年回国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副教授。1938年与夫人于式玉赴甘肃夏河县拉卜楞藏区进行实地调查,对藏族社会、文化教育和宗教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写成一系列考察报告和论文。1941~1947

年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创办华西边疆研究所,其间曾到西康省德格地区进行调查,写出《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等论文。1947年到美国,任耶鲁大学研究人类学系客座教授。1948年在英国考察讲学。1949年回国后仍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1956~1961年任西南民族学院副教务长和民族政策教研组组长。1961年至1985年任四川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兼外语系主任。他治学严谨求实,著述甚丰。专著有《美学》、《意义学》、《巫术与语言》、《礼仪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社会学论集》、《人生、家庭、社会》、《社会科学与真知》、《边疆社会工作》等。论文有《美国印第安人祖尼部落的母系社会研究》(Zuni: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ries)、《西藏系佛教僧教育制度》、《拉卜楞寺的僧官及各级职员的类别》、《拉卜楞寺概况》、《论信仰与宗教》、《回教传入中国与回族问题》、《喇嘛教育制度》、《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论创化教育》等。译著有《交感巫术的心理学》、《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两性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

胡鉴民(1896~1966) 江苏省宜兴县人。1922年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并获硕士学位,后至比利时和德国继续研究社会学。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劳动大学任教,后在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任社会学教授。

1936年入川任四川大学教育系教授,主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课程。1937年自费到理番县等地进行社会实地调查,写出有关羌族社会生活和习俗的论文。1953年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讲授人类学、原始社会、中国古代史等课。受涂尔干学派的影响较深,是中国社会学界中重视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学者,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论著有《中国社会的分析》《观念社会学》《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社会现象的研究》《关于社会学几个根本问题的讨论》《社会学与社会问题的研究》《羌族之信仰与习为》《羌民族经济活动型式》《苗人的家庭与婚姻习俗琐记》等。

冯汉骥(1899~1977)字伯良,湖北省宜昌县人。(生平详见《考古学》)。对中国亲属制度的研究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蒋旨昂(1911~1970)河北省丰润县人。1934~1935年在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1935~1937年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研究生,1937年夏游历英国、丹麦、瑞典、苏联,同年冬回国,作山东济宁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实验区指导员。1938~1940年在贵州定番乡政学院任讲师,1940~1941年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任副教授、教授。1947年至194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进修,1948~1949年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至1953年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授、总务长、教务长。1970年在四川医学院任总务长、副教务长。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和乡村社区研究,尤其是乡村社区研究方面在社会学界有重要影响。译著有《集体行为》,专著有《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黑水社区政治》《成都社会事业》《社会工作导论》等。

第十五章 军事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古代巴蜀的军事学研究

汉代巴蜀地区是刘邦争夺天下的后方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为国家统一、保境安邦斗争中,四川涌现出一批文臣武将,军事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汉代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撰写的《谕巴蜀檄》《告巴蜀太守》两文,在军事檄文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提出攻心为上、恩威兼施的军事思想;“兴必虑衰,安必思危”,受到历代政治家和兵家重视。

三国时期,频繁激烈的战争带来了研究军事的又一个高潮。据统计,魏、蜀、吴三国共著录兵书 60 余部,其中蜀国达 34 部。以诸葛亮为代表的一批军事家和学者,建立了巴蜀古代军事学的里程碑。

蜀国丞相诸葛亮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军事著述极丰《中国

兵书通览》载有兵书 20 多种,大部已经失传。中华书局 1960 年 8 月辑校出版的《诸葛亮集》,汇集了自著或托名的兵书有《草庐对》、《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南征教》、《军令》、《兵法秘诀》、《兵要》、《作木牛流马法》、《八阵图法》、《论斩马谡》、《答姜维》、《谕谏》、《算计》、《二十八宿分野》、《便宜十六策》、《与兄瑾论白帝兵书》、《将苑》等,其内容涉及到战争观、国防观、军事谋略、将帅选用、兵制、作战、治军、后勤等各个方面,为历代兵家所继承和发展。

晋巴西安汉人陈寿所著《三国志》,是举世公认的一部重要的军事历史著作。

据《中国兵书知见录》载,唐朝巴蜀兵书很有价值。梓州盐亭人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撰《兵权》1 卷,24 篇,系统地论述了出军、练士、结营、道

德、禁令、教战、天时、地形、水火、五间、将体、料敌、势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势、先胜、围师、变通、利害、奇正、掩发、还师等问题。

宋朝在与辽、西夏作战中屡战失利,大批学者纷纷言兵,形成自春秋以来兵学复兴的高潮,四川又成了宋王朝抵抗辽、金、西夏以及后来蒙古的战略要地。仅《宋代蜀文辑存》就收录452家、文章千余篇,其中四分之一以上为言兵、论战、选将用兵、军事战略、边防战备方面的论述。

苏洵撰有《权书》1卷及多篇军事论文。《权书》包括《心术》、《法制》、《强弱》、《攻守》、《用间》、《孙武》、《子贡》、《六国》、《项籍》、《高祖》等十篇。对人心、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攻守中的正道、奇道、伏道论述也颇精辟。

苏轼以策论、诗词等方式阐述战略战术和治军用兵、安边御敌方略,并撰有《残仪兵的》1卷,以及《教战守》、《训兵旅》、《练军实》、《倡勇敢》、《虏为中国患》、《用兵》、《管仲论》、《孙武论》、《诸葛亮论》等多篇军事国防策论。其中《教战守》最为精辟,其居安思危、全民习武思想为历代兵家所推崇。

张浚撰《绍兴中兴备览》41篇。另有《议练兵疏》、《论用兵疏》等172篇言兵论战的奏疏,是宋代武将中兵学论述最丰者。

张浚之子张栻,撰《诸葛武侯传》

1卷和《请誓克言和专务自强疏》等奏疏。他主张修德政、选将帅、练甲兵、进战退守,治实而不虚的国防战备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余玠治蜀期间,革除弊政,大开屯田,整顿军队,筑城设防,多次击退蒙古军的进攻,保卫了巴蜀的安全。他制定的《经理四蜀图》,是他治理四川的宏伟战略计划。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他创造了“依山筑城、恃险据守”、“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山城防御体系,有效地阻止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创造了古代战史上的惊人奇迹。

李焘撰有《南北攻守录》30卷、《记女贞契丹兴灭七十二侯国图》3卷、《西南备边录跋》、《武经总要跋》等,另有《论上供钱移以贍军疏》等。

明清两代四川兵学著作也不少。明代新都人程涓撰《孙子集注》13卷,佚。清代年羹尧撰《治平胜算全书》16卷、《年将军兵法》2卷。岳钟琪《清史稿》有本传,称他“治军有方,沈毅多智略,能与士卒同甘苦,人为乐用”,有集行世。杨遇春撰《武备制胜编》13卷。

二、近现代四川军事学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后,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兵学逐步向近代军事学变革。既继承了传统兵学理论遗产,又接受了西方一些先进军事思想,丰富了军事学的学科体系,取得了新的成就。近代四川军事学专著较

少,军事思想多散见于文集中。

丁宝祯有《丁文诚公奏稿》,在川奏稿达14卷,其中有《筹备边防》《训练绿营制兵》《派员带勇营赴援台湾》等59折军事奏疏。

四川近代军事教育始于1903年初开办的四川武备学堂。该校招收文武举人、监生、童生及官商客籍子弟,本科3年毕业,有步、马、炮、工、辎五科,另设速成科一年毕业,培训都守以下官弁,有些本科学生派送日本留学,至1905年共招生270人。1904年又开办四川官弁学堂,以讲求战术,训练将才,主要轮训武官及招收武官子弟入学,课程有数、理、化、文、史、地、修身等普通学科和典、范、令等军事学科。1906年武备学堂停办,改建四川陆军小学堂,校址仍在成都北较场,每年招生100人,3年毕业,课程与官弁学堂一样,另加外语。1908年武备学堂复办,改称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仍设步、骑、炮、工、辎五兵科。辛亥革命后,又改称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办了3期,1915年停办。

民国初年川军军官多为留日军校生和四川军校生。其中不乏军事学人才。在川军中担任高级将领的张志和从国外翻译了一系列军事著作,并撰写了军事理论专著《现代战争论》《军事与政治之关系》。

此期潜心研究我国古籍并取得军事学研究成果的学者和著作主要有:

1925年杨宝善和苏沛林共同编辑的《历代名将战略概要》(上、下集)32卷8册,1926年官道尊撰写的《诸葛亮心书集注》1册,1934年程昌祺撰写的《黄石公素书解》1册。

在本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四川出了一批著名的军事家。以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为代表。在中国革命实践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广泛开展军事理论研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中国军事理论体系。他们关于战争观、方法论、农村包围城市、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的著述,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指导了人民军队作战、训练及国防现代化建设,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军事科学理论宝库。朱德元帅的军事学学术成果,主要是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军事辩证法方面,著述宏富。刘伯承元帅的军事论著和译著多达80余种,是远谋韬略的军事战略家。

陈毅元帅的主要军事思想包括:革命的军事学,中国革命战争特点,人民军队的建设纲领和方针,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聂荣臻元帅的著作有依靠政治思想工作建设革命军队,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大兵团作战,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等。

罗瑞卿大将的军事著作较系统地

总结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对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张爱萍上将主要论述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内容,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陈伯钧上将主要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和人民战争理论。傅钟上将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和理论家,提出要把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来加以研究和探讨。

南京军事学院郭汝瑰主持编写的《中国军事史》共5篇,详细论述我国兵器、兵略、兵制、兵法和军事人物。国防大学张昌茂的学术论文,探讨未来战争的战略战术。

1959年4月,成都军区成立军事科学委员会和军事科学研究处,并先后在全区部队、院校相继成立军事科学委员会和专职科研机构,开展正规化军事科学研究工作。1984年四川省军区召开了首届后备力量建设学术讨论会。1985年成都军区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学术讨论会和亚热带山岳丛林作战学术讨论会。

重要成果有: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的《适应战略思想转变,加强军事理论研究》、《在热带山林地防御中组织阵前出击的初步体会》,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中

的交通运输问题的几点看法》、《进攻作战达成速决的几点看法》、《从咸阳阻击战想到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对防御战役几个问题的探索》、《必须坚持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的《一次成功的诱伏战》、《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城市防空问题探讨》,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成功的《谈谈参谋训练问题》、《要重视野战阵地防御与坚固阵地防御相结合》,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的军事史料《鄂豫皖武装斗争的卓越领导者曾中生同志》,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志礼的《加强战略预备队作战准备中的几个问题》、《装甲兵应在速决的进攻战中唱主角》、《运用现代化合同战术突破的几个问题》,四川省军区司令员任应来《试论我国的兵员动员形式》、《后备力量建设应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王相如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丛》、《军事学术论文选编》,别朝田的论文《人民战争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谢欣的论文《谈谈战争论一书中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方式的变革》,安田的论文《闪击战及其有关的历史教训》、《游击战应向现代化发展》。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 著

《历代名将战略概要》 杨宝善、苏沛林著,成都映雪庐 1925 年石印,约 60 万字。该书取材于左氏春秋、司马光资治通鉴、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唐书、新五代史、宋元明清史关于军事策略著述,节录成帙,共 32 卷。起自春秋,迄止清代。该书略如纪事本末体,每条有纲有目有论,有注疏,并附有多幅沿革地图,便于左图右史,两相印证。全书资料翔实,编辑系统,并以水经注、杜佑通典《华阳国志》为根据,对官制、地名进行了校正和注疏,对研究中国军事思想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诸葛亮心书集注》 官道尊著,成都昌福公司 1926 年 3 月初版。该书对《心书》兵权、将材、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等 46 条,逐条进行注疏。此书注疏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独树一帜,对研究《心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谈谈几个战术基本原则》 朱德著,载《红色战场汇刊》,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1933 年 6 月印发。作者系统地论述了 6 个战术基本原则:红军军人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决不允许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在进攻中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

并集中兵力在这一方向决战,反对平分兵力。战略上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上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受领任务时,要明了首长的决心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的地位,必要时在上级意图下机断专行。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下定适当的决心。在山地作战时要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上述六个基本战术原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红军作战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是指导红军作战的战术原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内容。

《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曾中生著,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3 年 10 月印发。全书十节,以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一节,内容极为丰富。其基本思想:一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与规律的探讨,明确地提出“反围剿”已成为时代的特种战术。二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文章强调发挥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威力。三是关于作战形式。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当时最适合敌我情况、最容易发挥人民群众力量的作战形式。四是关于作战指导方针。在战术上强调速决和进攻,兵力使

用上强调集中优势必胜的兵力,反对分割兵力与分兵把口。

《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刘伯承著,载《革命与战争》第三期。1934年5月15日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59期转载。文章以解答问题的形式提出和回答了20个问题。对游击队的性质、组织领导、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活动方法、相互关系等,都作了精辟的回答。是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作用。

《现代战争论》张志和著,上海辛垦书店1936年版。作者1937年9月到延安时曾将此书及辛垦书店出版的克劳塞维茨作的《战争论》送给毛泽东主席。全书以历史和哲学的眼光审视现代战争的形态和特质,指出现代战争不仅是武力战,而且是经济战、战略战、思想战;“今年底战争,是拼综合国力的战争。而国民就是国力底唯一要素。”作者批判了“唯武力”和“抗日三月亡国”论,呼吁培植民族精神,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

《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刘伯承著,这是1937年11月28日的讲演稿,后汇编成小册子,作为部队的教材。该文提出抗日游击队的基本任务:第一组织全民族的抗战,为动员一切力量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游击队首先要服务于抗日的政治目的,要为结成广泛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第二,配合基干军队打胜仗。第三,壮大本身成为基干军队。第四,消耗日本强盗的力量。文章创造性地发展了游击战理论,是开展游击战的指南。

《军事与政治之关系》张志和著,1937年12月成都球新印刷厂初版,1938年6月再版。全书10章29节,分别论述: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战争的发生、种类,现代战争形态,现代军事发展方向,少数军,大众军,全民抗战,军队政治工作,连队政治工作,武装民众。“全民抗战”是全书的核心,阐述了“人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最后因素”的基本观点。在“武装民众”一章中,提出“给人民以抗战的民主权利是团结全民族来抗战的中心”。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

陈伯钧著,载《解放》1938年28期。全文论述三个问题:游击是游击战的基本作战形式。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不是别的,乃是袭击。袭击的基本原则,作者提出秘密而周详的计划,迅速而突然的动作等十二条要领。袭击行动之敌。作者提出埋伏是游击队有计划的隐蔽配置于敌人必经道路的一旁或两旁,待敌人通过时突然袭击之等18条袭击敌人各种行动目标的方法。

《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刘伯承著,载《战术研究资料》1938年3月出版。

该文论述三个问题：游击战与运动的内涵。敌人在作战中的十个特点。

在广大民众中繁殖游击条件下,组织和进行游击战、运动战,以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适当配合,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此文精辟地论证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区别和联系,指导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方针、原则和具体方法,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概括,揭示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规律,不仅对当时正蓬勃开展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

《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罗瑞卿著,1938年10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出版。全书共8章,39个问题,约20万字。作者提出:要使我们国防军队更加坚强起来的中心环节是:以政治的威力提高军队的政治觉悟,加强其对于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心,强固军队的统一和团结,反对任何军阀传统和派系观念及各种有害的分裂倾向,以及切实建立军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执行正确的敌军政策。只有具备这样政治质量的军队才会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为了抗战到底,必须真正建立一切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此书是在抗战开始后一年零四个月时写的,比较系统地总结和介绍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抗日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著,载《前

线》周刊,1938年初八路军总部印发,约26万字。全书论述五个基本问题,计37节,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抗日游击战争是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抗日游击队在作战上有自己特殊的战法。概括地说,就是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敌人进攻。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迅速、秘密、坚决。

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方针: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破坏仓库,袭击飞机场;暴露敌人的企图,震恐敌人的军心;破坏敌人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分散敌人兵力;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篇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对目前战术的考察》刘伯承著,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8月至10月,约45万字。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第二部分,目前敌人对华北作战的概况。敌人在实行其“国家总力战”,采取了“思想战”、“经济战”、“政治战”、“外交战”等四战。第三部分,我们目前战役的纲要。配合游击战和

运动战并调剂其分量。自卫队、游击队配合基干军队作战。截断敌交通。拿反围攻对付围攻,造成敌人腹背受击。第四部分:我们战斗的目的和手段。文章对于当时全民族的抗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

罗瑞卿著,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4月,约2万字。全文论述党的工作,干部问题,部队政治教育等10个问题。文章回答了现实斗争中提出的若干问题。作者强调党的建设在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注重了干部的选拔和干部组织能力的提高,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工作作风。文章认为,军队力量的加强,不仅是争取坚持抗战的“决定因素”,并且是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有力保证。军队的建设,必须有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设与之相适应。政治工作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较好地解决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问题,对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刘伯承著,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全文论述:战术社会性扩大、敌进我进、群众性游击战争演变中的威力、交通斗争、对现代技术兵器的斗争、侦察与防谍等六个问题。核心是“总体战”思想。作者指出:军队与人民相结合,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斗争相结合,正规军、游击队、人民武装相结合,实行党政军民一元斗争,这就是“总体战”的基本含义。我们要用“总体战”去粉碎法西斯的所谓总合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为一体的“总力战”。同时,还提出“敌我的战术竞赛,将随之而更新颖更丰富的发展,急需我们在战斗中注视研究与发展战术”。该文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民战争理论。

《论解放区战场》朱德著,这是作者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次印刷,约3.1万字。这篇报告是朱德军事理论的代表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两军对比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两种不同的战争,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两种不同的结果。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人民军队的兵役、养兵、带兵、练兵、用兵等一整套的建军和作战理论。对军队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政治工作基本问题》傅钟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1982年3月印发,约12万字。这是作者1954年3月15日在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讲课的讲稿。全文分四讲: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学说。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政治工作的作风与方法。文章系统分析与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原则、内容和方法,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传统教材,对军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广泛深远的影响。

《刘伯承用兵录》 杨国宇,陈裴琴编,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约20万字。该书辑录了《夺取天险娄山关》、《用兵琐忆》、《论兵新孙吴》等30篇文章。作者中有的长期跟随刘伯承同志指挥打仗的负责干部,有的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他们用回忆录和学习札记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刘伯承同志的指挥艺术和用兵特点,以及关于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的理论和实践,从各个方面深刻地反映了刘伯承同志的军事思想,是学习和研究刘伯承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军队管理教育的几个问题》 贾若瑜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1982年印,约2万字。作者认为,军队有它的阶级性,建军原则和军队管理教育的方法也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剥削阶级的军队,其管理教育原则是建立在军官压迫士兵的阶级压迫之上的,其管理教育方法,是以惩办主义为特征的。我们军队有一个共同的政

治目标,在政治上官兵完全平等。因此,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崭新的,区别于任何旧式军队的管理教育原则和方法。该书系统地总结了军队传统的管理教育经验,对军队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 任荣主编,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约20.8万字。全书12章并附9篇重要历史文献,总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宝贵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军队今后作战和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 论 文

《南昌暴动始末记》 刘伯承著,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该文作于1927年11月,全文论述南昌暴动之前的政治、军事形势,南昌暴动及由南昌到广东的情况,并充分肯定了南昌暴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指出,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可惜失败了。但换来了失败中求得的教训。结论是南昌暴动是应该的,胜利的可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行动上犯了错误,才导致这次暴动的失败。

《怎样创造铁的红军》 朱德著,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1931年7月第二期、第三期。文章提

出:创造铁的红军应具备6个条件: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政治训练的重要;军事技术的提高;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这篇文章是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一篇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对毛泽东建军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刘伯承著,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文章作于1936年9月20日。全文从实战经验中概括提炼出15个问题:进攻战斗,必须选定主要突击方向、集中兵力、争取速决的胜利。防御要互相策应。要采用迂回战术。察明敌人部署、地形、道路,以及敌人和居民的政治情况,是战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警戒。通信联络。执行命令指示与机断行事。发扬夜间机动的优势。行动坚决紧张而有创造性,是争取胜利,克服困难的优越条件。实事求是,趋利避害。军政结合,文武双全,克服单纯军事观点。首长身先士卒,作部属的表率。要休养生息,养精蓄锐。(14)开展革命竞赛。向导是我军的耳目。文章从作战方针、原则、组织指挥到具体作战行动都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是以战教战的教材,是练兵、带兵、用兵的理论基础。

《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邓小平著,载《前线》周刊1938年2月12

日第3、4期。文章指出: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解放的。作者以介绍人民军队,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经验的方式,盼望政府和军队都能运用这些经验,抛弃强迫抓丁等强征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此文作于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抗日战局暂时处于局部失利的情况下,虽然论及的是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问题,但对于如何壮大国防力量,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参谋工作职责与认识》陈毅著,载成都军区司令部科研处1962年1月15日编印的《司令部工作参考资料》。该文作于1941年。作者提出:参谋工作是部队的灵魂,一个参谋工作者,起码要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待人接物的风度,对人对事的品格。军队好比一部复杂的大机器,互相间的关系弄不好,各部机件就不灵活,这是参谋工作怎样做法的主要问题。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参谋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系统地总结了参谋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司令部建设,参谋人员的修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陈毅著,载1942年7月新四军司令部《军事建设》创刊号。文章指出:了解和执行党的军事方针,要防止把游击战

和运动战对立起来、把保持有生力量绝对化等倾向。在执行党的军事方针上要反对分散主义对全军的统一集中领导的削弱；反对独立主义对总的战略方针的割裂和曲解；反对教条主义对实战经验的轻视和隔离；反对对具体经验的固定化和绝对化；反对组织战役指挥战斗中不脚踏实地、不正确分析情况的主观主义等。

《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邓小平著，这是1948年8月24日作者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综合报告。报告提出了进入新区前的准备及进入新区后的展开、作战、供应、社会政策、地方武装、干部等方面的七点建议。建议正确地解决了军事与政治、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是军队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

《关于今后作战准备和军队建设的意见》刘伯承著，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这是作者1949年1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发言提出：战略布局由前年的中央突破，变成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

开辟新区的组织问题，在未出动前，就要有一套地方党政军的配备，建立军政府，实行军事管制。正规化问题，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的正规化，才能组织战争。野战军与后勤问题，“补充在前线”与“加强后勤工作”不矛盾，这次170万人南下江

南，没有后勤保障，没有财经是不行的，作者把军队正规化与后勤建设提到建军议事日程，是很有远见的。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邓小平著。这是作者1949年4月向中央军委写的报告。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正确的分析了敌我态势，准确的情况判断，正确的决心部署，指导“京沪杭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纲要显示了军事家的高超指挥艺术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刘伯承著，载1951年4月20日《八一杂志》创刊号。这是作者1951年1月在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历史使命，目的意义，方针政策，措施和办法。报告强调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队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脱离我军建军传统、军事思想的优良基础而企求另搞一套“现代化”；另一种是满足于旧的一套，拒绝正规化、现代化的学术保守倾向。报告为由传统建军转变到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开幕词》朱德著，载1954年3月20日《八一杂志》84期。开幕词总结了我军建设的成就，提出了今后我军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具体任务和措

施。

《谈谈战争论一书的辩证法》 谢欣著,载《军事学术》1978年第九期。文章从战争与政治、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实践与理论、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进攻与防御等五个方面论证了《战争论》一书中的辩证法。同时指出:克劳赛维茨的《战争论》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20年完成的。那时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还没有诞生。克劳赛维茨用以研究战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和他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局限,因此,他的辩证法和对战争的解释不可能是完备的。

《闪击战及其有关的历史教训》 安田著,载《军事学术》1981年增刊第一期。作者认为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闪击战取得巨大胜利,从军事上说,是军事思想上的先进战胜落后,创新压倒守旧。从军事学术方面看,先进的军事学术和战争的正义的一方不存在天然的联系。交战的一方突然使用新的先进的作战方法,可以使自己获得很大的优势。在军事学术领域内反对保守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交通运输问题的几点看法》 王诚汉著,载《后勤学术》1981年第二期。作者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战争。充分认识交通运输在

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交通运输的规律,抓好平时建设,是落实战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代化交通运输建设中必须贯彻平战结合,军民两用的方针,所有新设计建设项目,都要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满足战备需要。

《加强战略预备队作战准备的几个问题》 张志礼著,载《军事学术》1982年第二期。文章指出,未来反侵略战争要顶住敌人的突然袭击,我军必须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军在平时的准备。在平时应做好五个方面的准备:熟悉战区情况,拟制好作战预案;做好扩编准备,提高动员扩编速度;作好机动准备,保证适时向战区开进;加强物资储备,保持装备器材的良好状态。

《适应新形势认真带好兵》 何正文著,载《军事学术》1982年第八期。文章论述了在新形势下带兵的5个问题:熟悉兵,了解兵是带好兵的前提;带兵必须爱兵;要有科学的带兵方法;既要言教,更重身教;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潜心研究之带兵之道。

《发展我军武器装备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张爱萍著,载《军事学术》1982年第八期。文章指出:发展武器装备。第一,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我们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思想,以及地理、经济等特点,自力更生,

从仿制开始,到自行研制,闯出自己的路子。第二,抓住重点。从当前国防建设和防御需要的实际出发,除生产一定的武器装备供边防军和部队训练外,就不要生产那么多一般的武器装备,以便节省财力用到发展新的武器装备上去。第三,阶段论同发展论统一。采取逐步完善,不断革新,直至达到更高更先进的水平,要求我们武器装备在短期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办不到的。文章所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发展武器装备的方针,为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咸阳阻击战想到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王诚汉著,载《军事学术》增刊1984年第二期。文章通过对咸阳阻击战的回顾与总结,对今后怎样打好现代条件下的阻击战作战问题,提出了6点看法。立足在仓促条件下投入战斗;着眼在特定的、不利的地形上抗击敌人;敢于战胜新的对手;采取综合防护措施、提高部队生存能力;坚持独立作战,顽强坚守;经得住敌人连续多次冲击。文章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引出并探讨未来作战的问题。

《关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聂荣臻著,载《军事学术》增刊1984年第三期。作者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10条经验,这就是:根据地是依托,群众是依靠,党的政策是决定的因素,坚持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相

互配合,加强与巩固抗日政权;根据地既要巩固,又要不断扩大;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斗争;经济政策和锄奸政策,万万不可发生偏差;实行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游击战应向现代化发展》安田著,载《军事学术》1984年第八期。作者认为:游击战是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作战形式,它的发展是否适应未来战争要求,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关于游击战的发展方向问题,作者提出了四点见解:游击武装力量向现代化发展势在必行;系统地研究现代游击战的理论;建立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体制;大力改善游击作战的武器装备。

《试论我国的兵员动员形式》任应来著,载《军事学术》1984年11期。文章根据我国的国情,过去的经验,未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填补,分孽,递升,升级,调服,卵生,跳跃等7种动员形式。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确定何种兵员动员形式,作者认为应因情而异,有主有从,简便易行,程序优化,就地就近,平战结合,讲究质量,形成拳头;通观全局,持久动员。

《装甲兵应在速决的进攻中唱主角》张志礼著,载《军事学术》1985年第七期。装甲兵为什么应在速决的进攻中唱主角?文章从3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从武器装备的技术战术性能上

看,装甲兵优于步兵,利于达成速决。

装甲兵能不能唱主角?从战争初期速决的进攻作战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可以保证有充分数量的装甲兵唱主角。从我军的现状看,装甲兵唱主角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用发展的眼光看,我军装甲兵唱主角的物质基础将会更加雄厚。装甲兵如何唱主角?在作战指导上要选择利于装甲兵达成速决的歼敌地域;要坚持选弱敌打的原则;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装甲兵;要明确战斗的指挥权限等。

《后备力量建设应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任应来著,载《军事学术》1985年第九期。文章提出后备力量建设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中心之点就是后备力量建设要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后备力量建设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即由训练普遍兵员为主,转为以训练技术兵员为主;由分散储备为主,转变为集中储备为主;由单一动员补充为主,转变为建制动员补充为主。改革是同步发展的必由之路。要通过改

革逐步把我国的后备兵员建设成为一支比例协调、种类齐全、训练有素、布局合理、应召快速的强大后备军。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别朝田著,载《军事学术》1985年12期。作者认为,人民战争、游击战争、持久战及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精华。它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为我们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树立了光辉典范。

《适应战略思想转变加强军事理论研究》傅全有著,载成都军区军事学术指导委员会《军事学术论文选编》第一集。这是作者1985年12月19日在成都军区热带山岳丛林地作战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全篇讲3个问题。深刻认识战略转变时期开展军事理论研究的战略地位;正确把握军事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努力建立强大的军事理论研究队伍。

第二节 主要学者简介

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县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在滇军中任团长、旅长,参加护国、护法战争。1922年赴法国留学,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到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和陈毅率起义余部转战闽粤赣湘边,发动湘南起义。1928年4月率起义军

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1930年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等职,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等战役的胜利,随后深入华北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指挥解放区军民开展对日大反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参加组织指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949年4月,他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部署渡江战役和解放西南、西北地区的重大战役,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他在军事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艺术上的一整套理论创建。1925年在苏联学习期间,曾提出回国后将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1927年南昌

起义失败后,他领导部队由单纯打仗转变为同时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的斗争;在军事上开始实行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硬打硬拼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指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主要军事著作有《怎样创造铁的红军》(1931)、《论抗日游击战争》(1938)、《论解放区战场》(1945)等,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经验,论述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建设人民军队,决定战略战术。朱德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建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志和(1894~1975) 四川邛崃县人。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长期在川军中任职,曾任旅参谋长、川军总司令部参谋、混成旅长、师长,四川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抗战期间任30集团军参谋长,1941年加入民盟,曾参加并策划刘文辉、邓锡侯的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译著有《现代战争论》、《军事与政治之关系》、《国共战争胜败管窥》。

陈毅(1901~1972) 四川乐至县

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上旬加入南昌起义部队。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与朱德等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翌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后来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秋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项英一起转战赣粤边,领导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代军长,指挥了黄桥等战役,参与领导华中敌后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转战华东、中原战场,取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后又参与指挥淮海、渡江等战役,率部解放南京、上海及东南广大地区,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华东局第二书记。1954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陈毅资兼文武,博学多才,生前发表过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1941年先后发表了《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建军报告》等指导部队建设的重要论著。

曾中生(1900~1935) 原名钟圣。

湖南省资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1月到达湖北黄安,在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中,他果断地组成中共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随后主持制定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创办军政学校,整编红军主力。1931年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冒险主义,屡遭打击,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5年2月被杀害于四川省西北部卓克基。曾中生在军事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红军早期的战略战术和人民战争、游击战理论。在被囚禁的困难条件下撰写有《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理论著述。

罗瑞卿(1906~1978) 四川南充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任红军大学教育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治委员等职,参与指挥了石家庄、太原等

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政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罗瑞卿在军事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著有《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1938)、《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1942)等。

陈伯钧(1910~1974) 四川达县人。1926年冬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20军独立团。参加过湘赣边秋收起义。后在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任排长。上井冈山后,任中国工农红军连长,赣西游击队参谋长。参加过龙源口战斗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长征期间,任红

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1937年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1938年起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参与指挥辽沈、平津、衡宝、广西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率部清剿湘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后协助刘伯承组建军事学院,1957年起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伯钧在军事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游击战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主要著作有《论抗日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1933-1937年日记》等。

第十六章 人 口 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近现代四川的人口学研究

(一)传统人口登记制度

中国封建时代的人口统计与赋役征收紧密联系。统治者视户口的多寡为国家盛衰、社会治乱的标志。掌握户口不仅在经济上可以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政治上则可以为统治者树碑。因此,中国实行户籍制度之早,人口调查、统计和呈报之全面,以及人口数字资料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有史籍可查的四川人口数字,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熊相纂修的明正德《四川总志》,是四川地方文献中记有人口数的最早史籍。清嘉庆年间成书的《四川通志》和四川各府州县志,户口数据的记载分别以县为单位。《汉书·地理志》、嘉庆《四川通志》,都有四川少数民族的人口记录。

民国期间,宋育仁主修之《四川通志》稿本,记述并分析了四川省在西

汉、三国、晋、唐、元、明、清和民国5年的全省人口数和分区人口数。

1914年,按照1913年北京中央政府内务部颁布的章程和格式,四川各地政府开始调查人口并整理,出版《四川省内务统计报告》。

政府的直接参与,是中国人口研究的一大特色。其中,由政府推行的人口普查是人口研究的物质基础,对于开展人口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现代人口学则是随社会学而从西方传入的。

(二)现代人口学研究

1918年,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开设了社会学。

同年,中国人口学家陈长蘅发表了《中国人口论》,此后,他又发表《中国劳动力问题讨论》等一系列论著,对人口问题进行广泛的阐述,并将西方人口学较早地介绍回国。

1931年国立四川大学成立,该校不少院系设有社会学、人类学等课程。英美等国教会开办的华西协合大学,也较早地开设了社会学。四川的高等学校,除开设有与人口学联系密切的社会学、人类学课程以外,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华西协合大学、乡村建设学院还专门开设有人口学。

在研究机构的设置方面,华西协合大学的中外学者于1922年建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对华西内地及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考察,也研究人口问题。1935年,四川大学成立了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从事四川及西南地区的经济、民俗和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些机构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成果涉及人口学的许多方面。

1928~1933年,由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在四川从事的《土地利用与人口调查》,搜集了有关出生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一系列人口变动数据。称得上四川人口统计历史上最宝贵的资料之一。此项调查是全国性的,为跨省区的人口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调查结果发表在1934年民国政府实业部编的《中国经济年鉴续编》。

随着社会学在四川的广泛传播和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人口学界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如《成都工人生活调查》、《成都市人口职业类别表》、《中国男多于女所发生的失婚问题》

(李剑华)《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胡鉴民)《农村人口减少的一例—农民离村运动》《农民离乡的统计》(川大、南开等)、《四川农村崩溃与人口压迫》。《民国意识》第三年合刊还统计了成都市自1909年至1935年的人口数字。这些文章,对于研究四川的农村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1936年民间意识社印发施居父著《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介绍并分析了汉、魏、宋、元、明、清等朝代某年或某一时期的四川全省和府、道、州的分区人口数;并认定宣统年间四川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的人口数为50562897人。同年《民间意识》社出版人口研究专集,刊登施居父著《四川历次人口统计的分析与检讨》一文,该文是这一时期四川人口研究的代表作。该专集还登有《四川人口七千万之由来》一文,认为“七千万之说,系根据光绪年间之户籍报告所列四川人口总数”,并依此刊列于中外《年鉴》,其后“逐年量为增减七千数百万之间”,实为“习焉不察”之数据。此外《四川月报》刊载了1936年3月至1937年10月四川各行政区的人口统计数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学校内迁,人口学在许多高等学校的社会学系或社会学课程里,占有相当的比重。人口学的研究工作在四川形成了一个高

潮。还通过社会调查与社会工作,加强了人才的培训。1941年,华西协合大学建立华西边疆研究所,1948年秋,成立社会人口研究室,社会学系的蒋旨昂教授招收了人口学研究生。

这一时期,社会学界对四川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颇有成效,出版了一批著作和统计报告。重要的有《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金陵大学)、《人口问题》(孙本文)、《生命统计方法》、《农村社会调查方法》(张世文)等。1944年,在金陵大学柯象峰教授主持下写成的《成都皇城坝劳工家庭调查结果之分析》、《四川农佃分布情况》、《四川农村的阶级变化》等文,对于研究四川农村人口的阶级构成,提供了资料。《四川月报资料》,对1932年至1938年四川各县人口变动,成渝二市人口变动情况作了统计,同时对1937年的死亡人口、1938年的烟民亦作出统计报告。《四川统计月刊》1939年2期,对上年成都市人口的逐月变动,职业情况和教育程度进行了统计分析。

对于边区和历史人口的研究,也受到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很大重视。出版的专著和文章有傅双无《四川边区各民族之人口数字》、柯象峰《西康社会之鸟瞰》、林耀华《凉山夷家》、胡庆钧《川南叙永苗族人口调查》等。李安宅对川甘青交界的“安多”方言地区进行了考察,发表《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和《德格之历史与人口》等文,后

者是人口学的重要论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国民政府对四川的人口状况,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四川省主计处统计局,1942~1946年陆续出版的调查报告有《四川选县户口普查方案》(1942)、《四川省选县户口普查总报告》(1943)、《中国人口问题的统计分析》(1944)、《四川省统计提要》(1945)、《四川统计年鉴》第一册(1946)等。这些调查报告,对当时四川的人口分布、密度、户均人口、性比例,人口的年龄、职业结构,婚姻及教育状况,以及各行政区、成都市的人口现状进行了记述和分析。《自贡市政府公报》创刊号发表了1939年建市时户口调查所得自贡市户数、男女人数,以及人口年龄、教育及职业结构材料。四川省民政厅统计室、重庆市卫生统计联合办事处、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也发表了有关四川人口问题的报告。

我省的特殊人口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四川省概况》依据1936年度的调查,称“全省烟民总数为133.88万人”,“烟膏内销数量为10599担,外销为6280担”。《四川月报》1936年9月,统计江安、富顺、江北、开江、灌县、永川、邻水等县瘾民为60287人。该刊同年10月载《四川各县瘾民统计资料》称:成渝二市及17个行政区117县之瘾民统计为115.56万人;作者并据此推算,估计

全川瘾民除以前已戒除一部分外,当不下一百五六十万人。

二、当代四川的人口学研究

(一) 停滞时期(1950~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面临如何适当新社会的需要而加以改造的问题。因受苏联学科建设理论的影响,从1952年开始,全国高校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课程陆续停办和停开,人口学研究随之中断。

50年代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对甘孜、阿坝和凉山自治州派出慰问团和访问团,政府组织的这些团体,对人口状况也作了调查;1956年,由全国人大民委领导的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搜集有少数民族人口资料。四川省、地、州人民政府,进行的家庭经济调查,也保存有少量的典型人口年龄结构资料。

在此期间,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四川于1953年和1964年两次进行人口普查,这两次普查和普查中有关规定所统计的人口资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人口状况保留了基础材料。

(二) 恢复发展时期(1979~1985)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各门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1979年,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刘洪康向大会提交了《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

个基本观点——两种生产》的论文。

1979年5月,四川财经学院人口研究室正式成立。1985年5月,该研究室扩建为四川财经学院人口研究所。1979年秋,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签订的P01项目的规定,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被教育部列为西南地区高等学校人口研究机构的受援单位及研究人口的西南分中心,进行人口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四川省教委也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人口学培训与研究的受援单位。

此期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省计划生育办公室、重庆医学院等单位相继建立了人口研究机构。此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省民族研究所、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华西医科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民族学院等单位,也陆续有人兼职或专职从事人口研究。

1981年,为筹备第三次人口普查,全省各地、市、县建立了人口普查机构。人口普查办公室的建立,普查人员的培训和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工作的开展,对四川人口科学研究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四川省计委计算中心和经济信息中心所建立的数据库,为人口研究提供十分便利的分析和数据处理服务。

1980年6月,四川人口学会筹备会成立,会上开展了四川省计划生育

与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了《四川人口研究文集》。

1981年3月,四川省人口学会正式成立。人口学会成立后,每年都召开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先后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有效地控制我省人口增长的问题”(1982)、“如何开创我省计划生育工作新局面,有效地控制我省人口的问题”(1983)、“毛泽东同志关于人口理论的论述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的问题”(1984)、“我省少数民族人口状况和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以及控制人口增长的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985)。此外,省人口学会还就一些重要的或特殊的课题举行专题讨论会。如“两种生产理论及人口规律问题”、“农村人口控制与农业现代化”、“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人口质量和提高人口素质问题”等等。

四川的人口学界通过互相交换图书资料,参加各自主办的学术会议,进修、讲学,以及合作编撰教材和专著,密切了四川人口研究和实际工作者与国内同行之间的关系,促进和带动了四川人口研究的拓宽和深入发展。同时,四川人口学界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人口学家圆桌会议等国际人口学会议共四次,并多次参加考察团,或以个人身份赴加拿大、美国和日本考察。在国内接待了联合国人口活动基

金会、开发计划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西欧、原苏联等国的学者和官员数十人次来川访问座谈,短期讲学。与世界各国人口学机构及学者加强了联系,交流了资料和信息。四川人口学界还派选研究人员去美国的一些高等学校、联合国开罗人口中心留学进修,攻读博士学位。来自美国的2名人口学博士生,曾到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进修,在四川从事人口学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工作逐步开展。四川人口学界的专业研究人员,先后赴省内的彭县、江津汉族地区,凉山彝族地区,阿坝、甘孜藏族地区,秀山土家族地区,省外西藏、云南的藏族和纳西族等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对成都、重庆和渡口等城市人口也开展调查研究。其中最具规模的有: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从1980年开始的“彭县千户追踪调查”,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对凉山彝区的联合调查,四川财经学院人口研究室对江津、什邡进行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查,并分别发表了研究论著和报告。彭县千户人口追踪调查,其研究成果发表于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4辑《人口调查与研究》,受到学术界重视。

这一时期四川人口学界的研究工作,集中在人口理论、人口态势、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等方面。“两种生产”一起抓的理论研究,使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有了初步了解,社会

效益很好,四川从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思想,基于对人口态势的研究,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来源于对农村人口的研究;在民族地区实行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照顾困难户生三个的人口政策,则依据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制订的。人口研究为现实服务,是四川人口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形成的一大特色。

(三) 研究成果

1. 工具书和教材编写 有刘洪康主编,四川财经学院人口研究室集体编写的《人口手册》,赵世利、张世文、罗忠恕、叶秀书合编的《英汉人口学词汇》,马延华编的《四川省经济地理·人口与民族》,刘梅恩等参加编写的《人口基础》、《人口经济学》,吴忠观参加编写并担任副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以及他参加编写的《人口理论教程》。

此外,人口研究手段也日趋现代化,电子计算机已广泛使用,并已建立数学分析模型。

2. 人口理论研究 有田雪原《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回顾建国以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几次论战》,张天性、海宇东、王茂修合著的《试论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规律》,有刘洪康《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两种生产》和《再论两种生产》,杨致恒、张光照合著《论人类自身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再论两种生产同是历史发展中的决

定性因素》,陈明立《资本论中的两种生产“思想”》,吴忠观《论两种生产的比例关系》、《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和《关于两种生产原理的三次论战》,刘洪康《必须加强人口理论的研究》,吴忠观、杨致恒、王茂修《试论我国人口再生产》,张世文、张文贤《人口的微观研究》,许改玲《马克思人口规律浅探》,吴忠观《坚持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开创我国人口科学的新局面》,陈明立《人类自身生产中两种生命的生产及其相互关系》。

3. 人口应用研究 始于1981年,最早的研究项目是四川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结束以后,人口应用研究工作充分开发和利用了这次普查的资料。经过几年的努力,建立起四川省微观人口数据库,编制了四川分区模型生命表,为人口应用研究的主攻方向——四川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累了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上,罗积玉、邢英、苏显康等人发表了《四川省未来50年人口发展趋势预测的处理方法》,蒋光植发表了《2000年重庆人口预测》,张大鸿、颜德贵等发表了《数据库在人口学中的运用》,罗启蒙发表了《人口普查资料的开发与运用》等。

4. 人口问题综合研究 主要有由刘洪康任主编,赵世利、吴忠观、马延华任副主编的《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周振华的《人口状况与现代化建设》、

《中国人口状况与现代化建设道路》和《试论四川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关系》。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主要的有周振华《论人口状况一定要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张文贤《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林圃、刘根发、彭作策《论计划经济与两种生产》,吴忠观《试论人口经济学的对象性质和方法》,《人口经济学概说》,以及陈振东《对渡口市人口迁移的初探》。

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主要的有张文贤《人尽其才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核心》,《略论农业人口的转移》,什邡县计划生育办公室《试论控制人口与农村贫富的关系》,张芳笠、杨致恒《我国人口布局和劳动就业》,吉铁肩、周存政《从彭县千户调查看四川盆地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及其经济意义》,罗忠恕《怎样提高我国人口质量》,沈冰于《人口结构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李永胜等《四川省彭县大宝山区婚姻活动方式研究》,吴忠观《试论人口质量》,王茂修《农村的商品生产与人口控制》,四川财经学院人口研究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人口控制》。

人口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忠康《四川省遂宁县人口密度与水土流失》,王茂修《论人类生命生产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曾详益

《略论人口的地理迁移对人体素质的影响》。

数理人口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叶秀书《人口预期寿命公式的探讨》,李永胜《四川省建国以来人口出生率变动趋势分析》,四川省人口学研究人口普查办公室《四川人口分析》等。此外,人口学者运用数理人口学研究人口普查资料也做了大量工作。

计划生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王茂修《计划生育必须以思想教育为主》,万长文《认真学习贯彻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阿坝州计委《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完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

5.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张光显、王端玉《少数民族的人口质量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程贤敏《喇嘛教对藏族人口的影响》,王克、吴怡平《论民主改革前藏族人口增长缓慢的诸原因》,吴文《四川苗族人口现状调查浅析》,徐铭《凉山彝族人口历史的发展》,程贤敏《凉山彝族人口问题浅析》,王端玉《喇嘛教与藏族人口》,徐铭《凉山彝族妇女的生育状况》。

6.人口史和人口思想史研究 李世平《旧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思想浅谈》,谢忠梁《中国历代人口略计表——兼及历代耕地面积小记》,《二千年间四川人口发展概况》,郑子尚《四川人口发展史的几个问题》,李世平《中国人口史的分阶段研究刍议》,程贤敏

《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清代游民问题浅析——兼论清代人口的几个争论问题》。有关人口思想史研究的有：李世平《洪亮吉是中国的“马尔萨斯”吗？》、《薛福成、严复、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人口思想的启蒙者》、卢仁善《中国第一部人口学著作“乙丙日记”》。

7. 外国人口问题研究 何景熙《土耳其人口状况和人口经济问题》、《巴基斯坦人口经济问题探讨》、《战后西亚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发展特点和人口政策》和《中印人口状况与人口政策的

比较研究》等。

主要译著成果比较集中地发表在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编辑的《人口研究译文》和四川财经学院人口研究所编辑的《财经译丛·人口专集》杂志上。

四川籍在省外工作的学者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天怡《谈谈美国发展经济时期的人口决策》、张天路《有计划地发展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促进民族繁荣》、《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特点及其转变》、《北京少数民族人口特点》等。

第二节 主要著作选介

一、专 著

《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 陈长蘅著，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出版 约 27 万字。作者认为，一个国家民族如果不注意人口增加的理则，研究预防人口过庶的方法，讲求淑种优生的途术，而完全听民自生自养，必定弄到文化衰败，乱轮常转，种族遭受惨酷的淘汰。作者提出，人口问题为彻底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先决问题。书中讨论了人口数量方面的各项问题。认为人口最易过庶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愈进化，人口增加的可能速率亦因此加大；人类支配环境与抵抗环境的力量远过于他种生物，并且这种力量是随着科学发达

而日有进步；人类愈进化，其两性之生育力似亦随之增大。主张大家把对人口问题的视线，由增加生育一方面移到减少死亡那一方面去。实行适中的人口密度与普遍的生育革命，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就需要大家结婚不要过早，养子不要过多。此外，作者还论述了人口品质方面的各项问题。如优生的人口政策，自然环境与种族进化之关系，遗传优劣与种族进化之关系，习传与种族进化之关系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提出以政府为主要训导保育机关，取缔宗法式的早婚和纳妾。

《生命统计方法》 张世文编撰，正中书局 1943 年出版（内容详见第十四

章)。

《中国人口状况与现代化建设道路》周振华著《社会科学研究》丛刊 1983 年出版,约 11 万字。文章指出:人口问题是规划四个现代化蓝图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因素。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从理论同实际结合的角度,论证人口状况一定要适合经济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具体地分析中国人口状况同“四个现代化”之间表现在各个方面的尖锐矛盾,及其产生的根源;并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地区四川省和上海市等地的实践经验,论述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和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性。

《人口经济学概况》吴忠观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约 12.3 万字。该书是在作者的有关论文和讲稿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综合整理而成。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性质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学的“两种生产”的原理,经济对人口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人口对经济有反作用的原理,和“过剩人口”的原理;人口与劳动资源,人口与所有制结构,人口与国民经济部门结构,人口与经济技术结构;人口与分配,人均国民收入,人口与积累和消费;人口与交换,人口与消费品市场,人口与市场预测;人口与消费水平,人

口与消费结构;家庭及其演变的趋势,家庭经济与人口发展;人口与环境、资源;人口转变;以及我国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交换,我国家庭经济与人口,和我国的人口转变诸问题。

《人口手册》四川财经学院人口研究所编著(主编刘洪康、副主编吴忠观),成都计划生育宣教分中心 1981 年出版,约 30.5 万字。该书分为 17 章,即:人口理论基本知识,世界人口史和中国人口史,外国人口思想史和中国人口思想史,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地理,人口的种族构成、民族构成、语言构成和宗教构成,世界人口概况和世界各大洲部分国家人口概况,中国人口,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人口素质与优生,人口和生态环境,人口统计的基本指标、人口再生产统计、婚姻及计划生育统计和人口抽样调查,人口普查,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人口机构及人口会议。

二、论 文

《四川历次人口统计的分析与检讨》施居父著,载《民间意识》1936 年合订本,约 0.5 万字。该文认为:史籍记录的四川户口数,汉魏以前,杳远莫考;汉魏以后,以户口定赋役,户口版籍或递相隐瞒,或分丁析户以避赋徭,加之历代常以户口消长课州县吏之优劣,因之户籍数多不足信。作者以积年搜集的四川宣统年间 144 厅州县历次编

造的全部户口表册,详细对勘以后,核算1910年(宣统二年)四川人口总数为50562797人。该文认为,四川省署的人口统计,根据1916年全省146县3屯之人口调查表册核算,全省人口总数户9950264,男28751057,女22015279,合计50766336,亦可视为过去四川全省人口调查的最后报告。

《德格之历史与人口》李安宅著,载《西康户政通讯》2~4期,约2万字。该文具有专著的规模。第一部分是德格简史,叙述了德格土司、寺院、政法、交通、教育等简史;记有征收农牧税章程15条,1942年土司为宗教而在各区征收地粮附加、牲税附加等数据,念经支出费十余次;该县的农区和牧区各教派寺庙的户数、男女口数,著名的德格印经院的甘殊尔和丹殊尔的经板数。第二部分是德格人口:包括普通户、寺庙户、临时户、公共户各类人口的比例;牧区、农区的寺庙数,户数,男女人口统计,村数与寺数的比例;区乡两级行政区的各类户口统计分析;农区多数寺院人口年龄组分配,普通户人口年龄性别分配,各分区的农户人口年龄性别分配统计分析。文章探讨了人口类型,牧区、农区的家庭结构,描绘了人口金字塔。文章认为,德格人口属减少类,寺院人口属移入类;牧区为移入类,农区人口较多,可以移出;农区单身家庭较牧区为多,这与牧畜文化是传统文化,农耕文化是

外来文化有关。

《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两种生产》刘洪康著,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3辑《人口问题论丛》(1979年),约2万字。作者从恩格斯学说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种生产”,认为如果不处理好人的生产与物的生产的关系,四化的实现将是很困难的。提出:实现人口转变,不采取断然措施是不行的,必然抓“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必须“两种生产”一齐抓,物质资料的生产要抓“上”,人口的增长要抓“下”,逐步达到协调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应该把人口计划放在应有的地位。

《旧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思想浅说》李世平著,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三辑《人口问题论丛》(1979年),约1万字。文章从认识造成当前人口现状的历史影响出发,探讨旧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多种人口观点。文章最后指出对马寅初等人的错误批判,原因之一是由于对旧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口思想的认识有片面性。

《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及其出路》赵世利著,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3辑《人口问题论丛》(1979年),约0.8万字。文章指出,我国农村人口增长快,质量不高。提出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出路: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加强小城镇建设,以缩小工农差别,促进工农

的一体化,避免人口过多集中大城市的弊端。以新建工业基地为中心,发展新兴城市,为农村人口的转移开辟一个途径。在大城市郊区建立一些卫星城镇,成为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基地。移民开发。我国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在总结移民开发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我国东南与西北的农牧接壤地带,移民开发,建设农牧结合的生产基地,对合理配置生产力也是必要的。

《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

程贤敏著,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三期,约1.7万字。作者依据1713年至1734年的人丁增长率,测算出1741年的人丁数和丁口比值,进而用计算复利的公式,求得清初各朝人口数和年平均增长率。认为,1691年清代人口已超过1亿。康熙后期,清代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乾隆年间形成高峰,乾、嘉之交,人口增长势头减弱。此时清代人口过剩问题已突出了。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特点及其转变》张天路著,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四期,约0.9万字。文章指出,由于人口再生产是以生物因素为基础,并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因此,人口再生产不可避免地也会随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人口再生产的进化过程分为三种类型: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微增长或低增长类型,存在于原始

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类型,出现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和北美;人口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出现于20世纪的欧洲、北美等工业发达地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以第一种类型为主,某些民族地区的某些历史时期存在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负增长率的特殊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第一种类型转变为第二种类型。

《中印人口状况和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何景熙著,载《南亚研究》1985年第三期,约2.8万字。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状况是影响两国经济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全世界关注的大事。20世纪前五十年,印度人口增长速度约为中国的一半。1951年至1981年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93%,印度为2.15%;1965年印度人口增长率达到顶峰,尔后缓慢下降,而中国则呈高——低——高——低的波浪式变化。印度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中国,中国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中,而印度小城镇的发展远胜于中国。中国在普及小学、初中教育方面比印度好,但高等学校就学人数,大专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印度低。1980年,每万人中的大专学生数,中国为12.8人,印度为40人。从1951年起的连续六个五年计划,印度都制定了人口控

制和计划生育法规,并不断增加财政投入。人口控制,中国晚印度20年,但

效果优于印度,因印度增大生二胎,限制三胎以上的多胎生育。

第三节 主要学者简介

陈长蘅(1888~?) 字伯修,四川荣昌人。1906年考入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英文班。1911年赴美留学,先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学习,1912年转入哈佛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1916年获学士学位;再入经济研究院,1917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1918年兼任北京盐务稽核总所翻译。后被北京交大管理学院聘为讲师。是年出版《中国人口论》一书,阐述了人满为患的观点。1923年任南京军需学校教官。1925年任四川巴县朝阳学院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参加中国经济学社并担任该社常务理事。在此期间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近百八十年来人口

增加之迅速及民势之变迁》等文。1930年参加中国统计学社,出版其代表作《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一书。这期间多次出国参加各类会议。1932年赴日本参加国际统计学社年会,并先后发表《我国人口的压迫与其解救方法》、《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应行注意的几个要点》、《我国土地与人口问题之初步研究及国民经济之政策商榷》。1947年初赴英国伦敦参加“非宗主国立法会议”,同年赴日内瓦参加由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国际贸易宪章起草会议和相互减低关税税则的多边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表《谈谈过渡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等文。

第十七章 民族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近现代四川的民族学研究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历代有关四川的著述留下了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廿五史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述,地方志中更保留了可贵的史料,较著名的如晋代《华阳国志》、明清时的《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土夷考》、《邛崃野录》、《土司纪要》等等。

19世纪中叶民族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来,四川的民族研究也是从这时开始的。1922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一个以外国学者为主的、以四川以至西南民族地区研究为对象的一个群众学术团体。该会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从1922年开始直到1945年为止共出刊17期。抗日战争以前四川出版的民族学专著较著名的有中国西部科学院(北

碛)的《雷马屏峨调查记》、任乃强的《西康图经》。

抗日战争时期,外省的许多民族学者,相继转移入川,使四川的民族学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当时,在成都华西坝5所大学均开设了民族学方面的课程,并出版民族学研究刊物。1944年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立边政系,他们经常组织师生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有李安宅的《德格之历史与人口》、任乃强的《康藏史地大纲》、闻宥的《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冯汉骥的《彝族历史起源》、林耀华的《凉山彝家》、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僮民》、马长寿的《嘉戎民族社会史》和《凉山罗夷的族谱》、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胡鉴民的《羌民的经济活动型式》和《羌民的信仰与习为》、邓少琴的《西藏木雅乡西吴王考》等。在

少数民族学者中,较著者有刘家驹的《班禅大师全集》和岭光电的《俚情述论》等书。

抗日战争期间,张怡荪在成都创设了西陲文化院,专门从事藏族文化研究和教学。1937年他编成《藏汉集论词汇》,收入了以佛学词汇为主的藏汉词目近5000条,接着又编成《汉藏语汇》辞书。1939年编成《藏汉译名大词汇》,共收词目近40000条。在他主持下于1945年还编成《藏汉大辞典资料本》10册,是当时国内藏汉辞书中资料最丰富的稿本。

华西边疆研究所于1941年成立,隶属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由当时华大社会系主任李安宅兼所长,主要任务是研究藏族的文化、历史和宗教。该所的主要成果有刘立千译的《印藏佛教史》和《续藏史鉴》、于式玉等的《西北民歌》等。李安宅先后于1938~1944年赴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与西康北路作藏族宗教调查,后于1949年写成《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其中一部分《拉卜楞寺调查报告》(英文),1982年由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中国民族学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内建立较早的民族学学术团体,1934年12月成立于南京。曾创办《西南边疆》月刊,1941年秋学会会址移至成都,《西南边疆》月刊亦迁成都出版,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期间在重庆,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也相当活跃,其较著者推中国边疆学会。1941年,研究民族边疆的学者黄奋生、顾颉刚、马鹤天等,分别于重庆、成都、榆林发起建立的中国边疆学会,以重庆为总会,成都、榆林为四川、陕西分会。初成立时有会员600余人,联系的群众较广泛,迄至1946年该会总会有《中国边疆》月刊(重庆出版)、四川分会有《边疆周刊》(成都出版)。该会从1943年起还编有《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共10种。此外,当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还编辑出版有《边政公论》、《蒙藏月刊》和《蒙藏月报》等3种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南京迁驻四川省南溪县李庄,该所设立的人类学组,继续编辑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个刊物中载有不少有关民族研究的论文。1946年秋,由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发起在成都成立了康藏研究社。出版有《康藏研究月刊》,1946~1949年共出29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47年四川大学一些有志于民族研究的师生组成中国边疆研究学会,并主编成都《西方日报》的学术副刊《中国边疆》(双周刊),迄至1949年4月,共出刊32期。

二、当代四川的民族学研究

(一) 转型时期(1950~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

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理论上逐步转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工作上以配合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为重心。

1. 为开展民族工作进行的调查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四川除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和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从事民族研究外,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和四川大学历史学系还分别承担着培养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人才的任务,成都《工商导报》1950~1951年出版了学术副刊《西南边疆》(双周刊)先后达26期。1951年,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在成都创办了西南民族学院,学院设置了研究室(包括民族文物馆),结合教学进行民族研究。1952年,全国进行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华西大学的社会学系和边疆研究所首先并入四川大学,接着又于1953年划归西南民族学院,集中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50年代,党和国家在民族方面的任务在于保障民族平等,增强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恢复和发展生产。民族研究者为实现上述任务,进行了大量工作,党和政府组织了一批民族学者和大专学生参加了当时的民族工作队和民族访问团,深入到民族地区,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以所搜集的资料作为党政领导部门决策的依据。如1954年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编写成《四川草地藏族情况》、《嘉戎藏族情

况》和《羌族情况》,这是50年代以后首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阿坝藏、羌民族的民族学著作。1957年,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编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社会调查》一书,是50年代后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凉山彝族的民族学书籍。1950年,胡庆钧参加中央访问团到凉山工作,后根据调查资料写成《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1956年)与《再论凉山彝族制度》(1957年),全面地阐述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特点。对甘孜州藏区,亦有1957年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编印的两本调查报告,即杨辛、张正明的《甘孜县麻书乡如西村调查报告》和张正明执笔的《甘孜藏族社会调查资料辑》。

2.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党中央及时提出必须迅速完成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研究工作的任务。成立了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参加该组的有中央和本省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民族工作单位的同志先后达百余人。1959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建立了民族研究所,1963年该所与四川民族调查组合并改称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56年至1965年,四川省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1) 搜集资料 先后搜集了四川省彝、藏、羌、苗等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资料6777件,5570万字,并以调查

组名义铅印内部发行了大批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其中彝族资料有《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调查综合报告》、《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凉山彝族社会的几个方面的情况》、《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贸易调查报告》、《西昌专区彝族地区社会调查》、《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土司历史及土司统治地区社会情况》、《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集》和《四川彝族近、现代历史调查资料选集》等。藏族资料有《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及绰斯甲、若尔盖、阿坝、红原调查材料》、《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理县社会调查材料》、《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道孚、丹巴调查材料》、《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八角楼乡、恶古乡社会调查材料》、《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社会调查材料》、《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地区社会调查报告》、《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更庆、甘孜麻书社会调查报告》、《甘孜藏族自治州玉隆、色须、昌台、塔公、大塘坝、宗德等牧区材料》、《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毛垭牧区社会调查报告》、《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寺、大金寺、甘孜寺、八邦寺调查材料》等,以及清代历史档案资料《金川案》。羌族资料有《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雁门羌族乡社会调查报告》、《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通化乡社会调查报告》、《茂汶羌族自治县黑虎乡社会调查报告》和《羌族地区近代经济资料汇集》。此外,

还有川南和川东南苗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10 份。

(2) 学术讨论 此期还就四川彝、羌、藏等民族社会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一些学术讨论。关于彝族主要是 50 年代前凉山彝族社会性质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 3 种不同主张:多数人认为是奴隶制,部分人认为是初期封建制,少数人认为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1957 年 3 月,全国人大民委在北京专门就此问题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在全国各种刊物上还发表了关于凉山彝族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文数 10 篇。1961 年 5 月和 1963 年 7 月,由四川省民委主持,在成都还分别召开了两次彝族社会历史学术讨论会。前者是《彝族简史》古代史部分讨论会;后者是《彝族简志》(上篇)讨论会。两次学术会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彝族的族源和凉山彝族的来源、两巽和南诏的族属与社会性质、凉山彝族的阶级分化与奴隶制的形成、凉山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曲诺和阿加的阶级属性、凉山奴隶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彝汉文献资料的运用和书稿的体例等问题。关于羌族,1962 年 1 月在成都由省民委召开了《羌族简史简志合编》历史文艺部分讨论会,着重就四川民族调查组编写的该书中提出的羌族族源,羌族古代史分期,羌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羌族历史人物的评价,羌族历史上的反

抗斗争的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作了广泛讨论。会后由李绍明写成《关于羌族历史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1962年9月13~1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此后,在国内报刊上就羌族史的问题开展了进一步的讨论,如胡昭曦《魏晋的氏羌和隋以后的羌族》和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就是两篇观点完全不同的争鸣文章。在藏族方面,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着重探讨了农村和牧区的社会性质问题,四川的学者积极参加了讨论,如邓子琴于1961年在《四川日报》上发表的《从甘孜藏族地区民主改革前的情况看初期封建社会地租形态的变化》和都淦的《民主改革前四川藏族牧区生产关系》等。

(3) 编辑《中国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即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前两种丛书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1956~1969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的,后一种则是中央民委1958年提出的任务。当时这三种丛中四川民族调查组的编写任务是《彝族简志》(上编)(写川滇两省交界处的大小凉山彝族)《藏族简志》(下编)(写川、滇、甘、青四省的藏族)和《羌族简史简志合编》。除此,还承担着《彝族简史》、《藏族简史》、《苗族简史》几本简史中四川部分的资料搜集与编写的协作任务。此外,在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四川

还拍摄了一部《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

3 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1956年,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成7个大型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省、区普查少数民族语言。设在四川的有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第四工作队(负责彝语支语言调查,简称民语四队)和第七工作队(负责藏语、羌语和嘉戎语等的调查)。此外,负责苗语支语言调查的第二工作队(队部设贵州)也派人在川南进行了苗语调查。彝语支的语言包括彝语、傣僳语、纳西语、白语、哈尼语、拉祜语等,还有当时认为接近彝语支的土家语。民语四队调查的重点除彝语外,对羌语和嘉戎语,以及其它语种都作了调查。通过这次调查基本弄清我省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对有方言的语言如彝、藏、羌语等提出了划分的意见,并了解到彝、藏等文字的使用情况。以陈士林为首的民语四队,为彝语设计拼音方案,当时简称为“新彝文”,以别于彝族原有文字。分布于湘、鄂、川、黔边区的土家族尚有一部分讲土家语,民语四队派人调查,于1959年写出了《土家语简志》(油印本),提出土家语是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意见。

(二) 发展繁荣时期(1979~1985)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正了航向,开创了我国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四川的民族学研究自此取得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

在此期间,四川省的民族研究机构有一所综合性的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两所教学兼科研的研究所,即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此外,一些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大学的人口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以及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康定民族师专、阿坝师专、西昌师专、三州的党校和民族干部学校的有关系科室,也从事有关民族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省民族研究所设有民族问题与民族经济、民族学与民族史、民族语言文字、藏学等四个研究室。该所承担的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在“六五”计划期间,有《彝族规范应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有关《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有关部分的编写等项。在“七五”计划期间,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中关于凉山彝族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问题》中的藏族卷、土家族卷《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整理对勘的协作等项。此外,还有省级的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4项。省民族研所有内部刊物《民族论丛》(年刊)和《国外藏学动态》(年刊)。西南民族学院原研究室现已扩建为民族研究所,设有民族理论、民族学、民族史、民族经济与地理等4个研究室,以及1个民族博物馆。西南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为近年新建,目前主要设藏、彝语言文学部分。西南民族学院承担的“七五”期间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中的《羌族文学史》和《彝族文学史》《民族教育问题研究》中的《中国民族教育发展途径探讨》等。

民族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纷纷成立。有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以上两学会均系中国民族研究学术团体联合会的成员,现挂靠在四川)、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四川省民族理论研究会、四川省民族地区经济研究会、四川省民族教育研究会、四川省民族语言学会、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研究会四川分会等。在四川多次举行的全国性的有关民族研究的学术研究讨论。如彝族社会历史学术讨论会(1979年),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1981年),全国壮侗藏缅苗瑶语言学术讨论会(1982年),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1983年)、中国人类学会第三届学术讨论会

(1985年)、全国首届彝族学术讨论会(1985年)、全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1985年)、全国藏族史学术讨论会(1985年)等。

四川的民族研究取得重大成就。

1. 民族学研究

(1) 民族学理论 李绍明在《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中认为民族学应以古今中外一切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民族发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过程及其规律,综合研究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民族间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所著的《民族学》一书已为中南、广西等民族学院采纳为教材。

70年代,四川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云南、贵州等省有关单位,编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以李绍明为总纂,于1980年成书,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为50年代以来第一本关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民族学专著,较全面完整地剖析了凉山奴隶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风俗习惯诸方面的问题。该书受到国内外民族学界的重视。伍精忠将此书译为彝文,于1985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该书编写组还创办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刊物,自1977~1982年共出刊7期。编写组编印了《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和《云南小凉山彝族

奴隶社会调查》二书,编印了由冯元蔚、曲比石美翻译整理的《凉山彝文资料选译》3集,编写组的成员还编写了一些史料和写成一些专著,如蒙默编的《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杜玉亭编的《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徐铭编的《明实录彝族史料辑要》和《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冯思刚译、原苏联伊茨著《东亚南部民族史》。1984年举行了彝族家支学术讨论会。次年由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编印出《四川彝族家支问题论文集》,反映了这次讨论中的不同观点。

(2) 民族识别研究 四川省大量的少数民族的族属问题早在50年代初业已解决,但还有数十万之众的族属问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长期悬而未决。四川省为此从1978年开始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获得解决。

经过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四川省恢复了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县的土家族、苗族成分。这片地区现有土家族80余万、苗族30余万,基本是近年来恢复的,5县也改建为土家族、苗族的自治县。在北川、茂县等地,部分人在民族识别基础上也恢复了原来的羌族成分。

民族识别调查还涉及凉山与雅安地区境内俗称为“西番”和分布在凉山州与攀枝花市境内俗称为“蒙族”,自称为“纳日”的这部分少数民族。经过

调查,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问题,也相应地提出了意见。

分布在四川平武、南坪和甘肃文县一带的“白马藏族”的识别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在民族识别调查基础上,四川有关单位于1978~1979年先后召开了两次学术讨论会。会后形成了《白马藏族族属问题讨论集》。

(3)少数民族调查与社会历史资料丛刊编辑 70年代民族研究工作恢复后,四川相继在一些原未开展调查的民族地区进行了一些社会历史的调查,其中较著者为: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组织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中的雅砻江试点考察,分别于1982年5~7月和1984年7~9月相继在凉山州、渡口市和甘孜州境内进行。考察成果有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编印的《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1983年)和《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1985)。1979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刊编辑委员会决定编辑《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作为《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公开出版。四川省负担的此项丛刊的8本编辑与出版任务,已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以后陆续出版(《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羌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凉山彝

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以上这些资料反映了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土家族的调查资料交湖南人民出版社统编出版),是四川省进行民族工作和科研工作必不可少的读物。此外,还有《四川广西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均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有四川省彝族的21篇调查报告。

2. 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研究

(1)民族问题理论研究 杨绍全的《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辩证关系》,石农心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都淦《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等文,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根源,并指出这一阶段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消灭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近年来杨绍全与石农心还根据他们多年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心得,编写了《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概论》一书,该书介绍了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情况、特点和规律,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经

“六江流域”指川、藏、滇边境横断山脉区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等六条由北向南的大江及其支流分布的地带。

验,尤其突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新方针。

(2)民族政策的研究 对红军长征时期中共民族政策的研究是四川近年来在民族研究方面取得的一项较突出的成就,周锡银的《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是一本系统介绍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的史料性专著。周锡银、张全昌《略论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一文,论述了中共的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杨绍全《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路线的光辉典范》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二文对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3)《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编辑 1979年由各州、县组成编委会进行编辑四川省12本地方概况丛书已相继完成并由四川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概况丛书有《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1985年)、《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1985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茂汶羌族自治县概况》(1985年)、《木里藏族自治县概况》(1985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概况》、《马边彝族自治县概况》、《峨边彝族自治县概况》、《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概况》、《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此外,宣传四川省民族政策成就,介绍

民族情况的还有《四川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画集丛刊》中的《四川册》二书。

3.民族史研究

(1)专史 由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共同编著的《羌族史》是四川省编写的第一本少数民族的专史,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的《羌族简史》,也经过《羌族史》的3位作者的重新编写,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任乃强写的《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该书对羌族的源流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作了有益探索。

50~60年代,四川省部分学者即参加了《彝族简史》的资料搜集和编辑工作。马长寿于1959年主要根据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写成《彝族古代史初稿》(油印本),此后由李绍明对遗稿进行整理加工和注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天墀的《西夏史稿》是近年来四川省编写和出版的一本断代史专著。

经蒙默整理的蒙文通遗稿《越史丛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专门考证百越史的著作。

《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是甘孜县籍的格勒编著的一本民族地方史。

(2)史料编纂 1959年,四川民族调查组已将川边历史档案初步整理成册,供内部使用。近年来四川民族研

研究所又进一步整理编辑成《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由中华书局出版。

赵吕甫的《云南志校释》和龚荫编的《明清云南土司通纂》是两本重要的地方史料专集。

刘立干译《米拉日巴传》是藏文史料翻译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4 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1)藏语文研究 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词典》于1985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桑木旦《藏文文法概论》一书亦很有价值。

(2)彝语文研究 《彝文规范方案》(《四川日报》1980年12月17日公布),是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省彝语文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制定的。它对古老的彝文(凉山彝文)进行整理规范,使之适应四化建设需要。1975年,经省革委同意试行,1980年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推行。《方案》既继承了彝文音节文字和方块字形的固有特点,又吸收了其它民族文字的先进办法,群众易于掌握。《方案》的推行,对彝族地区文化建设起到了良好作用,马明等先后编纂出《彝汉词典》、《彝语成语词典》和《汉彝

词典》等工具书,具有较高应用价值。此外,李民、马明合著了《凉山彝语语法》和《凉山彝语语音概论》等书。

(3)土家语研究 50~60年代,四川省的民族语文工作者对土家语进行调查研究,并写成《土家语简志》(油印本),确认土家语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独立语言。根据1979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的决定,全国进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编写。其中《土家语简志》一书由田德生与有关省的其他同志编写而成。

(4)其它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 四川省的少数民族语言情况极为复杂,存在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近年来除了继续对羌语进行调查研究 and 为羌族创造拼音文字以外,还调查了分布于凉山州、甘孜州等地的另一些民族语言,有的已写成调查报告或论文,已发表的有刘辉强《尔苏语概况》、《纳木依语概要》、《木雅语研究》。有关单位还调查了分布于甘孜州境内的贵琼语、尔龚语、扎巴语等。对这些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填补了对语言的认识空白。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著与译著

《西康图经·境域篇》 任乃强著,

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版,约30万字。
《西康图经》为任乃强关于康藏研究著

作的总书名,据作者自序说,全书拟分11篇《境域篇》即是其中之一。该书内容主要是在西康建省前作者对西康省应有的辖境所提出的看法,也是在本世纪30年代酝酿西康建省中反映出来的意见之一。所谓境域,除了涉及与四川、云南和青海的关系外,主要是康藏关系,即西康建省中,西康与西藏的边界应如何划分。康藏两地,虽然都是藏族,都信奉藏传佛教,但在行政关系上,各自的归属不同,在境域方面,历史上也有一定的分界线。作者指出:“由于国人对于康藏部分划界之沿革变迁迄今未明了,每有康藏交涉,发论争持,辄遗笑柄”。作者根据康藏界线之历史资料与沿革变迁,提出康藏应以鲁共拉山为界,西康省极西部应包括嘉黎、太昭。此外,作者主张应划入西康省的地方还有:四川之大小金川与卓克基;云南的永宁、中甸、维西、阿墩子等地;青海的结古、囊谦二县。本书在论证中,涉及许多掌故和历史资料。

《西康图经·民俗篇》任乃强著,新亚细亚学会1934年版,约20万字。此书专门介绍康区藏族及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字等,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藏族,是主要部分;下篇介绍区内纳西、傈僳、彝、汉等民族。在介绍藏族的风俗习惯中,分成11类介绍,即人种、职业、居住、饮食、衣服、性格、礼俗、岁时、娱乐、语文和同化。每类

之中又具体列出若干项内容。如居住类中就具体介绍藏房修造法、独木梯、八角碉、牛毛帐房等24项。该书语言通俗,可读性强,保存了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许多资料。

《雷马屏峨调查登记》常隆庆等著,载《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1935年1号,约30万字。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了雷马屏峨考察团赴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考察。调查内容除了彝族地区的地理气候和动植矿产外,还对彝族的生产生活、社会制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作了系统的调查了解。全书共八章。除第三、第四和第八章外,各章都讲的是凉山的自然概况,如山脉、河流、交通、气候、动物、植物、矿物等。第三、第四两章,主要是介绍彝族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家支分布以及所谓“夷务”问题。郭沫若在《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见《青铜时代》)一文中,大量引用了这个调查材料来印证西周的奴隶制社会。郭沫若说:“这个调查‘关于彝族社会的阶级组织与生产方式,是叙述得相当扼要’的。”“这些兄弟民族的现状正不失为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了解得这些情形,回头再去读殷周代的典籍,有好些暧昧地方也可迎刃而解了”。本《调查记》的著者尚有施怀德、俞德浚。

《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著,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年版,约8万字。

全书共四章,第一章讲西康西藏的地理,对这两地的山脉、河流、交通、气候、物产、人口、行政区划和政区沿革作了概要的介绍。第二、三、四章讲历史。涉及藏族史、藏传佛教史。藏汉关系史及帝国主义觊觎西藏史等,使人对康藏历史有了概括的了解,此外还附带谈了宁属地区的彝族。作者深感于清末民初,办理康藏事务者由于不了解康藏的地理民情,以致在与帝国主义者谈判中往往丧权辱国(如中英西姆拉会议)。因此该书虽主要在谈历史地理,而着眼点在于致用。旨在通过了解康藏史地,“深究其情俗,相时地之宜,因势利导,循序以推进之”。基于此,故在此书末章,对藏区的施政问题向当时西康省当局多所建议。

《保情述论》 岭光电(彝族)著,开明书店1943年出版,约5万字。作者系甘洛田坝(今属甘洛县)土司,曾在成都读中学,后入南京中央军校。1936年毕业后在重庆行营工作,1937年回乡继任为土司,本书系作者以往所写12篇文章的汇集。这些文章虽各自独立,但其总的内容在于介绍彝族(主要是越嵩一带)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情况;总结政府当局对彝区工作的成败得失,并提出若干意见。如作者认为:“要想俾人(彝族)成为中华好国民,亦须文化之力量,故力主治之以教化为主”(《自序》)。

《班禅大师全集》 格桑群觉(藏族)

编著,班禅堪布会议厅1943年10月刊印,约30万字。格桑群觉,汉名刘家驹,巴塘人,通藏汉语文,熟悉康区情况,曾任九世班禅堪布会议厅汉文秘书长并随侍多年。所编著的《班禅大师全集》包括三个部分:传记,包括九世班禅事迹及历代班禅列传,多译自藏文,考核翔实,可补史书之不足;传法录,为九世班禅阐述佛法的10篇文章,是佛教的重要典籍;演讲集及往来文电,反映了九世班禅爱国救亡之主张。此书为研究西藏历史、政治和藏传佛教的重要资料。

《印藏佛教史》 刘立千编译,华西协合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1945年出版,约8万字。该书根据一些藏文史籍和汉文有关著作编译而成。编译者认为,西藏佛教与印度佛教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欲明印度佛化之真相,可从西藏佛教中推之,然研究西藏佛教之渊源,法脉之系统,又非先考印度往期之佛史不可”,故将印度和西藏的佛教史合在一起叙述。全书分前后两编,并按照各自的佛教发生发展次序,每编中又分若干章。前编对印度佛教史分为六章:佛时与佛后之教法;小乘之分派及其发展;大乘之建立;大乘之发展;密乘之宏扬;大小乘之教义述略。后编对西藏佛教史分为五章:佛教如何传入;译师及论师;佛教之分派;显密教法历宏布;显密教法之理趣。按照以上章节内容,

分别摘译或摘录有关藏汉文资料。至于学术界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问题,则以多那他《印度佛教史》和萨迦派的《集续目录》所述为准,书后附有印藏教大事年表,便于读者对照研究。

《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 邓小琴著,中国学典馆 1945 年 12 月版,约 1 万字。今康定县营官区一带的藏民自称“木雅”,1944 年作者赴该地考察后写成此书,认为木雅人为西夏遗裔,其统治者西吴王(即明清的明正土司)为西夏王室之后。其依据有三:“西吴”为西夏的对音。“夏”与“下”同音;“下”字古音“虎”,与“吴”字音相近;“木雅”读作 MI-NAK,译作“密纳克”,在西夏时指都城兴庆府一带,西夏人南迁,将此地名带入康定;今木雅一带现存石碉遗迹和习俗,亦多与西夏习俗相同。因此,作者认为蒙古灭亡西夏后,有一支西夏人辗转迁来西南定居,今木雅人即是他们的后裔。此说在当时为一创见,经过此后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学术界已公认“木雅语”为一独立语言,而与西夏相近似,而建立西夏的党项羌最初即居川西北一带。因之,现今木雅人与古西夏人有族属上的联系,当然不能排除西夏覆亡之后,其一支人逃归故里与族人汇合的可能性。

《大小凉山傈族通考》 任映沧著,西南夷务丛书社 1947 年版,约 30 万字。作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曾任四川省雷马屏峨垦务局局长,对上

述 4 县彝区情况比较熟悉,书名虽为大小凉山彝族,实际上所涉及的仅限上述四县,亦即习惯上称之为小凉山的地区。全书分三编,第一编“社会制度”,第二编“夷患史纲”,第三编“夷务研究”。从民族研究的角度来看,以第一编内容较为有价值,其中包括了彝族社会性质,作者明确指出其为奴隶社会;对于奴隶制度,作者斥之为残暴、黑暗、苛刻、堕落;对广大奴隶群众的悲惨生活,作了尽情的描述,从而提出废除凉山彝区的奴隶制度,解放大小凉山十余万奴隶。这些认识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第二、三编主要是作者论述对凉山“夷务”应采取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其中引用了许多文献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某些观点具有一定的反动性,此外,作者另著有《大小凉山开发概论》一书。

《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蒙文通著,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约 75 万字。该书根据汉文古典文献资料,研究从西周末年至战国末年,包括周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的移徙情况,各民族移动的原因发端于周人之南迁。据古文献记载和气候学家研究,西周末年黄河流域曾发生过一次严重干旱,历时 150 余年,而长江流域雨量丰沛,未受北方旱灾的影响。因此周室迁其民于淮河汉水一带,着意开拓南方。周人南徙之后,西北空虚。西戎向东沿渭水出潼关进入伊洛地区,越过嵩山,一支

东向入淮；一支沿豫鄂西部南下入湘。原来居住在北方的赤狄、白狄从山西西北部沿河北山西之间太行山一带南下向河南北部移动，再向东入山东境内。由于这些民族的东移、连锁引起其他民族的向东移徙。如由于险狄(狄)东移，引起山戎、潞貉、狄獯南下太行向东至今朝鲜半岛。此外，有的民族当时由于受到某国的威逼也造成了民族迁徙。如南方的濮，于西周之初在巴中，东入荆，居江汉间，由于受楚拓地西南的威逼，遂由楚之西南部南下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湘沅，又至于永昌。该书在总体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交往就非常密切，从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

《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 1977 年编印，约 32 万字。对于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性质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从 50 年代起，有关报刊上先后刊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1977 年在编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时，编写组将这些讨论文章选辑成书，供编写组内外同志参考。全书共收入论文 20 篇，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奴隶制或基本上是奴隶制；第二种意见认为它是封建制初期或基本上是上封建制；第三种意见认为它正处于由奴隶制向

封建制过渡的阶段。

《藏文文法概论》毛尔盖·桑木旦(藏族)著，四川民族出版社 1979 年 6 月版，约 4 万字。作者按照藏语传统语法的描述方法和体例，对传统文法的两大组成部分——《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通过大量例句分别一一作了介绍。最后又对这两大部分进行了概括总结。书后还附有“文章写作方法”一节。该书通俗易懂，曾被藏区中小学，特别是安多藏语区广泛地做为教材使用，曾数次再版，受到读者欢迎。

《西夏史稿》吴天墀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约 28 万字。作者在充分利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结合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的西夏文物资料写成此书。全书共四章，主要论述西夏王国的形成，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以及西夏和辽、金、宋政权的相互关系等。该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贯彻了民族平等和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历史的原则。作者把西夏的历史看作和辽、金、宋的历史一样，是整个的祖国历史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和分别以契丹、女真和汉为主体民族建立的辽、金、宋政权，尽管在政治上出现过一时一地的分裂对峙，而经济文化方面，彼此都密切联系，难以分离，共同为创造祖国的历史做出了

贡献。这在“西夏的社会形态”一章里，以大量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本《西夏史稿》可以看作 11~13 世纪祖国西北大地上党项羌族的活动史，以及党项羌与汉、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关系史。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史料翔实。除正文外，书后列有四个附录，即西夏拓拔氏世系表，西夏大事年表和西夏史文献目录。前三个附录把纷繁零乱的东西夏史理得头绪井然。而西夏文献目录以及每章后面大量的注释，列出了不少资料，这对研习西夏史的读者是很有帮助的。

《东南亚民族史》冯思刚译，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1 版，约 23 万字。该书系苏联 P. . 伊茨著。所谓“东南亚民族”，实际上指的是我国南方各民族，其中，他主要研究的又是我国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壮、苗、羌三个民族。作者认为，在当代东南亚各土著民族中，这三个民族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是三种不同语系的各种语支的主要代表。同时这三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实际上决定了东南亚南部（除西藏外）民族历史的全部过程，因此他“选择”这三个民族进行综合研究，论述这三个民族的祖先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直到 16 世纪的明代才最终形成上述三个民族的历史过程。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版，约 20 万字。此书为 50

年代以来第一本关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民族学专著。包括凉山彝族及其社会发展、社会经济、等级制度和阶级关系、奴隶主所有制及其社会发展、社会经济、等级制度和阶级关系、奴隶主所有制及其剥削方式、家支制度、哲学、道德和宗教、文学和艺术、婚姻和家庭、被压迫者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等 9 章，还附有各等级典型户调查，以及凉山土司统治区基本情况。该书全面剖析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风俗习惯诸方面的问题。同时，还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特点及其在世界奴隶制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奴隶制的发展、演变等问题，均提出有益的见解，从而丰富了人们对奴隶制社会的认识，具有理论意义；阐明了凉山原有的社会形态，亦将有助于在奴隶制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拉卜楞寺调查报告》(Labrang a Study in the Field) 李安宅著，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82 年英文版，约 20 万字。此书系作者于 1949 年根据他 1938~1941 年在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及其所属百姓概况的调查报告写成。第一章包括拉卜楞寺的位置、人口和主要宗教机构；拉卜楞寺对所属的百姓及其分支寺庙；拉卜楞寺的创建人嘉木祥活佛及其世系情况。第二章作为教育机构的寺庙。介绍拉卜楞寺内的六个学院（藏语称为“戈洛

瓦仓”)即显明学院(学习藏传佛教和基本经典)、时轮学院(学习制订拉萨藏历)、医学院、喜雷学院(学习制订汉族阴历)、初级神学院和高级神学院;介绍各院设置的课程和寺内的等级制度。第三章介绍寺内供奉的主要神像。第四章节日和礼仪,介绍一年中寺庙公开进行庆祝活动的宗教节日;百姓中的各种节日、礼俗和仪式活动。第五章结束语,作者对藏族的宗教、文化提出自己的看法。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内容翔实。另一个特点是能较客观地反映实际。因此,拉卜楞寺对所属百姓进行的残酷压迫剥削,书中也反映得不少。例如第一章说:拉卜楞寺16个村的土地,绝大部分都属寺庙所有。百姓耕种土地,要给寺庙上粮和当差;向寺庙提供燃料和刍秣;要自备鞍马枪弹,为寺庙对外参加械斗并负担赔偿“命价银子”等。据作者计算,寺内每年单是正月念大经半个月,要耗费46710个银元,全年费用之巨可想而知。这些巨大的费用,当然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而来,像这种不怀偏见,如实反映情况的调查作,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拉卜楞寺在安多地区的黄教寺庙中,有代表性,因此,这本调查报告,在研究藏族的宗教和社会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对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某些看法是欠妥的。如在第五章中说寺庙统治优于世俗封建贵族统治;活佛转世制,优于封建父子

继承制,等等。该书系李安宅于1949年所撰《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的一个部分。

《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周自强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约25万字。全书共4章,探讨的问题是: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的等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呷西奴隶和阿加奴隶;曲诺的等级地位和阶级地位;土地租佃关系。作者认为,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主要有三个阶级;这三个阶级的差别表现为五个等级。三个阶级是:奴隶主、奴隶和隶属农民;五个等级是:孜目、诺、曲诺、阿加、呷西。孜目全是奴隶主,诺绝大多数属于奴隶主阶级,阿加和呷西绝大多数属于奴隶阶级,曲诺基本上属于隶属民阶级。有的学者把占彝族人口百分之五十的曲诺视为封建农奴,把凉山大量存在的土地租佃视为封建剥削,从而把当时的社会定为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着重进行了探讨,认为曲诺不是自由民而是隶属于特定的主子,是介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奴隶制隶属农民;关于民改前彝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土地租佃关系,大部分仍属于奴隶制租佃关系范畴。

《越史丛考》蒙文通遗著。蒙默整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约10万字。全书共12篇,考证辨析,涉及越史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大都是针对越南某些说越史者的纰谬而发。本

世纪 50 年代,以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 1959 年中译本)为代表,在越中研究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谬论。如说“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当另外一个大族(汉族)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却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中国之越人“在来自北方的人的南下逼迫下,乃西南迁至越南也”。又说:“楚越共同渊源于一个丰姓的种族”。意即楚人既居长江,则越人亦据有长江。又说:“汉代时交趾相当于今越南北部,包括中国广西省南部的一部分地区”。如此等等。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作者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自越王勾践强大而越名始著,后遂以“越”为族称,泛指古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战国秦汉而后,又有“百越”一词,泛指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及其居民。百越略可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四个族。它们虽都有共同的“越”称,实为住地不同、语言和习俗各异的诸民族。具体言之,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分布在今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骆越历来居于交趾、九真之地(今越南境),他们既非自北南迁而来,亦未见有北迁之迹。从语言和习俗来看:吴越语言习俗相同(断发文身),与楚人及华夏异;南越、西瓯习俗略同(椎髻徒跣)与吴越、闽瓯均不同。可见“百越”之中,民族纷繁。古人用“胡”泛称北方民族,用“越”泛称南方民族,本无不

可,今人必俗持此称以为确指某个民族,实乃大错,以此而欲达到某种目的,乃错上加错。该书还以一部分篇幅考订越史中其他一些问题。如“外越”问题,吴越舟师与水战问题等等。对“外越”的地域,作者考证为台湾、澎湖,果如是,则台湾、澎湖早在春秋末世已为在大陆建国之吴、越所统属了。使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史提前了七八百年(一般说法是开始于黄龙二年(公元 233 年))。学术界认为,此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凉山彝语语音概论》李民、马明(彝族)著,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约 11 万字。全书共分 9 章。第一章介绍凉山彝语语音特点的拼音符号;第二章介绍语音基础知识;第三章至第五章介绍凉山彝语的声、韵、调;第六章介绍音位理论;第七、八章介绍凉山彝语的音变、变词;第九章介绍凉山彝语外来词语音。该书以介绍凉山彝语(即彝语北部方言)为主,并举出一些彝语其它方音及同语支的一些语言和少数外来语音相比较,扩大了读者关于语音的知识,是一本适合中级以上彝语文专业的良好教材。李民、马明尚有《凉山彝语语法》一书(1982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实词、虚词、词组、句子分类及引述语等六个方面详细分析说明了凉山彝语语法的特点,与《凉山彝语语言概论》一书为姊妹著作。

《民族学》 李绍明(土家族)著,《贵州民族研究》1983~1984年连载,约22万字(后由四川民族出版社集为一册出版)。该著作为中国目前仅有的几本民族学专著之一。全书共分绪论、民族学发展史略、种族和民族、世界民族概况、中国民族概况、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中国各民族的政治制度、中国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国各民族的习俗和文艺、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民族学调查方法等11章,系统地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提出民族学应以古今中外一切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民族发生、发展、演变和消亡过程及其规律,综合研究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民族间的关系,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认为民族学理论即关于民族共同体由氏族、部落,向部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学说,而这种学说来源于对民族志的比较研究。他还认为民族学的应用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各民族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研究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亦即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研究。

《阿坝州藏族羌族调查材料》 李志纯等调查整理,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版,约13万字。1952年5月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李志纯等

7同志到阿坝调查,于1953年6月返回,历时年余。访问中他们分为两组。对草地藏族(在今松潘、若尔盖、阿坝、红原等县)、嘉戎藏族(今马尔康、大小金川和理县的部分地区)和羌族(在今茂县、汶川及松潘、理县的部分地区)进行了考察,将所得的材料分别整理成《草地藏族调查材料》《嘉戎藏族调查材料》和《羌族调查材料》,先为油印本,1984年分别铅印成三册。草地藏族与嘉戎藏族虽然同为藏族,但他们在语言、生产生活和某些风习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故分别整理成两册。

《羌族史》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约29万字。全书上、下两编。上编论述商周至隋唐时期羌人的历史;下编论述宋元明清以至现代羌族的历史。最后用两章介绍今天羌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艺科技,羌族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其活动地区,大体在今甘肃大部 and 陕西西部。秦国向西开拓,引起了西北地区羌人极大震动。秦献公时,羌人大规模地向外流动,特别是向西南迁徙,这些散之四方的羌人支系众多。他们后来或融合于汉族中,或者与该地土著结合,形成中国西南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民族如藏、彝、纳西、傈僳、哈尼等等。东汉及魏晋时期,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把羌人与其他“胡”一起大量内迁。这些入居内地的羌人,其后融合于

汉族中,从宋以后,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族,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交往频繁,从而与中央封建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从元明清以来岷江上游羌族地区都实行了土司制度。清代乾隆年间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历代封建王朝和民国时期,羌族人民曾进行多次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米拉日巴传》 桑杰坚赞著,刘立千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约17万字。《米拉日巴传》,1488年后藏僧人桑杰坚赞(1455~1507)著,其后有拉萨刻本和德格刻本,并有汉、蒙、英、日、德等种文字译本,是藏文著名典籍之一。198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藏文版,刘立千根据此藏文新版将他的旧译稿重新校订详加注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在汉文译本中,这个版本是国内首次出版的汉文全译本。该书以问答和民歌的形式叙述藏传佛教噶举派(俗称白教)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一生遭遇及其向群众和信徒宣扬佛法的情况。他从维护佛教的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上层统治者残暴贪婪的本性,抨击了某些上层喇嘛假佛济私的卑劣行径,是研究藏族历史、宗教、经济和社会的一部重要著作。

《藏汉大辞典》 张怡荪主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约400万字,参与

《藏汉大辞典》编写工作的副主编有祝维翰、年叙·钦绕威色(藏族)、土登尼玛(藏族)、多吉杰博(藏族)、洛桑土旺(藏族)、罗桑多杰(藏族)。全书共3卷,收词目53万多条。《藏汉大辞典》是中国第一部藏汉双解的大型辞书,是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以及人事有关实际工作所常用的一部综合性工具书。全书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语词部分收有基本词和合成词两类;百科部分收有语法、文学、历史、地理、诗歌修辞、同义藻语、佛学、因明、声明、医药、历算等。此外,还收有旧时公文、封建法典、藏区风习、农牧生产、器用服饰、工艺建筑、赋税差徭等方面的词目。书后附有动词变化表、干支次序表、藏族历史年表以及具有浓厚藏族风格的彩色图片百余幅。该书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全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一等奖。吴玉章奖金评委会评这部辞典“在各方面都超过一直被国际上奉为权威辞书的达斯《藏英辞典》”。

二、论 文

《川苗概况》 林名均著,收入《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3年编印,约1.3万字。该文作于1936年,为四川学者调查研究四川苗族较早的著作。全文共10部分:绪言;川苗居住的地域与其人口约

数；川苗的生活及其习性；川苗的服饰；川苗的语言文字；川苗的教育状况；川苗的丧葬祭祀和宗教信仰；川苗的婚姻与家庭；川苗的故事与歌谣；结论。作者在结论中，对如何促进川苗发展进步提出了5点意见，主要是加强汉苗民族团结，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交通状况，提倡教育。

《彝族的历史起源》冯汉骥著，收入《冯汉骥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约1万字。该文为冯汉骥与希洛克(J. K. SHRYOOK)合写，原为英文，刊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8年第三卷第二期。文中对川滇黔三省彝族的历史作了简要论述，并对彝族文化特征进行了历史考察。对其中若干问题提出有益见解。同时，还对截至30年代，中外学者有关彝族族源问题的各种学说作了系统、扼要的介绍。文章指出，这个中国西南人数最多的民族有各种名称，定居于现住地已有2000年之久，认为彝族系东爨当中的卢鹿部之后并无根据。罗罗在元代才成为他们的正式称呼。西南各族中广泛流行的黑、白之称，涵义不同。彝族的黑彝、白彝实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黑彝、白彝体质不同，其隶属关系来自种族间的征服。该文考证了黔西、滇东北、四川凉山三处彝族从汉代发展到近代的历史，并指出该地居民自古复杂并不仅限于彝

族。文章引用唐代《蛮书》的资料，说明彝族许多文化特征如无陶器、披毡衣、头饰、尚鬼、火葬等早在唐代即已存在。同时，还指出彝族文化既有北方文化因素，又有南方文化因素。作者认为西方学者认为彝族来源于藏缅边境的说法，尚需进一步研究。

《羌族之信仰与习为》胡鉴民著，载《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约3万字。1937年夏，作者赴川西北的汶川、茂县和理番县(今理县)，对三县的羌民进行民族学考察研究。考察所得的材料中，将信仰与习俗部分写成此文。全文分5个部分，即一 导言。二 羌族所信仰的诸神之分析：白石神与神林；屋顶上与室内诸神，地方诸神。三 羌人的巫师——端公。四 羌人之习俗举例：治病，送晦气，驱邪与祝殖仪式，占卜，羌族冠礼与丧礼中的特殊节目：求雨。五 结论。作者在文章中，不是一般的记述羌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而是通过列举羌族最有代表性的信仰与习俗，试图运用当时欧美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理论，予以解释。

《凉山彝族奴隶制等级结构的形成》赵卫邦著，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9年第一期，约1万字。全文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形成及特点有许多创见。共分三节：第一节“两种类型的奴隶制”中，引用我国古代关于扶余、满族以及日本、印度的资料，说明古典的

奴隶制和“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这两种类型的奴隶均共存于同一社会。凉山亦是如此,呷西、阿加属前者,典诺属后者。在第二节“等级制度的形成”中说明,由于凉山经济发展迟缓,奴隶制未能突破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严格界限,因而产生了曲诺这一特殊等级,导致凉山特有的等级制度。在第三节“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特点”中谈到四个方面:凉山彝族奴隶制是在黑彝内部分化极不发达下产生的;这是以家长制为主的奴隶社会,奴隶制已呈现萎缩现象;社会虽已产生解体因素,但尚未突破奴隶制生产关系。此外,作者认为曲诺来源于古夔人,黑彝征服了他们,从而形成隶属关系。

《彝文规范方案》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制定,载《四川日报》1980年12月17日。《彝文规范方案》是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省彝语文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层上由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制定的。1975年经四川省革委会同意试行,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推行。实践证明《方案》比

较科学,群众易于掌握。1983年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一等奖。

《土家语概况》田德生(土家族)著,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四期,约2万字。土家语分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关于土家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言学者中目前还有不同的看法。该文作者把它归之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文章根据属北部方言的土家族语,简要介绍其音位系统、词汇特点和语法系统。

《嘉戎语构词法研究》林向荣(藏族)著,载《民族语文》1983年3期,约2万字。嘉戎语是四川省阿坝、甘孜两州部分藏民讲的一种语言。该文依据1956~1959年中国科学院语言调查第七工作队川北组所调查的嘉戎语27个点的词汇材料,论述嘉戎语各个方言的构词形式及其特点。全文又以嘉戎语代表点藏区东部方言马尔康卓克基话为主。例词中当提到方言土语时,其前冠以该方言土语的名称以示区别。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张怡荪(1893~1983) 名煦,四川省蓬安县人,1920年北京大学国文门(系)毕业并攻读研究生,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讲

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战期间返川,创办西陲文化院。并主持西康省通志馆工作。50年代初,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科研

究所所长。后任《藏汉大辞典》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四川省第五届政协委员。张怡荪的主要贡献在藏学尤其在藏汉辞书方面,在他主持下,积数十年的努力编成《藏汉大辞典》巨著。此外,还编有《藏汉集论词汇》、《藏汉语对勘》、《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藏汉译名大辞汇》,译有《宗轮晶鉴》(即《土观宗教史》),以及所编的《西康省地图集》等。

蒙文通 生平(见本志《中国哲学》部分)他在民族史方面的代表作有《古史甄微》、《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巴蜀史的问题》和《越史丛考》等专著。

胡鉴民 生平(见本志《社会学部分》)在民族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羌族之信仰与习为》、《羌民的经济活动型式》和《苗人的家族与婚姻习俗琐记》等论文。此外,尚有《西周社会性质问题》和《印度喀拉拉邦的昨天和今天》等文章。

冯汉骥 生平(见本志《考古学》部分)他在民族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国亲属制》、《作为中国亲属制构成部分的从子女称》、《玉皇的起源》、《彝族的历史起源》、《西康之古代民族》、《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和《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等论文。他还重译了摩尔根民族学名

著《古代社会》一书。

李安宅 生平(见本志《社会学》部分)在民族学与藏学方面的代表作有:《关于祖尼人的一些观察和探讨》、《巫术的分析》、《边疆社会工作》、《边民社会实地研究》、《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等。

邓子琴(1902~1984) 曾名永龄,笔名无畏,云南省永善县人。192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1931年至1933年,在昭通省立二中任教并代理校长。1933~1934年相继任云南省教育厅督学、编译,楚雄中学教师。1935年任教于山东菏泽乡村建设学院。抗战爆发后返川直至1949年,先后任乐山复性学院都讲、齐鲁大学(成都)讲师、四川教育学院(重庆)教授、勉仁文学院(重庆)教授。1950年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民族学与民族史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曾率该系考察队多次赴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并创建该系地方史与民族研究室。其贡献主要在历史学和民族学,代表作有《甘孜地区两种封建统治下的农奴制》、《八邦寺的科巴》、《玉龙牧区情况概述》、《德格土司制度下的农奴制》和《内蒙古达茂联合旗调查报告》等论文和调查报告,并有《中国风俗史》、《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要略》和《民族社会史研究论丛》等专著。

第十八章 新闻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近代四川的新闻学

四川最早发表专文研究新闻学的报刊是傅樵村在成都创办的《启蒙通俗报》。该报 1903 年第 5、17 期,先后发表了卧云室主人讲演的《看报有益说》和新樵(即傅樵村)撰的《四川开官报说》两文。前者讲述报纸的作用;后者评介四川开官报的经过,两文均用白话写成,意在普及。

辛亥革命时期,成、渝两地报刊大量涌现,除了一些报纸继续发表有关新闻学的专文外,还有不少报纸利用发刊词、社说、时评等来阐述自己对于新闻学的主张。如成都《西蜀新闻》1912 年 10 月 28 日的《发刊词》,1913 年 2 月 4 日的“社说”,同年 3 月 3 日的“时评”,3 月 11 日的“时评”,7 月 31 日的“时评”,以及《西顾报》在 1912 年 8 月 20 日的“时评”栏发表的《成都报界之时代》一文。

利用报刊自身言论阐述新闻学理论,是四川早期新闻学研究中最具普遍性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五四”前后。重庆《民信日报》在 1918 年 10 月 15 日在创刊“缘起”中,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势力、舆论和报纸三者之间的关系。1919 年 1 月 1 日,孙少荆在《川报增刊》第二、三版发表《成都报界回想录》一文,为第一篇系统回顾总结成都报刊发展历史的专文。

这一阶段的四川新闻学研究,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比较重视政论报刊的舆论作用,提倡创办“启迪民智”的“白话报章”。

二、现代四川的新闻学研究

(一)初步发展阶段(1919~1937)

从“五四”运动至抗战爆发前阶段,是四川新闻学研究获得初步发展

的时期。

1924年,成都《川报》主笔刘小青以“疾庐”的署名逐日在该报刊登《四川新闻事业之改进》。1929年9、10两月《成都国民日报副刊》之《学舟》,先后发表《何谓新闻》、《混合编辑制——与成都新闻界同业商榷一下》的重要论文。1931年6月7日,北碚《嘉陵江日报》刊登了该报社长卢作孚于峡局讲授一篇《新闻常识》,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均有通俗而简明的解答;开始重视新闻报道的采、写、编等业务工作。

汇集研究文章的报纸纪念刊计有:《民视日报五周年纪念汇刊》(1926.10)、《民视日报七周年纪念汇刊》(1928.10)、《新四川日刊三周年纪念增刊》(1928.10)、《新四川日刊四周周年纪念增刊》(1929.10)、《新新新闻五周年纪念特刊》(1934.9)、《华西日报第一周年纪念专刊》(1935.5)、《重庆商务日报十周年纪念刊》(1924.4)、《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1934.5)、《济川公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36.1)、三台《牖觉报周年纪念刊》(1926.10)、以及成都《复兴日报星期论文集》等。

在外省的川籍报人也有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问世。这些文章多汇集于省外出版的新闻学专刊上。1929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报学月刊》上,有戴季陶写的《关于新闻事业经营和编辑的所见》;1930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

《记者周报》上,有王鳌溪的《重庆新闻事业》(6.15)和《日人文化侵略下之东北文化事业》(8.24)、周儒海的《川省新闻事业》等;1934年10月在上海创刊的《报学季刊》上,先后刊载有彭革陈的《新闻编辑的方法论》(1934.10)、萨空了的《由华北之检查新闻谈到新闻检查问题》(1935.1)、傅襄谟的《新闻本质及其科学体系》(1935.3)、郭步陶的《新闻事业和共通原则》(1935.3);1935年的《复旦学报》第一期上,有郭步陶的《研究新闻学需有纯粹的科学精神》;1936年1月复旦出版的《报展》纪念刊上,有陈铭德1935年9月9日为新民报6周年纪念日撰写的《新闻标题之研究》等。

据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报刊记载,四川的新闻学著作始见于1926年。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是成都《川报》主笔刘小青编撰的《新闻学要领》一书。第二本便是同年问世的《法专新闻学讲义》。第三本则是傅双无编纂的《报学讨论集》。

川籍学者在省外出版新闻学著作,首推川籍上海报人郭步陶。他从1912年起即在《申报》、《新闻报》工作,迄至抗战爆发前已有好几部新闻学著作问世,如《编辑与评论》(1933)、《评论作法》(1936)、《时事评论作法》(1937)等。

从20年代起,四川新闻界曾多次成立过新闻学会组织。这些学术组织,

均由新闻业比较发达的成、渝两市新闻界人士发起分别成立。

1924年,成都青年记者发起组织成都新闻学会,约有会员20余人,多在各地任外勤。该会曾组织过两次讲演会,第一次是请《川报》主笔刘小青讲演《怎样作新闻记者》,第二次又请人讲演《新闻学各方面》。继后,又有成都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1932年10月,重庆新闻人士朱典常等人发起成立重庆市新闻学研究会,以研究新闻学术及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1936年5月5日,成都新闻学会成立;7月13日,重庆新闻学会随之成立。两会均以研究新闻学术,发扬新闻事业为宗旨。

从20年代中期开始,已有高等学校和一些中等学校开始讲授新闻学课程,或通过其它形式直接开设新闻班授课,这对四川的新闻学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926年,成都的高等学校如四川法政专门学校规定,每周授新闻学二小时,政治、经济、法律各科学生均修此课。

1929年9月,重庆高级中学校附设重庆新闻研究所,招考正生30名、附学10名,学制3个月,专门研究新闻学,由《新蜀报》总编辑王白与吕翰初、傅圣希等具体主持。

(二) 发展阶段(1938~1949)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全国新闻学著作的出版中心,出版的新闻学书籍

不下40种。重要的计有《抗战军事与新闻动员》《战时新闻纸》《战时各国宣传方策》《战时新闻工作入门》《去到敌人后方办报》《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团结运动》《新闻事业法令汇编》《战时新闻记者的基本训练》《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写作研究》《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中国新闻学会年刊》《新闻事业建设论》《广播战》《英国之新闻事业》《各国新闻事业概述》《各国新闻事业透视》《综合宣传学》《新闻学新论》《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采访十五年》《新闻圈外》《上海报人的奋斗》《夜生活:二十年报纸生涯甘苦录》《季鸾文存》《北线巡回》《中国解放区见闻》等。郭沫若的《战时宣传工作》一书由重庆青年书店于1939年出版。

在成都,出版历史最久的《新新新闻》报馆成了四川新闻学著作的出版中心。从1940年起,它先后出版了余戾林编著的《中国的报纸》(1940)、《中国近代新闻界大事记》(1941)、《世界近代新闻界大事记》(1942)、《中国记者之路》(1942)、《中国的通讯社》《讯报入门》《平时新闻读法》《战时新闻读法》等新闻学著作;1943年6月,它还出版了谢崇周著的《新闻标题之理论与技术》一书。此外,余戾林编著的《时事小辞汇》(1945)和《新闻家》(1948),分别由时事资料社和天下文

化馆出版,敬朋所著的《如何创办地方小型报》(1942)等书,也以“新闻学小丛书”的形式。由成都的联友出版社出版。

在桂林、上海等地,也有川籍学者的新闻学著作问世。卓有成就者首推萨空了。1944年3月,他在监狱里写成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以艾秋隄的署名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1946年6月又署以本名由香港文化供应社出版港1版;1948年,他的另一部专著《宣传心理研究》,又由上海的耕耘出版社出版。长期主持《新民报》的川籍报人陈铭德,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由上海的新闻报社代为出版了《一年来的工作》。此外,后来一直长期在重庆工作的非川籍报人王文彬,早在抗战初期就编著了《报人之路》和《采访讲话》两书,1938年5月同时由上海的三江书店出版,其中的《采访讲话》一书被范长江称为“对于采访学成为较有系统之专书”。

抗战开始以后,南京、上海、北平设有新闻系科的高等学府和新闻专科学校相继搬迁入川,分别在成、渝等地设校授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及成、渝分会、中国新闻学会、四川大学新闻研究会等先后在川活动,使四川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研活动呈现出盛极一时的局面。

三、当代四川的新闻学研究

(一)转型时期(1950~1978)

这个时期新闻学的研究,着重宣传 and 阐述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办报传统,并结合新形势下的中心工作,总结运用党报学说指导办报的实践,以加强新闻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同时中共也加强了对报纸的领导,初步建立起自己的新闻理论的体系。

1950年5月10日至20日,在重庆召开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在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要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去指导工作。

1950年2月7日《工人报》创刊时,发刊词中提出两条任务,即“一条是要做到群众性”;“工人报首先就是要组织全重庆市的工人阶级共同来办”;“其次,就是组织全体工会干部来办”。还指出:“工人报只有起一定的指导作用,才能做到群众性,也只有广泛联系群众,才能起一定的指导作用”。同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1951年5月1日,他给《川东报》题词:“报纸要做到真正成为加强领导和联系群众的工具”。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从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高度,肯定了报纸批评的

重大意义。1952年5月1日在《川东报》创刊一周年之际,明朗同志还写了《川东报与通俗化》的文章,给编辑、记者进行了很好的文风教育。

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人民日报》给中央的改版报告,并明确指出:“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同年10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第一副主编伍陵同志在编辑部大会上专门作了《报纸改革问题》的报告。《四川工人日报》编辑部针对当时工人群众的反映,以及有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领导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等问题,大胆提出了“干预生活”的口号,即加强批评报道,克服官僚主义,支持

先进,表扬先进。使报纸的内容和版面丰富多彩。

1957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为指导报纸的改革,印发了《关于改进地方报纸的意见》,所以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5月一年的时间内,四川新闻界相当活跃,在新闻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报纸的产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报纸的任务、作用,报纸与读者的关系等,提出了与革命战争时期不同的一些看法,并在新闻业务上能够打破常规,独辟蹊径,使报纸版面、内容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1959年6月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四川分会在成都成立。

50年代的新闻著作大多是通俗小册子,适合通讯员和初涉新闻工作的人阅读。主要有王火编写的《怎样办报》,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怎样读报》(1953),张友著的《怎样做工农通讯员》,四川日报编辑部编辑的《工农通讯员讲话》两本,1954年四川日报编辑部编的《新闻工作文集》共3册,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编辑的《1953年工业建设新闻通讯选集》。

另外,这个时期在全国性的新闻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如:张黎群《一定要把研究工作做好》,郑震孙《用图片教育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游云谷《在川西北林区采访》,四川日报总编室《学用一致,钻研理论》,李半黎《深入实际对提高理论水平的意义》,

四川日报编辑部《摆好农业报道在经济宣传中的位置》等。

(二) 活跃发展时期(1979~1985)

开展新闻学术活动 1981年3月30日,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在成都正式成立,李半黎任主席。

1981年5月,省新闻工作协会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工作研讨会。

1983年11月12日,四川省新闻摄影理论研究会在成都成立,并举办了新闻摄影理论研讨班。

1985年3月12日,四川省新闻学会在成都成立。1985年10月11日至14日,该会和重庆市新闻学会与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发起在重庆市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

发展新闻教育事业 1980年5月23日,四川大学成立新闻专业筹建小组。1981年9月招收了首批本、专科学生,1985年6月正式建立四川大学新闻系。

这个时期,重庆渝州大学也招收了部分新闻专业学生,建立了新闻班。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在重庆成立进修二部,招收了一批干部专科班学员。四川电视大学新闻专业也于1985年招收了一批电大专科生。

1984年8月9日至12日,全国高校新闻教育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

院、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渝州大学等近20所高校新闻专业的教师会聚蓉城,就新闻教育理论与实践和新闻学中的一些迫切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建立新闻学研究机构,创办新闻学刊物 这段时间,全省不少新闻单位专门建立了新闻研究机构。1979年11月,四川日报新闻研究所经省委宣传部批准成立。接着,四川省广播电视研究所,以及一些地、市新闻单位的新闻研究所相继建立。

与此同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新闻研究所,四川大学成立了大众传播研究室。

四川日报的《新闻业务》、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新闻界》、成都晚报的《新闻之友》、四川广播电视厅的《广播电视天地》、四川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学论丛》等,是影响较大的几种新闻学刊物。

出版新闻学论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了《新华日报的回忆》,1983年2月出又出版了《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重庆《新华日报》的战斗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了《新闻知识》,具体介绍了采访、写作、编辑工作的技巧,介绍了消息、通讯、调查报告、报告文学和评论的特点与写作方法。这家出版社还于1984年3月出版了《新闻理论讨论文集》,

1981年、1982年、1983年出版了徐铸成的《旧闻杂忆》及其“续篇”、“补篇”等3本著作,1981年出版了张恨水的《我的写作生涯》,1982年5月出版了《挺进报纪事》,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重庆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了张友渔著的《报人生涯三十年》和张友鸾等著的《世界日报兴衰史》,1983年8月出版了《谢觉哉与新闻工作》和《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1984年11

月出版了刘思慕著的《国际通讯选》等一批“新闻丛书”。1983年还出版了乔冠华的《国际评论集》。

这一时期,北京新华出版社还出版了四川籍著名记者范长江的代表作《中国的西北角》(1980)、《塞上行》(1980)、《通讯与论文》(1981)。

另外,这段期间,一些川籍学者也出版了不少新闻学论著。如甘惜芬的《新闻理论基础》(1982),蓝鸿文的《新闻采访学》(1984)。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著

《报学讨论集》傅双无编著,上海崇明书局1929年版,16开本,约40万字。该集是傅双无以四川新闻学会的名义印行,全书连序共57篇文章。集内文章除国内陈次亮、张之洞、梁启超、孙中山、吴敬恒、邵飘萍、戈公振、汪英宾、任白涛和国外蒲莱士、威廉、琼斯等人的外,还包括川籍人士戴季陶、胡政之、傅双无等人的文章,其中傅双无的文章有《报学讨论集序》、《中国报界今后应有之六大觉悟》、《报联会成立应作如是观》、《一九二六年之新闻事业及新闻学概况》、《民众日报宣言及其计划》等。该集出版前,所有文章曾于1929年5月起在成都《民力日报》第四版逐篇刊布,延至10月1

日始完。

《编辑与评论》郭步陶编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初版,约14万字。全书共分两编:第一编编辑,下分编辑的准备、编辑的工作、编辑的方法三章;第二编评论,下分概说(包括评论在报纸中的地位、评论文的基本条件两节)、评论的种类、评论的变迁、评论记者应有的条件、评论的作法五章。书前有新闻名家张蕴和、谢六逸和李浩然的序各一篇。

《评论作法》郭步陶编著,上海申报馆1936年出版,约16.2万字。该书为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之五,共分三章,讲述新闻评论的本质、新闻评论的种类、新闻评论的作法等。

《本国新闻事业》郭步陶编著,上

海申报馆 1936 年出版,约 9 2 万字。该书为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之十一,共分两部分:一 新闻事业的本质。二 本国的新闻事业。其中第二部分包括:从纵的方面观本国的新闻事业,叙述“官府的新闻事业”和“民众的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从横的方面观本国新闻事业,介绍当时全国各省、市的报刊和通讯社,对重要都市的新闻事业作了比较,指出僻远省份新闻事业的困难,叙述了军阀蹂躏下的新闻事业、外人势力下的华侨新闻事业、以及“九一八”以后的东北新闻事业。

《时事评论作法》郭步陶编著,正中书局 1937 年 5 月南京初版,约 12 6 万字。该书共分 5 章,讲述时事评论的本质、种类、作法、撰评者的修养等问题。书前有潘公弼、李浩然、胡朴安、谢六逸、薛农山、袁业裕的序及自序各一篇。该书原为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后又被作者用作在复旦大学、沪江大学讲授新闻学的课本。

《报业管理概论》刘觉民编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6 月初版,约 22 3 万字。该书共分 10 章,包括叙论,报业组织的法律问题和实际问题,印刷工场、材料、人事和财务管理,发行推广和广告推广的实际,以及报业的理财政策。书末附录为参考书表。该书“除阐发理论外,并注重技术的讨论。材料切合实用,文字叙述简明”。是

我国系统研究报业经营管理问题的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

《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重庆《新蜀报》编辑部编辑,该报发行部发行,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印刷,16 开本,1934 年 5 月版。该刊汇集了多篇有价值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有:杨丙初的《重庆报纸小史》,这是第一篇较为系统地论述重庆报纸历史的文章;同时还介绍了已为社会而牺牲的《新蜀报》的最大功臣萧楚女、漆树菜、孙倬章的生平事迹;贺植君的《四千号的追忆》,详细讲述《新蜀报》12 年的历史;此外,刊有《纪念辞》、袁彬的《新蜀报四千号纪念》、刘泗英的《新蜀报初始之回忆》、刘尚新的《编辑纪实》等。

《复兴日报星期论文集》成都《复兴日报》社秘书室编辑,该报印刷部印刷,32 开本,1936 年 5 月版。该文集载有丁少斋的《引言》、姜蕴刚的《发刊词》、徐敦璋的《谈国际新闻》、魏嗣奎的《读者与作者》等。其中的《谈国际新闻》一文,作者既从编辑方面就如何编辑国际新闻提出了改进的意见,也从读者方面就阅读国际新闻之前应注意的事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读者与作者》一文,提出在日报上作文应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认清读者,二是善择材料,指出工人的报纸与资本家的报纸在读者对象、新闻记载、社论内容方面都截然不同,并针对成都报纸存在的问题,建议发表社评应当注重本地实

际,编制新闻各报应有所侧重。

《战时新闻工作入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编印,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3月版,约22.4万字。该书共收入有关战时新闻工作的文章40多篇,分为以下八类:战时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17篇);战时新闻记者的修养与学习(8篇);战时办报的教训(4篇);战时编辑工作的新动向(5篇);战时国际宣传资料采访的经验(3篇);战时报纸供应问题(3篇);战时新闻政策意见的提供(4篇);附录(3件)。作者有胡愈之、范长江、陆诒、孟秋江、刘尊棋、高天、黄药眠、成舍我、陈博生、张季鸾、邵力子、邹韬奋、金仲华、曾虚白、穆欣、潘梓年、柳湜等30多人,其中仅范长江就撰写了《战时新闻工作的真义》、《展开敌人后方的新闻工作》、《怎样发战事电讯与战地通讯》、《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建立积极的新闻领导政策》等5篇文章。

《中国近代新闻大事纪》余戾林编著,成都《新新新闻》报馆1941年12月版,约5.1万字。该书由纵的方面,记述中国新闻界的演进历史,从1815年8月5日起至1941年11月止,将各重要报纸及通讯社之创刊、政府公布之新闻法令、新闻学校或大学新闻学系之设立、新闻学书籍之出版、以及新闻记者之殉职等,皆按年代有系统之叙述(每条均分年号、干支、公元三

项编排),是较为完整的新闻史料。书前有编著者的《序》一篇,书末附录收有《新闻政策》、《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案》、《中国新闻学会宣言》、《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朱惺公骂贼文》。

《如何创办地方小型报》敬朋著,成都联友出版社1942年2月版,约4万字。该书结合我国地方情况讲述如何创办地方小报问题。为“新闻小丛书”。

《新闻标题理论与技术》谢崇周著,成都《新新新闻》报馆文化服务部印行,1943年6月版,约9.3万字。各章主要内容为绪论、新闻标题之形与质、新闻标题的法则与作用、新闻标题的技术、新闻标题的态度、新闻标题的连带关系和结论,

《新闻写作》潘霖著,台北中央日报社1955年版。作者资中县人,抗战时期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曾任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编辑,1949年赴台湾。该书对报纸各种新闻稿写作之理论与实际分析论述甚详,曾被台、港各大学新闻系科采为教材。

《通讯与论文》范长江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1981年出2月版,23.4万字。该书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作者发表在报刊上的新闻通讯,一部分是他撰写的新闻学论文。

《新闻知识》邱沛篁、胡发强、傅

雨贵、郑松元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14.2万字。该书是在1978年秋四川大学举办的新闻知识讲座的基础上编写的。除绪论外共分8章:第一章讲述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第二章论述新闻采访的指导思想、特点、方法与技巧;第三至第七章按照新闻体裁分别介绍消息、通讯、调查报告、报告文学和报纸言论的写作特色与艺术;第八章概述报纸编辑工作的基础知识。

《新闻理论基础》甘惜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约19.6万字。该书分新闻、舆论、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作用、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新闻事业和群众、新闻事业和党共7章,并附录了作者《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一文。书中绪论主要阐述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强调新闻学是一门科学;上篇四章着重论述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的普遍规律;下篇三章着重论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党的新闻工作的特殊规律;结束语阐述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修养。附录的文章中,表明了作者对于研究新闻学的指导思想、关于“工具论”、“统一舆论、组织舆论、新闻自由和新闻学研究的迫切任务”等问题的见解。

《论新闻采访与报道》缪海棱著,新华出版社1983年9月版,19.2万字。该书所汇编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在

50~60年代初期的一部分业务经验的研究和总结。

《新闻采访学》蓝鸿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20.7万字。这是一本系统概述新闻采访的历史、性质、原则与方法的专著。全书共三篇,第一篇论述记者的历史、类型、职责和修养;第二篇阐明采访的性质、重点、原则、路线和作风;第三篇具体剖析如何掌握新闻线索、进行访前准备、访问、开座谈会、观察和积累资料。

二、论 文

《成都报界回想录》孙少荆著,载1919年1月1日《川报增刊》第2、3版。全文除前言和结尾外,内分3个时期叙述成都报界的历史:清季维新后之报界情形;辛亥民国成立后之报界情形;癸丑后官僚势力范围之报界情形。

《新闻学概论》春秋著,载三台《牯觉报周年纪念刊》(1926年10月)。该文共分5部分:何谓新闻及如何构成新闻;新闻纸的意义及其职务;新闻纸对于社会和人民的关系;新闻之采集与编辑;通信社。这是四川最早的一篇概述新闻理论和采编业务的新闻学论文,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使用“新闻学概论”名称的论著。

《成渝新闻事业比较观》王白与著,载《新新新闻五周年纪念特刊》1934

年9月1日出版。该文是作者,(时任《华西日报》总编辑)“为《新新新闻》五周年纪念作”。文章采用比较的办法,探讨了成渝两地新闻事业的不同特点和风格。

《新闻编排的方法论》 彭革陈著,载上海《报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一篇关于改进新闻编排方法的论文。它一方面是说明英美两派新闻编排的内容;一方面主张我国报纸在编辑新闻时应采用美国的“单一式”,在排刊方面则应采用美国的“提要式”。

《新闻本质及其科学体系》 傅襄谟著,载上海《报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35年3月29日)。该文是作者在日本东京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学时于1935年3月7日撰写的学术论文。文章首先指出,新闻、新闻纸、新闻事业者,在新闻本质上原是三位一体共同存在的,其作用是三位连环而互为因果的;接着指出,新闻本质上有三大条件必须具备:报道要神速、要有一定的出版时间和地点、以一定代价供给一般社会的读者;并进一步探讨4方面的问题:与社会大多数群众有利害关系及高尚意识和兴趣的报道,全部社会现象皆为新闻报道之题材,必定经过“印刷”阶段而产生之报道乃为现代的新闻,新闻纸者即集中三种有机力(精神力、经济力、技术力)而组成之产物是也。文章还把最近

30年来西方新闻研究的系统约分为三派;大陆派(德、法、意、希),美国派,英国派。

《新闻事业和共通原则》 郭步陶著,载上海《报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35年3月29日)。该文分为四个部分;什么是新闻事业,什么是共通原则;新闻事业中的共通原则,从事新闻事业者应明白共通原则。文章指出,“新闻事业”是人类中的公共事业,而公共事业就必须遵循“共通原则”。在新闻事业中提出“共通原则”,体现出为大众传播的思想。

《新闻标题之研究》 陈铭德著,载《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纪念刊》即《报展纪念刊》(1936年1月)。该文是作者于1935年9月9日南京《新民报》创刊六周年纪念日撰写的。文章从地位、作用、制作等方面对新闻标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关于新闻标题的地位,指出“所谓新闻标题,即是新闻的纲目”;关于新闻标题的作用,揭示3点:提示新闻纲要于读者,广告新闻内容于读者,唤起社会舆论;关于新闻标题的制作,认定“标题是一种艺术”,不可小视和马虎。这是较早的一篇对新闻标题作专题研究的文章。

《统制新闻方法有改善之必要》 郭步陶著,载《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纪念刊》即《报展纪念刊》(1936年1月)。该文的可贵之

处。在响亮地提出“报纸之天职,为记载真确新闻,作人民耳目与喉舌。”强调“记载真确新闻,”坚持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要求“作人民耳目与喉舌”,表现了作者关于“人民本位”的思想。

《成都新闻业之今昔》黄鸿铨著,载重庆《四川月报》第九卷第一期(1936年7月)。该文共分6部分:引言,报业之沿革,报社之组织及现状,新闻界之组织及现状,新闻教育概况,结论。该文是一篇较为系统全面地叙述成都新闻事业历史的文章。其中“报业之沿革”将成都报业划分为萌芽(清末至民初)、进展(“五四”至1928年)、稳定(1929年以后)三个时期;“报社之组织及现状”按报社的内部组织及工作、人员待遇、营业概况进行叙述;“新闻界之组织及现状”叙述历年来成立之报联、记者工会、通讯

协会、探访协会等团体;“新闻教育概况”叙述学校教育、新闻学会和著述方面情况。

《记者节与言论的职责》郭步陶著,载《新闻记者》第二卷第八期(1940年9月1日)。该文共分5部分:绪论,

国际舆论的观察,社会需要公平言论,我们自身的检讨,记者的贞操问题。对抗战言论和记者修养具有实践意义。

《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余戾林著,载1941年9月1日成都《新新新闻》第九版。该文首先指出“新闻学为近代新兴的科学”;“无论从理论基础与事实需要两点来观察,新闻学也同其它……各科学一样成为独立的科学”。新闻教育的范围,作者意见分为3种:新闻系科专门教育,一般学校新闻教育,社会新闻教育。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傅樵村(1873~1918)名崇榘,字樵村,生于简州(今简阳),后迁居成都,为成都报人先驱。1898年,他“司《蜀学报》采访”,从1900年开始先后创办过《算学报》、《启蒙通俗报》、《通俗日报》、《通俗画报》等。1903年3月、10月,他用笔名在《启蒙通俗报》上先后发表《看报有益说》、《四川开官报说》两文,表达了他对报纸意义和作

用的认识。

郭步陶(1882~1962)原名成堃,字景庐,隆昌县人。早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1912年入《申报》,五年多撰写大量“杂评”文章。1918年转入《新闻报》,历任编辑、编辑主任、主笔等职,达20年之久。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沪江大学新闻系、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兼任教职。1938年,他赴香港先

后担任《申报》香港版总编辑、《星岛日报》晚报主任、《商报》周刊总编辑、中国新闻学院院长等职。他编著出版的《编辑与评论》、《评论作法》、《时事评论作法》、《本国新闻事业》等著作,发表的《新闻事业与共通原则》、《研究新闻学需有纯粹的科学精神》、《记者节与言论的职责》、《新闻界的使命》等论文,在我国新闻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孙少荆(1888~1927) 字今是,笔名行者,成都人。1912年起先后创办过《公论日报》、《女界报》。1914年后,先后担任《共和杂志》月刊主笔、《崇正日报》编辑兼主笔旋任副总编辑、《蜀报》主笔。1918年,创办《民知日刊》,并为《新青年》等撰稿。五四运动后,任《星期日》周报经理、编辑。1919年1月1日,他曾以“行者”笔名在《川报增刊》发表《成都报界回想录》一文,留下成都早期的报刊史料。

舒君实(1890~1984) 华阳县人。1922年,创办《壬戌日刊》。后入《民视日报》,曾任总编辑。1934年,任《华阳日报》首任社长。1943年,曾主编《成都快报》、《新新新闻》副刊“蜀雅”、“蜀故”周刊。1955年,被四川省文史馆聘为研究员。著有《学钝室杂著》等书。抗战初期,曾发表《新闻常识》、《非常时期之报纸》、《言论自由之真铨》等学术讲演。

王白与(1902~1949) 名本霖,字

白与,蓬安县人。北京陆军测量大学毕业。1920年回川后,先后担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译室主任。成都《华西日报》总编辑、社长,《新蜀报》总经理等职。1949年8月20日在重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1月27日遭杀害。他撰有《成渝新闻事业比较观》、《一年来之本报》等论文。

范长江(1910~1970) 原名希天,内江人。1933年开始为北平、天津报纸撰稿。1935年7月,陆续在《大公报》发表旅行通讯,后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6年夏,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后又发表《陕北之行》通讯,出版通讯集《塞上行》。抗战时期,创办并领导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并主编《新闻记者》月刊。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香港创办《华商报》,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50年后,历任新华社总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全国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等职。主编《新闻记者》期间,发表大量新闻学研究论文,后大部分收入《论文与通讯》一书。有《范长江新闻文集》行世。

傅襄谟(1911~1948) 字仲举,江安县人。1927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1933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新

闻学院改学新闻。1935年6月,创办并主编《留东新闻》周刊。1936年底回国,应聘担任重庆《国民公报》采访部主任。1938年,又兼任复旦大学新闻

系教授。1940年9月,担任《四川国民日报》总编辑。撰有《新闻本质及其科学体系》等学术论文。

第十九章 图书馆学、情报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古代四川的藏书业

四川自汉代以后就有较多的藏书家、目录学家、他们的藏书实践和治学活动,开始产生一些有关图书征集、保管、校讎、整理、利用等方面的论述。到宋代,四川成为全国刻书业集中的三个地区之一。刻书业的繁荣,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1151年前后晁公武守荣州(今四川荣县)时,编纂完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书目之一——《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分图书为经、史、子、集四部45类,共著录图书1937部(包括赵希弁《附志》)24500卷。每部之前有大序,称为总论。每类之下有小序,置于各类第一部书的解题之中。每一种书又有解题,或介绍作者,或介绍书的内容,或介绍学派源流,或介绍不同的学说,并详加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郡斋读书志》著录的许多图书,为

《宋史·艺术志》所不见,可补其不足。《郡斋读书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均效法《郡斋读书志》。

明代四川藏书家,较著名的有杨慎和陈于陞。杨慎(1488~1559)有双桂堂,陈于陞(1540~1596),字元忠,南充人,有万卷楼。陈于陞对于书之搜罗,颇有一套独到的方法。他根据类书注中所引证之书及各种书目来征求珍稀书籍,取得7年中得书3000部的奇效,这可谓图书征集之一良法。

清代四川之藏书事业,较前代为盛,出现为较多的理论论述和目录作品。诸如李调元、周永德等,他们不但有丰富的藏书,而且深通藏书之道和目录版本之学。

李调元有《西川李氏藏书簿》¹⁰

卷,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所藏之书。另有《万卷楼藏书约》对所藏图书的保管、使用等作出了规定。李调元在文化上有两项突出的贡献,即《庸书录》的撰著和《函海》的编刻。《庸书录》系文献史上一部重要的辨伪目录,颇有裨于文献学、考据学、目录学之研究。《函海》的编刻,表现了李调元对于图书搜罗和保存的独到见解:一是注重珍稀之本、罕见之作;二是注重蜀人著述,即四川的地方文献。

周永德(1856~1922),字达三,华阳人。周永德刻书,以目录学、版本学为指导,主持成都志古堂40余年,刻书500余种,亲自校勘《玉海》《读史方輿纪要》等百余种2000余卷,使这些书的内容质量达到了较高水平,为蜀学的昌盛做出了贡献。

忠州(今忠县)李士芬著有《忠州李氏藏书草目》,华阳李嘉绩著有《五万卷阁书目记》。他们在有关著述中,对图书、目录、版本之学亦多有阐发。

张之洞,清同治末年,出任四川学政,创办尊经书院,实行教育改良。为解决“诸生为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在缪荃孙的襄助下,于光绪初年完成了《书目答问》的编纂。《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它的出现,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为中国目录编纂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二、近现代四川的图书馆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演变,具有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学在中国诞生。四川近代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的兴起较全国为晚,约起步于20年代初期,20年代中期始有较大发展,其标志是1924年前后穆耀枢所著《改良中国图书馆管见》《图书馆运动》等的行世,以及《图书馆周刊》的创刊和图书馆专门学校的设立。

穆耀枢的图书馆学思想,对近代四川图书馆学的发展具有启蒙的作用,他提出要使国民养成读书爱好,认识和学会利用图书馆,使各级政府和教育单位重视和兴办图书馆、支持图书馆,创办图书馆专门学校,制定图书馆法律和图书馆奖惩办法,使图书馆工作者热爱图书馆事业,办好各级图书馆,组织我国图书馆协会和研究会,统一全国图书管理法,开办图书馆用具专卖所等主张。他除创办了通俗图书馆、儿童图书室、草堂图书馆外,1925年还创办了图书馆专门学校,为四川图书馆事业和理论建设培养了一批人才。1926年,他又在成都主力图书馆周刊社,出版了《图书馆周刊》。该刊以研究图书馆科学、交流图书馆工作经验为宗旨,是省内最早出现的图书馆学专业理论刊物。

毛坤1928年发表了《关于中国

图书大辞典之意见》,此后,他陆续发表了《译书编目法》(1929)、《中文编目参考书》(1929)、《观四库全书记》(1929)、《学校图书利用法浅说叙录》(1930)、《调查四川省图书馆报告》(1932)等文,在国内图书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30年代初、中期,蜀中图书馆运动兴起,图书馆事业建设与理论研究同步发展,1932年,重庆青年会图书馆举办图书馆学讲习会,开展学术讨论。同年,成都图书馆月刊社主办的《图书馆月刊》及营山县晋康图书馆主办的《四川营山县晋康图书馆季刊》相继创刊,刊登有关工作经验介绍和理论研究的文章。

1932年6月底,四川图书馆协会开始筹备,1934年3月,协会正式成立。协会的目的在于推动四川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四川文化的发展。

在传统目录学的研究方面,刘咸炘和傅增湘是两位杰出的人物。刘咸炘著有《目录学》(1934)、《续校雠通义》(1928)和《校雠述林》(1930)。傅增湘平生著述甚富,其有关目录、版本者,主要有《藏园群书题记》、《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书目录》和《藏园群书经眼录》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图书

馆学方面主要的教育、学术机构均迁入川内,一大批图书馆学界的专家学者云集巴蜀。四川的图书馆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于1938年迁来重庆,1940年,设有图书馆科、系的金陵大学迁来成都;以及在四川璧山成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这三所全国最主要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培养了一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推动了四川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址迁往昆明,同时在重庆设立理事会通讯处(1943年9月会址由昆明迁重庆)。该协会确定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协助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西南、西北各省发展图书馆事业”,该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曾有数期分别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出版。1945年3月,中国图书馆学社于四川璧山成立。同年6月,该社编辑的《图书馆学报》创刊。此外,出版的图书馆学专业刊物还有《图书月刊》和《图书集刊》,前者由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址在江津中白沙)编辑,创刊于1941年1月;后者由四川省立图书馆编辑,创刊于1942年3月,馆长蒙文通任主编,这两种刊物在当时国内图书馆学界亦有较大影响。

抗战期间,国内一大批著名的图书馆学者云集四川,如沈祖荣、毛坤、汪应文、袁同礼、严文郁、汪长炳、皮高

品、顾颉刚、刘国均、李小缘、蒋复聪、卢震京、金敏甫、徐家麟、桂质柏、洪有丰、岳良木、曲继皋、曹祖彬等人,他们在川中从事图书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领导四川乃至全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成为当时图书馆学领域的主力,编撰完成或出版的论著亦较多,如蒋复聪《图书馆管理法》(1943年)、《图书馆》(1943年)、王云五《新目录学的一角落》(1943年)、卢震京《图书学大辞典》(1940年)、杜耀光《读书合理化的体系》(1942年)、童启智《图书方法总汇》(1943年)、杨杰《读书指导》(1943年)、金敏甫《抗战时期之政府机关图书馆》(论文,1939年)、曲继皋《图书馆征集西南俗文学文献之重要》(论文,1939年)、邓光禄《图书馆界对于我国抗战建国之任务及其推进》(论文,1941年)等等。这些论著,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当代四川的图书馆、情报学

(一) 50~70年代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四川省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教育的新开端,1951年8月,西南师范学院开办了图书馆博物馆专修科。1954年8月停办。1957年3月,成都市区图书馆干部进修学校成立。

1960年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在四川省图书馆建立了函授辅导站,招收函授学员。

1963年12月,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开办了成都地区图书馆干部业余学校。

50~70年代中期,四川省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除上述各种形式外,主要通过举办业务培训培养和提高专业人才。通过业务培训,不仅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保证,而且对图书馆学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57年,成都市高等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为了加强联系和协作,组成了学习、研究、书目、宣传等五个经常性的业务活动小组,这是50年代后四川省图书馆界有组织的图学馆学术活动的开端。

1958年6月,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成立。从1960年10月至1962年10月,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组织了多次报告、座谈会以及专题讲座等,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课题有《科学技术情报工作方针任务和重要意义》、《高等学校图书馆如何加强为科学研究服务》、《图书馆如何支援农业》、《图书馆如何辅导读者阅读》、《怎样建立合理的藏书制度》和《国际图书十进分类法》等。主讲人有重庆市图书馆馆长杨作平、四川医学院图书馆馆长李永增、成都大学图书馆馆长丁道谦等。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于成立

当年,组织编写了一套图书馆中等专业教材。1958~1960年,组织各类型图书馆撰写和编印了《四川省大型图书馆工作经验汇编》(1949~1959)、《图书馆常用外语手册》和四川地区图书馆馆藏《外文期刊联合目录》、《石油天然气书刊联合目录》、《合成化学野生纤维书刊联合目录》、《四川地方文献资料索引》、《抗战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以及《全国中文政法书籍联合目录》等大型书目。

这一时期,四川省的图书馆学研究主要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工作实际的需要,偏重于工作经验的总结和业务技术方法的探讨。如图书馆如何为科学研究、生产、教学服务,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的编制,以及图书分类、编目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于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图书馆学刊物。正式出版的书籍,有重庆市图书馆陈铎的《怎样管理农业合作社图书室》一书。

情报学的发展历史已有40余年。中国情报学研究源于情报工作,与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同步。1956年,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前身)成立,次年12月创办了《科学情报工作》杂志(即《科技情报工作》杂志前身),标志着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开端。四川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

庆分所创建于1960年。此后,国防军工生产和科研机构的迁入与发展,大大加强了四川的科技情报工作队伍,为开展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初创是,正面临着中国情报界需要建立手工情报检索系统的迫切任务,重庆分所承担了情报检索刊物,即成套科技文摘的组织、编辑和出版任务,并创办了半导体等新兴学科的快报。到1966年,重庆分所编辑出版的科技文摘及刊物已发行70个分册,所报道量达1亿多字,约占全国检索刊物报导量的三分之二。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和科技情报事业都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学术研究陷入停滞状态。

(二)1978~1985年图书馆、情报学的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省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有了空前的发展。

1. 图书情报学教育 1983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四川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1984年改为图书情报学系),西南师范学院开办了两年制的图书馆管理干部专修科,开始招生。1985年,四川省图书馆和全省15所市、地区图书馆以及个别区图书馆等先后开设了专业班,招收正式学员。1981年8月,省图书馆学会创办了四川省图书

馆中等专业函授学校。

从 1978 年 7 月起至 1983 年 7 月,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四川省图书馆学会,或分别或联合多次举办图书情报人员学习班、进修班、图书馆馆长研讨论会等。

1979 年以来,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举办各类情报培训班约 20 次,分所还向西南地区(含西藏)共 20 多个单位先后派出 40 多人次进行巡回讲学。

1980 年,四川省科技情报学会成立,十分重视科技情报干部的培训工作,至 1985 年,有计划有目的地举办各种类型培训班、讲座共 10 多次。培训的对象,既有科技情报战线的领导和骨干,也有一般业务工作人员,该会和成都市科技情报学会先后联合举办了“科技文献检索方法与实践”、“中文科技资料及其检索方法”、“香港终端机文献检索”、“专利文献及检索和利用”等以用户为主要对象的培训班,共培训用户 700 多人次。其中尤为“香港终端机文献检索”和“专利文献及其检索和利用”两次培训影响较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均甚显著。

2. 学术会议 自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和四川省科技情报学会分别于 1979 年和 1980 年成立以来,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自 1979~1985 年两会召开的专题和综合性学术讨论会不下

16 次。地区图书馆学会召开的这类讨论会还不在此内。

两个学会先后分别同国家图书馆学会和科技情报学会在省内外组织了 6 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两个学会、四川大学图书情报学系以及高等学校图书馆等,还重视邀请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专家、学者来川进行学术交流。1978 年 7 月,国内知名版本学家顾延龙来蓉给图书馆学界作了题为“版本学与图书馆”的演讲。1981 年 1 月,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东方部主任陈炎生来蓉进行学术交流。四川大学图书情报学系于 1984 年初创时,先后邀请国家图书馆领导部门负责人鲍振西、陈源蒸等为该系师生作专题学术演讲。1985 年 4 月,美国人民友好图书情报访华团来成都访问,团长罗伯特·斯图雅特作了学术演讲。

3. 学术刊物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于 1979 年 3 月创办《四川图书馆学报》(季刊),它是学术性刊物,也是国内同类刊物中唯一的理论性刊物。在正刊外还编辑译文、分类编目和古籍善本等三种专刊,以及以丛刊形式出版了几种工具书和专著等。

为适应广大青年图书馆工作者的需要,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于 1981 年又创办了《四川图书馆》杂志(双月刊),1983 年 7 月改名为《图书馆员》,1985 年 1 月由省学会直接主办。为充

分发掘和利用图书馆馆藏文献,四川省图书馆于1980年创办了一种新型杂志——(集萃),刊物内容完全取材于馆藏文献,范围涉及文学、史学和科学技术各个领域,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1980年,省科技情报学会创办了《情报学刊》,创刊号上明确指出其读者对象为科技情报人员、经济管理人員和科学研究人員。国内情报学界把《情报学刊》同《情报学报》、《情报科学》并列为我国情报学界三大核心期刊。

4. 图书馆学、情报学各学科研究的新成果 70年代末至1985年底,四川省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在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图书馆学方面: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有《关于公共图书馆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几个问题》(胡继森)、《高等学校图书馆为“两个中心”服务的问题》(陈富安)、《论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孙德辉)、《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札记之一》(汪恩来)、《关于图书馆学的对象和内容(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若干问题札记之二》(汪恩来)、《如何认识图书馆的经济效果》(丁道谦)、《应该转变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张晓林)、《新的技术革命与图书馆的职能》(邵森万)等。关于图书的管理、收藏、分类的研究的有《国家书目与呈缴本制度》(刘启柏)、《图书馆藏书建

设论略》(许万雄)、《试论联合目录》(毛坤)、《论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原则》(张德芳)、《技术标准处理方法》(程仲琦)等。关于图书流通的研究有:《高等学校图书馆如何在提供教学参考书工作中贯彻少而精的原则》(黄彝仲)、《高等学校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点问题》(吴声亮)等。关于图书馆学教育问题的研究有:《谈图书馆专业教育》(沈祖荣)等,其他还有《工具书学初探》(戴克瑜、夏发奎、唐建华、邵森万)等重要文章。情报学方面: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有《社会科学的情报工作》(杨以凡)、《狭义情报学与广义情报学》(洪传科)、《理论情报学与应用情报学》(洪传科)、《加强高校情报工作之我见》(杜桑海)、《地方科技情报研究与软科学研究》(王思明、戎善明、甘邦举、江雪)、《努力开创科技情报的新局面》(左毅)等。关于情报实践的研究有《建立适应我国特点的情报刊物体系》(阎庆甲)、《科技情报效果的模糊评价法》(李天复)、《试论情报工作的“四化”——制度化、标准化、自动化、集成化》(赵芝)等。关于文献学、文献计量学及文献检索研究的有《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和应用》(刘植惠)、《建立文献学研究体系》(韩有悌)、《中文机械化检索的探讨和汉字“加汉标识”法》(王振玉)等。

1979年2月,为适应省内外图书馆学界干部业务学习的需要,四川省

图书馆学会组织省内图书馆学界和情报学界有关人士撰写《图书馆学知识丛书》。该套丛书共有《图书馆学概论》、《科技情报工作概论》等16种。按照全国有关善本书普查和目录编撰的要求,四川省图书馆完成了《四川善本书联合目录》的编撰,并正式出版发行。此外,为配合社会各界编纂史志和研究工作的需要,还编撰了《四川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四川进步革命期刊论文索引》。重庆市图书馆编撰了《馆藏党史书目和期刊目录》、《馆藏家谱族

谱目录》以及《馆藏抗战版文艺期刊篇名索引》等内部刊印的书目索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还编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文献题录》。

在此期间,川籍在外学者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主要有曾浚一《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初步探索》、荀昌荣《“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质疑》、《略论“左”的错误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影响》、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等文。

第二节 主要著作选介

一、专著

《目录学》 刘咸炘著,1934年石印本,约7.8万字。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著录、存佚、真伪、名目、篇卷、部类、别裁互著、次第、解题9篇;下编分版本、校勘、格式、文字、未论5篇。作者继承郑樵的目录学思想而又有所阐发,建立起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刘咸炘认为目录学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他的目录学体系并不满足于“部次甲乙”之法,而是在“部次甲乙”之外,容纳了更广泛的内容。对于目录学中之著录、辨伪、解题、版本、校勘等事,通过广征博引,发挥成说,最终穷其意而明其法。作者为读者指引了一条“读书门径”。

作者在《未论》中指出,学习目录学需要注意两点:“一则目录学中诸事当互资兼备,不可偏恃。若精于一而忽于一,则其得亦不为得”。一则目录学只是学之锁钥门径,不可即以是为足……以工具为目的,积习生常,乃人通弊,不可不警也”。这两点,是作者对研究目录学者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藏园群书经眼录》 傅增湘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19卷,总目1卷,约100万字。作者毕生致力于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所藏近20万卷古籍中,手自校勘的有16000余卷,撰有题跋500余篇,校记若干种。平生所见各书更不止数10万卷,大都择优做了记录。该书根据这些观书和藏书记录手

稿,由作者后人傅熹年整理而成,是作者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全书共38册,计经部2卷,史部4卷,子部5卷,集部8卷,共收录各种善本约4500种,100余万言。近代流传的重要善本基本包括在内,是了解近代所存善本概貌和流传、佚存情况的重要史料。所论各书的特点、渊源、优劣都出于数十年现书经验与校勘心得,对于今天鉴别和整理善本古籍仍有参考价值。

《英汉情报图书工作词汇》金若豪、刘植惠等编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2年版,约68万个字。书中收录情报图书工作的名词术语19000余名,内容广泛情报学和图书馆学的各个领域,同时还适当收录了计算机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常用词汇。书末附有常见的情报图书工作缩略词3700余条。该书词汇量大,新词多、实用性强,堪为情报图书工作者和高等院校情报、图书馆学系师生研究和借鉴国外情报图书馆经验的一部良好工具书。

二、论 文

《谈图书馆专业教育》沈祖荣著,载《湖北教育月刊》1935年第二卷第四期,约0.8万字。该文是国内较早的一篇全面系统地论述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文章。文章论证了:图书馆专业教育是一种学术专科教育,而不是一种简单的职业训练;图书馆的社会

功能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重大意义;办理图书馆专业教育之各种方式,对学徒制的训练、利用暑期作讲习的训练、师范科所设的图书馆课程、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训练、图书馆学研究院的训练等各种层次的图书馆专业教育进行了分析论述;介绍了30年代中期我国图书馆专业教育之状况;针对当时我国图书馆专业教育之问题,诸如课程设置、师资、学生、经费等,一一提出了妥善解决的措施和建议。

《试论联合目录》毛坤著,载《图书馆学通讯》1957年第六期,约1.1万字。该文是国内较早的一篇全面论述联合目录的文章。全文分:联合目录的意义和功能、联合目录发展述略、编制联合目录的组织与方法、编制联合目录中的问题、联合目录的著录与排列等5部分。纵观全文,作者所提出的许多看法,对于今天的联合目录编制工作,仍具有参考价值。

《论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原则》张德芳著,载《图书馆学通讯》1957年第二期,约0.4万字。从1950年起,我国图书馆工作开始研究自编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图书分类法。该文是第一次在总结图书分类法编制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图书分类法编制原则所作的理论阐述。文章阐明编制图书分类法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它对于在图书分类法编制中的一些极左

思潮起了抵制作用。例如,对于旧社会出现的一些消极事物或社会现象,对于历史上出现的反动思潮,对于科学上出现的一些幼稚或错误学说,均应坚持客观性原则而得到反映,这对于增强图书分类法的科学性、思想性、实用性都很有价值。

《高等学校图书馆如何在提供教学参考书工作中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黄彝仲著,载《图书馆》1964年第四期,约0.3万字。该文对高等学校图书馆在提供教学参考书工作中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提出六点做法:(1)设置教学参考书专库,加强管理工作,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图书丢失,而且还可了解读者动态,掌握图书馆为教学服务的主动权。(2)藏书范围必须明确。参考书的品种特别是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藏书的范围包括六个方面: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党和政府有关文件;国家教育部规定文科各系学生必读书目的各种参考书;任课教师指定的参考书;基本参考工具书;有关专业的最主要的成套过刊;有关专业的最主要的现刊。(3)争取任课教师的配合,对贯彻教学参考书“少而精”的原则起决定的作用。(4)使用方式以室内阅览为主,可提高教学参考书的利用率,保证满足多数人的需要,克服供需之间的矛盾。(5)适当增加重点参考书的复本比率。(6)加强调查研究。

《关于公共图书馆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的几个问题》 胡继森著,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一期,约0.5万字。该文认为,省、市、自治区以上公共图书馆在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中应作到:大力发展科技情报工作。成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社会教育中心。千方百计吸引更多的读者使用公共图书馆。成为地区性图书馆网的组织者。抓紧干部培训,积极开展图书馆学研究。

《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初步探索》 曾浚一著,载《新疆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年创刊号,约0.1万字。该文是根据毛泽东在《矛盾论》一书中关于“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这一基本原理,分析图书馆内容各环节、各要素之间、图书馆与社会各有关方面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各种矛盾后指出,图书的科学管理与充分利用这一矛盾的辩证统一性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界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有“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交流说”等几种主要观点。该文是“矛盾说”的代表作,也是系统论述这种见解的最早文章之一。

《高等学校图书馆为“两个中心”服务的问题》 陈富安著,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0年第二期,约0.7万字。该文在论述了高等学校图书馆在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后,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当前应加强

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服务的特点和规律的探索,做好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强调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建立文献检索阵地,加强文献检索服务工作,并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文献检索方法的宣传和辅导;根据国内外图书情报体制合一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解决同等学校图书情报体制合一的问题;提出了加强高等学校图书馆现代化建设和把独立分散的高等学校图书馆逐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高等学校图书馆网;为解决上述问题,呼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文章发表后一年左右,召开了全国第二次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文中所提问题,也多为会议讨论的主题。

《技术标准处理方法》程仲琦著,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0年第二期,约0.8万字。文章论述了:(1)技术标准的范围与特点。包括:技术标准:具有独立的体制、有约束力、有新陈代谢,以及有出版形式多样等特点。与技术标准相关的条文、规则性质的图书:大多围绕技术标准的制订和保证其贯彻而形成;(2)技术标准的处理方法。论述了单行本技术标准、汇编本、合订本技术标准、规则、规程和规范以及外国技术标准的处理方法。(3)技术标准目录。重点谈了标号、分类号的著录格式和著录地位,论述了检索号码、读者目录、公务目录的处理方法。(4)

具体作法。论述了技术标准的收藏、目录的排列、流通过程中的有关事项等。(5)最后谈了例外情况的处理方法。

《论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孙德辉著,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0年第四期,约1万字。该文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的精神,结合以往的实践经验提出:在全国和省人大下设图书情报协调委员会,由教科文方面人大委员,吸收有关系统领导和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情报所负责人组成,对全国和地区图书馆网建设进行规划、设计,并指导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条件具备时,制订图书馆法;对具有一定基础和条件较好的图书馆,给以重点投资,以发挥其为生产、科研服务和建立图书馆网方面的优势。文章还强调了地区图书馆(含市、州馆)以及县区图书馆在图书馆网络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札记之一》汪恩来著,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1年第一期,约0.7万字。该文认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基础理论的研究是最薄弱的环节。文章针对争论不休的图书馆学这一基本概念,列出近30年来较有影响的11种图书馆学定义进行辨析得出结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工作原理和规律的科学”。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有它自己的地位。

《国家书目与呈缴本制度》刘启柏

著,载《图书馆学研究》1982年第四期,约1.1万字。该文叙述了国家书目和呈缴本之历史、作用和特点,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呈缴本制度和国家书目状况。文章着重指出中国现行国家书目和呈缴本制度的严重缺陷,并对改善国家书目和呈缴本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扩大国家书目收录范围。除收录正式出版社和公开发行之图书外,宜将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团体和个人出版的图书和声像文献,均选入《国家书目》;应向世界《汉文图书总目》的方向发展;呈缴本不应仅限于正式出版物;宜调整接受呈缴本机构为:国家出版局、国家版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省、市、自治区图书馆等。

《如何正确认识图书馆的经济效果》

丁道谦著,载《大学图书馆通讯》1983年第三期,约1万字。文章指出,图书馆的性质决定其属于事业范畴,但这决不意味图书馆便可以不讲求经济效果。由于图书馆的特殊性,人们认为政府对它的投资是非生产性的,因而对它应当而又可能创造的经济效果不予重视,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作者认为图书馆的经济效果是指图书馆在充分地、合理地运用它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条件下,以尽可能少的消耗力争尽可能多的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文章特别强调了节约的重大意义。

《应该转变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 张

晓林著,载《图书馆学通讯》1985年第三期,约1.4万字。文章针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局限于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这一倾向,主张把图书馆从图书馆学中解放出来,把研究工作从图书馆工作诸过程的内容和技术方法中解放出来,面对用户及其情报需要和利用,面对整个情报交流和情报服务系统。

《中文机械化检索的探讨和汉字“加法标识法” 王振玉著,载《四川图书馆》1978年第11期,约1.2万字。该文指出,汉字是由单音节构成的多符号文字系统,排列成线性顺序是很难掌握其次序的,而且不便于建立像情报检索这样的文档。在电子计算机上对中文文献的存储及检索,有效的途径是用一个简易的码号系统对汉字进行直接标引,即给每个字一字一码、见字识码和见码识字做标引。码号系统的设计,要具有最佳的实际分辨效率,并能充分利用计算机的比特数。文章分析国内外汉字编码方案后指出,大多数方案存在着将汉字编码要求与电子计算机性能分割,不能正确把握汉字形成的规律,从而解决由一字一符成为一字一码和忽视文献检索中象族性聚集等特殊要求的缺点,作者经对码号配置最佳选择、码号系统的形成分辨指数、实际分辨指数和分辨效率、字源族性聚集的概率分布和汉字结构解析等方面的研究后,设计了汉字“加法标

识“编码方案。文章将该方案与国内外数种编码方案作了计算比较,证明该方案的分辨效率最高,重码率最低,简单易行。此文发表于国内开展汉字编码工程研究初期,作者的研究结果对推动汉字编码研究有参考价值,曾引起国内若干单位的推广应用(后称汉字“积成编码法”)。

《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和应用》刘植惠著,载《科技情报工作》1979年第六期,约0.3万字。该文指出,某一学科萌芽时,表述其内容的文献资料寥寥无几。当进入发展时期,有关它的文献资料增长,并逐步达到饱和状态,这意味着该学科已经成熟,很少有新的进展。如果分化出新的领域,则该学科文献量下降。由此可见,一门学科或技术领域的兴衰起伏,与刊登其成果的文献资料量发展变化紧密相关。文献资料量的变化是某一学科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因此掌握文献资料在数量和内容上的变化,就能追踪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的产生和发展的动向,据此可以调配科研力量,集中突破新兴领域。文献计量学的建立与发展,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一定的作用。

《理论情报学与应用情报学》洪传科著,载《情报学刊》1981年第一期,约0.6万字。作者把情报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情报学的基础研究即构成理论情报学,情报学的应用研究即为应用情报学。作者

认为,理论情报学面临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如情报学的学科属性和科学性、情报学的对象、情报的概念和本质、情报的结构和特性、情报的产生、传递、加工和利用的机理、情报发展史、情报学的方法论、情报学的分支学科、情报学和相关科的关系,等等。至于应用情报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有效的实施各个情报过程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应用各有关学科的技术于情报工作中,以改造情报工作现状,使情报活动最佳化。对此,目前国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情报处理技术现代化。应用情报学的另一项任务是总结我国情报工作的经验,探索科学的情报工作方法。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的关系,二者的摆法,在发展初期应着重抓应用情报学的研究,以解决用新技术装备情报工作的问题。不过在开展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应重视理论研究。

《加强高校情报工作之我见》杜桑海著,载《情报学刊》1982年第三期,约0.4万字。该文探讨了高等学校实行“图书情报合一体制”问题,提出图书情报合一,加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是图书馆改革工作中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步骤。文章对实行图书情报合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首先指出必须统一认识,在思想上冲破图书馆传统观念的束缚;其次,保持情

报业务的相对独立性,保持情报工作同科研工作的密切联系,有针对性地为学校重点科研课题服务;再次,集中力量开展情报服务、情报检索教学、情报分析研究和情报编辑报导等工作;最后,充实专业人员,改善图书情报人员的知识结构。

《地方科技情报研究与软科学研究》

王思明、戎善明、甘邦举、江雪著,载《情报学刊》1982年第四期,约0.5万字。该文运用布鲁克斯方程和耗散结构理论分析了情报研究过程,指出情报研究过程是由原始信息获得有针对性的、准确的、有序化的、有价值信息的再创造过程。同时,将情报研究与软科学研究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范围、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五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辨析了二者之间的异同:情报研究和决策研究是管理决策过程中有机联系的两个环节,情报研究是决策研究的基础。情报研究是整个社会的需要,是决策的需要,必须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来进行。情报研究和决策类的软科学研究需要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文献结构不一样。要现有的地方情报所去承担决策类软科学研究是比较困难的。要全面完成像兰德公司一样的软科学研究,必须建立专门的谋士机构。但地方所也可采取一些办法,完成部分软科学研究课题。

《建立适应我国特点的情报刊物体系》

阎庆甲著,载《情报学报》1983年第二期,约1.2万字。该文论述了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特点,提出了包括建立三大类(检索、报道和研究)七小类(文摘杂志、科技快报、专业期刊、专题文集、全译本、评论性刊物、科技动态)的情报物体系的建议;重点阐述了建立情报检索刊物体系的问题。

《科技情报效果的模糊评价法》李天复著,载《情报学报》1983年第二期,约0.9万字。该文最早在我国将模糊数学方法应用于情报学研究。文中提出模糊性是情报的效果《效益》的基本特征,据此,建立了评价模型,并列举情报工作中的实例,说明了模型的应用具有方法论和实用意义。

《努力开创科技情报工作的新局面》

左毅著,载《情报学报》1984年第三期,约0.6万字。文章针对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通过典型分析苏联、日本两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指出其最值得我国借鉴的特点:

欲求比较成功地使科技情报事业适应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制定适合国情的并且又是充分的、坚定明确的发展战略目标、方针和情报政策;必须下决心建设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系统,改变落后的手工方式;步骤上必须从实际出发,讲求效益。为此,应充分利用国外现成情报资源,建立与国外主要系统相连的国际终端和引进磁带;大力开展利用国内科技情

报资源,加强检索系统建设,逐步建设汉字机读数据库;充分利用公众传播

媒介,加强情报科学技术研究及其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

第三节 主要学者选介

刘咸炘(1896~1932) 字鉴泉,四川双流人。1916年,为成都尚友书塾塾师。1926年后,先后兼任过成都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述甚富,总名《推十书》,内容涉及文、史、哲。其有关目录学者,有《目录学》《校讎述林》《续校讎通义》等。

傅增湘(1871~1949) 字沅叔,号双鉴楼主人、藏园老人等,四川江安人。光绪十四年(1888)应顺天乡试为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戊戌科二甲第六名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唐绍仪和谈代表团南下。1917年12月至“五四”运动前,曾入王世珍内阁任教育总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罢免蔡元培令被罢免。后即从事收藏和校勘图书的工作。1927年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9年11月赴日本搜访中国古籍。傅增湘的主要贡献在藏书、校勘和刻书,主要著作见《文艺学》。

毛坤(1900~1960) 字体六,四川宜宾人。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2月转学入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毕业后留校历任助教、讲

师、副教授、教授,并曾兼任教务长。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受聘于四川大学为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毛坤的主要贡献在目录学,主要著作有《中国目录学》《目录谈概》《中外目录学与目录学家》《图书馆趋势》和《大学图书馆问题》等。

沈祖荣(1883~1977) 字绍期,四川忠县人。少年时代即随父迁至湖北宜昌定居,后考入武昌文华大学中学部和文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14年留学美国专攻图书馆学,1917年学成归国。1930年起担任了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直至1953年下半年图专并入武汉大学。后即一直在武汉大学任图书馆教授。沈祖荣毕生致力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所著述,包罗传统图书馆学的方方面面,而其所作一系列调查报告,如《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1918)、《中国各省图书馆调查表》(1922)、《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及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报告》(1929)等,更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史的珍贵资料。

第二十章 教育学(含心理学)

第一节 学科沿革

一、古代四川的教育思想

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兴学化蜀,至清道光鸦片战争后的尊经书院,约两千年,四川历代在教育学术思想方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代表人物。

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人。汉景帝末至汉武帝时期任蜀郡太守。文翁采取的教育措施有: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到京师太学肄业,习经术和律令;修学官于成都市中,招郡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称“文翁学堂”,开汉代州郡办学之先声;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见习、实习,每次外出各县巡察,加派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同行,让他们传达教令,进出县邑衙门内室,因而“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就学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数年学成回蜀后,经考核成

绩优异者任为郡县的官吏,次等的也担任教民务农的乡官。文翁兴学化蜀,开创了地方政府重视教育的风气。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推广文翁的办学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汉代蜀中除了官学外,私人授徒学和游学之风也很盛行。西汉成帝时,什邡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东汉初,资中杜抚“治五经,教授门生千人”;顺帝时新都杨厚“授门徒三千人”;新都段翳、绵竹董符、任安等也都“家居教授,弟子自远而至”。游学的如:雒人段恭“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梓桐景焉与蜀郡任末等“游学七州,遂明经学”。蜀汉谯周,任蜀汉典学,从事近50年,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经史人才。

四川地区的书院大盛于南宋时期。明代各府、州、县皆立学,学习内容

以“四书”、“五经”为主,面向科举制度。科第兴衰成为地方文教是否昌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兴学也就成为“有司之首务”。在官学之外,私学组织的书院也有发展,故明代四川大多数府、州、县都建有书院,书院“多以名贤遗址为主,其在蜀者,如北岩(在涪州,程颐谪涪时著书之处),紫岩(在绵竹,宋张浚读书地),青莲(在彰明,李白故里),金华(在射洪,陈子昂家乡)数书院,皆名人遗址”。南宋魏了翁在故乡蒲江建鹤山书院教授生徒,在教育方法上,他认为:“人物如千丈松,培植崇长非一日之功”,应当“念其成材之不易,故为扶植而容养之”。在学习方法上,他特别强调“审问”和“笃行”,注意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由于书院山长不由官府任命,而是聘请而来,办学精神比较开明,学风也比较自由。

清康熙四十二(1703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文翁石室遗址重建学舍讲学,取名锦江书院;“驰檄各庠,拨取才隗,延师教授之,其时之负笈来游者盖踵”。此外,还在各地广设书院,著名的有成都、华阳两县的潜溪书院、芙蓉书院、墨池书院、少城书院。咸丰同治年间,四川书院学生已达3万余人。清代除正规的府、州、县学外,社学和义学也普遍兴起。“书院以育英才,义学以养童蒙”,书院相当于成人教育,社学、义学相当于现今的小学教育。书院受到清政府的支持和赞助,所

以发展很快,地方官员也十分重视,经常礼聘学有专长的名家担任山长。清代书院同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科举又以清代最盛,故书院也被纳入科举的轨道,“大都讲帖括文字以博科第,取世俗功名”,或者“师所希在束修,弟所谋在膏火,有司又利在粉饰,以博声称为迁除之地”。上述弊端引起许多的忧虑和不满,所以主张书院教学应该“举凡兵农礼乐,皆能深通其变化而习知其器数”。有的书院规条还明确指出,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目的,天文、地理、职官、学校、兵法、刑名、水科诸科,都应“分门研究,每人各治一业”。这些改革的呼声和初步实践,为后来中国正规学校的产生,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二、近代四川传统教育的改良

鸦片战争后,四川士林风气日益不振。士林中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大事,广大士子梦寐以求的仍是入学、中举、金榜题名。直至19世纪70年代,西学东渐,四川的传统教育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影响下,才开始进行改良。

光绪元年(1875年),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文庙街西侧石犀寺旧址落成。书院首批学生是从全川3万余名生员中按学问人品择优录取100人。以后,每逢科岁两考,在各府县考取第一二名秀才和贡生中调取入院学习。

因此,尊经书院从建立起就是四川士子荟萃之地,是清末全省官办最高学府。

尊经书院的实际主事是四川学政、翰林院编修张之洞。他认为“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他从外地购买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一千多卷,建立了尊经阁,收藏图书典籍及中西时务书报,还开设了尊经书局出版图书,陆续刻印了百多种书籍。除传统的经史、小学、舆地和生员作业(名《蜀秀集》)外,还刻印了西方学者的著作,大大丰富了生员及蜀士的知识,使他们知道在八股文之外,还有更多的学问,从而眼界大开,学风为之大变。

光绪四年(1878年)底,王闿运担任尊经书院山长。他主院8年,除管理院务外,主要讲授《公羊》今文经学。他认为“凡国无教则不立,蜀中之教,始于文翁遣诸生诣京师,意在进取,故蜀人多务于名,遂有题桥之陋。今究其弊,必先务于实。”因此,他强调要以经史词章等实学分科授业,按时讲解,严格要求。他规定生员每日读书后必写心得体会,交山长审改评定,作业不得抄袭陈文,或者请人捉刀代笔。王闿运讲课重在阐述经学的微言大义之旨,教以崇用达本之方。同时他主张以教化转移风气,所以不在课士,尤其语默

出处之间,必使符合礼乐,笃为廉耻,立足称为移风易俗。他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操感士人,且以议论贬当世,所以四川学术界的风气一变而挚厚清高。

尊经书院成为培养四川人才的摇篮,为四川早期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对四川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著名的有维新变法的杨锐,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派核心人物宋育仁,经学大师廖平,发动保路运动的蒲殿俊、罗纶、张澜,舍身炸良弼的彭家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吴玉章等人。

宋育仁(1857~1931),四川富顺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87年他写成《时务论》,1894年奉派随使英、法、意、比等国,在欧期间考查民俗,采访时政,精求外国富强之术,写成《采风录》,风行于世。甲午战后回国,调四川商务局任职,他在重庆创办《渝报》,1898年在成都任尊经书院山长,发展组织蜀学会,从事集讲。该会以“振兴蜀学”、“通经致用”、“扶圣教而济时艰”为宗旨,集讲内容分论理、政事、格致三大类:“论理以明论为主,政事首重群经,参合律例,水陆军学,政教农桑各务,格致统古今中外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化重光声、电气水力、火汽地质、金体动植、算医测量、畜牧、机器制造、营建矿学”。蜀学会编印有《蜀学报》和《蜀学丛刊》,并出版一批介绍西方议会制

度、工业法规、法律制度、教育设施的书籍和文章。尊经书院成为四川维新派的一个重要基地。

光绪年间,维新派人士上下奔走,四处游说,著书撰文,身体力行,为发展新式教育事业而大声疾呼,四川出现了一批新式学堂,如成都中西学堂,蓬溪崇实学堂,荣县新亚书院,广安紫金精舍,广安官立学堂,遂宁学堂,成都算学馆,江津西文学堂,重庆川东洋务学堂,荣县中西学堂,遂宁经济学堂,彭县经济学舍,江津算学堂,重庆中西学堂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把“兴学育才”提到首要地位,“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艰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通令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及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尊经、锦江两书院合并成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是四川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四川大学的前身。高等学堂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又学习声光电化格致之学,开始了由书院向新学的转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清廷下诏“停止岁科考试,专办学堂”。

四川师范教育的先声是师范传习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川督锡良饬令各州县开办,到1905年全省共开办110所,培养了大批小学教员。1906

年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成立,招生360人,学生由州县保送。同年,“四川优级师范选科学堂”成立,开始在师范本科开设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这是四川开设教学和心理学的最早记录。

1913年,四川优级师范学堂改名四川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秋又改称“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次年秋开办了附属中学,又次年秋开办了附属小学,由青年教育学家邓胥功兼任校长。1918年前后,在成都高师主讲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的教师有:贺孝齐(原武昌高师校长,专长伦理学和教学法)、邓胥功(教育学)、蔡锡保(教育学、心理学)、张凤翔(教育法令)、刘冕(心理学)、加藤政司郎(教育学、心理学)。

1918年高师各部课目都把心理学、教育学列为本科公共课,而教育学的具体课目名称为教育史、教育法令、教授法等。

三、四川现代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校。官府通令各县公费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留日学生带回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教育学科。辛亥革命后不久,思想界曾掀起复古和尊孔读经之风。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民主和

科学的思潮影响下,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四川的文化教育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四川的教育学科才真正有了建立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

四川教育学科的建立,与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吴玉章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密切联系着。

1917年吴玉章被教育部委任为欧美学务调查员,考察了欧美许多学校。他对日本和西欧的资产阶级新式教育有较多的了解,但他主张“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1918年他在成都倡导成立“法华教育会成都分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和“四川华法留学会”等组织,并同张春涛等人在成都和重庆开办了两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8~1921年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约为1800人,四川有490人,占全国各省之冠。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进人物有陈毅、聂荣臻、邓希贤(邓小平)、刘伯坚、赵世炎、傅钟、李大章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回国后,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四川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吴玉章1922年8月至1924年3月担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以进步的教育观点大刀阔斧地改革成都高师,使该校在全国6大著名高师中处于上等水平。他在成都高师进行的多方面的教育改革,充分体现出

他的教育新观点:提出了为革命事业培养人才的教育目的。他主张办成都高师是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以“推进新思潮的扩展”,以启发学生“走俄国人之路”。改革课程设置。经他审定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科编制大纲》,去掉了陈腐的课程及内容,增设了新的课程,规定国文课要选讲近人作品,把哲学概论、教育学列为学生的基本必修课,理科各科课程注意增加近代新技术、新的内容成分等。聘任有新思想的教师。如聘请四川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王右木任经济学、日文教员,去电泸州保释被军阀扣押的恽代英,聘至成都高师讲授教育学,并让恽代英向全校师生讲阶级斗争课,聘请原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郭鸿鉴任成都高师教务主任。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锻炼。如让学生到成都兵工厂、丝织作坊和教会学校的工人中鼓吹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工会和发动罢工等,以使学生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根据师范特点,重视教育实习。高年级学生每学期安排数周到附中、附小实习教授法,要求实习生事先“自述教案准备情况”,并有示范讲授与师生共同评议的环节。平时组织学生到省城各学校观摩有经验的教师教学;“借资比较参考”。派遣师生出省、出国考察教育。吴玉章掌校不久,便派青年教员、《四川教育》主编邓胥功到美国留学,同时考察欧美教育发展状况和教育制

度,以后又派出本科和专科毕业生,到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以及出国到朝鲜和日本等处考察教育。他派学生出外考察的目的是“考察国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规定教学“凡对一学科之基本原理,由教师讲授,其应用推理之处,由学生自行研究自行实行,总以养成自动的理解为原则”。

吴玉章在成都高师的教育改革实践结果,如他所记:“经过一番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风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吴玉章《回忆五四时期我的思想转变》1959年9月)。

1926年11月国立成都大学成立,张澜被委任为首任校长。他主持成都大学4年多,致力于学校的教育改革,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改革的几个方面:广延名师。他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响亮口号。他用人唯才,不拘一格,只要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就礼聘到校任教。他既聘了“蜀学宿儒”,又聘了吴虞、吴芳吉、李劫人等新派学者。他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对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教员委以重任。设立教育系,聘请宋谋欧、刘绍禹、刘天予、陈修平和徐朴生等学者,教授教育学、心理学等课

程,并成立教育学会,编辑出版《现代教育》杂志。民主办学。他主持制定了《国立成都大学组织大纲》以及有关的通则、细则和规程等。学校的校务会议、教务会议和系科会议等均请教授参加,充分发挥民主办学的作用。改革学科和课程的设置。文科与理科开设的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大类。理科开设的各门课程的教学侧重基本理论和实验,文科课程的教学侧重对学生治学能力的培养。倡导学术自由。对学术上各种学派,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论争自由和思想自由。他对校内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与该社编印的《星火》杂志,给予鼓励和支持。

1927年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改校后,继续保持了成都高师重视教育理论教学和重视教学技能培训的传统。在各学院开设了几门共同必修的教育课程,而开设的课程内容较过去已有发展,开设有教育概论、教育行政原理、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乡村教育、各科教学法和教育测验与统计等多门课程。

1931年,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国立成都大学与公立四川大学合并,定名为国立四川大学。四川大学设有教育学院。教育学院由四川早期的教育家邓霄功任院长,设教育心理系、艺术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教育心理系由

四川早期的心理学家刘绍禹任主任。刘绍禹用自己留美节省的钱,选购了一批心理学实验仪器。1936年带回成都,在四川大学建立了西南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他在四川大学结合心理实验演示介绍西方心理学主要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先后主讲变态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学史等新课。1936年四川大学教育学院(后改名为师范学院)设立了“小学教育通讯处”专门为小学教师业余进修服务,实行中学教师来校随班旁听制度,和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小学教师培训班,用教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提高业务水平。

这一时期四川的教育学科教学和研究,主要基地除四川大学之外,在成都还有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各学院均开设心理学课程,文学院设教育系,教育系有教育概论、教育行政、教育心理学和教学法等十多门教育学课程。教师除美、英、加、澳等国的学者加沈高仁、云从龙、文幼章等外,中国的学者有方叔轩、刘之介、汤茂如、傅葆琛、杨立之、薛鸿志等人。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于1933年在重庆磁器口成立,教育界著名学者邵鹤亭等均在此主事任教。该院在1936年改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也是当时四川教育学科的教学、研究和新教育思想传播的主要基地。

抗日战争前,四川有高等学校12

所,省立师范学校7所。抗战开始后,有48所高等学校迁入四川,占抗战前全国108所高等学校44%。教育界学者纷纷入川。这段时期,四川成了全国教育科学的学术中心,是四川教育学科兴盛发达时期。

开设教育学科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院校增多。国立中央大学的文、理、师范等学院迁到重庆,其中有心理学系和教育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到璧山。心理学家谢循初1940年被教育部委派在江津北沙筹备并建立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合川和重庆先后建立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重庆歇马场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迁校成都,上海光华大学在成都设分校,这些大学都有教育学科课程。四川的师范学校1941年增建8所,县立师范学校和中学附设的师资训练班数目更多。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四川的教育学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教育理论探究方面,以及教育学科知识应用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学者荟萃,教育成果丰硕。来川的著名教育学学者孟宪承、李建勋、瞿菊农、常道直、邵鹤亭、张敷荣、普施泽、汪德亮、罗荣梓,著名的心理学学者潘菽、袁雪樵、陆志伟、艾伟、蔡乐生、孙国华、丁瓚、高觉敷、朱知贤、方辰等,对培育专业人才和交流学术思想都起了

重要的作用。当时编写出版的专著、译著有艾伟的《教育心理学大观》(上、中、下)、杨廉的《西洋教育史》、陈选善的《教育心理学》、赵廷为的《小学各科教材教法》、高觉敷的《教育心理学》、萧教嵘编制的《军队智慧测验》。艾伟当时任中央大学研究院教育心理学部主任,他创办了教育心理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毕业后在重庆授予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在国内这是首次。他在四川期间,继续进行他的心理测验研究,并继续制出《汉字测量》《小学算学运用题测验》《初中常识测验》和《大中学英语测验》等心理测验量表。丁瓚在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创建了心理卫生室,从事医学心理学的研究,并在学校和社会宣传普及心理卫生知识。

教育科学馆建立与教育刊物增多。1939年,四川省教育学者、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资中人)倡建四川教育科学馆。他聘请平民教育学者汤茂如(大竹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负责人之一)来成都筹建四川教育科学馆,后任该馆实验部主任。该馆主要任务是对省内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材教法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该馆编辑出版的教育刊物有:叶圣陶和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教学》、张鉴虞主编的《中学教育季刊》等。抗战时期四川的教育刊物还有《教育研究》《教与学》《教育通讯》(教育

部的机关刊物)、《教育心理研究》和生活教育社主办的《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

民主教育思想与反民主教育思想斗争激烈。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在教育思想上,一直存着民主教育和反民主教育的斗争,当时对“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和“国防教育”的口号,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和主张。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学者,把这些口号解释为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的有效工具,必须推行绝对服从的教育,他们赋予教育专制主义的意义,主张抗战时期不能讲民主,要教育人绝对服从一个领袖,信仰一个主义。而以陶行知为首的进步教育家,则认为“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和“国防教育”必须实施民族的、科学的、民主教育,提倡反对专制的、迷信的、复古的和殖民地化的教育。这种民主教育思想反映在《新华日报》《群众》《全民抗战》《战时教育》等报刊的文章中,倡导改变教育的旧制度和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教育制度和新课程。在反对专制教育的斗争中,陶行知和生活教育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曾先后发动“战时教育运动”,大量发行《战时教育》月刊,并开展全民教育运动,以适应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全面抗战路线的需要。民主教育的思想在四川教育界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产生了积极

抗日的深远影响。

心理学学术团体重建,学术活动活跃中国心理学会在1921年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后,活动停止。1942年,心理学家潘菽等在重庆成立中国心理建设学会,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心理学学术团体,其纲领是力行精神、民族气节和“八大心理建设”(即坚定必胜心理、复兴心理、自尊心理、俭朴心理、力行心理、正直心理、互助心理和民族心理),要求会员先“立己”后“立人”,以本身表现、口头或文字宣传、设讲座和其他文艺方式,开展心理改造,推广心理建设。总会设在重庆,并设有鄂北、鄂西、洛阳、西安、遵义和成都等10个分会。该会编印会刊《心理建设》5期共40篇文章。此外,重庆心理学界积极开展心理学学术活动与心理科学普及工作,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全国的心理学术中心,其中潘菽在重庆发表有关心理学的文章很多,如《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心理学技术在实业上应用的条件》《汉奸心理分析》等。

抗日战争时期,还有几位教育学者在四川做了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和实验。

陶行知在四川的教育实践及其生活教育学说的的发展 1938~1946年4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四川创办了闻名中外的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他创办这两所新型学校的指导思想是,教育必须为抗日战争服务,为争取中华民族

的自由平等事业服务。育才学校于1939年建立,招收具有一定特殊才能的流亡难童,目的“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教育内容方面有:德育。他认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教育主要是在“建筑人格的基础”,他提倡真善美的人格。他告诫学生记住“追求真理做真人,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

科学文化教育。学校设普通课程,教学生一般的知识技能和做人的一般道理。设特修课程,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专业组,以培养未来的专才,学校聘请了郭沫若、翦伯赞、程今吾、刘白羽、周扬、田汉、艾芜、戈宝权等十多位文化名人上课或作报告。学校的学术空气很浓。

生产劳动教育。贯彻手脑并用的方针,使教学和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同时在经费短缺的条件下,起到了生产自救的作用。卫生教育。他认为卫生教育是造成“健康堡垒”的必要条件。

军事训练;目的在于使学校与当地人民结成一个战斗的团体,作为能迎战敌人的准备。育才学校教育内容及措施,既体现育才学校办学目的,又发展了陶行知生活教育对培养人的主张,即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培养具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才。育才学校的教学方法和原则,革去了“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的弊端,提倡学生集体讨论的教学方法。陶行

知认为,讨论的目的,在于以集体的力量追求真理。他主张学习应当“五路探讨”,即行动、观察、看书、讨论、思考,然后再以思考之行动开始,到更高一级的融会贯通之思考。育才学校注重使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和锻炼。学生集体组织民主化、制度化,尊重学生的主动、创造精神。如陶行知所说:“集体生活是儿童之我向社会化道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坚持“社会即学校”的主张,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该校与社会联系密切。他号召学生在校外办识字班,参加民主改革运动,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专业班同学每周到农村宣传抗日、调查社会政治经济状况。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市中区创办了社会大学,其办学的目的,一是让广大需要入学深造而又无钱入学的知识青年,能利用夜间去求得学问,以获得职业技术技能,为寻求职业作准备;其二是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民主运动和建设新中国培养干部。该校公开办学一年后,在国民党反对派查封新华日报后亦被查封,被迫转入地下办学。陶行知在四川近8年的教育改革实践,以其丰富的教育经验,宏达的教育论述,精深的教育思想,为四川人民教育的发展留下宝贵的遗产,对四川教育学科的发展影响深远。

晏阳初在四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学院的教育实验 晏阳初 1918年在法

国时,对华工进行识字教育,主办《华工周报》,觉察到“苦力之苦”与“苦力之力”,决心为“解除苦力之苦,开发苦力之力”而奋斗。1920年回国后,先在北平发起组织大众教育联合会,首创扫盲运动,在长沙兴办平民学校。1923年在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他首任总干事。1926年他在河北定县开办平民教育实验区,并写成《社会概况调查》。他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以生计教育医贫,以文化教育医愚,以卫生教育医弱,以公民教育医私,以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1940年平教会搬迁重庆,他在歇马场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并进行平民教育实验。他任院长,勤奋办学,使该院形成了民主进步、团结互助、勤学奋发、艰苦朴实的校风,培养出一批乡村建设的爱国运动的骨干分子。不久他又在新都县进行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43年他被国际学术界选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大、影响广的“十大名人”之一。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和“乡建”理论,在当时的四川有广泛影响。1950年以后,他在国外继续致力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黄炎培在四川的职业教育实践 黄炎培,上海川沙县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教育会副会长,1917年在上海成立“中

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抗日战争期间他到重庆,在重庆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函授学校和职业指导所,在灌县创办了都江堰实用职业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重庆创办了职业教育的高等学校,即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从实用主义教育脱胎而来的。他认为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具有职业性,是与生活、生计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职业教育是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责为群众服务”。他以劳动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黄炎培在四川的职业教育实践和职业教育思想,对四川教育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胡颜立办成都实验小学的实验研究
1935年教育部参事郭有守,来四川考察教育,建议四川举办一所设施完善从事实验研究的小学,以“辅导川省改进小学教育”；“迎头赶上世界激流,创造四川教育的新经验”。四川省教育厅委任原国立编译馆编审胡颜立为该校校长。胡颜立从1935年到1947年初主持该校12年,先后制定的三个3年计划均逐一实现。其办学特点和实验研究成果是：办学宗旨和目标。以德、智、体、美、群、劳为树人宗旨,以提高公民的素质为培养目标,以“实验研究,辅导地方”为该校的建校使命；师资培养。要求教师有乐业的精神、研

究的兴趣,除教学训导外要进行实验研究,创造新的教学方法,他特别重视教师的进修提高。革新教材教法。除语算教材外,都不用现行课本,而根据“适合抗战建国需要的、适合学生需要的、适合课程标准的及适合地方性的”原则,收集材料,自行编辑。改革注入式教学法,注意指导学生自动学习。胡颜立自己在探索中,先后编写出《国语教学教法》、《自然科学教法》、《中心小学、国民学校各科教材教法》等专著问世。推行“中心单元教学”形式与开展课外活动。他认为此种教学形式,能适应时季需要,使儿童注意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儿童认识和应付环境和改造生活的能力。采用级任与训导混合制,要求教师“训教合一”,指导学生整个生活,注重人格感化,教师以身作则,切实联系学生家庭,增进训育效率。

梁濂溟在四川的平民教育与办学实践
梁濂溟,广西桂林市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后投身于平民教育事业,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省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于1936年到重庆北碚考察嘉陵江山峡乡村建设实验区。1938年应张澜之邀在南充创办平民教育馆,次年在璧山来风驿创办勉仁中学,1946年在北碚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致力于办学并撰写《中国文化要义》,1948年他将

国学专科学校改建为勉仁文学院,设文、史、哲3个系。梁漱溟在四川办的学校有几个特点:坚持自主办学和勤工俭学,提倡“学思结合、学用结合”,侧重学习新知识与继承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学校附设农民学习班、工农业余文化学校。接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在校任职。支持学生的反蒋民主活动,保护师生免受国民党迫害。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教育学科的发展进入成长期。学术交流频繁,学术探讨活跃,是教学与研究出人才出成果的时期。当时起主导作用的进步教育学说及其改革实践,具有深厚的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和理论结合实际的特点,因此为四川为全国的教育科学如何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改革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四川的高等学校和教育机构迁回原址。一些学者留在四川,在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和乡村建设系、重庆大学教育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乡村建设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校系,从事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四、四川当代教育学科的新发展

(一) 改造与建设阶段(1950~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

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四川先于全国进行院系调整。1950年,人民政府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部分系科合并,成立西南师范学院;1952年起将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川东教育学院以及其他院校的教育系或专业并入西南师范学院。调整后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教育系,设有学校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除本科外还有专修科,当时是西南地区培养教育学科专业人才的集中场所。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的教育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有叶麟、邓胥功、张敷荣、罗荣梓、陈东原、徐国启、普施泽、高振业、任宝祥、张清津、刘兆吉、张增杰、蒋良玉等近20名教授、副教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四川师范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和南充师范专科学校相继建立,这3所院校教育学科的学者有罗忠恕、朱炳乾、刘之介、周励秋、蒋梦鸿、唐自杰、仲南村、闵灿西、冯光华等,从事公共课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四川大学兼有培养中学师资的任务,也开设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学者张鉴虞、张绍英在该校任教。1953年,根据高等教育部的指示,各高等院校开展以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四川几所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研究组织,1951年

派出部分教师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进修班,学习苏联教育学家普希金主讲的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普希金1952年来重庆和成都讲学时,参加听讲者除高等师范、中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学教师外,还有中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等。以后又派出教师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苏联教育学家杰甫莉卡娅主讲的教育学和世界教育史理论。与此同时,苏联心理学家彼德鲁舍夫斯金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办的高等学校心理学教师进修班系统讲授心理学,四川的部分心理学教师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此外,四川的心理学老师还系统地学习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学说。在1958年以前,四川教育学科的教师,采用了苏联教育学、教育史和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并按照中国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以及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几所师范院校的学者,为开设教育学科各门专业课、各系科公共必修课的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史等课程,编印了一批为各校学生使用的讲义、教材和参考资料,并在省内外校际间交流,此外还参加了各自院校系科学生教育实习指导,以及成渝地区部分中等专业学校教师为提高教育质量和加快教学改革而学习心理学、教育学的辅导教学。当时,四川省的教育学科,较好地体现了“师范教育”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指导思想。

1958年以前,四川教育学科的改

造,侧重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教育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心理学、教育学观点及方法,学者们编写的讲义、论文,其主要内容多与这方面相关。1958年以后,经过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毛泽东教育思想以及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同时学校派出教师轮流到农村、工厂劳动和调查研究,各院校教育学科教师在修订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再一次修改或新编了教材和讲义。如1960年以四川师范学院协作编写各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学教材。这几年四川教育学科的发展,开始突破苏联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的局限性,尝试着建设能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并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教育理论体系及各科教材内容,但对西方教育科学研究却缺乏了解与借鉴。

少数民族的师范教育得到重视。1951年新建了西南民族学院,该院设有师范系,开设了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

1960年,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成立,张秀熟任副主任、总纂,并兼任《四川省志·教育志》的主编,四川师范学院院长刘绍禹任副主编。从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调集了一批教育学著名学者参加编辑工作,编写出上百万字的初稿和资料。其间还组织学者,对川北革命根据地的教育进行调查研究,由蒋梦鸿写成《川北革命根据

地的文化教育》调查报告。

1963年3月,重庆市心理学会举行第一次学术年会,有心理学论文和实验报告31篇,译文4篇和心理学教材6种(约67万字)。同年11月,四川省心理学会在成都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学术年会。1963~1965年,四川省心理学会编印出心理学科学普及读物3种,在省内外广泛交流,还分地区开展学术活动,召开心理学学术座谈会。

1966~1976年,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四川各校的教育学科教学和研究停止,学术活动中断。

(二) 改革与发展阶段(1977~1985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四川的教育学科也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教育学科系室的恢复与增建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招收新生。1985年,西南师范学院和四川师范学院分别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从在职中小学教师中选录培养两年制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和教师进修学校教育学科教师。重庆师范学院和南充师范学院等4所师范院校恢复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并担任学校各

系公共必修课的教学。1978年以后,四川省兴办了13所师范专科学校,并在西南民族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和成都大学等10所普通高等学校增设了师范专科点。这些师范专科学校和点都建立了教育学、心理学教研组、室。还就扩大了四川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场地。

教学改革深化和教学内容更新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后,四川省教育学科的学者在教学领域不断探索和改革。在课程设置上,西南师范学院等院校的教育专业,增开了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比较教育、社会心理学、青年心理学、认识心理学、学校管理心理学、教育测量与评估、心理测验等课程。对教育学课程,分别开设了教育基本原理、教学论、德育论等课程。各院校的公共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教学,更重视理论与实际一致,教材更具有针对性,四川省的学者与外省兄弟院校的学者协作,先后编出了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院、师范院校等各种类型的心理学、教育学教材,以及综合性大学哲学专业使用的心理学教材。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进并吸取国外教育科学的新理论信息,学习国内教育研究的重要成果,更新了教学内容。

科学研究范围扩大,成果增多 1978年开始,四川教育学科的学者取得了一大批在国内、省内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从学科分支范围看,研究包括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新兴教育学科。从应用研究看,有对教育经验的总结对教育改革的研究,有对教育行政原理的研究,心理学还有不少的实验研究。研究的成果包括编写出版的专著12本,译著3本,参加撰写出版的教材7本,参加翻译的著作3本,还参加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学》1卷和《心理学》1卷。

培养教育学科人才,壮大教育学科队伍 到1985年,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已毕业5届学校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这个系1984年被国家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共招收“教学论”、“教育基本理论”、“外国教育史”和“普通心理学”4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国家又批准以张敷荣为导师的“教学论”博士研究生点,招收博士研究生。

教育科学研究机构的兴建 1983年4月,四川省教育科学所在原四川省教育厅教育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设教材教法研究室、教育理论研究室和教育史志研究室,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小学、师范学校的教材教法,指导教学工作,总结教学经验,开展教育实验和探索教育规律。省教科所组织编写、审定推荐的科研专著有《初中作文

训练教程》《中学历史教学法概要》及成都七中的《中学教学实验教材的实验与总结》。

1983年5月,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1985年该所主办了综合性教育学术刊物《西南教育论丛》。1983年,西南师范学院还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和心理学研究室。1985年,四川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南充师范学院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重庆师范学院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室和高等教育研究室。

1983年以后,四川多数高等学校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共建立了37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其中除有7个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之外,省内其他高等学校均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或教育科学研究室,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主要任务是研究各类专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规律,这对教育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学术团体发展 学术活动频繁 四川省教育学会1980年3月在成都成立,学会先后分设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8个专业研究会。1981年4月,重庆市教育学会成立。1982年,全省有14个地市州成立了教育学会和专业研究会。1983年1月,四川省教育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学校思想教育为中心议题。1983年7月,学会

又在乐山召开了围绕教育方针和开创教育理论研究工作新局面的专题研讨会,同年由学会编写的《学校管理学》一书出版发行。1984年2月,学会第三届年会在成都举行,同年6月,学会在成都召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专题讨论会。同年,学会发起并组织,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和乐山市教育学会牵头,建立农村教育改革研究协作组。1985年1月,学会在成都召开第四届学术年会,同年学会又组织建立了“中小学校长素质调查”课题组,开始调查研究工作,并创办刊物《四川教育通讯》。

1980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筹备组成立,开展高等学校教育学学术活动。四川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1980年3月在成都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研究会1980年在成都成立,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校史研究会1981年2月在重庆成立。1983年1月,四川省社科联、省教育学会、省高

教育学会和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在重庆育才中学联合召开“陶行知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

四川省心理学会恢复学术活动1977年,成都和重庆的几位学者开始联系和酝酿,1978年春,在成都举行学术报告会,并研讨了恢复学会工作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课题。是年12月,在成都举行四川省心理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会议决定筹办学会刊物《四川心理学动态》。1979年12月,四川省心理学会在重庆召开学术年会,北京、贵阳、昆明等地的学者和美籍华人刘永和博士应邀出席。1985年12月,学会在成都召开学术年会,主要讨论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有关的心理学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1980年3月还在重庆举行全国性的基本理论学术会议,潘菽、陈立等著名学者参加了学术探讨,学会的刊物《四川心理动态》已编印28期。

第二节 著作选介

一、专著与译著

《教育学大纲》邓胥功著,上海文通书局1930年出版,约20万字。此书是邓胥功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兼师范科主任时,将历年教学经验及出国考察德、法、日本等国后,分析比较,综

合整理撰写而成的。该书主要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欧美、日本及我国影响较大的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的学说为主要依据,同时还博采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当代教育中的新思想、新成就。上卷为总

论,以明其风,下卷为本论,以研究教育之目的与方法。其目的论以社会学原理、生物学原理、人生哲学为基础,其方法论则以心理学、生理学、名学及经济学等为基础。上卷内容包括总纲六章,各章探讨问题深入细致,构成一体,范围包涵甚广:过去的教育学仅讨论学校教育,该书则并重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过去的教育学著作很少涉及历史、制度方面,此书则多方论述,以明其源。该书还列论了全民教育、儿童教育、试验、性教育、个性教育、智愚研究等新的专题。关于学制及社会教育取材新颖,对苏联的教育状况也作了详细介绍。

《教育之根本原理》(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by E·L·Thorndike and A·L·Gates) 王介萍、蒋梦鸿合译,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约16万字。该书是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桑戴克和盖茨的名著,主要以桑戴克创建的学习三定律,即效果律、准备律、练习律为依据,重点阐明教育和教学需要遵从的基本规律。主要内容有:教育之主要目标,教育之最显著的需要,学校之特殊功用,儿童自诞生至成长之特性,学习与教学的原理,学校课程中选择与组织材料和活动的原则。全书共分14章。此书译本于1930年完成,是中国较早译出的教育专著,出版后国内许多大学的教育系采用此书作为讲授教育原理课程的教材。

《中国教育史》 陈东原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约34万字。全书共分25章,从汉初之教育到清末之废科举和新教育之萌芽及尝试时期,历时2100年。作者认为,中国教育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汉至清末为第一时期,从这一时期的历代教育政策立论,可以概括为“养士教育时期”。养士教育现象表现有六:国家只定一个考试标准,社会便趋向这个标准。所以教育是被动的,静止的。平民皆有步入青云、变为统治阶级的机会。所以养士教育是统治阶级的教育。谁不愿向统治阶级反抗,谁就逐渐养成极其驯服的民性。所以养士教育是维护统治阶级极好的工具。自汉之乡试里选,经魏晋九品中正,以迄后世科举,皆规定重视乡里籍贯,其结果为农村经济与地方经济稳定了势力。考试方法自汉之对策、射策,以迄明清之八股律赋“莫不俱持文墨、重在纸上文章,俱不能出儒家范围”。今日新科学不能在中国繁荣滋长,是受过去教育的遗害。养士时代的青年,一捧书本便是统治阶级的候补者,国家优容,社会尊视;“故学人之因循怠惰贪私利已便成风气”。该书教育部分,有“汉文帝时君主教育思潮”,董仲舒的“养士教育理论”,魏晋南北朝的“玄学理论与其对教育之见解”;“范仲淹之教育思想”;“胡瑗之教学方法”;“王安石之人才救国主义”;“明”张居正之整顿教育”

与‘重实主义’等节目。

《初中作文教学法》刘兆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作者以教育学、心理学原理研究初中作文方法,旨在提高中学作文的效果。该书主要内容有:作文教学的目的性和重要性,作文拟题的启发性,作文教学与阅读及其与各学科的关系,作文教学的程序与指导,改文、批文与发文的方法和心理分析。

《心理学教学法》张增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作者根据师范教育大发展的形势和师范院校讲授心理学课程的需要,写出中国第一本心理学教学法。该书论述了师范学校心理学的教学任务,心理学教材内容体系,在心理学教学中如何贯彻唯物主义思想和巴甫洛夫关于心理的生理基础理论,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心理学的课程教学和实验演示,及直观教具的使用和心理实验等问题。

《普通心理学》黄希庭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约39万字。该书是作者在1977年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与教学恢复后,在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开设普通心理学课程的讲义基础上,经过两年多搜集国内外新资料,再修改充实而编成的。该书从心理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的立足点出发,系统讲述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全书分16章,前3章论述心理的实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意义、方法和

研究现状,脑和心理,心理的发生和发展。其余各章,作者从人的心理的整体性出发,分别论述各种心理现象,说明各种心理过程活动的规律性及其机制,个性倾向性和个性特征的形成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此外还指出某些心理研究的新动向。

《中国教育家传略》李定开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该书主要介绍从春秋时代到清末从事儒家经典教育的著名学者,对近现代的教育家也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教育史专著。

《中国高等教育史》熊明安著,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约37万字。此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从商朝至民国末期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探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以及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是中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著作,获得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学校管理心理学》张燮、陈安福、李光路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该书作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致力使学校管理心理知识系统化和本土化,提出具有中国中小学教育特点的学校管理心理学体系。全书共5篇15章,包括一般理论,领导意识和行为,教职工的积极性,学生管理与组织心理等有关内容。

《教育概论》徐国启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约23万字。该书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师范教育丛书”之一,编写上的突出特点是打破教育学历来的旧框架,建立一种篇章体系。全书共7篇18章,第一篇着重于从宏观方面论述教育的本质及其基本规律,分别讲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教育与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与政治的关系,然后归总起来讲教育的本质特点与基本规律;第二篇从分析学校的基本矛盾入手,明确提出学校的基本矛盾就是存在于学校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对象之间的矛盾,把教育目的、对象和机构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纲,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受这个纲制约。以下各篇,从第三篇教学论起都是为了解决学校的这个基本矛盾。

《自学心理学》唐自杰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85年出版。该书在体系上,较一般普通心理学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用心理活动范畴的二分法,即分为意向活动和认识活动,统帅全书;二是把心理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专列一章。在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阐述上,亦有不同于一般普通心理学之外,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讲述心理活动范畴的分类,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心理学的指导思想、任务和方法,心理活动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意向活动的主导作用,心理过程和个性的关系,以及关于注意、情绪、思维、意

识、心理的年龄特征。

二、论 文

《我们对于教育底主张》张澜著,载《现代教育》1929年第1期。该文是张澜任四川大学校长时为《现代教育》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文章尖锐地揭露教育的时弊,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作者指出,教育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又是政治的一个桠枝,不能在社会政治之外而独立,所以只有完成社会和政治的改造,才能完成教育的改造。

《现代心理学的派别》刘绍禹著,载国立成都大学《现代教育》1929年第一期。文章综述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各个流派及其主张,并详细介绍各派的实验依据,指出现代心理学有很大的发展,大致分为四大派别:构造心理学派,主张认真分析人的心理现象。机能心理学派,主张主要研究心的机能。行为心理学派,主张主要研究人的行为。完形心理学派,主张注重模型的研究。作者提出:“学习、研究心理学的人,不能蔽于一人一派的学说,当执长弃短,融会贯通,这才是我们今日治学应有的态度”。这一思想充分反映作者重视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并以此为基础而发扬光大的治学精神。

《遗传与环境问题研究之批判》刘绍禹著,载四川大学《教育半月刊》1949年第八期。该文指出,极端论者,

常喜偏袒一方,认为遗传或环境居于主要地位。作者在详细地介绍分析遗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观点、主要学者及其实验方法之后指出,遗传与环境两种决定论虽各具理由和证据,然而事实上个体的发展是遗传与环境交互影响的结果,决无任何一种心理品质的发展可以没有遗传的基础,或是可以不需要相当环境来培育的。遗传是个体与亲族间之联系,环境是个体所处的历史空间,无论时间上多么久,空间上多么远,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个体的发展。文章进一步从生物学、数学的观点说明“基因之遗传功能,必须有待于种种环境因子合作始能发生,个体等于遗传与环境相乘的积”。结论是“个体发展是由遗传与环境二因素决定,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吕氏春秋教育思想研究》邓胥功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一期。文章指出《吕氏春秋》(公元前329年)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与《学记》一样,是我国教育史上前人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宝贵遗产,尤其是“劝学”、“尊师”、“诬徒”、“用众”四篇对教学之方的论述很有见地,值得研究。教师对于学生喜悦的情感必须培养、爱护学生必须如爱护自己,学生生活必须适当安排,群众力量必须善于利用,凡事要以合情合理为出发点,而后又要以合情合理为归宿,这些教

育思想和原则,其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川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蒋梦鸿著,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创刊号,1960年,该文是作者地1932~1935年川北通、南、巴革命根据地老区进行实地调整后写成的研究报告,是介绍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文化教育的重要史料。

《5至8岁儿童时间知觉的实验研究》黄希庭、张增杰著,载《心理学报》1979年第二期。这是一篇实验研究报告,研究的目的是探明5~8岁儿童对秒为单位的时间知觉发展的特点及其主要阶段,文章反映作者用再现法对5~8岁儿童的随机样组进行实验研究的方法、过程和结果的统计分析。此研究报告全文被美国出版的《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杂志1980~1981年第八卷第二期译载,此研究成果亦为国内外一些心理学教科书所引用。

《对一次认识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唐自杰著,载《心理学报》1979年3期。该文是根据作者亲自从事的一项实践活动——提取农药“九·二〇”清液并进行测量,对其中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分析考察而写成的。作者认为:认识过程的发展是正确方面与不正确方面矛盾斗争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强度的意向活动的指引下,通过

反复实践和积极地感知和思维而发生、发展的。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必要的感性材料,克服脱离实际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倾向。心理学对于人的认识活动过程的研究,应该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注意从生活、实践的实际活动中,对认识过程的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如果只从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思维、想象各个断面孤立地分析研究,特别是只用实验室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就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就很容易走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歧途。

《学记在我国古代教育理论上的成就》戴续威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二期。文章指出《学记》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最早一篇比较系统完整的教育理论专著,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际,从教育目的到教育内容,从教师到学生等多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教育的创造和贡献,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试论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谢麟著,载《论教育的本质与职能》一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该文针对长期把教育视为上层建筑,片面强调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弊端,提出全面理解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文章论述社会生产的各个阶段教育与生产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从教育目的的制定,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的选择,以及教育事业发展的

规模和速度等方面,说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教育发展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应当正确认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

《教学辩证法》查有梁著,载《教育研究》丛刊1980年第一辑。该文提出教学论的根本原理是适应和转化原理,教学论的基本原理有三条:明确意义,增强兴趣。逐步深化,周期循环。掌握结构,培养能力。该文提出教学论的十多对范畴,并逐一用一个原理和三个原则来记述。作者应用了信息科学的成果等论述教学原理和原则,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文章在辩证法和现代科学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教学理论的框架,对传统的教学论有较大的突破。

《对120名优秀教师和模范班主任心理特点的初步分析》刘兆吉、黄培松著,载《心理学报》1980年第三期。该文是根据作者对五个省、区和三个大城市的120名优秀教师和模范班主任的抽样调查材料进行心理分析后,从中归纳出他们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心理品质14条,其中11条是优秀教师和模范班主任共同具有的,是对教师心理的系统研究报告。

《后进学生的特点及其转化工作》吴祥祯等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四期。该文主要探讨思想品德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文章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关心青少年一

代成长的高度出发,强调教育工作者要研究和掌握后进生转化的规律。作者通过调查研究,根据大量资料分析后进生的状况,具体地指出后进生的思想和道德方面缺乏正确的是非观念,而有自尊自傲和自卑自弃的心理状态,并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等方面的特点,提出转化后进生应掌握的原则和方法,首先是热爱学生,建立威信,善于发现后进生微弱的闪光点,及时引导并加强正面教育,其次是造成良好的教育环境,力争各种教育力量的配合。

《荀子的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 罗忠恕著,载《心理学报》1981年第一期。作者认为,荀子是我国古代较全面地论述人的心理活动的思想家,他以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为依托,形成系统的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荀子对“天与人”的关系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阐述,荀子的人性论,即“性与伪”的关系,无非是说人的自然性不够美满而已,并非人生来就是恶人,所以荀子特别强调人为的努力和社会的矫正,即所谓“化性起伪”。荀子的这两个观点是他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

《试论戴震的心理学观点》 韦茂荣著,载《心理学报》1981年第四期。作者认为,在戴震的哲学著作中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对戴震的心理学观点作了具体的分析的概括之后指出,戴震的心理学观点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

辉,其社会意义是进步的,是中国心理学史中的宝贵财富。

《个体品德形成的几个问题》 曾欣然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三期。该文论述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个体品德形成的几个问题,论证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伦理、与个体品德的基本区别,提出个体品德的基本心理结构由品德认识、品德情感、品德动机、品德意志行动和品德社会效果的反馈系统效应等组成的新见解,分析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伦理与个体品德之间的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发展的辩证关系,并指出相互转化的四个环节,品德心理发展的内部矛盾及品德心理发展的动态类型。

《西方课程的发展和当前的改革》 何志汉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三期。该文分三个部分介绍西方课程的发展和改革状况,提出美布鲁纳的课程结构论、苏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西德根舍因的范例式教学论,是西方课程现代化的三种典型。文章第一部分从柏拉图的七艺古代课程,讲到夸美纽斯的泛智论近代课程,并介绍百科全书派、形式教育论和实质教育论以及欧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主张,最后阐述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观点。文章第二部分叙述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引起欧美各国出现的教学改革浪

潮,有布鲁纳的新三艺,赞科夫的小学教学新体系,根舍因的教学实验等。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各国课程改革的重点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的改革,并指出以上改革的利弊。文章第三部分总结西方课程改革的特点,并提出应正确处理知识与智力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学习和劳动、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的关系,使课程内容与学生接受能力相适应,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孔子教学思想述评》徐仲林著,载《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第215~22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文引用孔子的大量论述资料,分为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学的意义、学的原则、学的方法五个部分,对孔子的教学思想进行述评。作者指出,学而优则仕是孔子教学活动的总目的,教学相长、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启发教学、引用名人言行、比喻等是孔子的教学方法,也是孔子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好学、乐学、博学、渐进有恒、虚心学习、善于学习,是学的意义和原则,多闻多见、学而思之、学而行之是学的方法。作者提出,孔子对于认识过程的理解,对于学、思、行的内容存在片面性,但他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孔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实践家,也是伟大的教育思想家。

《新时期教育工作的最高准则》高

振业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二期。该文是作者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教育条文的研究,用历史比较方法分析其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教育性质、任务和管理等方面的基本内容,重点论述教育的管理与领导、教育领导权限的划分、教育方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学术自由和发明创造奖励等五个问题。

《儿童的思维和语言》蒋明澄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二期。作者提出关于儿童思维发展的见解,认为儿童思维发展的历程是:前思维结构(知觉结构)、前思维结构向具体思维结构的过渡、具体思维结构、具体思维结构向抽象思维结构的过渡、抽象思维结构。儿童语言发展的分期有:前语言期、语音期、单词期、二单词句期、三单词句期、简单句子期。文章指出,研究儿童的思维和语言的发展,在理论上有助于了解个体意识的形成,在实践方面为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儿童思维和语言发展的年龄特征的根据。

《略谈中国古代家庭中的儿童教育》李定开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三期。该文简述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丰富内容和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方法,引用了颜之推《颜氏家训》、张扬园《训子语》、王应麟《三字经》等古书,概括总结古代蒙童教育的

经验有三个方面,即生活教育的培养、自然知识的传授、道德行为的劝导。我国家庭教育的原则有:早教原则、环境习染原则、诚信无欺原则、爱教结合原则和均爱原则。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经验对现在的幼儿教育工作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文翁化蜀的几个问题》 蒋梦鸿,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该文从文翁遣吏至京师受业,在成都修学舍兴学,学成回川后授官三个方面,详细考察历史事实,充分论述文翁化蜀的具体内容措施,推定文翁兴学的具体时间不会早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而司马相如第二次奉命使蜀的时间是在此之前4年,即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从而否定文翁曾派司马相如东受七经,回川后在文翁石室文学精舍中讲学的误传,以丰富的史料订正文翁与司马相如的关系,肯定文翁兴学化蜀的功绩,忠实地阐述了巴蜀教育文化的历史。

《谈谈关于正确理解青年的自我意识及其发展》 张增杰著,载《心理科学通讯》1983年第四期。文章认为自我意识的分化、矛盾、统一、转化,是青年期自我意识发展的特点。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不仅与年龄增长有关,而且受个体所接触的具体社会生活实践的制约,特别受其特定的社会关系制约。个体意识的发展对个体意识倾向的形成至关重要。青年期自我意识的发展,是

人的一生中个体意识倾向形成、稳定的关键时期。文章强调,在青年的自我意识开始分化、出现矛盾的阶段,是十分有利于对其教育、引导的阶段,进行理想教育十分重要,它是导向积极自我意识统一、转化的关键环节,也是防止和纠正消极自我意识统一的重要手段。

《新生儿能力的发展》 李长岷著,载《心理科学通讯》1984年第三期。作者认为,新生儿发展的研究,对了解个体心理发生和起源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该文内容包括:新生儿期的意义,新生儿的神经机制和活动动态,新生儿的反射行为,新生儿的感知能力等。文章指出,对新生儿的正确认识,对新生儿发展的深入研究,对发展心理学和保育方法揭示了新的观点。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庾国琼著,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三期。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20篇,被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之推提出早期教育思想,并以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年龄特点,提出教育婴孩的主张,儿童常常信其所亲,行其所服,因而父当以学为教,以身作则,严慈结合。他认为学习的最低要求在习一艺之长以自资,最高目的在利行施用,以应世经务。颜氏强调勤学好问,注意节操。

《大学班集体人际关系的心理学研究》 黄希庭、游季甫等著,载《心理学报》1984年第四期。该文综合运用社会测

量法、访问和观察法,对大学文科和理工科一、二、四年级的21个班集体人际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的主要结果是:

大学生班集体非正式的内部结构中,小的数量一般为3~9个,规模一般为2~4人,形成小团体的主要原因是心理上的相容性,其中60%的小团体正人缘因素占优势,负人缘因素占优势的仅为18%。大学生班集体中两极人物(人缘型和嫌弃型)都各有其自己的个性特质,各年级中两极人物在性别上的百分比无显著差异。大学生在班集体中对选择学习、郊游和今后工作的朋友时,在心理因素的要求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对品德和心理相似性的要求则是共同的。大学生对班集体领导人的心理品质主要是从政治思想品质、组织能力、学习成绩、知识水平、工作作风和群众威信等五个方面来要求的。大学生的自我观念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且与他们的人际关系有密切的联系。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及其对于教育科学的意义》查有梁著,载《教育研究》1984年5、6、7期。该文首先概括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基本内容,接着综合三论而提出系统科学的三个原理:反馈原理、有序原理和整体原理,论述三论提出的三组范畴:系统、要素、层次、结构、功能、涨落、过程、状态、交换。作者对上述三个原理和三组范畴对教育科学的意义逐一阐述,进

而论述三论的发展对课程改革、电化教育及发展教学论的影响。

《教学过程本质若干问题之我见》洪宝书著,载《教育研究》1984年第11期。文章首先指出,把教学过程等同于智育,而把德育、体育、养育列入教育过程,这是传统的认识,概念混乱。作者认为,凡是为了使受教育者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对受教育者施加直接影响的活动,都属于教学活动。因此,教学活动包括课程性的和非课程性的,按一定规律交替组合而成为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本质是受教育者在教师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积极主动地发展自己,使自身的现实发展水平逐步达到培养目标要求的过程。教学过程的主要矛盾,是受教育者的现实发展水平与培养目标之间的差异,这个矛盾贯穿一切教学过程的始终,支配和决定着一切教学活动,规定和影响教学过程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作者希望以教学过程的主要矛盾为主线,建立中国教学论的逻辑体系。

《文心雕龙中的文艺心理学思想》刘兆吉著,载《心理学报》1985年第二期。作者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分析刘勰论文艺创作中的心理学思想。文章在刘勰论文艺创作的过程和创作的风格中,对想象、思维与语言、情感、才能气质、作者性格等四个心理学问题进行分析和整理,指出《文

心雕龙》是中国古代蕴藏着丰富的文艺心理学思想的伟大著作。

《论美育的基本特征和职能》 曾成平著,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二期。该文主要探讨美育的本质特点及其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职能。作者谈到美育的涵义,在引用中外著名学者的言论后,归纳为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培养审美情感和发展创造美的能力。作者认为美育的基本特点是,形象感染性,以情动人性,娱乐性,发展心理的教育性和发展生理的教育性。作者指出美育对德育、智育、体育的三种职能,认为美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整体性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 潘后杰著,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三期。该文从四个方面对夸美纽斯的教育要适应自然的问题作了分析和论述:即夸美纽斯提出自然适应性的原则的时代背景和世界观基础;要求按照自然法则改革旧教育,建立新的学校秩序;要求依据人的本性和自然倾向进行教育、教学工作;要求遵照儿童的年龄和个别差异,确立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作者认为,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适应人的自身发展的秩序,对于人的多方面和谐发展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个性的动力系统》 张粹然著,载《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四期。该

文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个性是非常复杂的、多层次、多水平、多侧面和动力的有机整体,是各种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高度发展而完满的统一,认为个性结构的动力仍是以需要为基本动力,以性格为核心,以动机、愿望、兴趣、爱好、理想、世界观和信念等个性倾向为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决定作用。该文指出,当前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理想和世界观教育,培养广泛的兴趣和高尚的情操,形成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所具有的社会和个人统一的人生价值观是非常必要的。

《试论现代教育概念的划分及其基本特征》 叶上雄著,载《教育研究》1985年第四期。文章指出,现代教育是一个时代范畴,不能把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作为对称概念。杜威的现代教育,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是教育史上的两个流派,不能以此来划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现代教育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性质教育的时代概念。因此,现代教育有反映时代特点的共同特征:现代教育是顺应现代生产需要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现代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普及教育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班级授课是现代学校教育模式和体系的基础。教学内容、方式、教学理论现代化。

第二节 主要学者选介

张澜(1872~1955) 四川南充人,字表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1903年至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1904年归国,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1906年赴成都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907年返南充先后创办私立高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南充端明女塾,并兼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学监。1917年出任四川省省长,任内与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交通部商洽,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捐助吴玉章组织的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陈毅等200余人的旅费。1921年他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端明女子学校校长,倡导普教与职教结合,在南充县中除办普通中学外,增设农、工、医、师范等职业班,对南充地区蚕桑事业及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26~1930年间任成都大学校长,借鉴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校内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一时学校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园地。1943年,任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引用新人,力除积弊,以慈惠堂

作为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的基地。一生重视自我修养,有高尚的道德、顽强的民主精神和强烈的正义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的教育代表作有《我们对于教育底主张》。

吴玉章(1878~1966) 四川荣县人,原名永珊。生平详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1903年留学日本,1915年和蔡元培等在法国共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20年代起先后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创建华北大学,主持《新华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工会主席、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吴玉章的主要贡献在革命文化教育方面,大力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主要论著有《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之演说》、《中国历史教程》、《为贯彻提高教育质量的方针而斗争》、《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中国新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方案》、《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等。

邓霄功(1888~1976) 四川巴县人,字只淳。1907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回国后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主编《四川

教育》杂志,次年代理成都高师校长,创建附属小学兼任校长,办学成绩显著,经全国教育会评选名列第一。1922年赴欧美考察教育,1925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师范科主任,1931~1952年任四川大学教育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起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邓胥功的主要贡献在教育,专著有《教育学通论》、《教育学大纲》,论文有《吕氏春秋教育思想研究》、《评论师范学院制度》等。

晏阳初 生平见本志社会学。

叶麟(1893~1977) 四川古宋县人,字石孙。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入法国里昂大学专攻心理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医学院等校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代校长等职。其间曾于1935~1936年赴欧美6国考察教育。从1952年起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著作有《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导师与学生间的距离》、《列宁对苏联教育的贡献》等。

傅葆琛(1893~1984) 四川华阳县人。1916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后去美国俄勒冈州农业大学森林学院学习,1924年获康乃尔大学乡村教育

博士学位。同年冬,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之邀,回国任该会乡村教育部主任,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8年起,先后在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授、系主任、院长等职。1952年在西南师范学院、成都体育学院任教授。傅葆琛主要从事平民教育,著作有《中国乡村小学课程之改造》、《乡村民众教育概论》等。

刘绍禹(1900~,1981) 四川新津县人。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堂毕业,留学美国格锐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国立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并创办《现代教育》、《教育半月刊》。1935~1936年赴美考察教育,回国后在四川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大学教务长、副校长,1957年任四川师范学院院长。刘绍禹的主要贡献在心理学。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必须从客观科学实验入手,注重生理基础,反对内省法,反对把心理的科学方法与哲学思辩混为一谈。主要著作有《年龄与学习的关系》、《现代心理学的派别》、《心向与相属原则》、《记忆与理解》、《遗传与环境问题研究之批判》等。
